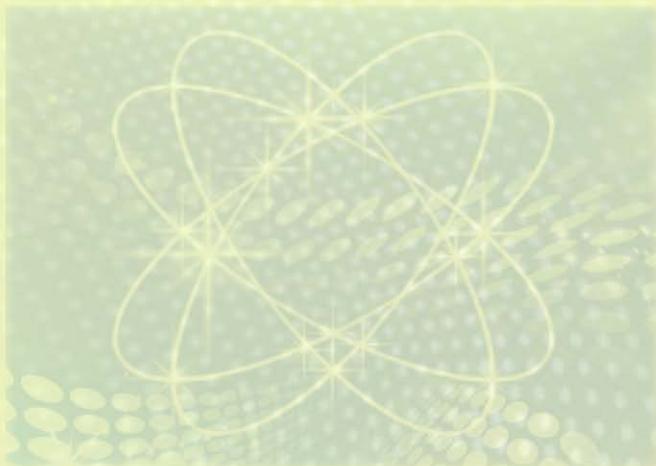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第二十卷

姚家余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20/姚家余主编. —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
2006. 3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ISBN 7—5634—2193—9

I. 中… II. 姚… III. 政治家—列传—中国 III. K8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647 号

中华政治家百杰传

姚家余 主编

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吉林省延吉市延边大学院内)

徐水精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85 字数:430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634—2193—9/K·152

定价:1180.00 元(1—25 册)

目录

杨士奇.....	1
----------	---

能够辅佐永乐、洪熙、宣德和正统四朝皇帝，日理万机，运筹帷幄，能处理好国家大事，却管教不了自己的儿子，其子因杀人而伏法。对此，后人叹息不已。

况钟.....	49
---------	----

当年，他做苏州知府，离任时，数万郡民祈留，因此又被留任三届。一位知府，受到百姓如此爱戴，史所罕见，而这样一位人物，后来参与朝政又将如何呢？

于谦.....	100
---------	-----

外族入侵，京师被困；危在旦夕，兵部尚书于谦，分遣诸将列阵九门外迎敌，并亲自率兵督战，打退了围困之敌，挽救了明王朝的统治。可是，朝廷竟以谋逆罪将他处死！

徐阶.....	157
---------	-----

奸臣严嵩父子擅权当道，厚颜昏庸，朝臣被迫害致死者甚多，人人噤若寒蝉。面对如此情形，徐阶谨慎以待，用韬晦之计，将严氏父子拉下马，为朝廷除了一大害。对此，后人褒贬不一，争议不休。

海瑞..... **212**

嘉靖朝，世宗朱厚，喜神仙道术，祈求长生不老，政事荒怠，国力渐衰。海瑞见状，购买棺材，诀别妻子，辞退仆人，上疏皇帝，以死陈谏。皇帝大怒，将其逮狱论死。海瑞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杨士奇

能够辅佐永乐、洪熙、宣德和正统四朝皇帝，日理万机，运筹帷幄，能处理好国家大事，却管教不了自己的儿子，其子因杀人而伏法。对此，后人叹息不已。

巍峨险峻的武夷山上的冰雪融化了，条条溪水奔流而下；幽雅峻秀的大庾岭上的淙淙泉水，滴成一条条喧嚣的小河，和武夷山上的溪水，东西两条水源，汇合成一条汹涌澎湃的赣江，弯弯曲曲向北流去，赣江滋润了江西的大地，也哺育了大地上的优秀儿女。

当赣江流入泰和县时，在镇郊冲积出一大片草地平原，是百姓放牧的好地方。每当风和日丽之时，就有成群结队的牛羊在草地上吃草、嬉戏。牧童骑在牛背上，吹着竹笛，悠扬动听的笛声在草原上空回荡。

在放牧的群童中，有一位七八岁的男孩，虽然身材瘦弱，衣衫褴褛，却眉清目秀，双眼炯炯有神。他一边放牧一边读书，牛儿走散了，有的走得很远，他也不管，只是捧着书本，聚精会神地读着。有时高声朗诵几句，有时摇头晃脑，面带微笑。当牛群四散，找不到踪影时，他便撅起嘴唇，打几声口哨，只见牛儿从四方奔回，围着牧童又吃起草来。

夕阳西下，晚霞满天时，牧童方骑上牛背，吹着口哨，慢慢地将牛群赶到泰和镇郊一幢深宅大院里。然后，牧童来到江边一间茅草房边。未等进门，便高声喊道：

“娘，孩儿回来了！”

只听“吱扭”一声响，房门打开，从里面走出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腰里扎着破围裙，软声细语嗔怪道：

“寓儿，天都如此黑了，才回来，赶快进屋吃饭吧，怕是饿坏了？”

“娘，孩儿不饿。娘，你猜，孩儿今天读了几页书？读了三章、八十三页《论语》，一、二章孩儿都会背了，不信？孩儿给你背一遍：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快别背了，娘相信。”中年妇女道，“快吃饭吧。饭后，还有功课呢！”

说着，母子进了茅屋。屋内陈设十分简陋，只有一锅灶，一桌两椅，一架织布机而已，桌上点一盏小油灯。

儿子坐在椅子上，母亲端来热气腾腾的饭菜，看着儿子狼吞虎咽吃饭的情景，不觉怜悯起来，便说道：

“寓儿，娘看你累了，今晚不背书了，早一点安歇，移到明天慢慢读吧！”

“不！”孩子回答道，“我还要背书，娘不是多次说，今日事今日毕吗，我要把《论语》的学而篇、为政篇、八佾篇都背会，七天之内把《论语》的二十篇都背熟，下个月，我就要开始学习《孟子》了。”

“好孩子，你有这个毅力就好，娘就是怕你累着。如果不累，那就背会第三章‘八佾’就行了。早点睡吧，明天还要起早去放牛呢。”

“孩儿明白。”寓儿吃完饭，操起《论语》，在小油灯下，又读起来。

母亲收拾完碗筷，坐在织布机前，脚蹬机轮，“咯嗒咯嗒”地织起布来。二更漏鼓响过，孩子坐在桌子前，手拿《论语》睡着了，母亲停止了织布，把孩子抱在床上，脱了衣服、鞋袜，盖上被，叹息着又回到织布机前。

漏鼓滴过三更，茅屋的灯还在亮着，月牙已经挂在树梢，屋内“咯嗒咯嗒”的织布机声，和赣江“哗哗”的流水声，间或几声水鸟、青蛙的叫声，汇成了泰和镇郊的动听的交响曲。

这个男孩就是杨士奇，这是杨士奇童年时期母子相依为命的情景。

杨士奇，名寓，号东里，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生于江西泰和县郊，祖父、父亲都读书不多，皆以务农为生。杨寓六岁父亲患瘟疫去世。母子俩无以为生，母亲昼夜纺纱织布，寓儿为财主放牛，维持生活。

杨寓自小是一个聪明乖巧的孩子，从五岁起接着母亲教导，开始读书。母亲略通文字，便从《三字经》、《百家姓》教起，寓儿只用一个月，便将《三字经》背熟，之后又学《百家姓》、《四书》、《五经》，现已学到《四书》中的“论语”，每日一边放牛，一边读书。他为了放牛不影响学习，便训练牛听他的口哨，口哨一响，牛群便乖乖地朝他奔来。所以，他在赣江边上放牛，可以放心大胆地读，牛群可以到处自由自在吃草，他从六岁起放牛，到十四岁，八年间，从没丢过一头牛，而将《四书》、《五经》全部学完、背熟。

十四岁的杨寓，个头已经超过了妈妈，长得高大英俊，但显得瘦弱；终日的放牧生活，皮肤晒得油黑。他除了放牛之外，还承担了家里的一切重活，像挑水、劈柴等等，所以在天亮前，要把这些活干完，然后，再到财主家去，将牛赶出圈。

一天傍晚，寓儿放牛回来，向母亲问道：

“娘，孩儿把《四书》、《五经》都学完了，明天该学什么了？”

“今天娘已经问了邻居老秀才，他说再学就要到吉安府郡学去深造，可是上学需要十两银子……”

“娘，快别说了，孩儿不去深造了，在家干活，孩儿有的是力气，咱娘俩吃穿不用犯愁！”

“那哪儿行，娘还要你参加乡试、会试，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呢，娘一定想办法，让你上郡学！”

“不用娘费心了，明天，孩儿就去打短工。”

“唉！娘的乖儿子，还是听娘的话吧，这才是孝心。娘一定想办法，让你进郡学深造！”

一个月之后，杨寓帮助邻居干完活归来，母亲将他唤到身边道：

“寓儿，娘有一件大事，想和你商量，娘想要改嫁，不知你的意下如何？”

“娘不是要守贞节，立牌坊么，怎么突然改变主意要改嫁了呢？”

“为了让你进郡学读书，娘不得不走这一步。”

“孩儿宁可不上郡学，也不能让娘不守贞节，劝娘还是不要改嫁！？”

“寓儿，还是听娘的话为好。娘为了社稷培养栋梁之材，为朝廷尽忠，就不能守节尽孝了，自古以来很多人不是忠孝难以做到两全吗？”

“娘，你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孩儿实在是于心不忍。”

“不必多说了，娘为了你进郡学读书，决定嫁给江东常来送鱼的罗大爷，他虽然年龄大一点，但是无儿无女，一辈子没结过婚，靠种田打鱼为生，积存几十两银子，除了和娘办喜事之外，剩下的银子就送你去读书深造。”

杨士奇跪下泪流满面对娘说道：

“娘为了孩儿读书走到这一步，孩儿实在是罪该万死！”

母亲也满眼含泪将杨寓扶起来，说道：

“快起来，寓儿不要这么说，娘走这一步，自古以来也有不少先例，只要你长大成材为国尽忠，娘比什么都高兴。娘准备半个月就办事，月底就送你到吉安府郡学去读书。”

就这样，杨寓的母亲嫁给了一位老实厚道的农夫。他把杨寓当做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从此改姓罗，叫罗寓。

罗寓进入吉安府郡学学习之后，学习很刻苦，他不但学习天文、地理、军事、史学等知识，还去攻《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尤其是对司马迁十分崇拜，对《史记》的内容和形式都做了深入地研究，认为《史记》在历史叙述和文学描写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境地，真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罗寓在郡学学习六年，到了廿十岁，已经学有所成，在郡学生员中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所学的书底之厚，有些教谕也自叹不如。

洪武十八年(1385年)，罗寓的继父去世，郡学读书不得不中断。他又归宗杨姓，以教授生徒为生，以便抚养母亲。

杨寓教书认真，因材施教，讲究方法，受到生徒家长的欢迎。一时间，泰和县境内都知道有一位年轻的私塾先生，书、经讲得都好，争相聘用。杨寓还常常在湖广、湖南等地游学，在江夏设馆招数百生徒，亲自授课，其职务等于担当了一个规模较小的小学校长。

杨寓一边教学一边学习，教学相长，学识更加渊博，成为吉安府一带儒学之佼佼者。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杨寓三十三岁，正当有为之年。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继位，是为建文帝。建文元年(1399年)，朝廷于全国各地征召诸儒撰修《太祖实录》。吉安府向翰林院学士黄子澄推荐杨寓，黄子澄命其进京考核，方可决定录用与否。

杨寓得到被征召入京考核参加撰修《太祖实录》的消息，很高兴，便兴致勃勃地跑回家去，向母亲报喜，与妻子儿女话别。

母亲道：“寓儿有了今天，不辜负娘的一片心血。到了京城不比家乡，处处要留心，不要做错了事，不管对谁，都要做善事，不要做恶事。”

“请放心，儿子一定牢记娘的嘱咐，等工作定下来之后，就接娘到京城去住。”

母亲为杨寓做了一身布衣穿的蓝布衣帽，妻子又为其做了一双千层底黑布鞋。穿上之后，显得英俊潇洒。

春天，赣江两岸，黄色的报春花竞相开放，杨柳吐绿，杏花、李花、桃花争奇斗艳，引来蜂儿蝶儿翩翩起舞，黄莺振翅高唱。

杨寓只身一人，登舟北上，心情格外激动。他从五岁起在母亲的教导下，刻苦读书。虽然两次丧父，家庭生活十分贫困，但还是一边放牧、一边教书、一边学习，二十年如一日，今天总算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他心里想，到京师之后，必定得到重用，效忠皇上，一展宏图。

杨寓昼行夜宿，有时乘船，有时步行，数日后方来到应天。久居泰和镇，只有几千人口，一条小街，适逢集日，遍地车马，甚感家乡之广大；后来到吉安府上郡学，府城有数万人口，数条街道，商店林立，车水马龙，行人熙来攘往，又感府城之威严而令人神往；今日进入应天城，见数条街道纵横交错，店铺作坊到处都是，行人熙熙攘攘、数不清的车马排成大队，难以行走。尤其见到二层、三层的酒楼。有亭台楼阁、深宅大的王府、将军府，还有皇宫高高的红色城墙，城墙四角高耸入云的角楼，角楼翘檐上“叮当”作响的风铃，这一切都令杨寓惊诧不已，他真正来到天堂，是神仙生活的地方。

杨寓来到秦淮河边一家客栈，住下以后，静下心来想一想，应考将要出的题目，自己应如何对答，如何撰写文章。晚间早早安歇了。第二天清晨，天未亮就起床，洗漱完毕，穿戴整齐，即赴城中心翰林院应考。

翰林院为一深宅大院，院内有三幢大殿，依次而建。杨寓来到第一幢大殿将吉安府的公函交与守门的役卒，役卒入内通禀一位官吏，将其引进大殿。

殿内宽敞、高大，装饰得富丽堂皇。在一排排书案后面已经坐满了人。杨寓被领到一张书案前坐下来，他左右看一看，都是陌生的面孔，大多数都是花白头发的长者，和他同龄的中年人几乎看不到。

片刻后，一位官吏宣布考核开始，每人当场写两篇文章，一篇为定题，另一篇为自选题。以写得快、好为优胜。在满殿应考人中，杨寓第一个写完，交给官吏，回到客栈休息。

第二天口试，由翰林院修撰王叔英主考，向杨寓提出若干问题，杨寓皆对答如流，尤其问到汉代司马迁及其《史记》，杨寓如数家珍，并可《史记》倒背如流，令主考官王叔英惊叹钦佩不已。

数日后，在翰林院大门前张榜公布：

敕修《太祖实录》者，以礼部侍郎董伦、王景为总裁官，太常少卿廖、高孙志为副总裁官。征李贯、王绅、胡子昭、杨寓、罗恢、程本立等为纂修。其中只有杨寓以布衣身份被选征，授教授衔。

在杨寓即将上任时，修撰王叔英又向皇上举荐，经过他的考核，杨寓对秦、汉以来的历史研究有很深的造诣，是位难得的史才，可入翰林院，充当编撰官。建文帝批准王叔英的奏疏，并降旨命侍讲学士方孝儒为《太祖实录》的总编辑，杨寓充当其助手。

由此，杨寓即进入了皇帝的智囊团兼秘书机构的翰林院，逐步成为朝廷举足轻重的人物。

杨寓将工作安顿下来之后，即向翰林院请假，回乡将母亲、妻子儿女接来应天居住。

杨寓返乡时，吉安府知府等官吏听说他们举荐的布衣杨寓进入翰林，甚为高兴，为其摆宴庆贺。泰和县知县和家乡父老也为杨寓一家饯行。杨寓虽未中过举人、进士，但以布衣身份在朝廷当了大官，也是家乡父老的荣耀。家乡一些长者，都夸赞扬寓之母吃苦受累终于将儿子培养成才，是有功之母。

杨寓在应天府街内买了宅院，家中有了仆人、丫鬟，母亲颐养天年，妻子操持家务，照看子女。杨寓有个儿子名叫杨稷，已经十八岁，十分淘气，不爱读书，今天上树掏雀窝，明天下河捞鱼，后天上野地抓兔子，无所不干。妻子管不了，杨寓忙于朝廷事务，没时间管，而老奶奶又惯着他。儿子读书不上进也令杨寓操心不已。

杨寓参与编撰《太祖实录》成绩显著，不仅编的速度快而且质量高，受到礼部侍郎董伦和侍讲学士方孝儒的表彰，都认为杨寓是编撰史书的奇才。

当时，朝廷采用方孝儒的建议，更定官制，命吏部考核翰林院诸儒，命每人写一篇策书，吏部尚书张看到杨寓的策书，给予很高的评价，说道：

“杨寓的策书，不是一般徒生的言论，没有高深的学识是写不出来的。”

张奏请皇上以杨寓的策书为考核第一名。张特意接见了杨寓，对其亲切地说：

“老臣为官多年，第一次看到如此好的文章，也算是饱尝眼福了。老臣尚有一个建议，你的名为寓，字音并不响亮，送你一个表字‘士奇’如何？”

杨寓答道：“老前辈的夸赞，实在是过誉了，晚生的文章毛病很多，尚需加倍努力，让其更臻完善。还感谢老前辈所赐之表字，‘士奇’二字甚合吾心。”

由此，杨寓，以表字在朝廷流传，均知其字，称为杨士奇，不知其名。

建文帝即位后，并州县、革冗员，考察官吏，诏行宽政，重农桑，兴学校，进行一系列的改革。接着，就与兵部尚书齐泰及黄子澄共谋削藩，除去威胁皇位的各个藩王的兵力。首先将周王废为庶人，接着，又将齐王、岷王、代王废为庶人，湘王自焚而死，独燕王佯诈称病。建文帝接到密告，说燕王实无病，正欲讨伐时，燕王自北平举兵，以诛齐泰、黄子澄为名，攻打战略要地，名曰：靖难。这一仗打了四年，最后以燕王得胜，建文帝失踪而告终。

在靖难之役中，杨士奇基本上采取了观望的态度。起初翰林院大多数儒士都站在建文帝一边，认为建文帝是太祖遗嘱所封的皇帝，名正言顺，大规模削藩也是为社稷着想。但燕王起兵后，以讨伐齐、黄二位大臣为名，经过四年的征战，最后取得了胜利。翰林院的不少儒士又转变了立场，认为燕王是位能干的将军，太祖起初欲立他为太子，只是群臣的劝阻才改变了主意，希望大明朝由燕王来治理，国家一定会强盛。杨士奇就是迅速转变立场者之一。

当成祖命方孝儒起草即位诏，想要重用大批儒士时，方孝儒坚决不从，并大骂成祖，被诛杀十族。杨士奇认为方孝儒是个人才，甚为可惜，但也过于迂腐，不值得学习。

明成祖即位后，发现杨士奇是位年轻有为的大臣，命其为翰林院编修，不久又选入内阁，主管机务，成为皇帝身边举足轻重的人物。

数月后，又晋升为侍讲，成为正三品的大臣。杨士奇给明成祖的印象越来越好。

永乐二年(1404年)四月，成祖立长子朱高炽为皇太子。

朱高炽自幼端重沉静，言行有礼，好学问，和儒臣的关系融洽，常在一起谈论学问。年龄稍大之后，练习骑马射箭，箭法精明，百发百中。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曾被燕王立为世子，太祖在世时曾赞其有“君人之识”。成祖即位后，商议立太子之事，武将们大多数要求立朱高煦为太子。朱高煦为成祖第二子，朱高炽同母弟，屡立战功，多次救成祖于危难之中，性格勇猛机智，力大无穷，为成祖所宠爱。但大臣们认为应按祖规，力主立长子为太子。最后，成祖遵从了大臣们的意见，正式拥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当时朱高炽十六岁，需进一步学习礼仪、典章制度、文史知识等，还要选择师长，以便使其尽快成长起来。当时可以充当太子老师的人选很多，大多数都不太适合成祖的心愿。有人提出翰林院侍讲杨士奇如何？成祖思考再三道：

“士奇乃布衣出身，自学成材，学识高深，实为难得，由他教授太子，朕甚为放心。”

于是成祖降旨，命杨士奇为左中允，每日在东宫为太子讲学，并协助太子办理成祖交给的一些事务。

永乐五年(1407年)，因杨士奇在东宫辅佐太子工作出色，被晋升为左谕德。

吏部大多数官员都认为，杨士奇办事很谨慎，从不马虎从事，每做一件事，事先都考虑得很周密，把可能发生的事都想到了，所以凡是委托杨士奇所办的事，都可以放心。

杨士奇大多数时间是住在紫禁城内，他的府第在应天城中，相距只有几百步之远，但他很少回家。多半是太子朱高炽想起来，劝他回家去住上一两天，太子还为杨母备上一点礼品。杨士奇感恩戴德，再三向太子殿下叩拜。杨士奇回家后，母亲、妻子儿女们都非常高兴，像过节一样庆祝一番，尤其是淘气的杨稷跳着叫着扑向杨士奇的怀里高喊：

“爹爹想死儿子了，你应当经常回家来看看！”

尽管奶奶、母亲控告他这一段时间干了很多“坏事”，善良的父亲，被儿子的举动激动的泪水。低声说道：

“爹爹为了朝廷哺育太子殿子，没有经常回家来看你，实在委屈你了。这是爹爹的过错，等太子登基当了皇上，爹爹将会天天回家来陪你，弥补今天的过错。但是你要听奶奶和妈妈的话，做一个乖乖的好孩子！”

等稷儿欢天喜地走了之后，贤惠的妻子开始软语细声诉苦，当问到杨士奇天天住在宫内不回家时，杨士奇有些生气了，懂事的老母亲劝说道：

“媳妇关心你，问问是对的，大内的事在家中不能随便乱说也是对的，反正你的丈夫不敢干坏事，要是在大内干坏事，皇上也饶不了他！”

母亲说的一番话，把儿子、媳妇均逗笑了。

杨士奇不仅在家中从不议论公事，就是至亲好友也听不到他的议论。因为杨士奇知道他所接触的除了皇上、太子之外，就是皇亲国戚，皇宫内的事很复杂，有些事还说不清楚，就这些事随便乱说，传出去，有些话肯定会添枝加叶，一传俩、俩传仨，越传越玄，后果不堪设想，

最后将会给朝廷造成很大影响。为此，杨士奇立下誓言，公事、大内事，在家中、在亲朋好友中缄口不谈。

但是，他在成祖或太子殿下面前，常常说大臣们的好话，有了小过失为之掩盖。年中，成祖派杨士奇代表朝廷去广东视察。广东当时正与南洋等地岛国通商，十分繁华。当地官吏见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便百般逢迎，请客送礼，讨好杨士奇。杨士奇对各臣除了赠诗之外，一律拒收。等杨士奇回京后，广东布政使徐奇派人驾车拉着荔枝、芒果等土特产馈赠廷臣，徐奇为了不使土特产送错，写了一份礼品名册，由使者按名册往各位廷臣府第分送。待土特产送毕，使者返回广东后，不巧竟将礼品册丢失在应天府城中。有人拾到了写有朝廷主要大臣的名册，不知何用意，便交给宫廷锦衣卫，锦衣卫交给了太监，太监也不明真相，便交给了成祖。成祖阅后，知道是地方官吏向朝廷主要大臣行贿的名单，其行贿者是何人？及其行贿物品，不甚清楚。成祖立即使吏部调查。吏部尚书蹇义看到礼品册后，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见上面还有自己的名字，于是就下了一跳，上面还有兵部尚书金忠，翰林院侍读黄淮等人的名字，将他们请来，当场研讨，共同认定是广东布政使徐奇向廷臣馈赠土特产的名册。这些大臣们顿时惶恐起来。徐奇送的东西不多，但他们毕竟都接受了，有人行贿，他们受贿，这在洪武年代是绝对禁止的，轻则罢官，重则杀头。

蹇义将情况调查清楚后，即向成祖如实做了汇报。成祖见名册上有蹇义的名字，对其汇报半信半疑，成祖仔细看了礼品名册，上面竟没有杨士奇的名字。杨士奇已经官居侍讲，又是太子殿下的老师，地位十分显赫，馈赠廷臣没有他，使成祖感到奇怪，况且不久前还代表朝廷去广东巡察，于是传来杨士奇，问道：

“广东布政使徐奇向朝廷主要大臣送礼，爱卿可曾知晓？”

“回皇上的话，微臣知晓。”

“朕这里有一份礼品名册，上面没有你的名字，是何缘故？”

“回皇上的话，微臣去广东时，群官赠诗辞行，已经受之有愧。在他们研讨给谁送礼时，微臣恰巧有病没有与会，所以这次送礼独没有臣。现在群臣是否接受了徐奇的礼品尚不知道，况且礼物只是几斤荔枝，两只芒果而已，十分微薄，据微臣推测，应当没有什么其他用意。”

成祖听了没有再说什么，即命太监将礼品册焚毁了事。

接受礼品的各位大臣，都在朝廷办事，皆心不在焉，每人手里都捏着一把汗，不知何时灾难就降临到头上。可是过了数日，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大家都知道为礼品册之事，成祖曾经传过杨士奇，想必杨士奇从中说了好话，不然，如此严重的群臣受贿事件，怎能不了了之。大臣们纷纷找到杨士奇，询问成祖传他问话的情况，杨士奇笑道：

“诸位大臣请安心为朝廷效命，别无他事，详情无可奉告。”

由此，大臣们都知道杨士奇是一位大好人，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

杨士奇不仅袒护大臣，而且也袒护太监或宫女。有的太监触犯了大内之忌，如打破东西，与宫女调笑等等，按着宫廷的规定，轻则逐出宫去，重则廷杖至死。有好几位皆被杨士奇讲情留下来继续工作。还有的宫女不守廷规，悄悄怀孕，被杨士奇放生而去。

宫廷上下，都念念不忘杨士奇的恩德。杨士奇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所以，在成祖、太子面前威信很高，而杨士奇的举止更加恭敬慎重，善于应付，每一句话、每件事都能合成祖、太子的心意。

永乐元年(1408年)，成祖率大臣及官兵数万人北巡。命杨士奇、蹇义、黄淮留下辅佐太子朱高炽。

蹇义，字宜之，巴人，洪武十八年进士。授中书金人。燕王率兵进入京师，蹇义热烈欢迎并依附其领导，晋升为左侍部，数月后晋升为尚书。蹇义熟悉典故，达治体，军国事皆可以依靠他去办理。黄淮，字宗豫，永嘉人，为洪武末年进士，授中书舍人。常在成祖御榻前为顾问，参预机密事务的策划工作。杨士奇等三人都成为成祖的心腹，让他们共同来辅佐太子，留守京师，成祖是比较放心的。

太子朱高炽喜欢文辞，写诗，杨士奇劝说道：

“殿下应当留意《六经》中的《乐经》，有空闲的时间则看看两汉的诏令。作诗是雕虫小技，写几首就会了，不必专门学习。”

太子认为杨士奇说得对，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太子在杨士奇等人的指导下，开始学习《乐经》，并将两汉的诏令反复阅读、研讨，对两汉朝廷的大事有了深入的了解，并且可以写出明了简捷的奏章，学识不断长进。

永乐九年(1411年)，成祖北巡回京，立刻召杨士奇问其监国的情况，杨士奇道：

“太子殿下，每天刻苦读书，对太后、皇太后十分孝敬。殿下的天资很高，有过必知，知而必改，存心爱人，决不会辜负陛下的托付。”

成祖听了很高兴，赞誉杨士奇等三人辅佐太子有功，朝廷事务办理得井井有条。

永乐十二年(1414年)，成祖率兵北征，杨士奇仍然辅佐太子留守京师。这时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联合起来离间太子，说太子

的坏话。当年，靖难之役，成祖起兵时，汉王多次立过战功，并救成祖于危难之中。当时，成祖心情激动时，曾经答应过等了登基后拥立汉王为太子。但成祖即位后没有付诸前言，汉王因而怨气冲天。成祖还特别宠爱赵王高燧，因为他年龄太小，常常博得父皇的欢心，而赵王也没有被立为太子。他们二人，心情相通，恨不得太子立即死掉，他们好取而代之。

成祖北征归来，进入京师，就听有人说，太子留守京师好吃懒做；还有人说，太子微服出访，去秦淮河妓院嫖娼等等。成祖听后半信半疑，心中十分不悦。成祖圣驾回到皇宫，文武百官前来迎接，惟独不见太子。成祖大怒，命太监立即去传太子，正在此时，太子率领东宫僚属黄淮等人姗姗来迟。成祖命锦衣卫将黄淮等人全部下狱。

杨士奇是最后一个来迎驾，成祖对其比较宽容，未曾治罪。回朝后，召他问太子事道：

“朕北征期间，东宫太子在京师留守，饮食起居情况如何？”

“回皇上的话，太子早起晚寝，御膳节俭，日勤不怠，孝敬如前。”

“可曾微服出访，赴秦淮河胡作非为？”

“启禀皇上，此事纯系子虚乌有，微臣可以用人头担保。”

“那么，朕北征回来，太子迎驾来迟是何道理？”

“回皇上的话，此乃臣等听错了皇上回到京师的时刻，皆为臣的罪过，与太子毫无关系。”

经过杨士奇的解释，成祖的怒气消解。但是宫中的大臣们，认为只将辅佐太子的黄淮等人下狱，单独宽免了杨士奇，有些不公平，纷纷上奏弹劾，成祖无法，亦将杨士奇下锦衣卫狱，数日后，与黄等人一起被释放。

成祖对有人说太子的坏话心存疑虑，便命吏部派人追查，追查的结果，恶言乃从汉王和赵王府中传出。由此，成祖对汉、赵二王的印象开始转变。

自从成祖封朱高炽为太子后，成祖曾一度喜欢的朱高煦、朱高燧两个儿子的表现始终不好。尤其是汉王朱高煦，对成祖未曾立他为太子耿耿于怀。实际成祖对朱高煦是比较了解的，此子除了性格凶悍、勇猛之外，干了很多坏事，自小就被太祖所厌恶。

洪武年代，太祖为了培养子孙辈们具有广博的学识，继承自己辛辛苦苦创下的大明业绩，便将分封于各地诸王的儿子，接到应天皇宫中，派几名学识渊博的先生，教他们读书、写字。在诸子中独有朱高煦不好好学习，在上学时不是说话，就是乱走动，逗乐子，举止轻佻。等到太祖周年祭奠时，成祖派遣朱高炽、朱高煦等回到京师，代表燕王参加王氏祭奠活动时，朱高煦在宫中东窜西跳，惹是生非，其舅徐辉祖乃太祖的大将军徐达的儿子，称其为无赖小子，需要寸步不离地看着他，就是这样，仍旧是不听话，夜间将徐辉祖的一匹好马偷走，骑着渡过江北，到各地去驰骋游乐，途中马蹄踩死了两个老百姓，有一位驿丞看见了，加以干预，将驿丞打死。于是朝臣皆举报，控告燕王之子，横行不法的行径。后来，发生了靖难之役，朱高煦跟随成祖征战各地，朱高煦的罪行也就无人追究了。等到成祖登基，立朱高炽为太子，封朱高煦为汉王，封地远在云南，因此朱高煦心中怏怏不快，埋怨道：

“我何罪，斥我于万里之外！”赖在应天不肯就藩，并要求为自己增加两支护卫的军队，共有千余人左右。他常常以秦王李世民自比，瞧不起太子朱高炽，一心想取而代之。

有一天，成祖命太子朱高炽和当时尚是皇太孙的朱瞻基一起拜谒孝陵。太子身体肥胖，而且有足疾，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一路上由两位太监搀扶着还老是失足。高煦在后面讽刺说道：

“前人失跌，后人知警！”

话音刚落，皇太孙应声说道：

“更有后人知警也！”

朱高煦回顾，脸色陡变，没想到这个侄儿如此厉害。后来朱高煦被成祖改封青州(今山东益都)，但他还是不想去，以愿意在成祖身边侍奉为借口，要求继续留在应天。至此，成祖对朱高煦的所作所为已经有所了解，对其欲夺取太子嗣位的阴谋有所警觉，只是出于对儿子的怜悯，没有采取措施，希望他能改弦更张，做一个老老实实的汉王。

永乐十四年(1416年)，成祖又一次北巡返回京师。回来后第一件事是询问汉王在京师的表现。首先问到吏部尚书蹇义，蹇义摇头不回答。成祖又问杨士奇，杨士奇答道：

“臣和蹇尚书都在侍奉东宫，外人不敢对臣等二人说汉王的事。但是汉王二次被遣就藩，都不肯去，现在知道陛下将迁，就请留守应天。只有陛下才能精细地观察他的真实意图。”

成祖听了没有说什么，起身回宫。过了几天，成祖召十多位大臣了解朱高煦的表现，完全搞清了他的阴谋，命其立即赴青州就藩，不准在应天逗留。无奈，朱高煦才将汉王府迁往青州。可是汉王到了青州后，暗中招募壮士三千人，日夜操练，不隶籍于兵部。更可恶的是纵容爪牙到处劫掠、残害百姓，有一农民阻挡了汉王的行路，将其活活打死，肢解尸体投入江中。青州兵马指挥徐野驴擒治汉王府的爪牙，被高煦得知用手铁瓜将其捶死。

成祖得知他的这些行为后，十分气愤，把他召到应天，准备废为庶人。太子朱高炽闻讯，问杨士奇怎么办？杨士奇道：

“汉王乃殿下的一母兄弟，此次陛下震怒，对其必严厉惩处，陛下应在父皇面前，为其求情，给予宽恕，此为上策，只有如此，兄弟方能和好，将来治理江山会得到汉王的支持。”

太子听了杨士奇的意见认为甚好。便连夜入宫觐见成祖。成祖已经安寝，太监禀报，太子朱高炽请求拜见父皇，成祖以为东宫有什么要事禀报，便卧于御榻上，请太子进入寝宫禀报，当成祖听说是太子为其兄讲情不宜废为庶人时，便挥手将其斥退，道：

“此事已定，不必再谈，请炽儿回去安歇。”

回来，朱高炽又向杨士奇问计道：“父皇不改变主意，如何是好？”

杨士奇道：“陛下乃菩萨心肠，经不住再一再二的恳求，况且陛下废其为庶人，目的是为了殿下日后顺利登基，只要殿下心诚，打动了陛下的心，想必会改变旨意。”

朱高炽依计，又经过两次劝说，并再三陈述当年汉王救成祖于危难的事，最后成祖叹道：

“诸皇子中，你是兄长，兄长有如此宽宏大量的胸怀，实在难得。父皇可以答应你的请求，对汉王从宽处理，他应当感谢你，如果执迷不悟，一意孤行，必将不得好死。”

由于太子的再三求情，成祖除掉了汉王的两支护卫军队，改封在乐安州(今山东广饶)，并叮嘱他，老老实实地在封地为王，如果再横行不法，定加重处罚。

在永乐朝代，虽然成祖多次北征，耗费巨资，但国库充实，百姓安居乐业。这一切，多亏几位大臣的领导与辅佐，除了吏部尚书蹇义之外，还有户部尚书夏原吉。原吉(1366—1430)，字维洁，湖南湘阳人，早孤，刻苦读书，以便抚养老母。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在乡试中成绩优异选入太学。太祖时，任户部主事，成祖即位，晋为户部尚书。他与蹇义详定赋役诸制，主持治理浙西水利，朝务兢兢业业，以理财有方，为成祖所信赖。蹇义和夏原吉历事五朝(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一个当了三十四年的吏部尚书，一个当了二十九年的户部尚书，长期掌握朝廷重权，当时臣民并称为“蹇夏”。

“蹇夏”主持朝政，清廉，公正，能够举贤任能。永乐十五年(1417年)，晋升杨士奇为翰林学士。永乐十九年(1421年)，改左春坊大学士，仍兼学士，进入内阁，同时入阁的还有杨荣。

杨荣(1371—1440)，初名子荣，字勉仁，福建建安(今建瓯)人。建文朝进士，授编修，燕王靖难之师南下，他迎降军前。成祖即位，入文渊阁，成祖北征，常为扈从。仁宗即位，入阁任工部尚书。

杨士奇与杨荣入阁的时间，分别为四十二年和三十八年。还有一位杨溥(1375—1446)，字弘济，湖北石首人，建文朝进士，授编修。永乐初年侍奉皇太子。永乐十二年(1414年)，因东宫遣使迎帝迟，被逮捕押入锦衣卫狱，关押十年。仁宗继位，晋升翰林学士。宣宗即位后入阁，任礼部尚书。在内阁的时间也长达二十一年之久。他们三人也都是五朝(建文、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元老，并且都久任阁臣，故时人合称为“三杨”。“三杨”中，杨士奇刚直敢言，杨荣多谋善断，有军事才能，曾多次随从成祖，出征漠北；杨溥是仁宗当太子时的才师，为人恭谨，被誉为有“雅操”。

仁宗即位后，擢任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在内阁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一天，仁宗在便殿，蹇义、夏原吉奏事尚未退下，望见杨士奇来了，便对二人说道：

“新任华盖学士来了，必有好的建议，一起听听。”

杨士奇进殿说道：

“恩诏减免税供刚下两日，惜薪司传旨征枣八十万斤，与前一诏相违背。”

仁宗听了道：“减半如何？”

杨士奇道：“尚可。”

仁宗立即降旨减半，使老百姓甚为高兴。

当时，正值成祖驾崩后，朝廷上下一律穿丧服，穿丧服应当到九月二十七日期满。这一天，礼部尚书吕震请求脱掉丧服，杨士奇不同意，吕震厉声叱责他道：

“穿丧服期已满，为何不该脱掉？”

杨士奇道：“陛下突然驾崩，哀痛已极，用语言难以表达，多穿几日孝服有何妨，不应有什么期限！”

有人问蹇义的意见，蹇义兼取二说，模棱两可。

翌日，仁宗仍然穿戴素冠麻衣带孝视朝，廷臣只有杨士奇及英国公张辅同样穿丧服上朝。朝罢，仁宗对左右说道：

“梓宫在殡，除丧换服，岂是臣子所忍心脱的，杨士奇坚持这一点是对的。”

不久，杨士奇被晋升为少保，和杨荣、金幼孜都被赐予“绳愆纠缪”银章，能密封言事。过了一段时间，又被晋升为少傅。

仁宗在“蹇夏”和“三杨”的辅佐下，实行了一些开明政策，其中之一就是他本人能够纳谏。他曾对杨士奇说道：

“为君以受直言为明，为臣以能直言为忠……今后，朕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们尽管直言指出，别担心我不会听从。”

仁宗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在他当太子监国的时候，有一位御史得罪了他，继帝位后，他想惩办这位御史。杨士奇劝谏道：

“陛下即位之时，下了一道诏书赦免以前忤旨者。现在如果还要办御史的罪，就是不守信用。这样，做臣下的会感到寒心。”

仁宗听了立即改变了主意，不计御史的前咎。

一天，仁宗召集文武百官，研讨如何开源节流，勤俭治国。有一位叫弋谦的大理寺少卿，奏道：

“臣以为勤俭乃治家、治国之根本，不懂勤俭，肆意挥霍浪费，最终，将会家破国亡。自古以来，得到报应者不胜枚举。因此臣建议从皇室做起，乃至朝廷各部，厉行节约，若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米、一贯钱，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整个皇室和朝廷七万多人，就可以节省二千五百多石粮，二百五十万贯钱，这是多么惊人的数字，臣希望陛下采取措施，开展每人每天节省一两米、一贯钱的行动。”

弋谦在上奏时，态度激昂，言词激烈。许多想讨好仁宗的大臣都指责他是沽名钓誉，有失大体。仁宗也讨厌他。杨士奇见状回宫后，进谏道：

“弋谦是应陛下的号召陈言的，如果要加罪于他，今后谁还敢说话呢？岂不是要叫群臣自此结舌吗？”

仁宗见杨士奇说得有理，马上改变了对待弋谦的态度，把他提升为副都御史，并安慰他道：

“卿素来清直，好好为朕办事，勿怀疑惧。”

同时，还下一道诏书自责过错。

当时，还有一位喜欢恭维的大臣，上疏歌颂太平，仁宗把奏疏让群臣传阅。满朝文武都认为歌颂得好，惟独杨士奇不以为然。他上奏道：

“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徙之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

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道：

“朕对待众卿以至诚，希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奏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

永乐一朝，连年征战，工役频举，支出浩繁。虽然当时的经济繁荣，国库殷实，但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耗费的人力、物力毕竟是太多了。仁宗即位后，在“三杨”的辅佐下，注意到百姓在永乐时期的负担，实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

仁宗即位，饬令停止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供等等。工部要修理军器，准备向百姓征布漆。仁宗命令，用官钞到市场上购买，不许向百姓征派。他说道：

“古时候的土赋，都是随地所产。一概从郡县征收。小民要聚集银钱，到市上买了来交纳，吏胥得以从中营私舞弊，今后一律禁止。”

凡是地方受灾，他都下令蠲免田赋，发放官粮赈灾。他在位短短的十个月时间里，多次蠲免灾区赋粮和发放官粟赈灾。

洪熙元年(1425年)四月，山东、淮安、徐州等地闹饥荒，地方官照旧催逼赋税。仁宗得知后，命杨士奇起草诏书，蠲免夏税一半，并停止一切官买物料。

杨士奇认为，这些事应该通过主管的户部和工部。仁宗道：

“户部和工部可以慢些让他们知道。救民如拯溺，不可片刻迟缓。户部和工部如果得知要蠲免，他们怕影响国家费用收入，一定会犹豫不决。”

于是仁宗命杨士奇即刻草诏蠲免圣旨。当时，有一个户部尚书，因为不彻底执行蠲免赋税的命令而被罢官。

当时，朝廷多数大臣认为仁宗是个善良的皇帝，没有必要向皇上进谏，深怕惹是生非。惟独杨士奇敢提意见，实心实意地为皇上卖命。

一天，藩司守令来朝，后部尚书李庆建议拨军伍余马给有司，每年上交马驹当做纳税。杨士奇道：

“朝廷选贤授官，而让他们牧马，这是贵牲而贱士人，怎么对天下后世呢？”

仁宗听后，觉得杨士奇说得有道理，准备由宫内出旨罢除。可是过了一段，仁宗没降旨，养马一事也未罢除，后来竟无声无息了。

杨士奇极力申述自己的意见，又没有批复。过了些日子，仁宗到思善门，召杨士奇，说道：

“朕对此事，并不是忘记了，而是听说吕震、李庆等人都不喜欢你，朕又念你孤立，恐为他们所伤，不愿因你说了即罢除，现在有了可以说话的依据了。”

于是仁宗拿出陕西按察使陈智说养马不便的奏疏，让立即起草敕书罢除牧马。杨士奇感激仁宗对他的关怀，叩头谢恩。

还有一日，临近岁尾，群臣练习正月初一朝拜仪礼，吕震提出要用音乐伴奏。杨士奇和黄淮商议，认为没有必要。因为要把乐师们请来，共有二百多人，需要场地，还要供他们饮水、吃饭，有所耗费，况且练习朝拜，只是走一、二趟，只要慢慢走，到时给皇上、皇后等磕头作揖即可。所以杨士奇和黄淮上疏请求制止。开始仁宗没有批复。

杨士奇又奏，等在廷中，直到夜漏十刻。仁宗反复思考，认识到练习时用音乐伴奏，实在是浪费。于是批复同意停止音乐。过了一天，仁宗召杨士奇等说道：

“吕震常常以错误的意见耽误事，要不是你们进言，悔之莫及。”

仁宗深感杨士奇处处为朝廷着想，没有任何私心，便降旨，任命杨士奇兼兵部尚书，并连前职，共领取三个职位的俸禄。杨士奇上疏辞谢了尚书的俸禄。

洪熙元年(1425年)五月，仁宗感觉身体不适，便将杨士奇召到御榻前，道：

“以前朕担负监国重任，你侍奉左右，同心同德，殉国忘身，屡历艰难与忧虑，不曾改变意志。朕嗣位以来，经常提出良好的建议，希望朕能治理好天下，坚贞如一，没有二心，谏在朕心上。兹创制‘杨贞一印’赐你，尚需互相勉励，以成明君良臣之誉。”

一席话说得杨士奇泪流满面，叩头不止，道：

“微臣为皇上尽心尽力是应该的，只要皇上举贤纳谏，就是百姓之福，微臣将更加坚贞如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祝愿皇上龙体安康，万寿无疆！”

没有多久，仁宗病危，召杨士奇、蹇义、黄淮、杨荣到思善门，命杨士奇写赦书速召太子朱瞻基从南京回北京。

数日后，仁宗于北京紫禁城钦安殿驾崩，享年 48 岁，在位仅仅十个月，葬于献陵。

仁宗虽然临朝只有十个月，但是在“蹇夏”、“三杨”的辅佐下，能够举贤纳谏，减赋救灾，停止工役和采办珠宝，惩治贪官污吏，给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所以仁宗突然殒天使杨士奇十分悲痛，他手拿

几天前，仁宗亲赐的“杨贞一印”，跪在仁宗灵前，哭泣不止，并向仁宗发誓：一定要辅佐好太子，使大明江山永固，继承仁宗的贤治之志。

洪熙元年(1425年)，六月，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

朱瞻基(1398—1435)，仁宗长子，喜欢读书，智慧超群，永乐九年(1411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孙，成祖甚为喜爱，巡幸征讨时皆相从，成祖在军中，命学士胡广等为其讲论经史。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成祖病逝于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县西北)，瞻基迎丧开平。八月，仁宗即位，十月立其为皇太子。次年五月，朱瞻基正在南京监国，听到父皇病逝的消息，十分震惊，匆匆起程，回京师奔丧。

汉王朱高煦，经其兄仁宗朱高炽再三求情，没有被废为庶人，被迫赴被封地乐安州之后，消停一段时间，多次写信感谢皇兄在父皇面前，为之求情。待成祖殡天时，他又窥测风向，蠢蠢欲动，但始终没有下手的机会。

一天，汉王在乐安州王府中和几名艳丽的王妃在宴乐调笑，有一名官员跑进来禀报道：

“启禀汉王，从北京传来的消息得知，好像是大内发生了什么大事。”

“什么大事？”

“下官不得而知，只是知道朝廷命在南京监国的太子火速返回京师。”

“能有何大事？速派探马回京查明真相。”

“是！”官吏领命走后，派出十匹探马向北京方向奔去。

第二天清晨，汉王正搂着艳丽的妃子酣睡之时，十匹探马身上像水洗一样跑回乐安州王府，带回一件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刚刚继位十个月的仁宗朱高炽驾崩。

官吏叫醒了汉王，禀告这一丧讯时，汉王道：

“不会有这等事，你们听错了吧！”

“千真万确，十匹探马刚刚回来，在南京监国的太子已经动身回就师了。”官吏又禀报道。

“是吗？”这时，汉王才大梦初醒一般，高兴得跳起来道：“这回该轮到朱高煦当皇帝了。”

有人提醒道：“太子朱瞻基马上回京师就要继位了！”

朱高煦灵机一动道：“本王让他回不了京师如何？”

王府的众官吏皆聚到汉王寝宫，议论仁宗殡天后该怎么办？大家异口同声道：

“对，路上截杀，让他回不了京师，皇位就该由汉王继承了。”

计议已定，汉王派出一千多兵马，于北京到南京的路上埋伏。兵马派出后第二天，皆回来了，向汉王禀报道：

“伏兵去晚了，太子已返回京师。”

截杀太子未成，汉王后悔不迭。”

朱瞻基继位后，在“三杨”等人的授意下，赏赐汉王特厚。计有黄金千两，白银万两，珠宝百件，绸缎百尺，宝马二十匹。凡是汉王所要求的，均曲从其意。

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汉王派使臣以献元宵灯为名，赴京师各处走动，探听朝廷动静。锦衣卫查明了此事，告诉杨士奇。杨士奇向宣宗禀报了汉王使臣在京师的行动，宣宗道：

“朕丝毫不怕，惟推心至诚以待之耳。”宣宗复函向皇叔表示诚挚的谢意。

这一年，宣宗已经二十七岁，虽然比较年轻，但是，自幼跟随成祖征战，多年参与监国，还是比较成熟了。

汉王以为朱瞻基年少可欺，日益放肆，紧锣密鼓，图谋夺权。先是派人暗中潜入京师联络英国公张辅为内应，叛乱夺取皇位。张辅将来人逮捕，向宣宗告发了汉王的阴谋；接着，又约山东指挥使靳荣等在济南造反。宣宗见此情景，将杨士奇等人召来问计道：

“皇叔如此逼朕，如之奈何？”

杨士奇道：“对待此事，自古以来皆为先礼后兵而已，别无他策。”

杨荣、杨溥等人也同意杨士奇的意见。于是宣宗派出使臣，持宣宗的御笔信函，至乐安州(今山东惠民县)，向汉王质疑，并提出严重警告。

汉王见阴谋败露，终于在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发动叛乱。他效法其父朱棣的故伎，上疏，污蔑朱瞻基被奸臣所迷惑，指责夏原吉等人为奸臣，声称自己是举兵靖难。

面对汉王的叛乱，宣宗征求群臣的意见：“该如何去平定？”

一位大臣道：“可派武阳侯薛禄前去征讨。”

杨士奇、杨荣极力反对道：

“不可取，难道没听说建文帝派李景隆征剿的教训吗？”

杨士奇建议道：“应当陛下亲征，汉王以为陛下新立，一定不会亲征，如今出其不意，以天威临之，必胜无疑。”

夏原吉、杨荣皆同意杨士奇的意见。认为先声可夺人心，应由宣宗亲征，一鼓而平之。

于是宣宗下定决心，率十万将士，亲征汉王朱高煦。

临行前，蹇义、夏原吉、“三杨”诸臣，皆再三禀告，汉王凶悍、狡猾，征讨时应多谋善断。这一年，杨士奇已届六十高龄，但和杨荣一起随军参加征讨。

宣宗于八月十日，誓师北京率军南下。宣宗听从杨士奇、杨荣等大臣的奏议，一面部署淮安防务，防其南窜；一面加强京师守备，以防不测；还发出圣谕，施以分化瓦解之策略，凡反正来归者，厚赏之，令还谕其众；复又发致汉王书，晓以利害劝其降服。

进军路上，宣宗问从征诸臣道：

“众卿试为分析，汉王的动向将会如何？”

一位大臣道：“乐安城小，他一定会先夺取济南作为叛乱巢窟。”

又一位大臣道：“汉王以前不肯离开南京，如今必引兵南下取之。”

宣宗道：“不对。济南虽近，不易攻也；而且一听说朕率军征伐，也没时间去攻打济南城。而汉王护卫军的家属都在乐安，士兵也不愿意离开乐安去取南京。据朕对皇叔的了解，其外多夸诈，内实怯懦，临事狐疑，辗转不断。他之所以敢反叛朝廷，是因为欺负朕年少新立，众心未付；又以为朕不敢亲征，如果派遣将领讨伐，只要甜言厚利诱惑，就可瓦解。现在一听说朕亲征，已经吓破了胆，还敢出征吗？”

宣宗的分析，果然不差。汉王起初听说朝廷有人建议命薛禄为将，高兴地说道：

“这容易对付。”

等到又听说宣宗亲征，气就泄了一半，束手无策。

二十日，大军来到乐安城下，将其团团包围。炮击其城，声如炸雷。城中人心瓦解。汉王手下的将士密谋逮捕汉王以献城池。

汉王走投无路，密遣人出城约降，宣宗许之。次日，汉王将出城，其党羽王斌等加以阻止。汉王则潜从小道出城向宣宗请罪。

宣宗将汉王父子拘捕，班师回朝，叛乱平定。

汉王被抓到北京后，废为庶人。囚禁在西安门内的逍遥城。一天，宣宗到囚室看他，他趁宣宗不在意，伸出一脚把宣宗勾倒在地，欲将上前加害。宣宗大怒，命令卫士用一个三百斤重的大铜缸将其盖住。但是，朱高煦力大无穷，顶缸而起。宣宗命人在缸上堆起许多木炭，点火燃烧。朱高煦活活被烧死在缸中。

宣宗亲征汉王叛乱，率大军凯旋回京时，路过献县单家桥，侍郎陈山迎驾，他向宣宗奏道：

“汉、赵二王同样有叛逆之心，请陛下乘机袭击彰德，捉拿赵王朱高燧如何？”

杨荣极力赞成陈侍郎的奏议。可是却遭到了杨士奇的坚决反对。

杨士奇道：“说赵王叛变，应当有真凭实据，天地鬼神难道是可欺的吗？”

杨荣厉声说道：“你要阻挠实施大计吗？现在逆党说赵王参与阴谋，怎么能说没有真凭实据呢？”

杨士奇道：“成祖有三名王子，当今皇上只有二位叔父，有罪的不可赦免，无罪的应该厚待，有怀疑，作防备，使皇上没有忧虑罢了。为什么突然加兵，伤害皇祖在天的意愿呢？”

这时，只有杨溥和杨士奇的意见一致。杨士奇想要进行宫去，向宣宗进谏，可是杨荣已经先进去了。杨士奇随后要进被门官阻止。不久，又召蹇义，夏原吉进去，二人将杨士奇的话禀告宣宗，宣宗道：

“赵王并没有公开叛乱，为何要加罪于他呢？”

宣宗的一句话，才把欲移兵袭取赵王的事加以平息。

宣宗凯旋回京以后，一天，宣宗想起杨士奇在单家桥说的一番话，将其召进宫，说道：

“现在宫内多是议论赵王的事，怎么办？”

杨士奇道：“赵王最亲，陛下就当保全他，不要被众人议论所迷惑。”

宣宗道：“朕要将群臣奏章送给赵王去看，叫他自己去处理，怎么样？”

杨士奇道：“陛下的主意英明，能有玺书更好。”

于是宣宗命太监派使者奉玺书到彰德。

永乐年代，赵王朱高燧恃宠，多行不法，又与汉王朱高煦阴谋夺取皇太子的宝座，被成祖斥责，多亏太子力解，得以幸免。

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成祖身体不适。护卫指挥孟贤等勾结钦天监官王射成及内侍杨庆养子，假造伪诏，阴谋在成祖进膳时下毒药，待成祖驾崩后，发布诏书，废太子，立赵王。总旗王瑜姻家高以正等，为孟贤谋划，计议已定，告诉王瑜。王瑜立即向成祖做了禀报，成祖大怒逮捕了孟贤，抄出伪造的圣旨，孟贤等皆被杀。晋升王瑜为辽海卫千户。成祖将赵王朱高燧召进宫中问道：

“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呢？”

赵王吓得浑身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

太子朱高炽在一旁，为他解围说道：

“此乃下人所为，高燧并未参与，也不知道。”

仁宗继位，加赵王岁禄二万石。宣宗继位，赐赵王田园八十顷。

赵王听说汉王被擒，并在铜缸中被烧死，惶惶不可终日。忽然接到宣宗的玺书和大臣们的奏章，大喜，感激涕零地说道：

“今日我有了生路了。”

立即上表称谢，并献出赵府的护卫军队。至此，大臣们欲惩处赵王的议论才平息下来。

宣宗对待杨士奇更加亲近，对杨士奇道：

“赵王之所以能够保全，全是你的功劳。”

宣宗在杨士奇等老臣的辅佐下，坚持执行仁宗的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他对民间疾苦有一定的了解。在一次外出还京的路上，他看到几个农民在田里耕作，便带着几个宫员前去看望，下马询问农家种田之事，并接过农民手中的犁把扶了三趟，说道：

“朕只扶推了三趟，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在干这种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如农家，确是如此。”

宣宗在杨士奇的启发下，曾经亲自写《织妇词》，赐给朝臣，并叫人画成图，张挂于宫中，目的是要官员和众妃嫔知道并记住百姓的艰辛。正因为他了解百姓的一些疾苦，所以才能注意百姓的休养生息。

宣宗经常向杨士奇等朝臣询问历史上一些注意与民休息而带来太平盛世的皇帝。杨士奇道：

“历史上这样的皇帝很多，如西汉的文帝和景帝、隋朝的文帝、唐朝的李世民等，都是经常关心百姓疾苦的皇帝。”

杨士奇见宣宗能以史为鉴，注意体恤百姓疾苦，深受感动。趁早朝归来，闲暇时间还向宣宗介绍一些由于皇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导致祸乱，丧权辱国的历史教训。杨士奇经常提到唐玄宗和隋帝，说这两个皇帝的遭际，值得后人鉴戒。

宣宗是一位绝顶聪明的皇帝，在杨士奇等朝臣的介绍、辅导下，对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兴衰更替，开始熟悉起来，宣宗在一次早朝上说道：

“四朝元老杨太傅曾向朕提到过隋帝和唐玄宗，这两位先祖有过功绩，也有过失，值得朕鉴戒的地方很多。另外还有不少先祖，也使朕引以为诫。像汉武帝好大喜功，海内虚耗，末年还能惩前过。唐玄宗初政，有贞观之风，久而纵欲，遂致祸乱。这是汉武帝比唐玄宗好的地方。”

宣宗还说道：“汉武承文、景之余，炀帝继隋文之后，开元之盛，遂有安史之乱，这些岂不都是仗着富庶而不知戒吗？汉武末年还能惩过，而炀帝遂以亡国，玄宗终至播迁，这些都足以作为世人之大戒。”

由此，宣宗总结出—条历史经验：国家之盛，本于休养生息；国家之衰弱，必由于土木兵戈。

在“三杨”等几位元老的辅佐下，宣宗还养成了节俭的好习惯。他说，要与民休息，首先就须自己节俭。宣宗坚决反对那种向百姓强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或充实国库的做法。他说道：

“人君恭俭，则户口日繁，财赋自然也就充足。”

在宣宗刚即位时，有一位工部尚书向他提出，宫中御用器物不足，必须到民间采办。宣宗制止道：

“汉文帝的衣服帷帐没有文绣，史称其恭俭爱民。朕也须以俭约率下。”

有一个和尚自称要修寺庙，为宣宗祝福长寿，被宣宗训斥道：

“人没有一个不想长寿的。古时候的人君，像商朝的中宗、高宗、祖甲，周朝的文王等享国最久，而那时候哪里有僧道、神仙之说！秦始皇、汉武帝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验在哪里。世人不悟，实在可叹！”

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认识到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宣宗不但自己较为俭约，对朝廷的费用和工程建设也反对奢侈。在修建仁宗的

陵墓献陵时，他遵照仁宗的遗嘱，厉行节约。蹇义、夏原吉、杨士奇等大臣赞同他的主张，认为这是利于万世的措施。于是宣宗亲自规划，仅三个月就修成陵墓。献陵的规模华丽方面不如成祖的长陵，以后几代皇帝的陵墓都以它为楷模，只是到世宗营建永陵时，才开始又奢华起来。

宣德三年(1428年)，蹇义又提出一项治理朝政的动议，为裁撤冗官，教育官吏节俭为民。宣宗御览奏章后，认为很好，并征求“三杨”的意见，他们一致赞同，此事就由蹇义负责。

当时有一位不识相的巡抚要求在杭、嘉、湖地区增设一名管粮的布政司官吏，被宣宗批评道：

“粮税自有常赋，朕正在裁抑冗滥，你反而要求增加官员。古语说得好，省事不如省官，你那位粮税官就免了罢！”

宣宗还严禁将官扰害百姓。他到北边巡边，严厉申戒将士道：

“有敢扰民者，杀无赦！”

锦衣卫指挥钟法保建议到广东东莞去采珠，宣宗说他是“扰民以求利”，把他罢官下狱。

宣德四年(1429年)，工部尚书吴中启奏道：

“山西圆果寺是国家祝福的地方，现旧塔损坏，希望能征调力役修建。”

宣宗道：“你想借此求福吗？朕以安民为福。”坚决不允许他役民修塔。

即使是皇室、勋戚这些贵族，宣宗对他们的要求也十分严格，禁止他们为自己的私利侵扰百姓。

宁王朱权要求宣宗赐给他南昌的一片土地，宣宗不答应，说道：

“你身为亲王，食租衣税，现有的岁禄就够多了，而一乡之田，百姓靠它衣食，不该夺以自富。”

对于贪官污吏，宣宗则进行严厉惩罚，毫不留情。御史沈润接受贿赂，宣宗道：

“御史本是朝廷耳目，今受重赂，是耳目蔽矣。”将其罢官，谪戍辽东。

即使犯法者是公卿阁僚，更加严惩不贷。都察院左部御史刘观，因为贪贿被逮捕下狱。工部尚书吴中私自把朝廷的木料、砖瓦赠给太监杨关建造府第，被宣宗知道后，将其投入大狱。

宣宗在“三杨”等元老的辅佐下，还能做到纳谏举贤，绝不独断专行。朝廷事务不忙的时候，他常常召集“蹇夏”、“三杨”等一班大臣在一起谈心，要他们指出朝廷的弊政。宣宗喜欢听逆耳的意见，而不喜欢听那些恭维讨好的话。一些喜欢阿谀奉承的官员，常常用“明君”、“圣主”之类的话来颂扬他，宣宗听了觉得讨厌。他对杨士奇、杨溥说道：

“朕每念创业难，守成不易，夙夜拳拳。幸运的是百姓稍得安定，不过，祸乱的发生往往出乎意料。而近来群臣好进谀辞，令人厌闻，卿等宜勉力辅朕。”

杨士奇、杨溥二人顿首道：

“臣等不敢怠奏。”

宣宗道：“直接指出朕的过错，就是对朕的最大报答。”

宣宗的另一个优点是，亲贤臣，远小人，这些优点，也都是与“三杨”的辅佐分不开的。

内阁大学士张瑛、陈山本是宣宗当太子时的东宫旧臣，二人寡学多欲，为官不廉，宣宗并不因为他们是自己的旧人而加以庇护，而是把他们调出内阁，贬了官。

都御史刘观被罢官下狱后，杨士奇和杨荣举荐顾佐接替他的职位。顾佐为官清廉刚正，约束下属严格。宣宗命他考察诸御史，整肃朝纲。顾佐不负宣宗重托，到都察院后，贬谪了二十位不称职的御史到辽东为吏，又降职了八人，罢免了三人。同时又举荐了四十几位清正敢为的人担任御史，使之督察百官。经过一番整顿，逐贪黜污，朝纲肃然。一些受到弹劾的奸吏怨恨顾佐，便诬告他受贿、冤屈好人。宣宗明察是非，不为谣言所惑，办了诬告人的罪，而对顾佐更加信赖。

宣宗还命“三杨”推荐一批廉直的官员出任府、州官吏，这些人中有许多成为明史上的清官，像周忱、况钟等，地方百姓为其建造生祠，祈祷、供奉至今。

宣宗在“三杨”的辅佐下，还作出一件有益于百姓的好事，那就是停止与交趾的征战。

交趾国，又称安南，于今天的越南中部、北部地区。国王名叫黎利，纪元顺天，建东、西二都，分为十三道，东都在交州府，西都在清华府，皆置百官，设学校，以经义、诗赋二科取士，和内陆明朝的风俗差不多。

在永乐朝代以来，交趾国多次叛乱，朝廷屡发大军征讨，都大败，甚至全军覆没。交趾国王黎利派人来朝廷讲和。宣宗也厌征战，想同意他们的请求。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等人，都说同意尚可，但没有名目，等于示弱于天下。

宣宗召杨士奇、杨荣商议，二人说道：

“陛下爱惜百姓生命以安定蛮荒，不能说无名。汉朝舍弃珠宝，史家传为美谈，不认为是示弱，所以可以同意。”

不久又选择可派遣去交趾国的使者。蹇义提出伏伯安有口才，可以派他去。杨士奇道：

“伏伯安这个人我很了解，虽然口才好，但言而不讲忠信，虽是蛮荒之国也不能派遣他去。因为伏伯安是个小人，去了一定会有辱于国家。”

宣宗认为杨士奇的意见很对，便改派别人担任使者。于是，经过和平谈判和交趾国停止了战斗，每年因此节省一笔数字巨大的军费。

宣德五年(1430年)春，宣宗陪同皇太后谒长陵，回宫后，召英国公张辅、尚书蹇义及杨士奇、金幼孜、杨溥等，在行殿朝见皇太后。皇太后摆宴席慰劳这些元老重臣，并一一为他们敬酒，使这些阁臣深受感动。在宴席间，宣宗对杨士奇说道：

“太后经常对联说，先帝在东宫时，只有你不怕触忤，先帝能听你的话，所以朝政廉洁，没有发生意外的大事。所以教诲朕应当接受直言，虚心纳谏。”

杨士奇道：“这是皇太后盛德之言，愿陛下不要忘记。”

不久，宣宗在鸿胪寺向文武百官降旨，道：

“杨士奇年老有病，上朝时可能行动迟缓，落在后面，文武百官不必以此论奏。”

宣宗年轻好胜，喜欢微服出行。一天夜晚，几名太监陪同宣宗在北京城内消遣，来到杨士奇宅第。杨士奇听说陛下来访，仓皇出迎，伏地连连叩头道：

“夜间城内并不太平，陛下为什么以宗庙社稷之身自轻？应速回宫中安寝。”

宣宗道：“朕想和你说说话，所以就来了。”

杨士奇一家热情款待宣宗，并与之畅谈片刻，即派家丁将其护送回宫。几天后，锦衣卫兵在北京城内捕获两名强盗，供词皆言要刺杀皇帝。锦衣卫将此案禀报宣宗。宣宗特意召杨士奇道：

“爱卿劝朕夜间不要微服出访是对的，最近抓获的两名强盗，就有逆谋。从今而后，知道你是真爱朕啊！”

宣德年间，各地屡次发生水旱灾害，召杨士奇商议下诏抚恤，免除灾区租税及官马亏额。在这个时机，杨士奇奏请宣宗，免除赋薪刍钱，减少官田租税，审理陈年冤案，减少工役，以便扩大皇上的恩德。百姓很高兴。

过了二年，宣宗对杨士奇道：

“抚恤百姓的诏书下去已久，现在还有需要抚恤的吗？”

杨士奇道：“前次所颁下的诏书命各府、县减少官田租税，而户部未曾执行，照旧征收。”

宣宗大怒道：“从今天开始执行，置之不理者，依法论处。”

在杨士奇主持内阁期间，为了扩大宣宗的仁治，上奏了不少对朝廷对老百姓都有益的奏章，除了上述的减免赋税外，还奏请皇上安抚逃亡到各县的流民，能安居下来就不要驱逐他们离县。举荐文学武勇之仕，使受极刑之家的子孙都能得到进仕的机会。又请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吏各举所知，推荐可以任郡守的人选等等，杨士奇的每项奏议都得到宣宗的批准。

宣宗举贤纳谏，励精图治，杨士奇等人同心辅佐，海内称颂不已。

宣宗于每年岁首，赐百官休息十天，有时携文武百官至西苑万岁山，赋诗唱和，并从中问民间疾苦。此时，文武百官的奏言，宣宗能做到虚怀若谷，认真听取和采纳。

宣宗即位初年，内阁大臣有七人。陈山、张瑛因是东宫的老师曾经进入内阁，后来，因为不称职，出任其他官职。黄淮因病退休。金幼孜去世。最后内阁中只剩下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三人。杨荣头脑清楚，办事有条理、有决断、有毅力，遇事敢做敢为。他数次跟随成祖北征，能知道边将贤能与否，险要关卡远近，敌情顺逆。但是，他常接受馈赠，边将每年送他良马，他都收下了。

宣宗知道了这一情况，曾问杨士奇该怎么办？

杨士奇极力为杨荣辩白道：

“杨荣能晓边务，臣等不及，不宜把小缺点放在心上。”

宣宗笑道：“杨荣曾说过你和夏原吉的坏话，你还为他说情吗？”

杨士奇道：“愿陛下以曲容臣那样容杨荣吧。”

这样宣宗才原谅了杨荣。后来，这些话悄悄传到杨荣的耳中，杨荣因此感到惭愧，和杨士奇的交往逐渐融洽。宣宗也更加亲切地厚待他们，先后所赐珍果、牢醴、金绮衣物、书器无计其数。

宣德十年(1435年)，年轻有为的皇帝宣宗，正在兢兢业业治理国家的时候，突然患病，而且越来越严重，以致卧榻不起。

这时内阁的老臣，只剩下“三杨”了。夏原吉已于宣德五年(1430年)病逝，享年六十四岁，金幼孜于宣德元年(1431年)病逝，享年六十三岁。还有一位老臣蹇义年近八十岁，而且重病卧床，危在旦夕。

这一年，杨士奇七十岁，杨荣六十四岁，杨溥也已经60岁了。“三杨”虽然均已年迈，但身体尚好，神智都很清醒。他们听说宣宗患病，都很忧虑。原先以为宣宗年轻，身强力壮，患一点小病，吃几付药，就立刻好了，没想到病情日渐加重。

一日夜晚，杨士奇已经卧榻休息，宫内两位太监急匆匆来到府第禀告，宣宗病危，召杨阁老火速入宫。

杨士奇虽然年届七十，身体是“三杨”中最好的一个，耳不聋、眼不花，只像五十多岁的人。他迅速穿好朝服，乘御辇来到乾清宫。只见御榻前围着一群内宫女眷，有张太后、孙皇后和众嫔妃等。张太后满眼含泪道：

“深更半夜将阁老请来为的是皇上病情甚重，方才几位御医来看过了，说难以救治，恐怕挺不到明天早晨……”

杨士奇走近御榻前，只见皇上两眼紧闭，在大口喘气，消瘦的脸庞呈蜡黄色，往日年轻英俊的模样已经不见了。

杨士奇立刻老泪纵横，跪在御榻前说道：

“老臣这几天忙于朝务，懒来看皇上，没想到竟病成如此模样，皇上你还有什么圣谕没有？”

张太后忙唤道：“皇儿，杨阁老来看你了，你不是夜间都想和阁老说说话吗？阁老来了，快说说吧！”

在众人的呼唤下，宣宗慢慢地睁开了双眼，看见了杨士奇，嘴唇动了一下，似乎是要说话，但没发出声音来，只有两只眼睛在四处寻找什么。

有人问：“皇上要饮茶吗？”

宣宗轻轻地摇摇头。

有人又问：“要喝人参汤吗？”

宣宗还是摇头。

最后，宣宗的眼光落在跪在地下的一位孩子身上，这就是年纪刚九岁的太子朱祁镇。宣宗看完了太子又把眼光移回来，直视杨士奇。

这时，大家都明白了，皇上所关心的是，太子还小，希望得到杨阁才的辅佐，方能继承皇位。

杨士奇道：“皇上请放心，老臣一定照顾好太子，让他成为贤明的皇帝！”

杨士奇说完话，宣宗眼睛发亮，消瘦的面庞出现了笑容，但片刻即逝，只见两眼紧闭，头一歪，停止了呼吸。

杨士奇与众嫔妃、太监齐声呼喊：“皇上——皇上——皇上！”由此，宣宗朱瞻基再也没有醒转过来。

宣宗朱瞻基在位十年，寿三十八岁。生两子，长子朱祁镇立为太子，次子朱祁钰。

宣宗驾崩后，宫廷内外谣言四起，有人说太子年幼，不能为帝，张太后可能要召立襄王瞻。杨士奇与杨荣等阁臣商议道：

“嗣主年幼，谣言纷起，倘有不测，危及宫廷。我辈受先皇厚恩，驾崩前，叮嘱辅佐幼主，理应力保，尽心尽力而已！”

杨荣道：“阁老所言极是，你我与杨溥虽已花甲之年，一定扶持幼主成为一代明君。”

张太后、孙皇后等，于内宫召见三杨，委以辅佐太子登基等事宜，三杨皆顿首遵旨，决不辜负先帝遗嘱。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九岁的朱祁镇即皇帝位，是为英宗，以明年为正统元年，追谥皇考为章皇帝，尊张太后为太皇太后，孙后为皇太后，封弟朱祁钰为王。

这一年，吏部尚书蹇义亦去世，老臣除三杨外，还有英国公张辅，尚书胡。太皇太后委任五臣，凡遇军国重务，一齐裁决。有人请太皇太后垂帘听政，太皇太后道：

“祖宗成法，明定禁律，汝等休得乱言！”

鼓城伯张，都督张升，都是太皇太后兄弟，只能于规定日期入朝，不得参与国政。张升领兵很有名望，杨士奇提出可给他晋升官职，太皇太后坚决不同意。

杨士奇二十八岁入宫，开始参与修《太祖实录》，辅佐建文帝，后来，又听命成祖，教导太子朱高炽，接着又辅佐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和孙子朱祁镇。杨士奇已为明朝尽力四十二年，成了洪武后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和正统五代的重臣。他眼看着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孙一个个长大成人，他抱过“呀呀”学语的朱高炽，看着他一天天长大；也抱过朱高炽的儿子朱瞻基，将其教导成人，更抱过刚刚九岁的皇太孙朱祁镇。今天，杨士奇已经七十多岁了，还要主持朝廷事务，扶持不懂事的幼主，深感责任之重大。所以，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从英宗朱祁镇登基日起，杨士奇又搬进紫禁城内，住于乾清宫旁，遇事请示太皇太后张氏，并可以立即召集张辅、杨荣、杨溥、胡四位大臣议政。

当时兵部尚书，开始曾由杨荣担任。杨士奇便与杨荣商议兵部训练士卒、严守边防、加强戒备等事宜。杨荣提出朝廷的御林军和地方卫所的军队要进行春、秋两次大训练的建议，不然“刀枪入库生锈，马放南山毛长”，一旦打仗，难以克敌制胜。

杨士奇非常赞同杨荣的建议，立刻从户部拨出银两，首先开始春季士卒训练。杨士奇还根据下属官吏的上疏，与四位大臣磋商，设立南京参赞机务大臣，以便加强管理南方有关兵部事宜。又经过认真挑选，分头派遣文武大臣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等地，罢去有名无实，危害朝廷官吏的侦事校尉之职。

正统初年，各地发生多次旱涝灾害，为了使英宗像他父亲宣宗一样关心百姓疾苦，得到广大吏民的爱戴，杨士奇和四位大臣一起研讨，

按各地受灾情况，减免租税。有些地方官吏纷纷上疏，对多次减免租税想不通，认为粮食少了，国库空虚，官吏们发不了俸粮，此举是对朝政的威胁。而杨士奇却不这样看，他耐心地向各级地方官吏解释道：

“天灾是不可抗拒的，粮食必然要减产，这是铁的事实。农民没有收获粮食或少收了粮食，你还要那么多租税，等于扎上农民的脖子，不让他活命。把农民逼死了，或逼得四处逃荒，还有谁来给你种庄稼、出粮食。所以，减免租税，使农民休养生息，是仁、宣之治十分成功的政策，这样，就使受灾的农民安定下来，准备来年多种田，多打粮食。减免租税的结果，最终会使农民多交租税，因此，减免租税，实际等于将来多收租税，何乐而不为？”

地方官吏听了杨士奇的解释，似通非通，不得不执行朝廷的政策，虽然国库的粮食少了，但百姓安居乐业，倒是一片太平盛世的景象。

杨士奇还命刑部审核悬案，将各府、县历年尚未了结的命案，派得力官吏重新调查结案，也使受害百姓感激不尽。同时还命吏部严格考核文武百官，够晋升者，按时晋升官职；不合格者，及时罢黜，一时间，国内政通人和，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正统初年，朝政清明，社会安定，国家富裕，都是以杨士奇为首的三杨等老臣辅佐的结果。正统三年(1438年)，在杨士奇等人的指导下，《宣宗实录》完稿，晋升杨士奇少师称号。正统四年(1439年)，杨士奇已经七十四岁，上疏英宗请求退休，多病的太皇太后张氏和十三岁的小皇帝英宗坚决不同意，杨士奇只好收回上疏。只是被恩准回籍省墓，不久又返还京师。

正统初年，宫中还出现一个巨蠹，名叫王振，山西蔚州人(今蔚县)，少年时自阉进宫，被选入内书堂读书，仁宗时于东宫侍奉太子。宣宗时，又朝夕侍奉当朝太子英宗，并在东宫伴他读书。英宗即位后，

便把王振提升为司礼监太监。他为人狡黠，善于逢迎，因而取得了朱祁镇的欢心。王振掌握司礼监后，倚仗着英宗的宠信，压制百官，专横跋扈，开了明朝宦官专权之端。

原来，在洪武年代，朱元璋见到历代宦官利用亲近皇帝的有利地位，干预朝政，酿成祸乱，为此，朱元璋立下条章，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兼外臣文武职衔，品级不得超过四品，并且在宫门挂一块铁牌，上刻“内臣(即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在洪武和建文朝代，对太监的管束都很严格，只要稍有违犯，就严厉惩罚。但是，这个制度到永乐朝代便被破坏了。朱棣在北平当燕王的时候，曾屡次收到建文帝宫中太监送去的情报，后来大军进逼江北，许多宦官又偷偷逃入靖难军中，密告南京城中的虚实。因此，朱棣便认为这些人对他忠诚，称帝后都成为他的心腹之人。这样，他就丢掉了“祖制”，经常选派宦官出使外国，派到各地征税、采办、监军，甚至赋予镇守地方、边防的重任。到了宣宗年代，又在宫中陈设书堂，太监可以读书识字。虽然如此，成祖和宣宗对太监的管制，还是很严厉的，若有犯法，则置之重刑，所以宦官皆不敢放肆。

英宗即位后，年龄很小，不辨忠奸，竟让王振这样的人掌握司礼监，是一大失误。司礼监是明朝宫廷里二十四个宦官衙门中最最重要的一个。它掌管紫禁城中一切礼仪、刑事、人事大权，更重要的是替皇帝管理内外一切奏章，代皇帝批答官吏上奏的一切公函秘件。皇帝的口谕，也由司礼监的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拟诏谕颁发。司礼监的宦官成天在皇帝周围，善于察颜观色，迎合皇帝的旨意，取得皇帝的宠任，进而又利用皇帝深居简出，和外廷官吏接触少的弱点，欺上瞒下，蒙蔽和驾空昏庸的皇帝。有时在代皇帝批签奏章和传达皇帝的圣旨时，私下加以歪曲篡改，以此来控制、威慑百官，造成皇权

旁落，宦官专政。王振掌握了这样的重要机构，便利用其权来大逞其奸。

正统初年，王振未曾和内阁五大臣商议，私自下令于朝阳门外筑一将台，请英宗登台阅兵。所有京营各卫武官，比赛骑射，名为阅武，其实是收集兵权，抵制朝廷文臣。比赛后，假传圣旨，提升卫卒指挥纪广为都督佥事。纪广原来是领兵镇守居庸关的指挥，投到王振门下，两人一拍即合，关系十分融洽。接着，适值兵部尚书王骥、右侍郎邝野奉旨巡视边防，因故迟延未归。王振遂唆使英宗传旨，命王骥、邝野二人回朝入殿。王振面责二臣道：

“尔等欺朕年幼么？如此怠慢，成何国体？”当即喝令左右，将二人捆绑下狱。

右都御史陈智，按着王振的意图，上疏弹劾英国公张辅，办事缓慢，回奏迟延。可是该上疏，却压在六部科道官员手中未曾呈上。王振知道后假借英宗之名，拘捕张辅和科道官员，因张辅是历朝勋臣，不便加刑，只命将科道等官员，各仗二十大板。等到太皇太后知道此事后，急忙赶来，忙令停杖，可是已经打完了。惟王骥、邝野，总算由太皇太后特旨，释放出狱。

太皇太后极为恼怒，亲御临便殿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胡五人入见。英宗东首上立，五大臣西首下立，太皇太后看着英宗道：

“此五大臣，系先帝简任，留以辅汝，一切国政，应与五大臣共议，非得他们赞成，不准妄行！”

英宗含糊答应。接着，太皇太后又命令女官，宣王振入殿。王振跪伏于地，不知何事。

太皇太后勃然大怒道：

“汝侍奉皇上起居，竟然干起违背祖规的不法之事，罪不可赦，今当赐汝死！”

王振闻言大惊失色，正欲分辩，左右女官，已拔剑出鞘，架到王振的脖子上，吓得他魂不附体，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英宗见此情形，慌忙跪在地上，替王振求情。五位大臣也依次跪下，替王振说了不少好话。

太皇太后道：“皇帝年少，不识此等小人，成事不足，误国有余。我今姑且听从皇帝及诸大臣的劝阻，将你的一颗头留下，但从此以后决不可干预国政。汝若再思预政，决不饶汝！”

王振连忙叩首谢恩，太皇太后叱令退下。王振战栗而出，五大臣亦奉旨退朝。王振经此一跌，不得不稍稍收敛一下，约有三、四年不敢干预政事。

正统五年(1440年)，靖江王佐敬私自赠杨荣金银，杨荣起先回籍省墓，回来后也不知道。王振借这个机会上疏弹劾杨荣。杨士奇极力解救，才得以平息。不久，杨荣气愤不已，得病而亡，终年六十岁。

这时，张辅、胡皆已病老乞休，难以临朝，只剩下杨士奇、杨溥更加孤立。

正统七年(1442年)，太皇太后殡天，王振无人管束，权势更大，作威作福，更加肆无忌惮。百官小有抵忤，就拘捕下狱，廷臣人人恐惧自危。杨士奇也不能制止。

这一年，杨士奇已经七十七岁，本来身体还算硬实，每日坚持上早朝，为朝廷六部所有大小政事操心。一日，杨士奇翻阅各部大臣奏章，突然看到吏部一位大臣弹劾杨士奇之子杨稷杀人的奏议。杨士奇阅后立即晕倒过去，不省人事，宫人唤来御医，再三抢救诊治方醒转过来。

杨士奇早年为官，经常在外，只此一子，十分溺爱。母亲、祖母等家人皆难以管束。自祖母去世后，杨稷之母多次哭诉，劝其认真读书，勿打仗斗殴，行凶惹事。可他把母亲的劝告只当耳旁风。

杨士奇曾为其在朝廷谋一官职，杨稷只拿俸禄从不上任。到处打着杨尚书、杨阁老公子的身份，招摇撞骗、横行霸道。杨士奇早知儿子之劣迹，甚想教育，因忙于政事，见不到儿子之面。有时见到了训斥几句，儿子哭哭啼啼表示悔改，杨士奇心软，只好饶恕了事。

已经进入耄谏之年的杨士奇，听说儿子杀人，对其是个沉重的打击。立即身体瘫痪，行走不便，而且语无伦次，不知所云。

吏部不少官员纷纷上疏弹劾杨稷。朝廷计议，不立即绳之以法，把他作恶的情状送给杨士奇审阅。

不久，又有人揭发杨稷数十件坏事，才将杨稷逮捕下大理寺狱。杨士奇因为老而有病，正在告假期间，英宗恐伤害杨士奇，暂不处死其子，降诏慰勉。杨士奇感激涕零，担忧病将不起，难以报效朝廷。

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杨士奇在哀子忧愤中去世。临死前，口中还不停地喊着：

“稷儿，稷儿，爹爹没时间管教你，愧对了你！爹爹对不起你！”

杨士奇享年八十岁。赠太师称号，谥号文贞。待杨士奇死后，朝廷才将杨稷绑赴刑场，处以极刑。

在正统初年，杨士奇主持内阁，积极训练士卒，加强边防军备，特别提出过，边防缺马，应多养马训练骑兵，防御北方强敌入侵。杨士奇死后，王振横行无忌，加强边防无人问津。数年后，瓦刺入侵，发生土木之变，英宗被俘，有识者不禁思念起杨阁老来。有人说，如果杨阁老在世，瓦刺难以入侵，英宗不会被俘，也不会发生土木之变。

在明代的历史中，一提起仁、宣之治，总要归功于“三杨”的辅佐，而“三杨”中，功劳最大的当属杨士奇。

杨士奇出身布衣，自学成才，官至一品，显赫一时，为五朝元老。他之所以在封建社会走上仕途之路，并成为仁宣之治的重要人物，归结为一点是，他关心别人比自己为重，他主动承担罪名，袒护皇子、阁僚、太监和宫女；关心受灾农民，主张减免赋税；敢于进谏，关心皇上的圣明与安危，这样，他成为历朝的好人，令后人长久地思念。

杨士奇辅佐五朝皇帝，居官数十年，廉洁奉公，政绩显著，受到人民的赞誉。

况钟

当年，他做苏州知府，离任时，数万郡民祈留，因此又被留任三届。一位知府，受到百姓如此爱戴，史所罕见，而这样一位人物，后来参与朝政又将如何呢？

怪石嶙峋，泉水淙淙，翠竹傲立，百鸟齐鸣。——这是龙冈八景之一，屏风叠翠的景色。在其附近，尚有龙冈烟树、鹰岛春云等景点。此龙冈八景，位于江西省的西北部，流入鄱阳湖的潦水中游两岸，是江西省靖安县的龙冈洲。

元朝末年，在这里发生了一件惨不忍睹的事件。

龙冈洲居住着几十户人家，世代为农，安居乐业。其中一家有人在元朝做了官，突然富裕起来，在龙冈洲修建了一座府第。外有高大的青砖院墙，红油漆大门。墙内楼台亭阁，富丽堂皇。元末红巾军起义后，一支数万人的队伍在龙冈洲活动，经常与元军展开激战，元军屡战屡败，红巾军不断发展壮大。有一支元军孤立无援，就投降了红巾军。他们开赴龙冈洲时，十几名士卒住在元朝官员府第。这家府第的奴仆以为他们是元军，就给另一支红巾军报信，夜间来了几百人将府中投降的十几名元军抓走，在荒郊野外统统杀死。待红巾军走后，其余的元军以为是元朝的官员勾结元军，杀死了他们的弟兄，便闯进府中，见人就杀，上至七、八十岁的老人，下至几岁的孩子，以及奴仆、丫鬟，三十余口人，皆被杀死，府第内到处都是身首异处的尸体，血流成河。

惨祸发生之后，邻居黄胜祖一家，见官员府第无声无息，进府一看，家中主仆皆被杀死，只好协助料理后事。在往外抬尸体时，发现柜中尚藏着一个六岁男孩，吓得浑身瑟瑟发抖。黄祖胜立刻把这个男孩领回家中。

这就是况钟祖辈一家的遭遇。

况钟字伯律，号如愚，生于洪武十六年(1383年)。家乡就在有龙冈八景的龙冈洲。

龙冈洲况氏这个家族，第一个祖先是唐代的况鼎，曾被封为水南伯，从他乡迁居到新建西山之麓，以后氏族繁衍，便形成了况坊这样一个村庄。到了宋代，有一位名叫况升的人，从况坊搬到靖安城内的甘家巷，这是况钟家族的一支远祖。在宋代，靖安最显赫的况家的人物是况淳，曾任观文殿大学士，封为惠国公。

况钟的高祖名况亮，曾任元代的常州路同知。在龙冈洲的产业就是况亮创下的。到了曾祖况懋建，祖父况渊，家业逐渐扩大，并修建了豪华的府第。就是在况渊这一代，全家遭了厄运，只留下一个六岁孤儿，名叫况仲谦。邻居黄胜祖没有儿子，便把况仲谦作为自己的儿子收养，况仲谦从此改姓黄，名黄仲谦。

黄胜祖在龙冈洲也是富户，只是名望和家业比不上况家。黄仲谦在比较优裕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对诗词赋饶有兴趣，对功名科举则比较淡薄，他所继承的黄胜祖的遗产相当丰厚，所以在宅中修建了不少山亭水榭，逐日以游宴吟诗为乐。

待仲谦长大成人后，娶妻寥氏，生子取名黄钟，即是后来的况钟。黄钟童年时长得白白胖胖，聪明伶俐，人人见了喜爱。父亲为其请来老秀才教授《四书》、《五经》，并指导练习书法，从描红、描绿开始，进一步学习楷书、隶书和行草，在老秀才的认真指导下，下了不少苦功夫，到成年时，黄钟已写得一手好字。

黄仲谦又续娶一位罗氏，生子取名黄镛。五岁时与其兄黄钟一起学习，此子也很聪明，但学习成绩不如其兄。

黄仲谦继承黄家遗产之后，曾经考虑恢复原姓，但又觉得是黄家抚养大的，否则早死于战乱中了，如今黄家又没有子嗣，如果恢复原姓，黄家也就绝了后，所以始终难下改姓的决心。

黄仲谦六岁时，虽然已记事。但很多事，不太明白，只记得一天早晨睡在箱子里，被人叫醒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等亲人，皆被杀死，倒在血泊中，就是他的义父——黄胜祖，将他抱回家。等他长到十五、六岁时，黄胜祖对他说道：

“孩子，你本姓况，是况渊的后代，元末战乱，况家三十多口人皆被杀害。那天晚上，贼兵进宅杀人时，可能是你母亲急中生智，把正在睡梦中的你，藏在箱子里，这样，况家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这时，黄仲谦才知道原来他姓况，黄胜祖是他的义父，也是他的救命恩人。黄胜祖待他如亲生儿子一般，直至娶妻生子，继承家业。黄胜祖临终前曾嘱咐他说道：

“别忘了，你是况家的后代，况家只有你这一棵独苗。”

黄仲谦想到这些，使他十分为难：改姓吧，对不起黄家；不改吧，也对不起况家。究竟如何是好，使他苦恼了后半生。

一天，一位算命先生来到他家门前，被仆人请到宅内给黄仲谦算卦。算命先生，已经六十多岁了，有五十多年的算命历史，善于察颜观色，随机应变，他见黄仲谦面黄肌瘦，愁眉苦脸，便说道：

“老爷乃大富大贵之人，吉星高照，日进斗金，发福生财，不过老爷最近被一件事所困扰，难以解脱。”

黄仲谦道：“老先生说得对，可是，能不能算一下是什么事？有没有解脱的办法？”

算命先生道：“可以，请报上生辰八字来。”

黄仲谦将生辰八字说了一遍。算命先生摇了一卦，说是得了中上签，上面说道：

“一座庙宇刚盖起，内中老僧心中急。

僧去庙空谁主持？两条江水东流去。”

黄仲谦道：“请老先生能否解释一下？”

算命先生道：“‘一座庙宇刚盖起’，是说老爷发家时间不长；‘内中老僧心中急’，是说老爷有一件十分难办的事；‘僧去庙空谁主持？’是指出难办的事是老爷为嗣业继承一事犯愁；‘两条江水东流去’，是说，嗣业由两个儿子继承，祖业就会像江水一样不停地朝东流去。”

黄仲谦道：“好！好！老先生卦算得好！的确是为两家的嗣业继承之事犯愁。两条江水东流去，一句话，解除了我半生的苦恼，两个儿子，分别继承两家的嗣业，非常之好。”

黄仲谦特意拿出十两银子，赏给算命先生。

黄仲谦在病危临终时，将两个儿子唤来道：

“老父自感病情日重，有一事始终放心不下，就是老父原来姓况，六岁时全家遭劫，由黄胜祖抚养长大成人。义父曾劝我改回况姓，而黄家就没有人继承祖业了。为此事，我曾苦闷了大半辈子。前几年，一位算卦老先生指示我：‘两条江水东流去’，这就告诉我，由你们两个继承两家的嗣业。黄钟是老大，你应当恢复姓况，由你继承况家的嗣业。黄镛，由你延续黄家的后代，以报抚养之恩。”

黄仲谦嘱托之后不久，便离开人世。

黄钟对于父亲的遗嘱铭记在心，从未稍忘。他在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时，有一次回乡省亲，遇见宁都生员宋惟亮，谈到了自己的苦闷。宋惟亮也竭力劝说黄钟给皇上呈奏章，请求准予恢复原姓。

数年后，黄钟升任礼部仪制司郎中，向宣宗上了《请复姓奏》，说道：

“臣思立性命氏，各有源流，叨仕圣明之朝，孝治天下，若不请复姓，有失本源之义。”

宣宗不仅御批所请，而且颁发《赐复姓制词》，道：

“今不忘所本，用复旧姓，是宜嘉奖，特赐训词，以励民俗。”

黄钟恢复原姓时已经四十七岁了，从此才称况钟。

宣宗在颁发《赐复姓制词》的同时，还颁发了《追赠父复姓制》，把黄仲谦恢复为况仲谦。

关于况钟的家世源流，况钟在《示褚子诗》中写道：

“吾家诗书胄，况坊名阀阅，

奈何遭元末，群盗肆猖獗。

阖门殒锋镝，惟父脱虎穴，

赖彼黄氏泽，鞠养不令绝。”

永乐四年(1406年)，况钟已二十三岁。长成一个文质彬彬、眉清目秀、身材胖胖的大小伙子。

这一年，靖安县来了一位新的知县，姓俞名益，仁和人，进士出身，为官清正，他想选用一个能干练达的书吏。在县城内到处张贴告示，再三物色，没有合适的人。有人推荐说，龙冈洲黄胜祖家大公子况钟为人机灵，写一笔好字。俞知县便将其唤到县衙一试，见况钟不仅人才出众，而且毛笔字写得好，曾令其写了一篇楷书，一篇行书，字迹结构合理，运笔有神韵，自成一体。然后又询问一些史书知识。回答得口齿伶俐，十分圆满。

经过测试，合乎俞知县的要求，于是就正式录用为书吏。况钟听说被录用很高兴。他自小在家中读书、写字，从未出过远门，这回到了县衙，见了知县大老爷，还赏识他的字，感到新奇、兴奋。况钟回家对祖父说，已被录用为书吏，祖父并不高兴。黄胜祖道：

“我培养你读书、写字，是想让你在功名上求上进，中举人、中进士，光宗耀祖，不愿意让你只做个书吏。”

祖父的一席话，使况钟很扫兴。俞知县见况钟不来县衙上任，不知何故？派人前去询问，得知况钟的祖父黄胜祖不同意孙当书吏。俞知县认为人才难得，便乘轿，亲自登门拜见黄胜祖。

黄胜祖道：“希望孙继续攻读诗书，参加乡试、会试，在功名上有所成就，不想让他当书吏。”

俞知县道：“自古以来，从书吏起家，后来成为高官的人很多，且不谈大家熟悉的汉代的萧何、曹参，唐代就有孙伏伽和张元素，前者做到谏议大夫，后者做到金紫光禄大夫。做书吏又有何不好呢？”

经过知县的反复劝说，黄胜祖无言以对，也没有办法违抗县太爷的决定，只好让况钟到县衙做了书吏。

况钟上任后，其工作主要是，为知县起草、抄写各种公函、案卷，收发京城各种指令、要事，以及其它例行公事等等，起初工作不太熟悉，等过了半年之后，况钟将县衙内的文墨工作，理顺得井井有条，有些事不用俞知县说话，即办得十分圆满，甚至俞知县想不到的事情，他都能为之操劳。

俞知县初上任时，家小远在钱塘县，只身住于县衙，其生活除了差役照顾外，皆由况钟协助料理。春天，俞知县忙于治水，无暇顾及家小，况钟多次派人去钱塘慰问。况钟见知县过于劳累，在县衙休息不好，即代为购买一所宅第，将其父母妻儿接来。俞知县去府衙办事归来，想下轿回衙休息，被况钟拦住道：

“请知县不必下轿，径自回家休息。”

俞知县笑道：“况书吏勿要取笑，本官之家，远在钱塘，何时才能到家？”

况钟道：“昨天远在千里，今日近在咫尺。请轿夫抬往后街，即是知县府第。”

县太爷的八抬大轿，被抬到后街，果然有一座宅院，大门前挂有“俞府”字样。俞知县下了轿，半信半疑，命人叫门。开门者是家中老仆人俞顺。只听俞顺喊道：

“老爷回来了！”

只见知县的妻子儿女、父母七八个人出来迎接。知县见到家人喜出望外，立即进入府中与家人团聚。问其原因，皆言是况钟所为，由此俞知县对况钟十分感激，并认为他有很强的办事能力。

永乐十二年(1414)，况钟在靖安县做了近九年书吏。朝廷规定，凡是各县、府、州的书吏，经过九年后，可送交吏部考核，优秀者，可提拔晋升官职。俞知县感到况钟能力较强，可参加考核。到了通考之期，派况钟赴南京，由吏部考绩。俞知县和礼部尚书吕震是旧交，就写了一封信让况钟带上去见吕震。经过晤谈，况钟给吕震留下非常好的印象，觉得况钟是个人才。经过吏部考核，成绩优秀，于是况钟暂时就留在吕震手下办事。

当时，吕震还兼管工部事。工部的储藏物料的神木厂发生了火灾，成祖要求负责大臣禀告起火原因。吕震草拟了奏疏，说火灾是“烧毁木植”而引起的。况钟看过之后，觉得不妥，对吕尚书说道：

“此奏章呈上去，难免获罪。”

吕震道：“依你之见如何？”

况钟道：“不妨用‘烧毁拣退木植’的字样就好得多了。”

吕震觉得有道理，就照办了。

成祖御览了奏章，知道烧毁的是拣退木植，也就没有再加追究。

由此吕震对况钟更加赏识，又在成祖面前加以推荐。

当时成祖正欲出巡北京，准备工作十分繁忙，吕尚书奏请成祖，成祖在百忙中，接见了况钟。见况钟是一位文静、俊秀的青年。提出问题，皆对答如流，且口齿伶俐，吐字清晰，声音宏亮。况钟给成祖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永乐十三年(1415)九月，成祖降旨，任命况钟为正六品的礼部仪制司主事。

仪制司是礼部四个司中最主要的一个，主要官员有正五品的郎中一人，从五品的员外郎一人和正六品的主事一人。仪制司的工作是制定和布置一切重大典礼的仪式，诸如皇帝即位、皇帝大婚、皇帝加冠、册立皇太子、朝贺、朝见、大飧、宴飧、大射、宴射、皇太子监国、封宗室王、封郡王、巡狩、亲征、献俘、奏捷、进历、进春、经筵、日讲、耕、视学、策士、传胪等等仪式都包括在内，极其繁琐复杂，稍一疏失，就要被指责，甚至被处分，碰着成祖这样烈性的皇帝，尤其难以应付。况钟在仪制司任主事期间，一贯小心谨慎，从不马虎从事。从各项礼仪的筹备、开始到进行中乃至结尾，他都考虑得十分周全，从未出什么差错。

永乐十四年(1416)，南京藏书阁发生了火灾，烧毁大批珍贵藏书，找不到引起火灾的原因。成祖听到后，十分生气，雷厉风行，降旨彻底追查。问到很多大臣，皆说不清楚，看样子，可能要引起大狱。成祖责成礼部查清火灾原因，礼部尚书把查情工作交给了况钟，况钟到烧毁藏书阁废墟上观察了三天，最后得出结论，向成祖禀报道：

“卷帙内蠹鱼年久每能生火，恐非人所为也。”

成祖听了况钟的话，没有再深究。

永乐十五年(1417)，成祖再次出巡北京，礼部就选派况钟随行。那时，北京还不是京都，而是所谓“行在”，但是已经有许多重大的

政治活动在北京举行。当时邻国到“行在”来朝贺的就有南真腊、占城、暹罗、撒马儿罕等国。又在北京举行了两次会试，况钟都参加了具体的接待、布置等工作。

永乐十九年(1421)，成祖正式迁都北京。反对迁都的主事萧仪被杀，侍读学士李时勉下狱。况钟积极拥护成祖迁都，热情地奔走，筹备朝贺、祭告等典礼。在迁都过程中，况钟的才能又一次受到成祖的赏识和重视。

永乐二十年(1422)，成祖命太子监国，亲自率兵往阿鲁台，凡祭告、庆贺、封策等文件大部分都是况钟参加草拟的。况钟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期间，先后受到成祖三十一次嘉奖。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成祖死于榆木州。八月，朱高炽继位，是为仁宗。仁宗是位宽厚仁慈的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尽力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从各方面选拔人才。

这一年，况钟任主事已届九年，又到了考绩的期限了。经过朝廷各方面的考核，况钟的主事业绩突出，被越级提升为正四品的仪制司郎中。

洪熙元年(1425)，南京发生多次地震，仁宗朱高炽担心要出什么大事，派太子朱瞻基去祭奠孝陵，实际上是要他坐镇南京。朱瞻基的随行人员，都是朱高炽亲自挑选的，被誉为“识达大体”的况钟，就是其中之一。朱瞻基带着况钟等人抵达南京才两个月，便得到了朱高炽病危的凶讯，他们从南京立刻赶回北京去，况钟戴着纱帽，穿着礼服，扶着朱瞻基的轿子而行，朱瞻基见他千里跋涉太辛苦，特别批准他骑马随行。每到一地，朱瞻基停下来休息时，况钟都是在那里迎候。因此朱瞻基对况钟格外有好感。朱瞻基继位，是为宣宗。况钟又被派陪同亲王赴南京祭孝陵。

况钟在永乐、洪熙、宣德等三朝中为礼部的一名小官，但为朝廷做出了不少好事。

王直当时曾写了两首七言绝句：《王马图为况郎中题》

“凤臆龙不受羈，长林丰草日斜时；
超然自得随天性，比乐奚官未必知。
汗马名驹出月支，贡来长得被恩私；
彤皂盖行春日，还忆金门立仗时。”

宣宗是一位颇有作为的皇帝，也比较肯听臣僚们的意见，因此，即位以后，在政治、经济，尤其在人事行政方面采取了不少积极的改革措施。

宣德五年(1430年)，苏州府等九个府的知府有缺额。宣宗感到有许多大臣、官吏都是凭资历逐级迁升的，其中有不少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于是，就想在吏治上有所改革，便命令大臣们在五、六品的京官中，选拔一批干练的去充任。

吏部尚书蹇义推荐了况钟。礼部尚书胡也赞同，内阁大臣三杨，杨士奇、杨荣和杨溥也都积极支持，认为况钟可以胜任知府工作。

宣宗降旨，一共任命了九位知府，其中有苏州府知府况钟。欢送这九位知府赴任时，宣宗赐宴，并亲自参加，还给每位知府发了一份敕书，原文如下：

敕苏州知府况钟：国家之政，首在安民。安民之方，先择守令。朕临御以来，孜孜夙夜，以安民为心。而比岁田里之民，鲜得其所，究其所自，盖守令匪人。或恣肆贪刻，剥削无厌，或幞冗庸懦，坐视民患，相为蒙蔽，默不以闻。致下情不得上通，上泽不得下施。

今慎简尔等，付以郡寄，夫千里之民，安危皆系于尔，宜体朕心，以保养为务。必使其衣食有资，礼义有教；而察其休戚，均其徭役，兴利除弊，一顺民情。

毋徒玩，毋事苟简，毋为权势所胁，毋为奸吏所欺；凡公差官员人等，有违法害民者，即具实奏闻。所属官员人等，或作奸害民，尔就提下差人解京。尔亦宜奉法循理，始终不渝，庶副朕之委任，钦哉故谕。

宣宗的敕书，是对地方官员如何做好工作的指导。指出了知府、知县是直接治理百姓的，人选的是否得当牵涉到经济能否发展，社会能否安定等方面的问题。并说明当时的地方官员有很多是不能恪尽职守的，所以才派一批新人去担任。到任以后，应该如何做，也提得比较具体。最后告诫他们，一定要认真而坚决地贯彻朝廷的意图，并给予权力，如有的人干扰或破坏他们的工作，可以上报或解京法办。

按朝廷规定，知府之上，尚有行省一级的官员，而宣宗要这九个知府直接和朝廷建立某些联系，实际上是想多了解一些地方上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说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措施。

宣宗让九个知府领取敕书赴任，已经是破例的恩典，尤其对于况钟，应该说是最受宣宗信任和重用的，因为苏州府的人口和税粮超过任何一个府治。宣宗早就关照吏部：“苏州大郡，公务繁剧，急选廉公有才能者任之，贪暴厉民者不可用。”看来，宣宗认为况钟是苏州知府理想的人选。

况钟于宣德五年(1430年)七月到任。当时，苏州府吏治很腐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而规定上的赋税还拖欠数百万石之多，本来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反而日趋贫困。其原因是凡是到苏州来做官的，或出差来此路过的，都要搜刮一饱才走。因此造成国贫民困的局面。

况钟上任时，首辅杨士奇赠诗一首，内有“六月云霓人望切，好为霖雨向姑苏”等句，把况钟比做救大旱的甘霖，对其期望很大。

曾任越府长史的周忱，是江西吉水人，为况钟江西的同乡，为况钟写了一首七律《送况郎中任苏州太守》：

擢自仪曹领郡符，朱熊轼向姑苏；
身驰驿传声华重，手捧天书宠渥殊。
政治九江重渡处，时清合浦还尽珠；
故人尊酒遥相送，努力期君展壮图。

周忱是况钟的好友，诗中强调了况钟出任苏州知府非同寻常，而是“手捧天书”的领差知府，希望他有所作为，大展宏图。

况钟上任伊始，首先撰写了一篇《座右铭》，作为展开知府工作的施政方针：

卑而不可不牧者民也，迳而不可不察者吏也，严而不可不用者刑也，微而不可不崇者德也。不植其德，难施乎刑；不施乎刑，难以正吏；不正乎吏，民曷由安之。

此《座右铭》，论述了官员、吏员与老百姓之间的相互关系，阐述了“植德”与“用刑”之间的辩证的关系，说明官员如果自己不能身体力行，要坚决执行法律就比较困难；不能坚决执行法律，就无法纠正吏员的不正之风；不能纠正吏员的不正之风，就不能使老百姓得到安定。

况钟即按照《座右铭》，首先开展了整饬吏治的工作。他对于所有属官、属吏的考察是不动声色地进行的。一开始，书吏们拿来公函、案卷，要他批准，他都是照批不误，有人误以为况钟愚庸无能，用种种方法加以欺瞒。苏州府通判赵忱对况钟尤为轻侮，背后议论况钟是

面瓜，不能任知府工作。其实况钟已把他们的种种表现记录在案，较重大的事件上报了朝廷。

到任一个月后，况钟已将基本情况掌握在手，便开始采取措施。先把属下官员、吏员全部集中，然后，宣读了宣宗所颁发的敕书。当念到“所属官员人等，或作奸害民，尔就提下差人解京”的话，凡是有劣迹的官员、吏员皆感到惶恐了。

况钟道：“我早就知道苏州地方上为非作歹的人不少，我自然有办法加以分辨，但我不准备像包拯那样亲自来一个一个地辨认，但是，谁是好人、坏人，我已经记录在案。好人我一定以礼相待，加官进俸，坏人我要依法惩处，为民除害。”

况钟当众把几个官员贪赃枉法、欺上压下的罪行一一宣布。情节特别严重的有六人，整理案卷，上报朝廷，宣布斩首。这样，府内所有官员方知道况钟的厉害，看到他办事非常坚决，观察得也很仔细，立即对新知府刮目相看。有几个有劣迹的官员，主动承招了自己的罪行。

经过一番清查，况钟又撤换了一大批平庸无能的属官，其中有：苏州府经历司知事孙福，长洲县知县汪仕铭、主簿林泉，吴县主簿王勉，常熟县知县刘正言、典史郭良，吴江县知县张肃、县丞赵浚、主簿巩端，昆山县县丞刘志、主簿赵荣等十一人。后来又向朝廷报告了长洲县知县徐亮“到任半年，正事不理，诘问其故，但云年老无能，今事皆废弛，吏胥肆奸，民失所望”。宣宗接到奏章，降旨把徐亮也撤换了。

对于较大的贪污案件，况钟审理清楚后，就押解进京，听候发落。先后被押进京的有：苏州府经历傅德及其赃款白银五百七十三两，是长洲等县的粮长、皂隶们揭发检举的。昆山县知县任豫及其赃款白银

八百六十两和昆山县县丞吴仲郢及其赃款四百二十两，是昆山县的老人、粮长们检举揭发的。长洲县典史薛孟真及其赃款白银九十七两，是长洲县县丞徐景贤检举揭发的。这些人都曾用酷刑拷打粮长里老，索取银两。

当况钟派人将这些罪犯押解进京后，宣宗非常重视，降旨命行在都察院审理治罪，并对众臣道：

“知府一郡之表率，而行之自廉始，钟必能持廉，持廉而后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之贪者必自敛矣！”

事实证明，宣宗的推断是正确的，经过况钟以身作则地奉公守法，严惩贪官污吏，把苏州府的坏风气逐步加以扭转。

在况钟整治的这批贪官中，长洲县典史薛孟真气焰最为嚣张。他以催粮为名，带着第三房小妾，坐着船，遍历各乡镇，遇到殷实富户，就住下来，百般索要衣食，榨取银两。苏州府推官高鹏接到老百姓举报，前去劝说，薛孟真恼羞成怒，竟将高鹏殴打下水。

薛孟真被押解进京后，被判有罪很不服气，百般辩解之后，又上疏弹劾况钟，进行报复。宣宗看到薛孟真的上疏，责令况钟逐一答复。况钟写了《陈明贪官反噬诬奏》辩明了真相。经过况钟的解释，宣宗并没有加罪于况钟，依旧对况钟十分信任。对薛孟真的判处，不但维持况钟的原判，而且加重处罚，对况钟整饬吏治给予极大的支持。

况钟治理苏州府，将官吏加以调整之后，下一步工作就是削减田赋，减轻农民的负担。

况钟上任后不久，好几位官吏向他反映，苏州府向朝廷缴纳的田赋过重，农民早就承担不起了。有人说，根据统计，当时全国夏税秋

粮总数为三千万石左右，而耕地面积仅占全国百分之一点一的苏州府，夏税秋粮却要缴纳二百八十一万石，占全国总数百分之九点五。

苏州府的赋税为什么比其他地方的要重呢？况钟经过深入了解，其原因有二：一是，这一带曾是张士诚的势力范围，他以苏州府为其统治中心，与朱元璋抵抗。朱元璋统一全国后，对这一带的老百姓采取移民政策，把一部分殷实富户迁到凤阳，又把苏州的田赋酌量增加，目的是要削弱拥护张士诚的富豪们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二是，很多人认为苏州府的土地确实比其他地区的肥沃，有意识地把朝廷的财政开支的较大部分由苏州府承担。

当时的官吏，把太仓直隶州的人口和税粮作了一次统计：洪武年间每丁授田十六亩，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造的黄册，共有六十七个里，八千九百八十六户。到了宣德七年（1432年），不过相距四十年，所造黄册只有十个里，一千五百六十九户了。人口锐减，其原因不是由于战乱、瘟疫死亡，而主要是逃亡。这里的赋税过重，难以维持生活，必然要逃往他乡。再仔细核对一下，这里面还有一半是虚报的，实际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户口人丁了。

所以，况钟向当时的巡抚周忱详细汇报了这一情况，周忱向朝廷写了一篇《与行在户部诸公书》。其主要内容是：

“户虽耗，而原授之田俱在，夫以七百三十八户，而当洪武年间八千九百八十六户之税粮，欲望其输纳足备，而不逃去，其可得乎？恐数岁之后，见户皆去，而渐至于无征矣！”“天下之农民固劳矣，而苏松之农民比于天下，其贫又加甚焉！天下之农民固贫矣，而苏松之农民比于天下，其贫又加甚焉！”

因此，他要求户部诸公重视这个逃亡问题，并且采取一些措施，以扭转这个局面。

苏州府的耕地有官田、民田的区别，其所缴纳的田赋的比率也不同。官田又有古额官田与抄没官田之分，古额官田指宋、元以来籍没入官的田；抄没官田指明初抄没张士诚及其僚属所有田产，两者合计起来，数量很大。官田与民田纳秋粮的比例为十五比一。当时官田之粮虽按朝廷规定削减十分之三，一石犹为七斗，而民田仅以五升起科，即有的官田之粮几乎为民田的十四倍。

况钟也写了篇奏章《核减浮粮实数覆奏》，请求核减官田：原以每亩一斗至四斗者，核减十分之二；原收每亩四斗一升至一石者，核减十分之三。提出了请求核减古额官田税粮三十四万五千八百石，抄没官田税粮三十七万五千三百石，共计七十二万一千一百石的方案。户部因为核减数字过大，不予批准。

况钟认为，减轻税粮是根据宣宗的敕谕行事的，被户部驳回，心中不服，于是又上《再请减秋粮及抛荒粮抽取船奏》，说道：

“查洪武年间抄没官田起科多者，每亩不过三、四斗，农民可胜。其所不胜者，正在古额。伏睹敕谕明开旧额官田。今本部驳。查不准古额官田，前后不一。人民惊恐，莫知适从。若不遵依，不减，仍照旧额征粮，不惟有违恩命，抑且失信于民。”

况钟在奏疏中指出，要减轻税粮的主要是宋元以来的古额官田，而皇帝在敕谕中也明确了要减轻古额官田的税粮。如今如果不减，就是违抗皇帝的命令，而且对老百姓也失去了信用。道理讲得很清楚，态度也很坚决，但户部仍旧不批准。

关于核减抛荒浮粮，况钟也做了很多艰巨的工作。昆山具有全家死亡或外逃的户口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户，占整个苏州府总户口的25%左右，遗下来无人耕种而抛荒的官田、官地以及滩、荡等共二千九百八十二顷十一亩。还有昆山县若沿河滨海田地已经崩塌，无从

种植，两者合计为十四万九千五百一十石粮，况钟请求一同豁免，但户部批驳不准。

况钟再三上疏，请求核减古额官田税粮与抛荒浮粮两事，都被搁置下来，未于批准。宣德七年(1432年)，一天，宣宗在文华殿召集大臣议论朝政，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再核减一次税粮。一位大臣道：

“苏州知府况钟曾多次请求核减税粮和浮粮，皆未被批准。”

宣宗质问道：“为何？”

那位大臣回答道：“户部不准。”

宣宗又问道：“户部为何不准？”

户部尚书道：“因核减税粮数字太大，影响京师俸粮发放。”

宣宗道：“何谓影响？每年各地粮仓皆言已满。前次朕下诏核减官田税粮一事，竟未实施。积太多粮食欲发霉乎？”

一句话，问得户部尚收一言不发。于是宣宗命首辅杨士奇立刻拟就诏书，颁发全国，再一次核减税粮。

这样，况钟的请求终于得到朝廷的核准实现了。减免了官田税粮七十二万一千六百石，抛荒官田税粮十万石。运南京的税粮七十四万五千六百石改由官军来苏自运。运临清的税粮一百零六万一千一百石，减去六十万石。这使苏州府的老百姓的负担减轻了不少。况钟曾代表七县士绅、在籍副御使吴讷、粮里老人陈昭贤等上奏谢恩。

除了税粮之外，苏州府人民负担着“调倭船只”、“粮运船只”、“借马”等许多种苛捐杂税。

苏州离海岸长江口都很近，受到倭寇骚扰的机会比较多，做些准备是必要的，但是在当时却成为一种巧立名目的敲诈勒索。苏州府沿海一带共有备倭船只四十二艘，这些船只被官军们故意弄坏，或谎报破损，连年借修造为名进行勒索。有个百户李让经常到长洲县催索木

材，长洲县当地不出木材，老百姓要凑钱到别处买了木材再运来，运到以后，李让却又不要木材，而要银两布绢了。这样故意刁难，使老百姓很难应付。假使银两布绢缴迟了几天，老百姓便要被拘捕殴打，有时把农具、牲口、铁锅变卖了银两送去，还要被责骂。

况钟计算了一下，卫所收取的银两，已经远远超出造船需要经费的数目，而且事实上所谓备倭船只已经多年不修缮不添造了。况钟将情况调查清楚后，给宣宗呈《备倭船及开浚河道奏》，对李让等人的敲诈勒索作了揭发。至于修造备倭船只的材料解决方法，他也做了具体建议，说道：

“乞照领近浙江海宁等卫及嘉兴等府造捕倭船只事例，合用木植着军卫自行采办，其棕、麻、油、铁、石灰有司支給官钱买办。”

况钟的上疏被朝廷所采纳，李让由巡按御史所法办。由于况钟的干预，彻底废止了这一种不合理的做法，苏州的老百姓又免去一项沉重的负担。

“粮运船只”是平江伯陈奏准朝廷而定下的规矩，其具体办法是由苏州府七个县每年抽调一批船只以供粮运。抽掉的数目按里程计算。由苏州府运粮至淮安缴纳者，每二千石，抽船一只；至徐州缴纳者，每二千六百石，抽船一只；至临清缴纳者，每三千石，抽船一只，共计要抽调船只五百零六艘之多。事实上，抽调不出这许多船只，于是便折缴造船费用，每只三百石粮，共计十五万一千八百石粮。

况钟对于陈当初定下这个规矩的经过作了详细地调查了解，原来说明是“不为常例”的。于是他就上奏宣宗，指出“不为常例”的事情，不应该每年科派。朝廷批准了况钟的奏本。由此，就取消了农民每年都要缴纳“粮运船只”粮的负担。

关于“借马”的苛税，始于建文四年(1402年)。当成祖的大兵南下时，要经过江北，而当地老百姓流亡走散的很多，寻找马匹很困难。而成祖认为江北的老百姓受战乱创伤较重，特予免税三年，以缓解民困。至于驿递须用的马匹则暂向苏州府借用二百四十匹，也以三年为期，三年以后，则由江北地方自行筹款买马，以供驿运，原借马匹则归还苏州。对于苏州府来说，显然这是额外的负担，于是由此另立了一套摊派的办法，有粮五百石以上的富户出上马一匹，四百石以上的富户出中马一匹，三百石以上的富户出下马一匹。当初说是以三年为期，认为负担不重，但，三、六、九年……过去了，马根本没有还，而且马匹有死亡，还要原出借者购买补足，这样不少人家的负担就加重了，马匹连续死亡，不断购买补足，有的人家买不起，最后弄得家破人亡。

况钟出任苏州府知府时，这一批马已经借了二十八年了，因此况钟就上奏朝廷请求将马匹归还苏州府。此事在朝廷里拖了两年，到宣德七年(1432年)才被批准。江北把向苏州府借的二百四十匹马还给了苏州府。这一苛捐杂税终于也被免除了。

一天，淫雨霏霏，道路泥泞。况钟乘轿赴县衙议事，走至虎丘塔榜，有人在轿前喊冤告状。况钟掀开轿帘一看，乃是一位白发白须的老者，跪在泥泞的路上，浑身浇得湿透了，雨水从白头发上滴下来，再从胸前白胡须上滴到衣服上。只听老者喊道：

“青天大老爷，小民冤枉！”

况钟命书吏上前询问：“状告何人何事？有无状子？”

老者道：“小民叫朱阿狗，儿子叫朱长胜，前几天府衙派人来，说邻村一家也叫朱长胜的兵丁死亡，他家没人继承人丁，说让我儿子

充当。我都七十多岁的人了，妻子五年前就死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儿子一走，我可怎么活呀？我一个大字不识，只能说一说，那里有什么状子？”

况钟让书吏记下老者居住的村庄、姓名、状告事件，劝其回乡等候，府衙一定秉公处理。

过了不久，又有名叫陈阿多、严佛保的，也是状告军籍一事，他们家本无派丁之义务，只是亲属户绝丁尽，官府让他们来抵充，他们也感到冤枉。

况钟接连接待数十起状告军籍的案子，深感军籍十分混乱，需要认真清理。

明代驻军的一种形式是在水陆要冲地带设立卫所。在苏州府就有苏州卫、太仓卫等。每一卫所辖士兵五千六百人，卫所下面设千户、百户所等等。士兵来源基本上有三种情况；开国之初的老兵，称“从征”；投降过来的，称“归附”；犯罪流放充军的，称“谪发”。规定这些士兵都是世袭，父死子补。这一办法，很不得人心。洪武三年（1370年），便发生了士兵陆续逃亡的事件。朝廷只好四出追捕，同时颁布了一条规定，所有千户、百户等武职人员的职位升降或奖惩是以士兵是否足额、有无逃亡为主要标准之一。这样一来，本来相当混乱的军籍就更加混乱了。

况钟经过深入调查，了解到近年来，朝廷对清理军籍甚为重视。宣德三年（1428年），拟定了十一条清军条例，予以公布；宣德四年（1429年），扩充为二十二条。这一文件被称为《清军条例》或《军政条例》。宣德三年（1428年），朝廷派御史李立和给事中孙确，到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四府清理军籍。李立是一个好大喜功、虚荣心很重的人，他在清理军籍时，为了向朝廷表功，只顾追求名额，认

为军籍越多越好，因此，他的一些做法，完全违反了《清军条例》。凡是丁尽户绝的，本应把军籍注销，却不予注销，而是找这家的远房亲戚、义子、女婿或佃户来充当，任何人找不到，即寻找一个同名同姓的人顶替。如果有的里老不赞成，便鞭打里老，施以酷刑，强迫里老把与丁尽户绝者略有关系的都上报作应继人丁，最后将其押解到卫所，充当士兵。

况钟在调查中还发现，苏州府同知张徽，积极支持李立的做法。张徽书底较厚，能写点诗文。曾写过吟咏苏州府景物等诸诗，如《南园》、《道山》、《泮池》、《杏坛》等等，但其为人做官，名声欠佳，对上谄媚讨好，对下百般勒索。对于李立在清理军籍中的某些做法，积极赞同，甚至还感到不足，还异想天开，把士兵死后，寡妇改嫁他人所生的儿子也拘捕来充丁，说这是“军籍民胎”。凡是被张徽发现可以充当士兵的人，无一幸免。在其他府、县，类似张徽这样的酷吏，还大有人在。

最严重的是，张徽借清理军籍逼死人命。

有一位本无军籍的农民，被张徽发现，可以充当本村一家丁尽户绝的军籍，这位农民不同意，说道：

“我若充丁，全家无以生计，父母皆得饿死。”

张徽道：“谁让你们是本家，你不充丁，谁充丁？我是问你一句话，你情愿做士兵呢？还是情愿做鬼呢？”

这位青年农民，只好回答：“我情愿做士兵。”但他出了府衙大堂，想，充丁是死，不充丁也是死，回家路上，便跳井自杀了。

凡是被定为有军籍的人，如果不死，一旦逃亡，邻居、解差还要连坐，或被治别的罪，因此一家人甚至有数十人被充军或杖死的。

张徽在吴江县如此审理军籍，自然要避开其他官员的耳目，因为吴江县地处交通要道，往来的官员太多，对张徽很不利，于是就搬到同里镇审理，把知县、仵作等人也都带去，并且公然贴出“敢有违者，罪在必死”的布告。这样一来，被枉断军籍的人越来越多，受冤而死的人也不少。

况钟在苏州府接到因军籍而申冤的案子，有朱阿狗等一千二百零一名、陈阿多等四百五十六名、严佛保等二百二十六名，总计一千八百八十三人。况钟对其一一作了复查，发现这一千八百多人基本上是民户，应无军籍，于是况钟把李立、张徽枉断军籍的事实和要求朝廷另派官员，依据条例重新清理军籍等一项动议，写成奏章，上报宣宗。

宣宗御览了奏章，甚为震动，将兵部尚书张本等大臣传来说道：

“朝廷爱恤军民，本同一体，刻薄之辈徇私妄作，以致纷纷如此。”

于是宣宗降旨，命刑部右侍郎成钧前往复查。成钧还是个比较正直的官员，按朝廷颁布的条例，对一千八百多人的军籍问题，进行了复查，最初，免除了一百六十人的军籍，明确了一千二百四十人的军籍仅限于他的本人，不得株连追捕。

在复查时，况钟贴出《钦奉清军榜示》，告诫粮里老人，如果原来确属军籍，而粮里、老人又作保具结改为民籍者，则发往边远之地充军，负责作保具结者发往附近卫所充军，如有官吏、粮里、老人等仍旧以民作军讹诈财物者一律查办。这样，就协助成钧使清理军籍一事走上了正轨。但是，被曲断为军籍的情况很普遍，而且也不是短时间内能查清，所以不可能很快将其冤案全部平反。后来又经过巡案御史曹习占、苏州府同知王贵等再次清查，最终才把被冤为军籍的平民全部恢复为民籍。

况钟将枉断为军籍的冤案平反之后，又发现一些冒充军籍的案子，也很复杂，需要清理。原来昆山县有部分农民，为了逃避徭役等负担，就向太仓卫等卫所的官员行贿，送礼物、攀亲戚，甚至拜卫所官员为干爹，要求列名为官军，实际上并不真的去当差，将原来应该负担的税粮和徭役统统推掉，由左右邻居承担。周忱在《与行在户部诸公书》中有过阐述：

“其所谓屯营隐占者，太仓、镇海、金山等卫，青村、南汇、吴松江等所，棋列于苏松之境，皆为边海城池，官旗犯罪，例不调伍，因有所恃，愈肆豪强，遂使避役奸氓，转相依附，或入屯堡，而为之布种，或入军营，而给其使令，或窜名而冒顶军伍，或更姓而假作余丁，遗下粮差，负累乡里。为有司者，常欲揆究矣，文书数数行移，卫所坚然不答。为里甲者，常欲根寻矣，足迹稍稍及门，已遭官旗之毒手。”

这些假冒军籍之家，到再一次编造黄册时，又把家中老老小小报到别的一家，弄得户口也混乱不堪。

况钟把这一情况上奏宣宗，宣宗也非常重视，立即要求行在兵部查办。兵部按况钟的奏章，宣布各府、县以《军政条例》再行核查，冒充军籍者，可以自行改正，但以一个月为限，过期就要法办。分管苏州府的巡抚侍郎、巡按御史也对此类案件进行了清理，并且告诫卫所官员，如果知情不举，也要办罪。为此，很多冒充军籍者纷纷退籍，在况钟的治理下，苏州府百姓的军籍管理，按朝廷的《军政条例》办事，比较正规，受到兵部的多次嘉奖。

阳春三月，百花含苞待放，太湖岸边，绿柳轻摇，湖中白帆点点，波光闪闪。

况钟劳累了数月，苏州府的各方面工作大有好转，甚为高兴。这一天，受友人之约，来太湖吃鱼，并游湖玩乐。陪同来的有几名县吏和治农县丞樊敏。樊敏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他虽分管治农，但没有什么具体工作可干，在太湖吃鱼时，便对况钟道：

“况公，卑职分管治农，无事可干，可否分派一具体工作？”

况钟道：“苏州府催运粮米没人负责，派你前往如何？”

樊敏说道：“甚好，只要有事干即可。”游太湖之后，樊敏即前往工作，但此事被沼安巡抚成钧所知，认为不能借调，加以阻止。

成钧是朝廷派到江南来的治农巡抚，任吏部侍郎之职，遇事独断专行，不考虑后果。

况钟的工作得到上级的干预，他并未恢心，立即将情况写成奏章，奏明朝廷，请朝廷裁决。宣宗知道了这件事，和内阁三杨商量一下，三杨认为况钟的做法没有错误，其他府、县，可以参照执行。于是宣宗降旨，支持况钟的工作。

苏州府是江南的名胜之地，也是鱼米之乡，为此朝廷派到江南来的大官，必先到苏州府，而且指手划脚，大捞油水。大理寺卿熊概巡抚江南时，在苏州府设立了总圩长、圩老、小圩长等共有一千六百七十二名，原来是要求他们协助粮长、里老关心农务和催办税粮，但是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利用这一身分接受状词、放债、盖房子、造船、买马、包揽小户粮草等等，成了农民的大患。熊概的这一做法，曾与成钧商量过，得到成钧的支持。

可是老百姓对总圩长、圩老等官职的设立十分反感，他们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纷纷上告知府。况钟审阅了这些人的状子，感到设立一千六百多名的大小圩官，实在是累赘。询问下属官吏，说此事得到

成钧的支持，是否应该取消，况钟拿不定主意，于是又上奏朝廷，宣宗御批，认为设立圩官，不干正事，应立即取缔，以便节省国库开支。

这两件事，使成钧丢了面子，大为恼火，由此成钧与况钟的矛盾日渐加深。

况钟正在认真治理苏州府，各项工作已逐步走上轨道时，宣德六年(1431年)三月初八日，传来凶信：况钟的第二个继母何氏在家乡靖安病逝。

况钟的母亲廖氏，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卒，当时况钟八岁。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况仲谦续娶罗氏，永乐十五年(1417年)，罗氏卒，况钟离礼部仪制司主事任，丁忧回原籍靖安，朝廷予以夺情起复。不久，况仲谦卒，况钟又下忧回原籍。永乐十六年(1418年)，朝廷予以夺情起复。第二个继母何氏，是宣德五年(1430年)十二月逝世的，讣告三月八日才传到苏州。江西靖安离苏州府水陆路程，最多三十天可以到，为何三个月之久才接到讣告，曾引起人们的议论。

况钟接到讣告后，于三月十二日，启程回江西靖安原籍去了。况钟离任丁忧时，心情比较复杂，因为上任之后要办的事情很多，有的刚刚开了个头，如今中途放手，三年后再接着干，等于白辛苦了一阵子。可是丁忧又是封建礼教最重视的一项制度，不能不遵守，因此内心深感苦闷。

况钟回乡后，成钧乘机对况钟打击报复。他把上次替况钟撑船回靖安的皂隶朱阿佛找来，让他向朝廷控告况钟，在状词中，说况钟向姚枢买三十根木料，没付银两。还私自购买入官私盐船等等。

此外他还发动一些人纷纷向朝廷控告况钟。

一位叫顾忠的告发：市面上红曲每石卖六钱银子，而况钟的家丁范某和苏州府皂隶顾信去找店主金震，把二十多石红曲强卖给他，索

价每石二两银子，一共拿去四十五两银子。医户张琳告发：市面上建独活这种药材每百斤是七钱半银子。况钟家丁姚某和苏州府皂隶顾信把建独活六百斤卖给张琳，本来只应该付四两半银子，结果付了六两。粮长沈恒吉告发：况钟丁忧回故乡时，他曾送给况钟白纆罗两匹、蓝青纱四匹、画两轴、花席三十条、白米六石。

除上述四人控告况钟外，成钧自己也写奏章上疏宣宗控告况钟，他说，况钟之母于宣德五年十二月内在家病故，“次年二月闻讣，一向不举，至三月初九日方才关府”。又说况钟“不辨是非，禁死囚人”等等。

成钧在暗中发动群众控告况钟，然而苏州府的老百姓都无限怀念况钟，因为况钟回乡丁忧不久，苏州府又回复到以前那种贪污盛行、苛捐杂税增添不已的局面。所以，老百姓强烈地要求朝廷准予况钟回苏州府任职。长洲县的顾荣等三万七千五百八十人向朝廷上了本章，直隶巡按御史张文昌、苏州府同知杨粟、嘉定县知县祖述等也联名上奏请求起复况钟。另一直隶巡按御史金濂到苏州府公干，又有二千多人向他称道况钟的贤能，请求起复况钟，金濂也把这种情况反映到朝廷里。

老百姓还编了一些怀念况钟的歌谣：

“况太守，民父母。

众怀思，因去后。

愿复来，养田叟。

还有人写了一些歌颂况钟的诗歌：

郡中齐说使君贤，只剪轻蒲为作鞭。

兵仗不烦森画戟，歌谣曾唱是青天。

老百姓向当时在苏州的钦差抚民刑部侍郎成钧请求，希望转向朝廷反映，让他尽快回到苏州府知府原任。对于老百姓的请求，成钧并不支持，而且对他们说道：

“本巡抚已在想办法另外调一个好的知府来。”

宣宗一方面接到成钧以及朱阿佛、张琳等人控告况钟的奏章，另一方面又接到张文昌、杨粟、金濂和众百姓请求起复况钟的奏章，觉得有些矛盾，也有些困惑。由于宣宗过去对况钟有过较多的接触，可以相信他决不致于像成钧、朱阿佛等所控告得那样糟。既然大多数老百姓要求起复回任，宣宗也就御批、照准。宣宗降旨道：

“民之所欲，与之，其乏种复任，不必赴阙。”

圣旨言明：况钟不必从故乡靖安来北京朝见，可直接回到苏州府知府任上。

况钟在家乡丁忧，终日惦念苏州府所筹划的未竟事业时，突然接到起复回任的圣旨，真是喜出望外，当时写了一首诗：

闻讣家居秋始阑，夺情有诏又加鞍；
别帷只为君恩重，抚印重看士庶欢。
报国一心何日尽，哭亲双泪几时干；
作忠移孝纲常重，业业兢兢殚寸丹。

诗中表达了移孝作忠做好苏州知府的决心，“业业兢兢殚寸丹”颇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气概。

宣宗固然对况钟比较了解，但是成钧等人所控告的一些事情也确实有弄清楚的需要，便令都御史负责清查，命况钟对所控每件事情逐一作出解释。

况钟于宣德七年(1432年)，上《遵旨辨明诬陷奏》，说明和成钧发生矛盾的经过，认为成钧是在打击报复。

况钟在奏章中解释如下：

一、托湛孟礼出面购买入官私盐船确有其事，这事情办得很不妥当，承认自己有过错。但姚枢的三十根本料则是付了银子，不是白用他的。

二、继母去世的消息是三月初八才知道的，不是二月间知道的，并没有闻讣不举。

三、关于“禁死囚人”，在自己到任之后，没死过一个人。曾审问罪犯一千五百一十八名，清查得比较仔细，没发生一起冤案。在未到任之前的一年中，苏州府曾禁死囚人二百零九名，况钟当然不能负责。

四、顾忠、张琳、沈恒吉三人所控告的则全是捏造，并无其事。

根据调查，成钧等人所控告的绝大多数都不确实，况钟也有不够检点之处，对自己要求不够严格。宣宗了解到大致情况后，认为况钟确是一位清官，对其更加信任。对成钧也没给什么处分。

况钟复任后，工作更加兢兢业业，并得到同乡好友巡抚周忱的关怀和支持。因为况钟和周的观点是一致的，充分合作的。在这种情况下，成钧的工作很难开展，再加上他打击报复未曾得逞，见了况钟抬不起头来。于是，在宣德七年(1432年)七月，成钧被朝廷调往他处去了。

宣德七年(1432年)，况钟二任苏州知府之后，从四月四日到四月二十六日，江南连续下了二十一天大雨，长洲县淹没农田二千二百七十三顷九十亩，吴江县淹没了二千五百六十八顷四十亩，昆山县淹没了二千二百七十五顷八十四亩，常熟县淹没了四百六十六顷三十六

亩。整个苏州府共计淹没了七千五百八十四顷五十亩。五月十三、十四日又刮大风，吴江、长洲两县吹倒了不少房屋、塘岸。

况钟接到各县的报告，甚为焦急，立即差遣各县官员督促抢救，并于六月初二，给朝廷上疏《修浚田圩及江湖水利奏》，除报告灾情外，并“乞遣大臣总督各官于农隙发民疏浚”，具体的要求是要这位大臣会同府、县官员对苏州地区的水利进行调查研究，决定疏浚的方案。朝廷同意况钟的要求，就派原在江南的以工部右侍郎衔任抚民巡抚的周忱负总责，以况钟为辅，大举开发苏州府一带的水利。

江南是水乡，苏州府范围内河港湖泊密布，而太湖之水入海的通道也有一大部分在苏州府地区之内。归有光曾写《三吴水利录》，专门论述这一带的治水问题。

杭州、湖州、宣城、歙县、镇江、常州等各府各县的河流，皆流入太湖，这些地区发大水，就要引起太湖的泛滥。除太湖之外，还有苏州府以东二十里的沙湖和松江府东北二十里的阳城湖上接吴淞江，东通巴城湖，北通施泽湖，周长有七十里，是一个可以调剂太湖储水量的大湖。湖南二十里的傍山湖是太湖的流水经过鲇鱼口及长桥之后，重新合流之地，也就在这里形成了吴淞江的上游。常熟东南五里的昆承湖，有白茆蒲可通长江。这四个湖再加上常熟县西南四里的尚湖，一共五个湖，对苏州府的水利来说，都是有重要作用的。

周忱与况钟等人，经过认真研究，按着向朝廷呈报的疏浚方案，对苏州府一带的五个湖，进行了综合治理，派出数万民工开始了疏浚工程。周忱对这一工作，和况钟同样认真负责，时常亲自到工地来察看、督察。“督浚昆山，嘉定诸浦，时以匹马往来江上，见者不知为巡抚也。”

在治理水患时，况钟发现苏州府滨湖海的田不仅十分低洼，而且圩太大，差不多每一个圩有六、七千亩田，少的也有三、四千亩田，又因为经常取泥壅田，河床日深，离圩身就日高，排水救涝还好一些，车水灌田就十分困难了。圩里各分岸，车水还要再转车，人力和时间都不经济。况钟的布置是将圩改小，平均每圩五百亩左右。圩旁开凿一条泾河，使之与外面河道相通，这样无论发生水灾、旱灾，进行抗旱排涝就比较方便了。

按着况钟的建议，苏州府一带，进行了水患和水利的综合治理，使几十万亩田地做到了旱涝保收，数十年后，农民们一直念念不忘况太守治水之策十分英明。

况钟在积极治理水灾的同时，还开设济农仓，大量储存粮食以备饥荒时赈灾所用。

积谷防饥是当时可能采取的救灾办法之一。宣德七年(1432年)，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秋粮都获得了大丰收，巡抚周忱本来就有积储粮食的打算，正好朝廷有旨，准许以官钞平米，并向殷实大户劝借粮食，以备灾荒年使用。这样，况钟便在周忱支持下，建立了济农仓。这个仓库所存储的粮食不是准备北运或供官府取用的，而是专为赈灾设置的。

宣德七年(1432年)，苏州府的济农仓储粮二十九万石，存粮来源主要有，原来库存三万石，向富户劝借九万石，漕运浮粮五万石，没收归公而为豪绅所侵占的死绝户田粮十二万石。分储在长洲、昆山、常熟等六县。当时崇明县也属苏州府，因为有大海之隔，储运比较困难一些，就存储在长洲县的仓库里，一有灾情，再运往救济。

宣德八年(1433年)，苏州府范围之内发生了旱灾，粮食产量很受影响，计有四十万户的一百三十万人缺粮、无粮，都是依靠济农仓的救济而解决的。

大家看到济农仓发生了良好的作用，况钟决定把济农仓加以扩充，增加其储存量，同时，又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因为当初明成祖把国都从南京移到北京之后，江南的老百姓的税粮虽然并未增加，但是增加了十分繁重的运输任务，因为有的运到南京，有的运到临清等地交付，运费的代价往往超过粮食的价格，长途运输，损耗也大，因此，苏州府每年税粮名义上虽然只征二百七十万石，实际征收额则达八百一十万石之多。

这八百一十万石粮食究竟如何处理呢？除了二百七十万石所谓“正粮”以外，运费和蚀耗也要从中扣除，但余下的就被经手的官员、士绅们分掉了。

而在况钟的主持下，废除了这种旧规章，而是规定加七成交纳，从八百一十万石一下子减为四百五十九万石。第二年再递减为加六成交纳，又从四百五十九万石减为四百三十二万石，第三年再递减为加五成交纳，再从四百三十二万石减为四百零五万石。这里所附加的七成、六成、五成，充作运费和损耗，实际上还绰绰有余，于是就把这多余的粮食拨给了济农仓。本来要运往南京交拨给官军的七十万石，也经过周忱交涉，由官军有关部门直接来苏州提取，苏州府只负担每石米附加一半的运费。这样又积余了较多的粮食，也用以充实了济农仓。这样，苏州济农仓存粮达到六百九十万石。

宣德九年(1434年)，苏州府又发生了严重的旱灾。由于济农仓存粮充足，普遍得到了救济。

关于济农仓的管理，况钟作了明文规定。凡是运粮遇到风暴、盗劫等意外，都可以向济农仓暂借，但秋后要如数归还。用于修圩、筑岸、开河、浚湖的粮食，向济农仓领用之后可以不必归还。一般老百姓请求借贷，则根据劳动力和种田的多少而决定借贷的数目，也要在秋收后如数归还。如有意破坏、纠缠，以后则不准再借。

由于况钟的大力提倡，不仅苏州府的济农仓办得有声有色，而府属六县，也有办起县级济农仓的。如常熟县就有，其仓曾一度储藏了五万石粮食。

况钟任苏州知府达十二年之久，曾发生过一些灾情，但没饿死过一个人，这除了况钟多次请求朝廷减免税粮之外，济农仓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苏州府这个富饶的鱼米之乡，除了防止自然灾害之外，还要抵御人祸。有的卫所的官军到苏州府抢劫，况钟采取措施，维护百姓的安宁。

况钟曾贴出《通禁苏民积弊榜示》，其中有一条是专门针对卫所官军的：

卫所官军及巡司兵牌驾驶四八跳，伴当多人，满装军器、枪支、锣鼓、炮石，于偏道河港停泊，盘诘验引巡捕，或假以寄顿贼脏及强盗指攀等项为由，遇有商民，辄便擒拿，或连家小，于寺庵观院非法拷打，百般凌辱，诬认贼情，恣肆搬抢家资，指要财物，将妻女奸骗者，许令被害之家，指实来告，以凭拿问。

这一份告示，把卫所官军为“匪”作歹的坏事大体上分门别类地罗列了一下，而且允许所有被害人前来控告。因此苏州府范围内的苏州卫、太仓卫及其所属千户所、百户所的官军都有所顾忌，开始收敛，军纪比从前有所改进。到况钟起复以后，在其督促之下，卫所官军也

做了一些维护治安的工作。对于闯入苏州府范围的浙江等地的卫所官军，也采取了措施，发现他们行凶抢劫，就逮捕法办。

宣德七年(1432年)，松江府华亭县人韩、傅二公差运粮赴徐州。回程途中，九月十三日那天，路过吴江县白蚬江，忽然有一伙人，自称为镇海卫巡捕官军，抢去棉布和食米，韩、傅二公差到就近的同里巡检司去报告，同里巡检司派人来查办时，这一伙行凶抢劫的人还没有散，强盗船看见有人来捕拿，就进行顽抗。结果打死一人，凫水逃走二人，活捉了十一人，抢劫的赃物也搜查到了。况钟亲自问案，里面有一人名叫林保，自称是浙江海宁卫的百户。因为他们有军籍，又是属于浙江管辖，况钟觉得事情不好办，便差巡检张义将犯人、赃物、供词一起解京，请朝廷法办。

浙江海宁卫乍浦千户所百户叶俊、陶义、士兵陈胜童等，经常乘坐大船，在吴江县境内兜销私盐。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初三，他们经过吴江县平望巡检司时，自称是雷内官大人，不肯接受查询。该船刚过关口时，船上就有人涉水逃走，叶俊和陶义也逃走了，捉住了陈胜童等十二人。因为浙江不在况钟的管辖范围之内，觉得还是押解到浙江巡检司去，请他们审理。哪知事情办得不够仔细，被在逃的叶俊等人探听到了，便伏兵于嘉兴县、崇德县交界的松老桥附近。八月初十，苏州府所押解的陈胜童等人犯经过这里，被伏兵所抢。押解人犯的皂隶、弓兵等皆身受重伤。况钟得到消息后十分愤怒，上奏朝廷，强烈要求将叶俊等人解京严办。

浙江镇海卫的指挥陈，原本就是一个强盗，他经常借打捞木材为名，沿江盘诘客船，乘机抢劫。宣德八年(1433年)八月初三，陈等乘坐了两只黑楼船，自称是南京捕盗指挥大人，在江阴县地界三山石

堰港口拦劫泰州人徐官、昔保到苏州府来收买麻料和船只，抢去银子二两、猪七口、鹅十二只、米五斗。初七那天，徐官、昔保他们在苏州府的大街上认出了两个上船抢劫的人，便扭送到苏州府审讯。陈的船又在初四那天，开到深港焦店地方，自称为锦衣卫捕盗大人。拦劫了扬州卫军给引用船十三只，抢去干鱼三百五十八包，计三万三千一百六十斤。扬州卫军给引用船上的杨谧心有不甘，便私下查访，知道了这些干鱼都到了苏州阊门外下塘邓英家里，杨谧就到苏州来告发。

这个陈官居镇海卫指挥，品级属于正四品，和况钟级别一般高低，但况钟也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顾虑，派人到邓英家里抄出了所有的赃物，并上报朝廷，请求朝廷依法严办。

况钟因为自己的职权所限，没有能对那些为害老百姓的不法官军采取更直接的制裁，但他不畏强暴，尽最大努力拘捕法办，从而维护了社会秩序和老百姓生命财产的安全。

况钟在治理苏州府的业绩中，还有一项甚得民心的大事，就是重视教育，兴办儒学。

况钟自己为书吏出身，读书不多，但是他希望年轻人多读书，有高深的学问。他上任不久，就到各县去察看儒学。当时各县的儒学，地方都比较狭小，有的设在庙中、祠堂里，要容纳较多的生员在里边研读是有困难的，因此一些儒学往往徒有其名。况钟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正统初年定下计划，决定大规模地改建苏州府儒学。

他找到府内的几位官吏，征求修建儒学的意见，他们皆摇头，认为大可不必。追问其原因，都说：“有钱人请先生在家教子读书，建儒学是走走形式，没人肯来。”况钟认为，为朝廷培育人才，把儒学建得宏伟壮观一些，不怕没人来上学，不怕聘不来好先生。

况钟从多方筹集资金，先后三年，完成了苏州儒学扩建任务，新建了大成殿、至善堂、后堂、明伦堂、斋舍和射圃，共数百间学习室。聘来十多名老秀才、举人前来教书。一时间儒学热闹起来，有些富家子弟也送来读书，在家聘不起先生的家庭，也纷纷送学生来儒学学习。

苏州府所属吴县的儒学地势低洼，春夏之交经常积水，墙壁浸透倒塌了，环境也不好，紧靠着兵营，整日喧嚣，无法使生员们静心研读。宣德七年(1432年)，况钟请巡抚周忱一起去察看吴县县衙门西南的一块空地，发现比旧的儒学面积有四倍之大，而且光线好，于是决定就在此地另行兴建。经费方面，为了不加重百姓的负担，况钟就把苏州府济农仓历年积存的苇席收集起来，共有五十余万条，折谷的银两可以购米五千石，所有砖瓦等材料及泥木工的费用就都用这笔钱支付。宣德九年(1434年)冬开工，半年时间就竣工了。新建儒学规模相当大，正如杨荣在《吴县儒学重建记》中所说：“享礼有殿，讲论有堂，藏书有阁，宴休有亭”，连门庑斋舍在内，一共二百三十多间。这样，为吴县生员们的研读经史，讲求学术，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苏州府的儒学扩建之后，所需教材况钟也很关心。原来启蒙教育读《三字经》、《百家姓》，生员教育读《四书》、《五经》，况钟认为这些教材，有的较难懂，只靠死记硬背，到了成年之后才能了解文意。于是他命人刻了一部《四书详说》，书的前面有袁铉所写序文，对刻书情况与内容都作了介绍，这部书成为后来有一定影响的明宣德苏州府儒学刻本。长洲县儒学教谕韩阳书写了一部汉代马融著的《忠经》，况钟看了以后，觉得内容很好，同意刻书。有人认为马融节操上有问题，反对刻印。况钟说，马融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家，他才高而博闻多识，编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

《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等，使古文经学注释，达到最高境地。他的《忠经》有什么不可以刻?不应该以人废言。在况钟的一再坚持下，刻印了《忠经》一书为教材，对生员研究学术有极大的帮助。

苏州府儒学有经常讲诵典籍的活动，况钟有时去听讲，大力支持其活动。况钟只是以学生的身分，虚心学习，了解情况，从不以知府的高官地位去瞎指挥。有时府考评选考卷，况钟有时去看看，听听教谕等人的议论，他十分谦虚，认为自己是书吏出身，读书不多，懂得很少，所以总是抱着讨教的态度。

府县儒学中有的生员有了知识，不干正事，和粮里、老人等相互勾结，包揽讼词，或者抗租抗粮。况钟发现后，到儒学中去做劝说工作，发出《各儒学榜示》，要求教谕和士绅们，教育生员不做对抗府衙工作的事情，知府和儒学应密切合作，维持社会治安，多做对老百姓有益的好事。

儒生之中，凡是品德和才能有突出表现的，况钟就大力向朝廷推荐。有一位生员名叫邹亮，字克明，号为藻安居士，从小就喜爱读书，凡是天文、医学、卜筮、兵法等各种书籍，凡是能得到的，就要刻苦攻读，亲手抄录，甚至废寝忘食。有时把自己平时写的诗文送几篇给况钟看看，况钟认为很好，又推荐给巡抚周忱，周忱也给以好评。而邹亮写了《痒生邹亮上守求荐达书》，说汉代的贾谊和唐代的马周都是从一个里巷布衣而得到朝廷的重用，希望能得到况钟的提拔和推荐。

况钟征求了周忱的意见，就写了《保荐儒生奏》，向朝廷正式推荐邹亮为难得的人才。朝廷经过考核，最初任命其为吏部司务，又调都察院司务，均为九品官员，后来逐步升调为正三品的监察御史。邹

亮著有诗文集《鸣珂集》、《敕芳集》等，并编写了《诗宗韵海》一书。《姑苏志》还为其立传，表彰他为姑苏人争了光。

当时，受到况钟的推荐、关怀的儒生还有许多人。苏州人陶继、蒲嗣宗等四人，被推荐到朝廷，得到重用。有一位儒生叫刘敷，流寓在苏州，要回原籍，而经济困难，况钟给他二两银子，让他回到了原籍。还有一位儒生俞嗣，他母亲年轻守节十分虔诚，请求旌表，况钟派人调查果然属实，给予旌表。在苏州府衙门贴邻，住着一位穷书生，已经四十多岁，双亲年迈，自己又没有力量娶亲。况钟把自己的月俸拿出一部分，送给他作为结婚的费用，并派人参加他的婚宴，使这个穷书生满门生辉。况钟在知府任上，象这一类好事做了很多，当地百姓争相传诵、历代不忘。

况钟对儒生、百姓关怀备至，而对不法的官吏却进行纠劾，绝不宽容、姑息。

朝廷设立督察院这样一个部门，派遣巡按御史到各地区进行调查工作，了解各级官员是否恪尽职守，民间有无冤狱、灾情等等，对维护封建法制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朝廷制定了《宪纲》，对巡按御史的职责和权力都有明确的规定，但《宪纲》居然成了一纸空文，很少有人遵守。

有些地方官员手脚不干净，心怀鬼胎，见了巡按御史卑躬屈膝，博取其欢心；而有些巡按御史到地方上贪赃枉法，接受贿赂，得不到阿谀奉承便不开心，对清廉正直的官员则进行打击报复。

况钟对这样的巡按御史绝不同流合污，遇有敲诈勒索者，进行纠劾，绝不包庇。宣德七年(1432年)，况钟给朝廷上疏《请申明御史知府相见礼奏》，指出“近年以来，各处巡按刷卷公差御史多有违越

礼分，其各处知府有等茸贪脏，畏惧纠劾，不顾名分，献谏进谄，有出郭迎接，下马路跪，候其过者；有照知州知县丁立揖拜者；有跪听发放回答者；有被秽骂凌辱者；各失体统，无敢言论”。“间有执法奉公、不肯阿谀，却乃吹毛求疵，故将首领官吏借端凌辱，擅作威福，以为得体”。况钟认为，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只是分工不同，并无尊卑高下之分，主张御史与知府见面的礼节应该按明初制订的《宪纲》上的规定办理。

朝廷对况钟的上疏十分重视，指定礼部、翰林院等部门共同研究，再拟文发到各部门遵照执行。

正统元年(1436年)十月，巡按浙江的监察御史王珽从任上回京时，经过苏州所辖的州县，居然“越驿乘舟”，索贿勒索，作威作福。完全违反了《宪纲》的规定，况钟就上疏纠劾。浙江按察司佥事商贤也上疏纠劾王珽“言轻行薄，骋小才而害良善”，并且把王珽为非作歹的事一一列举。朝廷对此事很重视，派人调查后命令刑部将王珽逮捕法办。

况钟将王珽纠劾之后，一些正直清廉受到王珽迫害的官员得到平反。常州府知府武全和余姚县知县黄雄被王珽罢官，经过吏部核查，纯属打击报复，皆官复原职。王珽入狱，清官得到公正的评价，老百姓皆感谢况钟，一致叙说：况知府是老百姓的况青天。

正统四年(1439年)冬，况钟任苏州知府九年，已到了考绩的时候，要到京中听候吏部的调迁。

姑苏的冬天，略微有些寒意。城南的枫树叶已变成红色。枫桥下鱼船往来，船上炊烟袅袅，枫桥旁，寒山寺的钟声不停地敲响。有人问：“不到春节敲钟干什么？”老人们答道：“恐怕是苏州府衙门，

出了什么大事！”有人跑到寒山寺问方丈：“何事敲钟？”方丈说道：“况青天要离任而去。我们为其祈祷祝福。”

苏州府的百姓听说况钟任职期满，要离任进京，纷纷跑到府衙，向况钟告别，不少人扶老携幼，拿着鸡、鱼、肉、蛋，送给况钟路上吃。

况钟因为在苏州生活了九年，对当地的山川风物和老百姓都有些感情。所以一旦离去，也有些依依不舍，特别是受到苏州老百姓的爱戴而深感欣慰。况钟在和七个县的老百姓告别时，写下了四首诗：

十年鞅掌抚名邦，如水襟怀对大江；
无德及民殊自愧，君恩有负每神伤。

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
惭愧士民相饯送，马前洒酒密如泉。

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
停鞭静忆为官日，事事堪持天日盟。

父老牵衣话别间，空烦扶杖出重关；
相逢知是何年事，珍重无忘稼穡艰。

这四首诗表达了况钟当时的愉快心情。在当时，能做到“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是很不容易的，敢于说出来，写在诗中，说明确实做到了，敢于接受别人的检验。

长洲等县的百姓为况钟造了一个生祠，并请况钟留一帧肖像，以便悬挂在生祠里，况钟也照办了。同时，在肖像旁题了几句话：

无能抚育，空赍俸钱，敢劳父老，称曰青天。焦劳者百千种，荏苒兮八九年。何当留此碌碌形貌，有玷玻胥山之高耸，吴水之清涟。

这几句话比较谦虚，表达了况钟当时真实的心境，可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八九年的辛苦劳累，得到百姓如此深情的怀念，还是值得的。况钟的肖像经过摹刻后，流传甚广，有的人出重价前来收购。

况钟九年任满到北京去候职之后，苏州府的一些知名人士和老百姓，对况钟的离任都感到惋惜，几十年来，没遇到这样好的知府，真是关心百姓疾苦的父母官。他们想，如果换了一个对情况很不熟悉的知府，很多理顺了的工作难免要改变，如果来了贪赃枉法者，苏州府的秩序就不堪设想了。恰好，府吏们听说，松江府知府赵豫、常州府知府莫愚、吉安府知府陈本深等三人也已九年任满了，这三个府的老百姓也要求他们连任。这一消息在苏州府内传开了，百姓们奔走相告，并提出：“清朝廷让况青天也连任！”

当时府吏张翰等人发起，有一万八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按御史张文昌提出请求，希望张文昌奏明朝廷请况钟连任。

正统五年(1440年)九月，朝廷已经降旨，任命杨衡为苏州府知府。这时，张文昌转达张翰等一万八千人请求况钟连任的奏章已送到朝廷，与此同时，江南巡抚周忱也呈上请求松江府等三府知府连任的奏章。

当时在位的皇帝是英宗朱祁镇，为宣宗的长子。宣德十年(1435年)九岁时即帝位。宣德初年，有大臣三杨和皇太后辅政，国家尚安定，社会经济也有发展。到了正统五年(1440年)，英宗刚刚十四岁，可以御览奏章，看了张文昌和周忱的奏章之后，认为民意不可违，同意他们二人的请求，于是立刻降旨，命况钟和其他三个知府都继续担

任原职。已经发表了杨衡为苏州知府，因尚未到任，又改派赴其他府县。

九月，正是菊花盛开的时节，姑苏街头，行人熙来攘往。这时有一匹快马从城外奔来，马背通身是汗，四蹄扬起灰尘，马上骑着一位年轻的面带微笑的驿丞。快马停在知府衙门大门前，驿丞手上拿着一封公函，快步走进大门内。片刻，从府内传出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

“况青天留任了！”

很快，姑苏街头人人奔走相告，有敲锣打鼓的，有放鞭炮的，整个姑苏城沸腾了。

况钟留任后，他的品级和职衔，在吏部进行了一番研讨。

在明代洪武年间，曾把府一级衙门分成三等，税粮二十万石以上者为上府，知府为从三品，二十万石以下者为中府，知府为正四品，税粮十万石以下者为下府，知府为从四品。洪武年间之后，就改为正四品官了。

况钟既然九年任满，而且政绩很显著，按道理应该提升，但知府没有三品官。吏部请示了首辅，内阁首辅又上奏皇上，皇上降旨：任命况钟为观察使，给正三品俸禄。实际仍任苏州府的知府。

这一年，况钟已经五十七岁了，为三朝老臣，名声又很好，英宗对其十分尊重。况钟离开北京赴苏州上任时，英宗赐宴送行，特地赐路费钞二千贯。首辅杨士奇也设家宴为况钟饯行。席间，杨士奇赠诗，道：

“十载不愧赵清猷，七邑重迎张益州。”

赵清猷和张益州都是宋代的名臣。赵清猷又名汴，为宋神宗时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职位高低，朝中称他为铁面御史。当“知越州、吴越大饥，疫死者过半，赵汴前往救灾，尽救荒之术，疗病埋死，而

生者以全，下令修城，使得食其力”。宋神宗经常要地方官学赵汴的榜样。张益州，原名张方平。说他赴益州上任途中，正风传有边民起衅，朝野都很紧张，但他认为是谣言，所以“道遇戍卒，皆遣归，他役尽罢”。到任后，“适上元张灯，城门三夕不闭”，并抓住了谣言制造者，办了罪，“蜀人遂安”。

杨士奇把况钟比拟为宋代名臣张方平和赵汴，这两个人的地位都比况钟高，而且宋代以来一直负有盛誉，这又出于杨士奇之口，对况钟来说，应该是极大的荣誉。

况钟为了酬答宫中官员的赞扬，也赋诗一首：

万里苍生荷相君，微材深沐拂披勤；
奖余当做箴规看，要把忧劳益几分。

况钟第三次任苏州知府，感到很光荣，也深感责任重大。在离任时，他原来想到北京谋个一官半职，已是将近六十岁的人了，自感在世时日不多了。他在征求好友周忱的意见时，他也有类似的意见，所以，按道理他是江南巡抚，正是况钟的顶头上司，在向朝廷上奏留任的三位知府中，就没有苏州知府况钟，而况钟之所以能够留任，是因为苏州人张翰等一万八千人联名向直隶巡按御史张文昌提出的请求，由张文昌上奏朝廷才得到英宗批准的。

有老百姓的强烈要求，又经皇帝降旨，况钟第三次官复原职，知府工作又驾轻就熟，对周忱来说自然是再好不过了。所以周忱热烈欢迎况钟留任，并对其所有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况钟到任后，虽然须发皆白，年近花甲，但精力不减当年，仍然赴各县奔波，救民解困，审理疑难案件。凡是有到苏州府大堂鸣冤叫屈者，况钟皆亲自出堂审问，直到把案情查到真相大白为止，冤枉者予以平反昭雪；诬告者从重责罚。况钟不仅审理本府的案件，邻府遇

见疑难案件，也请况钟会审，在况钟的审理下，多年积存的疑案皆迎刃而解。

由此，况钟的名声越来越大，应天十府，乃至朝廷都知道有一位三朝老臣况青天。

况钟第三次留任，除了将计划未完成的工作，督促各县努力完成之外，还做了一些培养人才的工作，提拔和培养了不少下属官吏，使他们能得到朝廷的重用。

长洲县知县韩，工作多年，为官清廉正直，为治理长洲县立下汗马功劳。况钟每到长洲视察，韩从不行贿，也不卑躬屈膝，各项县务均搞得井井有条。况钟认为韩的能力不在自己之下，便向朝廷推荐，此人可以重用。于是英宗降旨，将韩调任湖广武昌府知府。升任到比苏州府更重要的城镇为官。韩上任时亲自赴况钟府第拜见况钟，况钟设宴为其饯行，二人彻夜畅谈，况钟将其送出姑苏城三十里，依依惜别。

正统年间，吴县主簿吴复九年任满，按政绩的考核，各项工作都很出色，与知县配合默契，收发函件，井然有序，凡是来县衙办事，告状的男女老幼，皆赞誉吴主簿能力强，心眼好使。况钟呈报给周忱，想要将吴复调升他职，周忱也认为吴复业绩突出，应该晋升。这时，吴县有一千八百余老百姓，联名请求吴主簿留在吴县工作，认为他是清官，是老百姓信得过的好人。况钟见此情况，想要推荐他为吴县知县，征求周忱的意见，周忱表示同意。于是吴复没有调升他地，而是升任为吴县知县。吴复上任后县务工作更加积极努力。

苏州府通判邵堪，工作兢兢业业，多次得到况钟的嘉奖，九年任满时，况钟向朝廷推荐邵堪可提升重用，在即将他调时，数百名老百姓向巡按御史曹习占提出请求，希望邵堪仍在苏州府任职，朝廷交巡

抚侍郎查核邵堪政绩后，认为况钟的推荐情况属实，业绩显著，任命为苏州府同知。

从况钟大胆提拔属官的事例中，可以看出况钟毫无私心，举贤荐能，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的业绩。从中可以看到，他们在况钟手下做事，无论在办事能力上，或掌握治理县政的公务上，都成长较快，这是名师出高徒的结果，只要刻苦工作，兢兢业业，就能够得到提拔的机会，去承担更繁重的职务。

况钟不仅对下属官员，不断地关怀、提拔和重用，而且对上级官员的工作也大力支持，密切合作。况钟的顶头上司巡抚周忱遇到困难，他也极力帮忙，毫不懈怠。

周忱的职权本来不包括军事的调动和指挥，后来因为太湖一带经常出没盗匪，而地方却没有兵力前去剿灭。况钟见这一情况，上奏朝廷，援引大理寺卿熊概巡抚江南兼管军事的前例，请求给予周忱提督江南各卫所的权力。皇上批准了况钟的奏章，周忱有了兵权，可以随时调兵，打击太湖盗匪。

还有些官吏和百姓，打官司往往不通过苏州府或江南巡抚衙门，直接到北京去告状，甚至有时并不是真有难断的案件，只是直接到北京去告御状，广肆株连，弄得百余人往返北京，疲于奔命，把一些人拖得家破人亡。鉴于这种情况，况钟上奏朝廷，今后凡是江南巡抚周忱所管辖的府、县内的案件，皆应由各府或巡抚周忱处体勘。朝廷接受了况钟的意见。这就禁止了越过苏州府和江南巡抚衙门的诉讼，既确保了苏州府的职权，也扩大了周忱的职权。

况钟在苏州府任职的最后几年，比较突出的事件是和吴讷的交往。

吴讷是常熟人，和况钟的交往甚密。吴讷历任御史、金都御史等官职。出巡贵州时，有人送黄金给他，他不接受。光禄寺丞董正等偷

窃官家财物，被吴讷检举，为此案充军者四十四人。此人不仅铁面无私，生活清苦简朴，而且对审理案件、分析案情有深入的研究，著有《棠阴比事》，是中国古代有关司法的一部名著。他于正统四年（1439年），就辞官回乡了。虽然常熟县属于苏州府，但是两地相距在百里以上，况钟却经常去吴府拜访他。两人常在一起谈心，有时况钟遇到疑难案件也向他讨教。这使况钟断案更加准确无误，受到苏州府百姓的赞誉。

正统七年（1442年）十二月，寒风刺骨，枯叶飘零。这一年，姑苏天气格外冷，苏州府衙门内已升起了炭火盆，但人们还是感到寒气袭人。大堂上，况钟正在审理吴县李氏母女申冤案。母亲李氏三十多岁，为吴县农妇；女儿翠花十六岁，长得颇有姿色。丈夫前几年病逝，母女俩依靠几亩薄田过日子。邻居豪绅邹天虎与李氏田产相连，秋翻地时，邹天虎将李氏田产划归已有，并欲霸占翠花为妻。李氏被逼，徒步走到姑苏城苏州府告状。况钟于数天前审阅了状纸，将李氏母女俩安顿好，衙役将邹天虎传来，当日升堂审问。

邹天虎为当地一霸，依靠身强力壮，会几手拳脚，在乡间为非作歹，没人敢管。今日被衙役传来，登上府衙大堂，被两旁站立着的恶眉瞪眼的皂隶、衙役吓得抬不起头来，两腿一软，只好跪下，听候发落。

“你可是吴县乡民邹天虎？”大堂上有人高声问道。邹天虎连忙应道：

“是，小民是邹天虎。”

“抬起头来！”一声宏亮的断喝，吓得邹天虎抬起头来，见大堂上，坐着一位身体强壮，胖胖的花白须发的老人。

“邹天虎，本官问你，强占邻居李氏田产，并欲霸占其女儿为妻，可曾是你？”

“是小民，小民知罪！”邹天虎连连答道。

“经本府查明：邹天虎不仅欺诈李氏母女，而且为害乡里多年，强占民田一百多亩，霸占民女十三人。按大明律，可开刀问斩，本官念你能够认罪，判处充军海南，饶你不死！”

邹天虎听说没有死罪，像鸡叨米一样，连连叩头谢恩。

这时，在旁站立的李氏母女也跪下连连叩头谢恩。

当况钟站起来，喊“退堂！”二字时，“堂”字尚未说出口，便倒在龙书案上。书吏、衙役急忙上前，扶起来，只见况钟口吐白沫，不省人事。

府吏代喊“退堂”后，大家七手八脚将况钟抬到后堂，立刻请来姑苏几位名医，诊治抢救，均不见好转。片刻之后，况钟即停止了呼吸，离开人世，终年五十九岁。

讣告发出后，苏州府官民数千人皆跪在府衙大门前痛哭失声，久久不忍离去，尤其是李氏母女跪在府衙门口，哭得死去活来。

巡抚周忱得到况钟去世的消息，亲自前来吊唁，朝廷吏部也派专人前来送殡。况钟的灵柩由其子女护送，于江西靖安县龙冈洲安葬。在扶况钟灵柩上船时，有数万人前来送葬，见船上只有书籍和日用品，使姑苏人更加感动不已。

况钟是况家的独苗，妻子一再病故，一再续娶。建文二年(1400年)，娶熊氏，永六年(1408年)，熊氏卒。永乐八年(1410年)，续娶王氏，宣德元年(1426年)，王氏卒。宣德三年(1428年)，娶舒氏，宣德七年(1432年)，舒氏卒。宣德九年(1434年)，娶李氏，正统三

年(1438年)，李氏卒。正统四年(1439年)，娶万氏，共娶过熊氏、王氏、舒氏、李氏和万氏五房妻子。

况钟还有四个儿子：况宁、况寰、况宾、况宇。

况钟去世后，由苏州官员、士绅和老百姓发起，就在儒学内辟设了况公祠，并陈列了况钟遗像的石刻，题名《况太守像》。

太子少师华盖殿大学士杨士奇、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杨溥、建安人杨寿夫、左谕德兼侍读学士周述、侍读学士曾、襄府长史周孟简、礼部祠祭司郎中孙源贞都题了像赞。

况钟的遗像是根据况钟生前的肖像临摹下来的。况钟生前比较喜欢画像，而且爱在画像后面题上几句诗文。他任礼部仪制司郎中时，请人画了一幅像，他自己写了一篇像赞：

我形至陋，我德未充，生逢盛世，出遇时雍。

勤赞襄于宗伯，鸣呵于九重。

惟纸与墨，朝夕是从。惟卷与轴，涉猎粗通。

将若何无忝虞国之苗裔，亦允续广江之儒风矣乎！

这篇像赞主要是抒发他自己受到提拔而被重用的愉快心情，并有自勉的意思。

郡学的况公祠，建于正统七年(1442年)，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后人将况公祠大加修缮，把三国时清官郁林太守陆绩卸任带回故乡的“廉石”搬到况公祠旁，用做陈设。何谓“廉石”呢？原来陆绩为官清正，卸任回乡时，行李太小太轻，压不住船，船颠簸得很厉害，于是搬了一块大石头上船，才把船驶回苏州，后人称这一块大石头为“廉石”，搬在况公祠旁，也是歌颂况钟的清廉。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况钟的长子况宁(况定观)后裔的外孙岳士景，曾写文章

谈起幼年时代到况公祠瞻仰遗像、凭吊古迹的情况，还看到过“廉石”，并受到先人的深刻教育。

在苏州西美巷还有一个况公祠，是清道光六年(1826年)兴建的。现在和西美巷小学建在一起，尚有大石碑一块。

在况钟的故乡靖安，也有一个况公祠。况公墓在文革中遭到了破坏，坟墓被挖开，文物被抢掠一空。

由于况钟的业绩突出，给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千百万人民怀念他，为此，他的形象必然出现在文艺作品中。清初戏剧家朱素臣，写了一部二十六出传奇《双熊梦》，也叫《十五贯》。故事情节如下：

有一人家姓熊，生活困苦。史熊友兰为船工，弟熊友惠在家读书。因家中老鼠较多，于饼中放老鼠药用来灭鼠，老鼠竟将饼叼至隔壁邻居家，又将邻居家的金环与宝钞衔来熊家。熊友惠正无米下锅，即将金环当了去换米，邻居却因吃饼中毒而死。告到衙门，问官以金环为证，断定熊友惠与邻居童养媳侯三姑有奸情合谋杀其夫，二人皆被判死刑，并认为宝钞亦友惠所偷，严刑逼供追赃。

熊友兰闻讯，向客商陶复朱借十五贯钱，前去救弟弟。这时，有一屠户尤葫芦，也借十五贯钱回家，养女苏戍娟问钱从何而来。尤和养女打趣，说是苏戍娟的卖身钱。苏戍娟坚决不从，逃出家门，途遇熊友兰，结伴同行。其时窃贼娄阿鼠潜入尤家，杀死尤葫芦，偷走十五贯钱。案发后，熊友兰与苏戍娟被邻人与差役追及，搜出了随身携带的十五贯钱，带至县衙大堂审问，县官即断定熊、苏两人杀尤盗钱而私奔，也被判处死刑。苏州府知府况钟奉命监斩，临刑时四人一齐拼命喊冤，于是况钟再审，发现不少疑点，乃临时决定停斩，请示巡抚周忱，缓刑复查。经过况钟的认真调查，捉住真凶娄阿鼠，案情大

白，四人均宣告无罪，熊友兰与苏戍娟，熊友惠与侯三姑分别结为两对夫妇。

这部传奇共分《开场》、《泣别》、《鼠窃》、《得环》、《摧花》、《饵毒》、《陷辟》、《商助》、《窃贯》、《误拘》、《如详》、《狱晤》、《梦警》、《阱泪》、《夜讯》、《乞命》、《踏勘》、《廉访》、《擒奸》、《恩判》、《请罪》、《考试》、《谒师》、《刺绣》、《拜香》、《双圆》等二十六出。

《十五贯》问世以来，受到观众和评论家的赞誉。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六年，浙江省戏曲界对朱素臣《十五贯》原作进行了整理，创作了一个昆曲演出本，把熊友蕙、侯三姑一条线砍去，共分《鼠祸》、《受嫌》、《被冤》、《判斩》、《见都》、《疑鼠》、《访鼠》、《审鼠》等八场。突出了况钟重视调查研究和不错杀好人、不漏过坏人的认真负责精神，充分起到了古为今用的作用。

当时反映到文艺作品中有关况钟形象的，还有话本《十五贯戏言成大祸》、《警世通言》第三十五卷《况太守断死孩儿》等等。

据专家的考证，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并不一定是真人真事，但况钟审理过类似《十五贯》、《况太守断死孩儿》等案件，肯定是会有的，从中可以看出况钟审查案子从不草率从事，而是审慎地从各方面考虑，认真调查研究，这是况钟事业有成，受到老百姓爱戴的根本原因。

关于况钟的著作，在明代，苏州府常熟人张洪写过《况太守前传》。清道光年间刻《况太宗集》。还有，《况钟复任唱和诗卷》，原由况钟后人江西省靖安县高湖乡岩口村况为玉家收藏。高三十四厘米，长九百三十一厘米。现由江西省博物馆收藏。另有一部《秋江送别诗叙》，为况钟离任时，诸好友秋江送别之作。高三十三点五厘米，

长一百三十六厘米。此书也藏于江西省博物馆。有一部《况氏家谱》也由况为玉收藏。

况钟，只是一个三品的知府，可是他的事迹在《明实录》的《宣宗宣德实录》等部分，《明史》、《明史稿》、《续藏书》等诸书中都有所记载，或为之立传，可见况钟这个人物在历史上是比较突出的。明史专家吴晗同志对况钟的评价是：

“况钟刚正廉洁，极重视小事情，设想周密，不怕是小事，只要有利于百姓就做，对百姓有害的就加以改革。兴利除恶，反对豪强，扶持善良，百姓敬他爱他，把他看作天神一样。”

“生活俭朴，住的房子没有什么陈设，吃饭也只用一荤一素。做官多年，没有添置过田产，死后归葬，船上只有书籍和日用器物，苏州人民看了，十分感动。做官办事不用秘书，一切报告文件都亲自动手，文字质直简劲，不作长篇大论，说清楚了就算。在请求官田减租的报告上，直率批评皇帝失信。”

一个封建社会的知府，能够做到这些，是罕见的，也是难能可贵的，况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政治家。

于谦

外族入侵，京师被困；危在旦夕，兵部尚书于谦，分遣诸将列阵九门外迎敌，并亲自率兵督战，打退了围困之敌，挽救了明王朝的统治。可是，朝廷竟以谋逆罪将他处死！

夜晚，秀丽的西湖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皎洁的圆月刚刚挂上树梢，大榕树迎着寒风傲然挺立。

在这万籁俱寂的寒夜里，杭州城郊一座瓦房中，泥瓦盆里的炭火在燃烧着，烤得屋里暖融融的。一位年过六十、白发苍颜的老人，正坐在案边，眯缝着双眼，身旁还有一个七八岁男孩，那四方脸和端正的鼻子长得很像老人。老人正在教男孩念两句诗：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老人的声音低沉，男孩的声音尖细、清脆。

“爷爷这两句诗我已经会背了，是谁写的呀？”

“文天祥。”爷爷回答道。

“文天祥是谁呀？”

“离现在一百多年前，宋朝的时候。”老人慢慢说道，“那时朝廷衰弱，国内纷乱。外族乘机入侵，先后两个皇帝被虏了去。朝廷被迫南迁，把都城迁到临安（今杭州），只保持了半壁江山，这是我们民族的奇耻大辱……”

接着，老人又讲起，北方蒙古王朝的铁蹄向南践踏，半壁江山也难以保障的时候，南宋朝廷荒淫无度，奸臣当道，最后连都城临安也处于危机之中。在危难之际，宋朝丞相文天祥，变卖了全部家产，组织了万人勤王军队，参加了保卫临安的斗争……后来文天祥在五坡岭被俘，在狱中写了《过零丁洋》一诗，表达他宁死不屈的意志。念的就是这首诗的最后两句。

“后来，元军把文天祥囚禁了整整四年，威逼利诱全部施尽，文天祥誓死不降，最后，被杀害。临刑时，昂首挺胸，神态自若。他的一颗为国为民的赤心，光照千古！”

故事讲完，祖孙两人均被感动得流下了热泪。这一老一小就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和他的爷爷于文。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于谦出生于浙江钱塘县的太平里。他的祖先原籍是河南考城。曾祖名九思，举家迁居钱塘。祖父于文，是明太祖朱元璋手下的得力大将，当过兵部主事，后又调工部任主事。父亲于仁，为人正直，一生没有做官。母亲刘氏。于谦出生时，他祖父已告老家居，非常疼爱这个懂事的小孙子，常常向他讲述屈原、岳飞、文天祥的故事。孙子也愿意听爷爷的教诲，立志要做文天祥那样的英雄。

于谦除了缠着爷爷讲故事之外，常常领着村中的孩子们玩耍，成为孩子王。

冬日，山村炊烟袅袅。当夕阳挂在吴山山顶树梢上时，一群天真的孩子，聚集在广场前嬉戏。谦儿喊道：

“喂，咱们玩骑马战好不好？”

“好！”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孩子们选出年龄最大的阿金当裁判，谦儿和宝儿各当了将军。

“我要铁旦！”

“我要狗剩！”

双方的将军开始挑人，孩子们顿时活跃起来。先被将军选中的又高兴、又自豪，接着就帮助将军出谋献策，道：

“要大黑！”

“不，要二狗子！”

孩子们挑得极为认真，真好似在进行战斗前的准备。

挑来挑去，剩下两个年小体弱的孩子虎崽和阿猫了，宝儿一伙的孩子们吵着说道：

“不要，他俩不能打仗。给谦儿一伙吧！”

“他不要咱们也不要！”

谦儿一伙的孩子们喊道。

两个孩子被丢在中间，没人要，委屈得哭了起来。

这时，谦儿说道：

“别哭，别哭，我们要！”

听到谦儿的话，虎崽和阿猫停止了哭泣，揉着眼睛站起来，往谦儿一伙这边走来，大黑可不高兴了，他撅着小嘴道：

“谁要你俩？要了你俩还不干等着输呵！”

谦儿一摆手，充满信心地说道：

“听我的指挥，咱们准能赢！”

还劝说体力强的大黑到宝儿一伙。

充当裁判的阿金见对方的人已分好了，便道：

“开战！只见宝儿阵中，跃出一匹战马，当马的孩子恰是大黑，骑手是号称大力士的铁旦，二人威风凛凛地冲杀过来。

谦儿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对方阵中最强的战马出阵了。于是他当机立断，命令虎崽和阿猫出阵，虎崽当马，骑手是阿猫。战马踌躇不前，“骑手”也不愿出阵，孩子们向谦儿投去怀疑的目光，道：

“他俩上去不是要吃败仗吗？”

谦儿好像没听见一样，只是给虎崽和阿猫鼓劲道：

“天不怕、地不怕，只要骑马敢冲杀；有志男儿当英雄，无耻小子当狗熊！”

虎崽和阿猫在谦儿鼓动下，精神抖擞，斗志旺盛，冲杀过去，拼命撕打。但是，终因力量悬殊，铁旦将虎崽拎下马来。宝儿阵中一片喝彩声。

谦儿这边的战士，却撅着嘴，垂头丧气。长得胖胖的狗剩子，鼓着两腮，嘴里嘟囔，对着谦儿要两个“废物”不满。

谦儿一边安慰着大家，一边细心观察宝儿阵中的动态，并考虑迎敌策略。

阿金下令：“第二战开始！”

见对方阵中，中等战马出阵。谦儿立即命令最强的战马出阵。狗剩子当马，骑手是二狗子，二人都是摔跤能手。冲过去，三下五除二，把对方骑手拎下马。

阿金宣布，战斗打成平局，是一比一。

第三战是决定双方胜负的关键一仗。谦儿胸有成竹，立即下令组成中等战马，谦儿自己当马，骑手是大黑，他个子大但身体弱。见对方只剩下将军宝儿和小小了。宝儿身强力壮，可小小是宝儿的弟弟，骑上马就害怕。

谦儿与大黑已经冲过去，向对方喊道：

“怎么还不出阵，怕死了吗？”

“胆小鬼！胆小鬼！”这边的孩子大声喊叫。

在众人的催促下，宝儿和小小来到阵前，未等交战，小小就从宝儿身上摔下来。

阿金高声裁判：二比一，谦儿一队获得胜利。

孩子们围在将军于谦身旁跳跃着，欢庆自己一伙的胜利，对谦儿意见最大的狗剩子纳闷地问道：

“咱们一伙的体力不强，怎么能取胜呢？”

谦儿向他解释道：

“咱们用最弱的马，战他们最强的马；用咱们的强马，战他们的中马；用咱们的中马，战他的弱马。所以就取得三战二胜的战绩。”

听了谦儿的解释，孩子们才恍然大悟，一下子把谦儿抬起来，举到半空。

孩子们玩得那么开心，兴致勃勃，谁也没有注意到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观看，俱是白发、白须，接近古稀之年。一个是老英雄于立，还有一个是于立的客人，五台山道士弘天法师。二人自始至终看着孩子们的这场游戏。等到战斗结束，弘天法师将谦儿叫到面前，仔细端祥了一番，赞道：

“于老之孙，将来定能成为天下的栋梁！”

孩子们听了，哄笑了一阵，又玩了起来。谦儿闪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若有所思地回味着道士的话。

爷爷看到刚刚七岁的孙儿这么机智沉着，心中暗暗高兴，听到法师的称赞，更是乐得合不拢嘴。他多么盼望能像和尚说的一样——小孙儿成为国家的栋梁！

春风，吹绿了西子湖畔的垂柳，也吹绿了吴山三茅观的翠柏。

于谦推开院门走出书房，迈步来到山顶。他长得中等身材，眉清目秀，衣冠楚楚，步履稳健。手里拿着一本厚厚的书卷，站在山顶，举目四望：左边是浩荡的钱塘江，正在奔腾不息，江上片片白帆，顺流而下；右边，美丽的西子湖，碧波轻荡，像一个娴静的少女，岸边那随风轻轻摇动的垂柳，把她装扮得更加婀娜多姿；南面，显出秦华山的英姿；回首北望，家乡钱塘的景物尽收眼底；纵横交错的街巷，炊烟缭绕。更远的地方，便是那直通京都的大运河，像一条绸带在泛着银光。

于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舒展两臂，将昨夜读书的劳累，一扫而光。

于谦于永乐十年(1412年)，十五岁时，考取钱塘县的秀才。十六岁开始到三茅观来求学。于谦勤恳好学，天分很高，喜读先秦两汉的书籍和苏东坡的文章，更潜心研究古今治乱兴国的道理，特选录唐陆贽的奏疏，手抄成册，朝夕批阅，“慨然有天下己任之志”。于谦还喜读诗词，留心古人行事大节。仰慕文天祥的为人，撰写了赞词，悬挂在自己的座位旁。赞词是这样写的：

“呜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国亡身，舍生取义，气吞寰宇，诚感天地。陵谷变迁，世殊事异，坐卧小阁，困于羁击。正色直辞，久而愈厉，难欺者心，可畏者天。宁正而死，弗苟而全，南向再拜，含笑九泉。孤忠大节，万古修傅，我瞻遗像，清风凛然。”

从这篇赞词，可以看出于谦在少年时代的志愿和抱负，他不肯只做一个文弱的书生。对文天祥忠烈事迹的景仰，更反映了他对元朝统治者吞灭南宋，感到亡国的伤痛。虽然到了明朝，已是“世殊事异”，但还要保持民族的尊严，不能再遭受异族的统治和侮辱。

于谦读书的吴山，就是历史上所载金朝暴君完颜亮幻想吞灭南宋“会当立马吴山第一峰”的吴山。杭州风景甲天下，吴山风景甲杭州。吴山是杭州风景的佳胜处。它在杭州府城南，峰峦高耸，林繁茂；左临钱塘，轻帆出远海，通行万方；右瞰西湖，烟霞映长日，景华多变；南望秦华山，是秦始皇登临的胜地；北眺杭州城，城方圆三十五里，井邑浩荡，为当日富庶城市。杭州城北的大运河，贯通江淮，越过黄河，直接幽燕京都。在吴山读书，真可以俯仰古今，开拓心胸。

于谦于十七岁时，应乡试不第，仍旧于吴山三茅观读书。更加潜心求学，“濡首下帷，足不越户”。后来他写诗回忆道：

我惜少年时，垂髻发如漆。

锐意取功名，辛苦事纸笔。

教书先生喜欢他聪明好学，同学们敬慕他天分高。他的同窗高孟升是他披星戴月刻苦读书的见证人。高孟升还可以讲述于谦在读书时发生的几件令人难忘的小事。

永乐十三年(1415年)，于谦和许多学生随督学佾事官到文庙行祭礼。因督学佾事官平日恣行威福，督责学生过于严厉，所以当隆重的典礼正在进行时，学生们借故争吵起来。群情激动，嚷喊拥挤之下，督学忽然间坠落到学宫前的水池中。学生们都惊慌四散，惟独于谦见督学要淹死，便下水相救。督学一时气懵了，抓住于谦，要归罪于他。于谦坦然道：

“和你吵架的全走开了，我是见你快要淹死才救起你的。现在你不责难和你争吵的，反而要归罪不曾和你争吵的，可以这样办吗？你还要加罪来援救你的人，这是什么道理？”督学听了，只好罢休。

于谦在少年时，就这样聪明、勇敢，一时间名闻乡里。

一天午后，学生们正在书房里读书，那朗朗的读书声飞出窗外，飘满整个书院。

“御史大人驾到！”随着一声吆喝声，一顶绿呢八抬大轿停在了三茅观门前。御史被一群地方官员前呼后拥着，威风凛凛地走进观内。教书先生慌忙打开屋门，恭恭敬敬地站在门旁，请御史大人走进房间。学生们偷偷一看，为首的竟是个挺着肚子的大胖子，横眉竖眼，满脸胡须，十分吓人。几个胆小的学生害怕了，读书声戛然而止。惟有于谦连头也不抬，仍然端端正正地坐在书案前继续读着，态度自如，声音响亮。

御史认为，这是对他的不恭敬，于是恼羞成怒，刚要发作，又觉得不妥。他强作镇静，背着手环顾了一下，然后用手一指，忿忿地对教书先生道：

“让他到案前来讲书，要跪着讲！”

教书先生顺着御史所指的方向一看，心中暗暗叫苦道：“于谦呀于谦，怎么单单叫到你呢？”

他了解于谦耿直的性格和倔强的脾气，捏着一把冷汗。学生们也面面相觑，有的还互相眨巴眨巴眼睛，偷偷伸伸舌头。

于谦见御史让他讲书，便略微思考了一下，又抬起头看看神色紧张的教书先生，然后胸有成竹地从位置上站起来，走到讲案前，向各位官员鞠了一躬，道：

“请各位大人一齐跪在案前听讲。”

话音未落，御史勃然大怒道：

“放肆，太放肆了！小小年纪，竟敢捉弄朝廷命官！”

于谦好像没有看见御史生气，他看了一眼站在一旁狠狠瞪着自己的教书先生，又回过头来，对御史从容地说道：

“大人，今天学生要讲的是太祖高皇帝的《大诰》三篇，学生不敢不跪；为了表示对高皇帝的尊敬，各位官员莫非不该跪着听吗？”

说完，他紧紧盯住御史。御史当然不愿在一个小孩子面前，甘拜下风，但听到于谦所要讲的是《大诰》，心里倒抽了一口凉气。他知道《大诰》是太祖高皇帝的圣谕，宣读时，历代皇帝都要跪下聆听，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小的督学。停了一会，御史看没有别的办法，只得跪下，其他官员也都撩起袍子，跪在御史周围听讲。

于谦一边背，一边讲，他背诵得滚瓜烂熟，讲得有声有色。御史和官员们挑不出任何毛病。好不容易等到于谦讲完，这帮官员才像得到了救星一样，慌忙从地上爬起来，一边揉着跪疼了的膝盖，一边尴尬地朝门外走去。走到门口时，御史大人在仆人搀扶下，狠狠地瞪了于谦一眼。

御史走后，教书先生大发脾气，认为于谦给三茅观惹了祸。而同学们却一下子围到于谦身边，称赞他的机智、大胆，伸出大拇指道：

“好样的！……”

他的同窗好友高孟升最为赞赏于谦的机智、勇敢的性格。他说道：

“人不能卑躬屈节，逢迎权贵，要象石灰一样洁白，要经得住烈火的熬炼！”

于谦在同窗的启发下，写了一首诗，题为《石灰吟》：

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高孟升连声说：“好，好，我们就要做这样的人！”

永乐十五年(1417年)，于谦二十岁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钱塘县廪生。于府张灯结彩，庆祝一番。钱塘县令来于府拜贺时，见于谦长得相貌堂堂，一表人材，便当红媒，要将翰林董忬的女儿嫁给予谦。媒人介绍董小姐，长得花容月貌，善习女红，能读诗书，撰写诗词。于谦之父母十分满意，当即订婚。

永乐十六年(1418年)，于谦和董小姐完婚。董氏善于勤俭持家，孝顺公婆。是位贤惠勤俭的妻子。

永乐十七年(1419年)，于谦亲自到山东去拜省他的岳父。董忬不慕权贵，性格直爽，曾因直率，忬逆当朝权臣，被降官为济南教授。

于谦在岳父家逗留数日，即到山东各地考察一番。农村各地残破荒凉，百姓生活困苦。“因为靖难之役”，战祸延续天年，而山东一带的农村遭受的兵祸最重。再加上赋税、徭役繁重，使百姓已不能忍受，于是在山东浦台县，暴发了在唐赛儿领导下的农民起义队伍。于

谦目击农民的流亡和困苦生活，这对于后来，他在进行为官时，比较注意农民疾苦，主张改革弊政，都有深远的影响。

永乐十八年(1420年)，于谦在浙江杭州参加乡试，中了第六名举人。次年，于谦二十四岁，从家乡出发经过山东，到北京参加“会试”和“殿试”，中了进士。

当时正是明朝国势鼎盛时期，朝廷刚刚迁都北京；三保太监郑和等率领庞大的舰队第六次出海远航；锡兰、苏门答腊等十七国的使臣或国王来中国“入贡”，西蒙古瓦剌部的贤义王太平、安乐王把秃孛罗也都“来朝”。明王朝在对外关系上，达到了鼎盛时期；但在国内朝政方面却存在着不少弊端，于谦怀抱着拥护皇权，欲做“救时宰相”的宏愿，感念亲眼目睹的现实，自然要陈述并抨击时弊，提出改革弊政的主张。这些主张，不能不在他“殿试对策”的答卷中表露出来。

当时，主考官大学士杨士奇、侍读周述都亲自阅过于谦的试卷，很器重于谦的才学。但因“策语伤时”，原本会试考取第一的于谦，殿试结果，竟列在三甲第九十二名，这是朝廷权臣对其表示压制之意。可见，于谦在从政之初，就有直言敢谏的精神，并受到过打击。

于谦中进士之后，被任命为山西道监察御史。上任后，公正清廉，断案神速。昭雪冤囚数百人，受到朝廷的嘉奖。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于谦接受朝廷一项特殊的任务，奉命到湖广地方，考察官军功过，兼“安抚”川贵等地的瑶民和僮民。

当时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部落时代，不服从朝廷的管束，朝廷派去的官员多数采取残暴的滥杀办法，使瑶、僮民族的起义斗争愈演愈烈。于谦到任之后，微服出访，深入到瑶族人居住的山寨去查看，从和瑶民的谈话中，得知官军对少数民族滥杀无辜的情况。

这时，川贵一带的总兵、都督等官员，给于谦送金银珠宝，迎到家里热情款待，拉拢于谦，企图掩饰自己滥杀冒功的罪行。于谦毫不徇情，并当面揭发他们的罪状。回京后，奏劾官军在湖、广、川、贵等地贪功妄杀等罪过。促使朝廷下令不许官军邀功妄为，多少改变了地方官军对待瑶族、僮族人民的残暴办法。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明成祖在北方和鞑靼军队作战的归途中，病死于榆木川。太子朱高炽即位，就是明仁宗，改元洪熙。于谦仍然继任监察御史。从永乐二十年(1422年)到洪熙元年(1425年)的四年内，于谦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平反了不少冤假错案，贬逐了几十名贪官污吏，朝廷上下皆赞誉于谦“廉洁、干练”，是难得的清官。

仁宗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长子朱瞻基即位，就是明宣宗，改元宣德。宣德元年(1426年)，杨士奇推荐，调于谦入京师任兵部右侍郎。朱瞻基见于谦身材结实，相貌英俊，声音宏亮，在朝班里奏对公事，朗朗清畅，条理清晰，认为是个难得的人才。

八月，宣宗的叔父，汉王朱高煦叛变，起兵山东乐安州，想重演一幕“靖难之役”，夺取皇帝的宝座。但朱瞻基很果断，立即决定亲征。因平日朱瞻基赏识于谦的才干，特别提拔于谦做“扈从”，随皇帝亲征。

朱高煦是朱棣的次子，仁宗的同母弟。善骑射，以才能自负。朱棣“靖难”起兵，朱高煦随军作战，立有战功。后来又跟随朱棣出征漠北。朱高炽以长子被立为太子。朱高煦被封为汉王，封地在云南，不肯就藩，改封地于山东青州，又坚决不去。他知道朝廷要迁都北京，想长期留住在南京。他在南京私造兵器，招纳亡命徒，暗中收养武士，漆战船，教练水战。朱棣得知高煦的不法行为，大怒，于永乐十五年，

强令高煦徙居山东乐安。高煦到乐安后，仍然私募军士，不隶属兵部，蕴藏着阴谋，时刻想篡夺帝位。

明仁宗驾崩时，当时太子朱瞻基监国南京，自南京奔丧。由于乐安离北京较近，仁宗已驾崩但密不发丧，等到太子朱瞻基到了良乡，京师才为仁宗发丧，可见朝廷中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朱瞻基回到北京，继皇帝位，是为宣宗，改元宣德。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举兵反叛，终于暴发了一场战争。

宣宗接受杨荣的建议，于八月十日，率大军亲征。高煦本来想先攻打济南，不料宣宗亲征，便惊慌失措，不敢离开乐安。宣宗率军于二十日包围了乐安城，发大炮神机铳轰城，声震如雷。二十一日，高煦被迫投降。在其出城跪拜军前时，宣宗特命于谦当众宣布高煦罪状。于谦敏捷从事，声调高亢，高煦伏地战栗，顿首称道：

“臣，罪该万死!万死!”

朱高煦此次反叛，十几天内便失败了。宣宗和于谦等人凯旋回京。

宣德二年(1427年)，于谦奉命巡按江西。到任后，处理公事，廉明公正，严厉执行法律规章，不徇任何私情。有时还复审刑狱，平反冤假错案。有一个人被诬控为跟随高煦反叛的首领，案件久悬未决，于谦翻阅旧案，判明是件冤案，反判定那诬告者有罪；另外，经过认真调查、核实，平反被枉判的死刑案数百人，并将他们立即释放。

宣德三年(1428年)，于谦在江西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江西宁王府官员，素日恃势骄横，借“和买”为名，掠夺商民的货品。于谦经过私访，查明了宁王府官员的罪行。宁王曾上告宣宗不服于谦的惩办，最后于谦拿出人证、物证，上疏宣宗，惩治了这些官吏。因为于谦打击了权贵的凶焰，改革了许多弊政，深受江西老百姓的爱戴，将他的牌位在南昌府名贤祠里供奉。

宣德四年(1429年)，于谦巡按江西的任务完成，回京复命。后又奉命率领锦衣卫官校巡查搜捕长芦一带运河上官船走私贩盐者。于谦执法严办，不论贩盐者是谁，一律惩治。

于谦认真执行监察御史的职责，维护明王朝的皇权，因而宣宗对其“眷顾独隆”。当时都御史顾佐，性格刚正倔强，平时对国僚属员，很少赞许；但他认为于谦为人公正，才干超群，能力超过了自己，对其十分敬重。于谦写过一首《都御史顾公致政有喜》：

林下且消闲岁月，台端犹忆旧冰霜。

春风诗酒从容处，重睹群英会洛阳。

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当年于谦和顾佐诗酒往还，和他在都察院受人爱戴的情景。

宣德五年(1430年)。烈日当头，久旱无雨。田地龟裂了，纵横交错的裂口中往外喷着热气。大地上干旱得可怕，仿佛只要一颗火星，就能把所有的村庄、树木烧成一片灰烬。

几只乌鸦，偶尔在路旁的枯树上停留一下，“呱呱”叫了两声，又张开翅膀向远处飞去。村头的小庙前，骨瘦如柴的农夫们，带着全家老小，跪在破旧的供桌前，虔诚地念道：

“老天爷，行行好，下点雨吧！”

随着恳切而凄惨的哀告声，人们的泪珠大颗地滴到干裂的土地上，立即被厚厚的尘土吞没了。

离小庙不远的地方，一个壮年汉子，好不容易从深井中提出无一滴水的空桶来，抬头看看站在一旁嘴唇开裂的孩子，叹了口气，道：

“唉，老天这是成心不让咱穷人活呀！”

这时，从北边大路上奔来三匹骏马，时而飞跑，时而缓行。为首的一匹白马上端坐着一位中等身材、四方面庞、眉目清秀、三十岁开外的官员。他紧锁双眉，用炯炯有神而又略带忧虑的目光，环视着眼前的一切。汗水从他的额头上流下来，滴在汗涔涔的马背上。他顾不得擦一擦，只是急切地策马向前。他就是新上任的山西、河南省的第一任巡抚于谦。

五天前，在京城皇宫里，宣宗召见朝廷文武百官。三十二岁的宣宗坐在盘龙宝座上，御座背后，太监执着伞扇，各位大臣身穿朝服，躬着身子依次登上台阶，走进殿里，低着头行了跪拜礼，站立在御案两侧。

宣宗用低沉的声调道：

“自朕登基以来，北虏扰我疆土，境内又遇天灾，目前，国步艰难……”

大臣们听着皇帝略带颤抖的声音，偷眼看看皇帝忧愁的面貌，都低头不语。大殿内死一般的寂静，连喘口粗气也能听得清楚。

宣宗又接着说道：

“为充实国仓，安抚臣民，抵御外虏，朕欲在各地增设巡抚一职，负责监察各地事务，职权在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等三司之上，卿等以为如何？”

“陛下英明！”老臣杨荣等一齐回答道。

可是由谁来担任巡抚呢？在众大臣的荐举下，各地的巡抚皆已选出，惟独山西、河南两省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其巡抚尚未选好。老成持重的大臣杨士奇和都御史顾佐都推荐于谦，认为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最后宣宗下诏，命于谦任山西、河南两省巡抚。于谦走进金銮殿，跪在皇帝面前，接受圣旨，宣宗赞许他“忠勤可嘉”，要他今后更加“勤于政事，莫负望”。于谦叩头谢恩时，热泪夺眶而出，他觉得，即令粉身碎骨，也要为皇帝尽忠。

于谦虽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但他一想到皇上对他的器重和信任，想到成千上万的饥民在等待着自己，于是接过诏书，谢过皇恩，二话没说，气宇轩昂地大踏步走出了大殿。大臣们准备了丰盛的酒席为他饯行，朝廷准备了华丽马车送他上路，于谦都一一谢绝了。他告别了妻子儿女，带上简单的行装，骑马上任。

于谦策马向前，肩负的重任，使他忘却了旅途的劳累；而途中见到的惨景，又把他那颗年轻的心揪得隐隐作痛。他不忍目睹周围的一切。而这一切又偏偏映入他的眼帘。

那边地头上有几个人，他们为什么在烈日下暴晒着？于谦两脚轻轻磕一磕马镫，那白马略微加快了速度。来到近前，于谦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身边依偎着四个孩子，那嶙峋的骨头，像是要顶破薄纸一般的皮肤似的。母子五人围跪在一座新坟前，骨瘦如柴的孩子们哭喊着“爸爸！爸爸！”那妇女蓬乱的头发周围裹着一条旧白布，褴褛的衣襟中还卧着一个婴儿。妇女已经哭不出声了，两眼只顾呆呆地看着面前的新坟。她怀里的婴儿，头耷拉在妈妈枯瘦的胳膊上，眼睛紧紧地闭着，而那可怜的小嘴却张着，他正用尽全身气力，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还在寻找着那甜蜜的乳汁。

看到这些情景，于谦立即命令仆人从行囊中取出十两银子给那妇女，妇女感激涕零，和三个孩子一齐跪到于谦马前，磕起头来。于谦的咽喉哽塞了，说道：

“赶快去买点粮食糊口吧！”

说完，不忍心停留，上马继续赶路。就这样，于谦在上任的路上，看见逃难的老人和骨瘦如柴的孩子，他都让仆人拿出银子赈济。一路上，于谦很少说话，他看着展现在面前的令人惨痛的景象，思考着如何带领百姓渡过灾荒。

于谦一行三人来到一座高大的房子面前。大门上挂着刻有“巡抚衙门”四个金字的黑色匾。于谦翻身下马，把马缰绳递给身后仆人，径直向衙门走去。门前一位肥胖的官员，拦住于谦，问道：

“请问，尊兄来此有何贵干？”

于谦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身后仆人答道：

“这是新上任的巡抚于大人。”

胖官员将信将疑。他想：巡抚上任，为何既没有仪仗执事和鸣锣开道，也不坐八抬大轿？他一边把于谦让进衙门，同时，命令手下人赶快去请三司长官。

不一会儿，一顶顶轿子停在了衙门口外，官员们鱼贯地走进大殿，他们是来为新任巡抚接风的。虽然于谦的作为他们有些耳闻，但觉得新官上任设宴洗尘的规矩还是必不可少的。

当他们走进大殿时，看见年轻英武的巡抚于谦，早已坐在公案上边。于谦先宣读了朝廷的诏书，然后，命三司官员禀报灾情。于谦还仔细询问百姓生活得怎样？官府打算如何带领百姓渡过饥荒？一贯善于言辞的布政使司被问懵了，不知如何回答。好一会儿，才结结巴巴说了几句，但也是语无伦次，驴唇不对马嘴。

站在一旁的官员们，眼看巡抚大人脸上显出愠色，冷汗从布政使司的额头上，鼻尖上渗了出来。最后只得拿出最后一招，大摆接风宴席。没想到竟被于谦制止。当即布置救灾工作。

于谦提出，首先解决灾民吃饭问题。将粮食贷给灾民。之后又立下制度，每年三月，令府州县呈报缺粮民户，按人口分配贷粮，先发豆类和主粮，次发黍谷、小麦，再发稻米，到秋天收获时如数偿还官仓；但年老、患疾病和实在贫苦者，可免偿还。还创立平糶粮食的办法，由官库钱钞先尽量收买大户粮食，再向中等粮户收买，贮积在各地预备仓内，减价卖给饥民。于谦还令各县设置“义仓”和“平仓”。义仓里存储地方“贤良”捐助的粮食；平仓里存储丰年贱价买进的粮食。仓前立碑刻名，书明某人捐资若干、捐粮若干。捐二百金以上的给予冠带，贱价卖给平仓千百石粮食的建坊立匾，予以旌表，并免去其徭役。于谦又令县官从每里中选出忠厚的长者二人，协同里甲，照户籍查计人口，给饥民发放粮食或银钱；同时又命县官时刻稽查，不许里甲徇私作弊；还通告各县，如有外省饥民，流亡到此，允许他们在当地就食度日，不许驱逐。于谦还屡次捐出自己的薪俸，赈济灾民。于谦还携带圣旨到湖广、四川等粮食丰收的地方，购买粮食，运回来，救济山西、河南的灾民。这样，在于谦的积极努力下，拯救了千千万万人民的生命，使他们在大灾之年，免于死亡。

一个夏季的傍晚，大雨滂沱，狂风呼啸，黄河的浪头一个比一个高。随着怒涛的嚎叫声，混浊的黄河水猛涨，眼看要冲破多年失修的大堤了。四面响起了震人心肺的铜锣声和吆喝声：

“黄河又要决口啦，快逃命呵！”

震耳欲聋的霹雳声，黄河水的咆哮声，夹杂着凄惨的呼喊声，回荡在黄河的上空。

在一片混乱中，从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几匹马飞快地来到黄河大堤上，那马全身淋得透湿，雨水顺着马鬃向下滴着。为首的

一匹马身上，乘坐着于谦。他头戴斗笠，身披蓑衣，透过茫茫雨线，看着凶恶的黄河浪涛和难民们携儿带女，拼命外逃的情景。于谦痛心地说道：

“这班官吏，上瞒朝廷，下欺百姓，有负皇恩，洪水如此泛滥，竟谎报平安无事，真是一群畜生！”

于是于谦就亲自来河南开封一带黄河沿岸视察，惩治官吏；发动农民增筑河堤，还下令黄河沿岸每五里地设一寓铺，设专人巡守，督促地方官吏随时修缮。他还命令在堤岸两旁种树，以巩固堤基；还命令各地开设“惠民药局”，专给各地灾民免费治病。

百姓们在地里劳动，大道上行路，或在道旁闲谈，经常可以见到一位中等身材，长方面庞，两眼和善，步履稳健的中年人。他常到田间地头访问百姓，询问有没有挨饿的人家，官府给贷粮没有？询问当地官吏有没有贪污受贿滥用职权的？百姓看见他那和蔼可亲的态度，听到沁人心脾的话语，都愿把心里话说出来。往往当他走后，百姓们才恍然大悟，莫非他就是巡抚于大人吗？

于谦也关心农民的收成，田地长时间没下雨，于谦很焦急。他在一首《望雨无寐晓起偶题》中说：

“云霓常在望，天地岂无情？
寸坐待甘霖降，群黎各遂生。”

第二天，天空布满了云，于谦非常高兴。可是过了一会儿，风吹云散，于谦却又焦虑。他在《次日阴云密布不雨复散》一诗中说：“泼墨浓云布，漫空雨意悬。斯须露红日，依旧睹青天。祈祷知何益，焦枯亦可怜。菲才膺重寄，值此更凄然。”他盼望：“挽将天上银河水，散作甘霖润九州。”

有时田间喜雨，下了瑞雪，或久雨新晴。他都十分喜悦，在诗中写道：“一声雷送雨，万国土成金，……天公应有在，知我万民心。”“谷日晴明好，半年信可期。……”

如此关心农民疾苦的人，在当时的官吏中实属罕见。

于谦在山西、河南任巡抚的十几年中，年年照例是冬春两季在太原，夏秋两季在开封。从他的诗里，处处可以看到他的行踪如“三晋冲寒到，中州冒暑回。山川元不改，节候自相催。”是写他巡视不计寒暑。又“碗子城边路，年年几度过。山川认行色，花熟鸟鸣珂。”是写他年年要路过太行山。“月落日未出，东方隐又明，云连怀庆郡，雾绕泽州城。”是写他巡视各地，晓行夜宿，十分辛苦。“秋雨黄河水，春风碗子城。巡行知几度，候吏厌逢迎。”是写他访求民疾，却怕官吏迎送。

正统五年(1440年)夏初的一天，于谦带着几位仆人，从山西去河南，途经太行山。走着走着，太阳落山了，雄伟的太行笼罩在夜幕之中，四周黑沉沉的，大地万籁无声。

仆人说：“大人，咱们到客栈里歇息一下，明早再赶路吧？”

于谦骑在马上，正全神贯注地考虑着：因为忙于公务，已经耽误了去河南的日期，那里一定有许多事情等待自己去处理。黄河两岸的堤堰修得如何？山东、陕西因灾荒而流入河南的二十万饥民的吃饭、住宿问题解决了没有？仆人的提醒，于谦全然没有听到。

仆人见于谦没有回答，又重复一句：

“大人，咱们再歇息一下再赶路吧！”

于谦随口答道：

“公务紧急，翻过这道山再歇。”

说着，扬起马鞭，又向前奔驰起来。仆人们都熟知巡抚大人勤于公务的习惯和执拗的脾气，不再说什么，策马紧紧跟在后边。

于谦和仆人们走进山谷。只见谷深林密，没有一个行人，只有于谦一行人的几匹马的马蹄声，伴随着嘶叫着的山风，还有偶尔传来的虎啸狼嚎声，在寂静的山谷中回荡。年老的仆人跟随于谦走惯了夜路，倒并不在乎，可年轻的仆人的背上一阵阵地冒出冷汗。当他们抬头看见走在前边的于大人是那样的镇静自若时，又略微放宽了心。

忽然，不知从何处传来一声吆喝：“站住！”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山峡谷中，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这声音显得格外地大。随着喊声，从山谷两边的山坡树后跳出十来个人影，黑衣蒙面，手执钢刀，拦住于谦一行人的去路。

为首的一个喊道：

“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若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

其他的强盗也随着喊道：

“是要命，还是要钱？”

于谦骑在马上，大声斥骂道：

“哪里的强盗，赶紧走开，勿图财害命！”

为首的把手中大刀一挥道：

“弟兄们，上，让他到阎王爷那里去骂！”

话音未落，只见一个人上前抓住于谦的马缰绳，另一个人举起手中的大刀就要下毒手。

于谦的两个随从，虽然有些武艺，可是被刚才突如其来的事情惊呆了，眼看大人命在旦夕，却又失去了主意。正在危急间，老仆人慌忙喊道：

“赶紧住手，你们竟敢杀害巡抚于大人，天理难容！”

听到“巡抚于大人”五个字，强盗们立刻住了手，把已经举起的大刀放了下来，其他的强盗也慢慢往后退去。

为首的那个丢下大刀，带头跪在于谦的马前道：

“今日冒犯巡抚于大人，实在该死！”

“大人日夜为我们操劳，为我们解除苦难，我们怎么能忍心……”

于谦训斥他们道：

“你们若是为生计所迫，拦路行劫，倒也情有可原，本官不怪。今后遇有困难，只管向官府申报，本官必定为民作主，尽力帮助。你们万万不可再做这种营生了。”

强盗们听着于谦的训斥，跪在地上一言不发，等到于谦一行人离开山林，马蹄声渐渐远去了，他们才慢慢抬起头来，望着巡抚大人隐进夜幕中的身影，谁也不说一句话，他们皆怀着又感激又惭愧的心情，四散而去。

于谦在奔驰的马上，长叹一声，道：

“不怨民反，只恨官逼，都是做官的不好，逼得百姓走投无路，万般无奈才干这种营生，本官没把地方治理好，也是有负皇恩啊！”

想到了这些，于谦更加勤恳的工作。提出轻税养民的政策，处处为灾民着想，同时，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居官清廉朴素，不接受馈赠，不拉拢私交。他的父母留居杭州故乡，于谦特遣长子于冕侍奉，以慰双亲。妻董氏寄居京师，正统十年(1445年)病死。于谦正在任上，十分悲伤。于谦时年四十八岁，竟不再续娶，亦不置妾，只身奔忙公事。

于谦处处为百姓着想，百姓自然爱戴于谦。当时流行着这样的歌谣：

凶年饥岁贪无粟，处处人民皆枵腹。

儿女卖与富家翁，一男只换六斗谷。
春来只有四斗粮，兼糲夹糠煮薄粥。
夫妻共食一月余，面渐尪羸皮搭骨。
引领看看作饿莩，精液耗干无泪哭。
忽闻巡抚到此邦，开仓赈济饥与荒。
示民出粟自捐俸，谆谆复谕富贤良。
幸蒙尚义诸耆俊，贷资输谷到官仓。
大家小户皆得食，顷然面色生容光。
鳏寡孤独俱在养，医药调理救灾伤。
赵父杜母今复见，天遣恩官拯二方。

正统六年(1441年)十月，山东、陕西一带许多地方，连年天灾之后，当年秋季又颗粒无收，官府催税的铜锣声仍在各乡镇响个不停。

“各家各户听着：今年新加兵捐，抵制北虏。若逾期不纳，以子充兵，顶捐顶税！”

成千上万的百姓，为了躲兵捐，逃活命，扶老携幼，背井离乡。

在一间破旧得遮不住风雨的土坯草屋里，土炕上躺着一个四十开外的男人。他那苍白而消瘦的面庞埋在蓬乱的头发和胡须之中。床边站着两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其中一个，用干瘦的双手端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药汤，道：

“爹爹，把这药喝了吧！”

男人睁开眼睛，看着女儿手中的药碗，问道：

“哪里来的钱，买了药？”

两个女孩把目光一齐转向倚着破椅子的哥哥。爹爹明白了，儿子又去为田主拉犁耕地卖了一天的命。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痛苦地叹了口气。

哥哥约有十六七岁，穿一身破衣服，骨瘦如柴，脸色蜡黄，神情十分疲惫。

这时，门外的铜锣声又响起来了：“若逾期不交，以子充兵，顶捐顶税！”

这刺耳的喊声，传进茅屋，像钢针似地扎着爹爹的心。“老婆刚去世，我也不中用了，儿子再被抓去，两个女儿可怎么活呀！”

听着那阵阵催命的铜锣声、吆喝声，他用尽全身力气坐起来，对女儿说道：

“拿菜刀来！”

孩子们惊呆了：“爹爹要菜刀干啥？”两个小女孩踌躇不前。

“快去，拿来！”他把手一挥，女儿手中的药碗摔碎了，药汤撒了一地。看看爹爹痛苦而盛怒的神色，姐妹俩谁也不敢再说什么，慌忙从灶台上拿起菜刀，递给爹爹。

爹爹两眼瞪着站在旁边惊恐的儿子，用痛苦的声音低声道：

“柱儿，过来！”

柱儿走到爸爸床前，只见爹爹的脸痛苦地抽搐着，嘴唇不停地颤抖，哆嗦着把手中的菜刀交给儿子。柱儿不知是为了什么？怯生生地接过菜刀。

“柱儿，砍掉你的一只手吧！爹爹是不中用了，你再被官府抓去，你的妹妹们可怎么活呀！”爹爹费了很大力气，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然后倒在床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兄妹三人围在爹爹病床前，失声痛哭起来。这悲惨的哭声传出茅屋，消失在夜空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在京城王宫里，丝竹齐奏，灯火辉煌。英宗正大摆宴席，庆贺奉天、华盖、谨身三个大殿和乾清、坤宁两宫的修缮完毕。十五岁的英宗坐在盘龙宝座上，大臣们一一行过跪拜礼，按照品级入席。

宫女们为每人斟上美酒。鼓乐齐鸣，群臣刚要举起面前的玉杯，只听殿外一片喧闹声，英宗脸上立即显出不愉快的神色。一个小太监慌慌忙忙走进大殿，跪在御案前：“圣上，王先生在殿外发脾气呢！”

一听“王先生”三个字，英宗一怔，急忙对跪在面前的太监道：

“传旨，打开东华门，请王先生赴宴。”

东华门大开，王振身穿皇帝御赐的红色一品朝服，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徐为首的一大群官员立即迎了上去。徐为兵部尚书，拜王振为义父，行贿谄媚，谋得兵部尚书之职。英宗吩咐随身太监在御案旁设一书案，赐王振入座。

在大臣们前往迎接王振之际，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和山西、河南巡抚于谦等互相交换了个眼色，彼此在心中发问：

“宦官不得参加殿廷上的宴会，这是太祖立下的规矩，怎么能随意破坏呢？”

宴会开始了。随着一片欢呼万岁声，酒过数巡，鼓乐声重又响了起来，宫女们翩翩起舞，百官举杯痛饮。御膳太监用金托盘端上各种名贵的菜肴，宫女们将酿造多年的长春露酒，徐徐倒入百官的玉杯里。

在众人频频举杯的时候，只有于谦没有饮酒。他望着众官所谄媚的王振，一股怒火在胸中燃烧。

王振原是山西蔚州人，他参加过科举考试，屡试不中。又任过某县的教官，也一事无成。后来，胡作非为犯了罪，被判充军。正赶上宣宗皇帝大赦，皇宫里要人，他见有机可乘，便经过阉割，自愿进宫当了太监。因为他善于投机钻营，竟然取得了英宗的欢心。王振入掌司礼监后，倚仗着英宗的宠信，压制百官，专横跋扈，开了明朝宦官专权之先河。

正统七年(1442年)，张太后病故，“三杨”亦先后去世。王振便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他首先摘去宫门上那块禁止宦官干预朝政的铁牌。又大兴土木，役使军民在皇城内建造府第，他的府第在京城内设有好几处，都是重堂邃阁，宏丽不亚于皇宫。他还役使民工为他建智化寺，为他祝福。他卖官鬻爵，收受贿赂。地方官入朝没有给他送上一份厚礼，就施加迫害。他结党营私，滥用职权，陷害忠良，重用佞臣，百官敢怒不敢言。更可恨徐等人，为了升官发财，竟在王振面前自称干儿子，真是卑鄙至极。

在宴会上，兵部尚书徐，扯着嘶哑的声音叫道：

“我提议，为王先生光临今日的宴会，干杯！”

“慢！”于谦“嚯”地从椅子上站起来，跪到龙案前，厉声说道：“万岁在上，微臣久闻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不得参加殿廷上的宴会，不得穿文武百官的衣服，这是太祖的祖训。今日王振为何破例？这不是对太祖的不恭吗？请圣上明断。”

鼓乐声戛然停止了，宫女们停下了歌舞，慌慌忙忙地退到后边。大殿上一阵寂静。徐那嘶哑的声音又响了起来，他嘲笑道：

“太祖的祖训你听到过吗？”

“宫门口，有三尺铁牌为证！”于谦回答道。

大殿上顿时沸腾起来，文武百官议论纷纷：

“王振算什么?只不过是太监，今日竟敢如此耀武扬威，成何体统?”

“太祖立下的规矩，王振竟敢破坏，真是狗胆包天!”

“咱们堂堂明朝的大臣，同一个太监坐在一起，岂不有辱名声!”年轻的英宗不知如何是好，对左右太监一摆手。太监们喊道：

“今日皇上龙体不适，回宫!”

众大臣站起身来恭送英宗回宫后，三三两两地退出了大殿。大殿上只剩下两眼闪着凶光的王振。

正统二十年(1447年)春，于谦回京奏事，看见王振更加嚣张，竟然乘着帝王的辇，在京城横行霸道。于是奋笔疾书，给英宗写了一篇奏章，揭露了王振“专权独裁，蒙蔽皇上，任用小人，贬斥忠臣”的罪恶，并且“望皇上速黜王振，以除祸根……”

奏章呈上之后，偏偏落到王振手中。王振看后，勃然大怒。正赶上王振的走狗李锡求见。李锡一看王先生怒气冲天，立刻明白了原委。凑近王振低声下气问道：

“翁父，又是于谦这个龟孙子在难为您老人家……”

王振随手把奏章给李锡看了一遍。李锡向王振使了个眼色，命左右仆人退下。两人耳语了几句，然后响起了一阵奸笑声。

数日后，王振向皇帝呈上一本奏章。英宗翻开一看，是通政使李锡弹劾于谦的，内容大约是：“因长期外任，没有升官，心怀怨恨，不满皇上……”

昏庸的英宗看完奏章，怒形于色。王振一看，果然见效，于是乘机添油加醋道：

“于谦在外任职十几年，打击陷害忠良，皇上没有给他加封，便心怀不满，找借口诬蔑皇上。如此欺君，罪过大焉。若不严加处置，今后如何保住圣上神威？”

王振的谗言，如苍蝇一般在英宗的耳边“嗡嗡”地叫个不停，把头脑本来就不清醒的英宗说得更加糊涂了。英宗把龙案一拍，道：

“传旨，让锦衣卫把于谦抓起来，斩首！”

于谦被捕入狱的消息，不胫而走。牢狱里，于谦身穿罪衣，颈项上带着枷锁，满腔悲愤，满脸愁容。他早已想到这是王振一伙的诬陷。于谦望着窗外初升的太阳，沾满雨露的杏花和吐丝的垂柳，心想：也许马上就要引颈就刑了。死，并不可怕，只是死了之后，谁来惩治祸国殃民的奸臣狗党？……

于谦思绪万千，心乱如麻。

看守于谦的狱卒，走到于谦的窗下，看看四面无人，悄悄地说道：

“于大人，您老德高望重，忠义双全，杀了您，老百姓是不会答应的！昨天，请求赦免您的官吏和百姓已经有好几千人了。他们跪在宫阙门口不起。听说大部分是从晋、豫一带远路赶来的呢？”

狱卒说完，匆匆地离开了。

于谦脸上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顺着深陷的两颊一颗颗地滴了下来。

北京城里，人声鼎沸，许多人已经泣不成声了。

有的说道：“咱们联名写奏章保教于大人，若皇上不答应，咱们就跪在宫门口不起来，看他们怎么办？”

有的说道：“再不行，咱们就劫法场，杀王振，救出于大人！”

宫阙门口，跪求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龙书案上，要求赦放于大人的奏章堆积如山。二十岁的英宗，登基十余年来，第一次见到这种场

面，他不知如何应付是好。王振自觉失策，感到众怒难犯，于是和几个心腹策划了一个下台阶的办法。

宫廷外面有数千名要求赦免于谦的老百姓。一位太监走上台阶，手捧圣旨照本宣读道：

“朝廷逮捕于谦，纯系误会。有位御史的名字也叫于谦，专横跋扈，不得民意，朝廷本想治他的罪，不料却错逮了于谦。现在立即无罪释放，调回京师任大理寺少卿。”

圣旨宣读完毕，太监们劝告守候多日的百姓们，道：

“赶快回家种田去吧，莫误了农时。”

这样，聚集多日的老百姓才纷纷散去。

数月后，皇宫门前又来了一万多人，跪伏在宫门前，请求皇上还派于谦回山西、河南任巡抚。

人们议论：“大理寺少卿是管什么的？”

“于大人调回京师是升了还是降了？”

一位六十开外的官吏解释道：

“大理寺少卿是负责审查案件的，是正四品官职。”

“巡抚是几品官职？”

“是食二品俸禄。”

“二品官，改为四品官，这不明明是贬了两级吗？”

“不行，不行，只要不是升官，就不能让于大人离开咱们山西、河南。”

众人七嘴八舌在议论。还有一个人悄悄说道：

“听说山西的晋王，河南的周王也来了，质问皇上，为什么将于大人贬官？要求于大人仍回晋、豫任职。”

在王侯百官的要求下，在群众的压力下，于谦终于官复原职。

于谦入狱三个月，险些被杀头。出狱后，仍然清廉正直。于谦每次进京奏事，总是不带任何送人的礼物。有人对于谦说道：

“你虽然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该带一些地方著名土产，如合(即线香)干菌(即蘑菇)裹头(即手帕)等物，便中送点人情。”于谦笑着举起两袖说道：

“我只能带有清风！”

因此，作绝句一首以见志：

“手帕蘑菇及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

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

此诗远近传诵，为一时佳话。

正统十四年(1449年)二月，英宗召见新兵部尚书邝野。

邝野，五十开外年纪，宽阔的肩膀，笔挺的腰板，眼角已出现几条鱼尾纹。看得出，自从他任兵部尚书以来，北部瓦刺族的不断侵扰，朝廷内的明争暗斗，使他消瘦了，衰老了。邝野是个深明大义、胸有韬略的将领。他一心忠于皇室，朝廷内王振一伙奸党呈凶，他看得很清楚。但是，他是在乱臣当政忠良被压的情况下接任的，他怕重蹈于谦等人的覆辙，因此，一贯说话小心，做事谨慎。

听说皇帝召见，他想，一定是为了北方边境事宜。他真想把北方瓦刺多次进犯挑衅和北方边境防守空虚的实情一一禀报。他更想把王振狼狽为奸霸占军田、动摇军心，以及他们勾结瓦刺首领也先，私造大量铜铁箭镞运往瓦刺，以换得蒙古种好马的营私舞弊等行为，向皇上陈述明白。这位老臣多么想趁英宗单独召见的机会，把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呀！

邝野走进大殿，看见了皇上旁边坐着王振，心里顿时凉了半截。

稍停一会，英宗问道：

“近期北虏的情况如何？”

邝野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吐露实情吧，怕得罪坐在一旁的王先生；不说实情吧，更怕欺蒙皇上！

“启禀万岁，近几年来，瓦剌势盛，其首领也先，狼心不死，屡屡侵我边疆，扰我军民，挑衅滋事……”皇上打断邝野的话，大怒道：

“小小瓦剌，竟敢如此猖獗！”

邝野鼓了鼓劲，很想说出王振一伙勾结也先贪赃枉法，纵虎为患的行为。但当他一抬头，看到王振那对闪着凶光的眼睛时，他的勇气又没了。转了话题道：

“微臣身为兵部尚书，不能征讨逆虏，实在是罪该万死，近期以来，也先经常派使臣数千人前来京师，名为进贡，实为敲诈钱财，刺探军情，也先存心不善！”略停了一下，又道：“据说，这些瓦剌贡使，在京师购买大量刀枪火药，铜铁箭镞，偷运出塞。”

邝野说完，头也不抬，怕再碰到王振那逼人的目光。

正在这时，一位太监走进来，跪在案前，道：

“启禀皇上，也先又派贡使来京了。”

英宗问道：“来了多少人？进贡何物？”

太监答道：“进贡一批蒙古种马。明明来了两千人，却号称三千人，硬要领三千人的赏品。请圣上明断。”

英宗没有回答。

王振在细心观察英宗的脸色，两眼发红，手在不断地发抖——这是皇上发怒了。他马上假装大发雷霆道：

“小小瓦剌流贼，竟敢如此欺我大明，传旨，这次进贡的马匹价格，削去五分之四，虚假的名额一律不赏。”

邝野心中暗暗吃了一惊。王振一贯和也先串通一气，贪赃枉法，引狼入室。今日为何又一反常态，挑起事端，这不明明是要惹怒也先，给他侵扰边境寻找借口吗？”

五个月后，英宗紧急召集文武百官上朝议事。

原来是也先率领瓦剌军入侵边境，不少城镇被占领。成千上万的男女被瓦剌军掠去，告急文书一天十余次传入京城。大同参将吴浩仓惶出战，在猫儿庄兵败身死。驸马都尉井源率领的四万骑兵，也全军覆没。

这一年，英宗刚二十二岁，显得年轻幼稚。心情激愤道：

“贼首也先，欺我大明帝国，妄说我使臣曾答应将本朝公主嫁于也先之子，胡言今春贡马乃聘婚彩礼。本朝不承认有此事，贼首反咬一口，诬蔑本朝失信，借机偷袭我边境。现贼兵已占大同，正向宣府、甘肃一带进犯。边境告急，流贼猖獗，群臣应协力保卫社稷，以解朕之忧。”

群臣听了英宗的讲话，没人敢发表意见，因为王振在场，不知他的态度如何？

王振见大家都在观望，他干咳了两声道：

“太祖、成祖都是身经百战，今日陛下春秋鼎盛，血气方刚，何不效法祖宗，御驾亲征呢？”

停了一下他见没人支持他的意见，又道：

“臣以为小小蛮贼，必然惧怕天威，只要陛下率军一到，贼兵即刻化为齑粉。”

英宗一听，大喜，道：

“甚好！甚好！王先生言之有理！”

文武百官听了面面相觑，觉得王振的主张实在不妥，但又不敢违抗英宗的旨意。众人都在等待兵部尚书的意见。邝野大胆地说道：

“瓦剌贼军，乃虎狼之师。微臣以为六师不可轻动。尤其是皇上安危，事关朝廷大局，更要深思熟虑。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实在不宜御驾亲征。”听了兵部尚书的话，众人频频点头，表示赞同。

王振大声疾呼道：

“邝大人所言有所不宜？历代先祖，皆亲征御敌，不独当今皇上如此。今日有人阻驾亲征，岂不是纵敌养虎，坐失良机吗？”

王振为什么主张英宗亲征呢？不少大臣都知道：王振的家乡在蔚州，离大同较近，随皇上亲征，可以回老家炫耀一下。倘若凯旋而归，挟天子御外敌的英名大振，乃是两全其美。群臣虽然早已看透王振的企图，但都敢怒而不敢言。有些大臣，很想上前劝阻，英宗把手一甩，正言道：

“朕意已定，有关部司做好出兵前的准备工作！”

接着，英宗降旨，命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鼎、七十五岁的英国公张辅等一百多名大臣随从“护驾”。亲征期间，朝政由英宗之弟王朱祁钰代理。调于谦回京任兵部左侍郎，主持兵部事务，保卫京师。

这时，于谦因母亲去世，正在家守丧还不足一年。他接到圣旨，立即收拾行李，星夜赶回北京。

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十六日，英宗亲率五十万大军，前往御敌。出征前夕，于谦和吏部尚书王直等冒死在午门外跪伏，恳请皇上留下，英宗不听劝阻，固执己见，一意孤行。

一路上，英宗照例每天吃山珍海味，观看美女，歌舞弹唱。王振下令，沿途县府官员都要进贡名贵特产，名为孝敬皇帝，实则都进了

王振的私囊。兵卒们由于出兵匆忙未带粮食饥饿难忍，一路骚扰百姓，杀鸡、抢粮，老百姓难以忍受，纷纷外逃。出兵数日，阴雨连绵，军中疾病蔓延。队伍尚未到大同，士兵病死过半。军心不稳，松松垮垮如一盘散沙。兵部尚书邝野、户部尚书王佐等人，再次恳请皇帝：“暂时回师，从长计议。”

王振在一旁，大怒道：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尚没见一个贼兵，就想逃跑吗？”

邝野耐心解释道：

“不是逃跑，用兵之法，如流水，避实击虚，进退自如。不应不顾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贸然前进。”

“混蛋！”王振骂道：“你只是个迂腐的读书人，只会纸上谈兵，懂得什么是军事？再有敢阻挠进兵者，以军法论处！”

说完，下令处罚邝野、王佐等人跪在荆棘中。众臣见此情景，无人敢顶撞王振，王振更加狂妄跋扈了。

傍晚，浓云罩住了整个天空。电闪雷鸣，震撼大地，暴风雨即将来临。

王振在左右晃动的营帐中暗暗思考：

“天气如此恶劣，莫非此次出兵不合天意？”

忽然探子来报，大同总督军宗瑛、总兵朱冕在山西阳和战败身死，全军覆没，左参将石亨只身逃回大同。大同镇守郭敬藏在草丛中才保住了性命。宣府方面奏报：马营堡被围，明军坚守三日，难以出击，水源被断绝，形势十分危急。这些坏消息使王振也惊慌起来。

有人劝王振道：

“贼兵狡诈多变，神鬼莫测，又善于骑射，看来不易取胜。假使一旦兵败，便留为邝野、王佐等人的话柄。因此，三十六计，走为上，不如就此班师吧！”

王振一看大势不妙，接受建议，八月三日，下令退兵。

当时，曹鼎向王振转达大同总兵郭登的建议，请皇上“急入紫荆关，方能平安无事。”但王振非要请英宗亲临他家乡，以夸耀乡里。他竟指挥明军朝蔚州前进。大军刚刚走了四十里，王振忽然想起，这么多军队，踩坏我家地里的庄稼怎么办？于是，又下令军队折而向东，循原路向宣府方面退却。大军到了宣府，也先已率军追赶上来。明军一面派吴克忠、吴克勤俩兄弟率兵拒敌，一面向怀来县奔逃。

吴氏兄弟与瓦剌军交战，兄弟俩皆战死，明军大败。又派朱勇、薛役领兵四万增援。明军又败，薛役战死殉国。

八月十三日，英宗退到土木堡，离怀来卫（今河北怀来县）只有三十五里了。土木堡周围百余里，高山耸立，目标突出，易攻难守。众臣提议天黑之前赶到县城，邝野几次向英宗奏道：

“速派精兵断后，快马入城！”

英宗早吓得丧魂落魄，一切皆依赖王先生。王振所挂念的是队伍后面的一千多辎重车辆，车上载着他此次出征所获得的金银珠宝和地方土特产，怎肯轻易丢掉？听了邝野的劝谏，怒骂道：

“你知道什么？再敢胡言就斩首！”

“斩首也要说！”邝野忍无可忍，据理驳斥道：

“我身为朝廷尚书，以社稷为重，为圣上安危着想，在此驻军十分危险。我从不怕死，何必以此相威胁！”

王振见邝野敢于顶嘴，立刻暴跳如雷，喝令武士把邝野推出门去。

英宗没有听从众臣的意见，执意在土木堡宿营。天刚蒙蒙亮也先率兵追到。明军被其团团包围，处境十分危险。

英宗正在惊恐绝望之时，也先派使者送来亲笔信，表示愿意与明军讲和。王振等人不知是计，以为绝处逢生。英宗也喜出望外，立即命曹鼎写好敕书，并派两名使者前去讲和。使者前脚刚走，王振立刻下令让军队拔营去村里取粮食和水。

明军刚刚拔营南行，突然，杀声四起，万马咆哮，也先率兵冲杀过来，毫无准备的明军一下子溃不成军，也先的军队一边杀，一边喊：

“解甲投刀者不杀！”

饥渴难当的明军，纷纷脱下甲衣，丢掉武器，举手投降。有的争相逃命。瞬息之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邝野、王佐、曹鼎等大臣领兵抵抗，皆被乱箭射死。英宗眼看全军覆没，干脆下马盘膝而坐，束手被擒。

就这样，英宗率领的五十万大军，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被也先的两万军队所打败，连堂堂的大明朝皇帝也当了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丧师辱国的战役——“土木之变”。

当英宗被俘时，护卫将军樊忠眼看五十万大军葬于王振之手，年轻的皇帝被其挟持当了俘虏，气忿难忍，举起手中的长柄铁锤，对准王振的脑袋，用尽平生的力气，一锤砸下去，砸得王振的脑浆四溅。

樊忠仰天大笑道：

“我为天下除了一大害！”

说完，他提起铁锤，跨上战马，跃入敌群，左冲右突，连续击杀也先军数十人，最后壮烈捐躯。

自从英宗御驾亲征之后，代理监国的王朱祁钰，每天都在焦灼地等待皇上的消息；留守的群臣，每天早晨聚集在这里打听北方的战报。十多天过去了，杳无信息。王的心里更加忐忑不安。于谦早已料到，此次出征凶多吉少。因此，大军走后，他立即着手整顿军队，准备增援。

八月十八日晨，百官早朝完毕。正陆续走出皇宫，忽见二人踉跄直奔皇宫。群臣一看，正是随驾出征的侍臣肖维侦和杨善。百官大惊。忙迎入宫内，觐见王。

王道：“二位大臣从何处而来？皇上龙体如何？”

肖维侦和杨善不回答问题只是啼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王又道：“你们既随驾亲征，为何不顾皇上安危，私自逃回京师？”

过了好半天，二人才说道：

“御、御驾被贼兵俘虏了！”说完，又放声痛哭起来。

“御驾被陷”，犹如晴天霹雳，震动每个人的心弦，震得百官魂飞魄散，不知所措，只好抱头痛哭起来。孙太后和钱皇后听见这个消息，哭得死去活来。大臣们也哭得眼前发黑，站立不稳。

于谦和众大臣一样，十分悲痛。在痛哭中，他突然想到：事已至此，哭有什么用？便大喊道：

“众大人切勿悲痛，还是献计献策，救国救君吧！”

王道：“说得对，如今大敌当前，有计策请奏明。”

群臣停止了哭泣，偶尔还有大臣的抽泣、叹息声。正在群臣悲痛之际，走出一个人来。此人身材矮小，长着一对老鼠眼，短胡须，走到王桌案前，“扑咚”一声跪下，扯着尖细的嗓音，阴阳怪气说道：

“微臣夜观天象，荧惑星曾入南斗，明朝气数已尽，势难挽回。”他又泪流满面，转着贼溜溜的老鼠眼，道：“微臣从历数上推算，朝廷只有赶快南迁，才能避免这场亡国之祸。”

群臣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一贯散布悲观论调的翰林院侍讲徐有贞。他在英宗亲征前，就预备逃走，已经把妻子家属送归故乡苏州去了。他公开主张逃跑，一时间，群臣惶惑。七十八岁的礼部尚书胡，抖动着银白色的胡须道：

“永乐帝在北京建立陵墓，是不想让子孙南迁的。”

听了胡的话，满朝文武百官不知如何是好。

于谦是以兵部左侍郎的身分参加会议的，对动摇人心的言论，他感到身负重任，必须予以还击，于是，厉声道：

“倡议南迁者，当斩首，京师是朝廷的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谁不知宋朝南渡的祸患，请立刻调动四方勤王兵，誓死守卫京师。”

于谦的提议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武将王、商辂等人的支持。皇太后命太监金英把徐有贞叱出，和王等人商议，采纳了守城的建议。当即晋升于谦为兵部尚书。心中无主的王和皇太后把守卫京师的责任全部交给了于谦。

御前会议结束后，孙太后在便殿传见于谦。她眼睛哭得像核桃一般，哭泣着问道：

“寡人和钱皇后搜集了一大批金银玉器，想派使臣送往也先军营赎回皇上，你看如何？”

于谦答道：“回皇太后话，微臣本应誓死迎回皇上，无奈不知皇上下落，以臣之见，也先乃狼子野心，送给他金银财宝，只能让他以为本朝软弱好欺，并不能解救当今皇上。”他还向太后建议：“国家

不可一日无君，无奈皇上之子见深刚满周岁，难以管理国事。请皇太后下令，让王代理国家君主，立见深为皇太子，朝廷才不至于动摇。”

皇太后并没有听从于谦的劝阻，秘密地从皇宫里搜集了大量金银珠宝，用八匹马驮运，派太监仓促运向居庸关外，去寻找瓦剌也先的中军营，企图把英宗赎回来。其愿望，当然完全落空了。

英宗在八月十五日被俘后，瓦剌军把他送到雷家站(今宣化县东南)也先的中军营帐里。经多方审察验证，确定为明朝皇帝后，也先哈哈大笑道：

“我经常祷告上帝，祈求恢复大元帝国的一统天下。今天果然有如此大的胜利，俘获了明朝的皇帝，大家看，该如何处置？”

将领们有的主张立刻杀死，以泄大恨，有的主张留着，奇货可居，以便向明朝要挟。经过一番争论，没有结果。暂时将英宗移到也先弟伯颜贴木儿营里去看管，只许被俘的锦衣卫校尉袁彬和英宗在一起，另外，还有日前明朝派来的使臣梁贵，现在尚在瓦剌军营里。英宗乘机让袁彬写信，将派梁贵送往怀来卫，说明被拘留的情况。这样，朝廷才知道了英宗被俘后的准确消息。

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王命调各地勤王军队火急来京，提任守卫。当时，通州官仓存粮数百万石，恐被敌军夺去。有人建议焚毁，应天巡抚周忱建议，可令驻京臣僚军队各自运进城内。于谦立刻奏请王，京城文武百官，可预支本年九月至明年五月的俸粮，军士各预支半年饷，各自到通州仓领取。更征用顺天府大车五百辆起运通州官粮进京，同时号召百姓有车之家，能运粮二十石纳京仓者，官府给脚银一两，特派都御史陈镒总管运粮事。于谦还请命赏给新选余丁官军和旧操舍人及应募新兵每人银一两、布两匹，守城匠人、守门军火夫和皇城内外官军每人布两匹。于谦如此布置守城，暂时安定了人心。

八月二十一日夜，秋风瑟瑟，蜡烛下，于谦披衣伏在案上。他时而紧锁双眉，苦苦思索，时而提笔疾书。自从他任兵部尚书以来，白发骤然增多了，嘴角边的皱纹更深了。“土木之变”大军惨败，皇帝被俘，也先军队又如狼似虎追击而来。现在保卫朝廷，保卫京师的责任多么重大呀！然而，朝廷赏罚不明，是非不辨，王振余党仍然耀武扬威。如不诛灭王振余党，正气难树，邪气难压。必须奏请朝廷，刷新朝政，揭露王振祸国殃民的罪恶，置诸国法，以雪民愤，激励士气。

八月二十三日，王登临泰和殿代理朝政时，都御史陈镒等奏道：

“王振倾危社稷，构陷皇驾，请诛灭王振九族，没收其财产，以安人心。”

王听了，尚没有明确的答复。群臣喧嚣震动殿堂。王振死党锦衣卫指挥马顺等用恶言骂道：

“你们如此逼迫殿下，想要造反不成？都老实点！”

群臣看见马顺粗暴的态度，想起马顺按王振旨意残害翰林院侍讲刘球的罪恶，多年来压在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迸发出来。给事中王第一个跳起来，指着马顺怒骂道：

“马顺贼子，以往你仗着王振的权势横行霸道，今日还敢如此放肆，真是狗胆包天！”

说着，他一把抓住马顺的头发，马顺也就势抓住王的头发，二人扭打成一团，王一口咬下马顺肩膀上的一块肉。大殿上顿时乱了起来，正邪两派官员在大殿上开始了一场撕打。马顺当场被打死。群臣在激愤之下，又拖出了王振的两个心腹太监毛贵、王长随二人，当场也被群臣打死。

马顺等三人的尸体陈列在东安门外示众，军民上前击打尸体以泄愤恨。

过了片刻，又把王振侄儿王山捉来，反手捆绑跪伏殿前，众人争向前唾骂，一时间，朝廷大乱，内外喧动。

二十二岁的王，坐在龙书案后面，吓得面如土色，打算起身回避。

于谦想：如果王不明确表示伸张正义，那么正气难树，邪气难压，抗击瓦剌就难以取胜。于是他排开众人，挤到龙案前，恳切地说道：

“殿下且住，王振罪大恶极，请殿下下令，铲除王振余党。否则民愤难平，士气难鼓！”

于谦见王仍是犹豫不决，就再三恳求。王终于被于谦等人的赤诚之心所感到，点头应允了。

嘈杂的宫廷平静了下来。

王宣布道：“王振罪应灭族，立即派都御史陈镒抄没他的家产。马顺等人依附王振，作恶多端，打死勿论！”

群臣叩头谢恩。这场轩然大波终于平息了下去。

这一场撕打，十分激烈，于谦的袖袍也被扯破了。但于谦处理得当，得到群臣的拥护。当他缓步退出左掖门时，吏部尚书王直握着于谦的手，恳切地赞叹道：

“今天即使有一百个王直，有什么用？”

王直自愧不如于谦，对于谦力排众议，支撑危局，表示很大的敬服。

王下令将王山凌迟处死。又令将王振家族无论老少一律斩首，抄没其家产。王振在京城内外共有私宅数处，穷极华丽，抄出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余面，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马数万匹，其他币帛珠宝等物不计其数。不久，王振死党郭敬、鼓德清从大同逃回，亦被抄家监禁。于是邪派阉党的凶焰，暂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镇压。

在于谦的倡议下，在群臣的拥戴下，九月初六，王朱祁钰登基继承了皇帝位，这就是景帝。遥尊身陷敌营的英宗为太上皇。至此，明朝又有了君主，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朝廷的混乱局面，使“土木之变”以后一个多月以来动荡的民心逐步安定下来。

深秋时节，北国的清晨，寒意甚浓，瑟瑟秋风吹来，枯黄的树叶纷纷下落，惟有在寒风抖动的艳丽的枫叶，把凉意甚浓的深秋点缀得生机勃勃。

在高高的山上，于谦身穿一身将军的战袍，腰间带一柄长剑，迎风而立。他近看眼前，一片火一样的枫林，远望京师的山山水水，不由得想起吴山的丛丛翠竹和西湖荡漾的碧波，想起童年时代的游戏，想起十七岁作的《石灰吟》一诗中所寄托的壮志。现在面对瓦刺的入侵，为了国家安危，该是“粉身碎骨全不怕”的时候了。想到这里，他的情绪有些激动。

于谦自任兵部尚书以来，深深感到保卫京师、保卫社稷的责任重大。也先率军长驱直入，京师已是危在旦夕。但是“土木之变”以后，剩下的队伍不足十万，如何能抵挡如此强悍的瓦刺军队？

他经常彻夜不眠，运筹帷幄，策划调度。他上疏景帝把大江南北的军队，都调来守卫京师。他还广泛发动百姓参战，命兵部四处张贴布告：

“军民人等，如能生擒或取敌首级一个，军校升一级，百姓给以副巡检官职，赏银五两；擒敌三名或取首级三个者，军校升二级，百姓给以副兵马官职，赏银十两；如能偷营劫寨，进攻敌人，夺得大旗，则给以更大的升赏……”

由于于谦采取了一条列激励措施，军民斗志高昂，纷纷参战，京师军队猛增到二十二万。这二十多万军队如何安排为好呢？

今日他登山，一则为舒展一下彻夜未眠的疲倦身体；二则为视察一下京城的地势。透过早晨的阳光，望着北京纵横交错的街道和熙熙攘攘的人流，考虑着迎敌的策略。他突然看到北京的城墙和高大的地安门。想到敌人攻打北京城，必然首先要攻打城门。北京新城共有九个城门，明军守住九个城门，就可以安然无恙。对，把军队分成九路，以逸待劳，等待远途而来的瓦刺军队，出奇制胜。

于谦得到边境发来的报告，说十月九日，也先已率兵出发，从紫荆关和白羊口分两路直扑北京，预计十一日左右可到达北京城外。

于谦在兵部尚书府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各路将领到齐后，于谦道：

“瓦刺军队就要攻打北京城了，诸位看如何迎击为妥？”

众将军议论纷纷，各抒己见。

总兵石亨道：“瓦刺骑兵凶猛，势不可挡。应避其锋芒，退守城内，伺机破敌。”

众将军有的点头称是，有的摇头，显出怀疑的神情。

于谦道：“不能在敌人面前示弱，退守城内不是办法，会使也先更加轻视我们，助长了敌人的气焰。我们要在城外迎击敌人，挫败敌人的锐气。诸位以为如何？”

众将军一致拥护兵部尚书的决策。

于谦命兵部侍郎吴宁留守城内。自己身披盔甲，骑着战马，在城外指挥，督战九门。于谦每到一地，便慷慨陈词地向将士们说道：

“京师，乃朝廷的根本。身为大明臣民，理应誓死保卫京师，保卫朝廷，定要打败俘虏英宗的瓦刺军，活捉也先，要洗刷“土木之变”的奇耻大辱，要为皇上报仇雪恨！”

于谦那洪亮的声音，震撼着每个人的心弦。军民振奋，群情激昂。

于谦还下令：“士兵，如有贪生怕死不出城者，一律处斩；战场上，将领不指挥军队杀敌而向后退却者，斩其将领。”

十月十一日，接着预定时间，瓦刺军队果然来到北京西直门外。于谦一面命军队坚守西直门，一面派副总兵高礼、毛福寿率部绕到瓦刺军后面杀敌。战鼓一响，人人奋勇冲杀，杀死瓦刺军数百名，军威大振。当日晚，于谦又派薛斌率领勇士数百人偷袭敌营，打得那些正在酣睡的瓦刺军一片混乱，仓惶逃命。一连两个胜仗，大大鼓舞了明军的士气。

也先吃了败仗，改变策略。假意求和，表示愿意送还英宗。景帝信以为真，派两位官员出城迎接。也先狡辩说：此两人官位太小，不够谈判资格。须派于谦、石亨带重礼来才行。于谦立即看出这是也先的阴谋诡计，对景帝道：

“陛下决不可轻信，这是也先的阴谋诡计。只有彻底打败瓦刺，才是惟一的办法。”

也先见明军没有上当，两天之后，集中了一万多兵力攻打德胜门，企图孤注一掷。当时，天寒降雪，刮大风，忽而又雷电降雨。于谦先派石亨领兵埋伏在道旁民间空屋内，另派小队骑兵做先锋，攻打瓦刺军阵，接战后假装败退，也先立刻下令命精骑万余，呼啸追来，直逼明军。于谦待敌军接近城门，令神机营火炮火铳齐发，同时，石亨的伏兵骤起，前后夹攻。也先军大乱。明军副总兵范广骁勇绝伦，跃马当先，冲入敌阵。部下将士勇气倍增，个个奋勇杀敌。结果，瓦刺军大败于城下，死伤无计其数。也先弟平章孛罗卯那孩，号称铁颈元帅，在激战中被炮火击毙。

也先见德胜门攻不下，转攻西直门，都督孙镗率军迎战，两军展开了大搏斗，孙镗力杀敌军前锋数人，瓦剌军稍向北退，孙镗追击，瓦剌军增援部队赶来，孙镗率军拼力血战，杀得难解难分。明军高礼、毛福寿等率兵从南面来助战，战斗更加激烈。高礼身中流弹。孙镗兵死伤渐多，力感不支，被瓦剌军围攻，敌人渐渐逼近城门。城上守将程信急发箭炮助战。这时石亨领兵又从北面杀来，瓦剌军三面被围攻，难以支撑，遂向西南方向退去。这是北京保卫战，第一次大会战的胜利，给嚣张的也先部队以迎头痛击。

十四日，瓦剌军又攻打彰仪门土城。于谦亲临指挥。他先派毛福寿在京城外西南一带街巷要道埋伏下神机火铳队，又派武兴、王敬率军迎敌。瓦剌多为骑兵，最怕火枪、火铳。于谦就派神机营在前。弓刀队在后，以火枪、火铳为掩护，弓刀队上前奋勇杀敌，两队配合默契，打得敌军无力抵挡，眼看溃逃下去。

正在这时，景帝派来一个监军，他为争首功，贸然领数百名骑兵驰马抢先，结果把自己的阵式冲乱了。也先一看明军阵容动摇，心中大喜，遂下令反攻。明军措手不及，直退到土城附近。百姓看明军后退，便自动组织起来，爬上屋顶，藏在街巷里，只要看见敌军，立即高声呐喊，石头、砖块纷纷下落，打得瓦剌军抱头鼠窜。适逢王、毛福寿和高礼又率兵来援，瓦剌军难以抵挡，又仓皇退走了。这是北京保卫战的第二次大胜利。守城将士和京郊百姓欣喜若狂，士气愈加旺盛。

经过五天的激烈战斗，瓦剌军队死伤严重，士气低落，加上处处遇到北京城内外百姓的袭击，处境十分狼狈。骄横的也先本来以为攻战北京轻而易举，没想到，这次遇到的兵部尚书于谦亲自指挥下的明朝军队，纪律严明，阵容整齐，士气高涨，与三个月前，王振率领的

松散的明军截然不同。也先眼看士兵伤亡惨重，又听说各地明朝援军即将到京，不敢恋战，于十五日夜间，拔营逃跑。也先此举，也没逃出于谦所料。于谦立即命令石亨等领兵追击。命城楼的花炮手对准敌营猛轰，瓦剌兵又死伤上万人，残军仓皇退却而去。

于谦在京师保卫战取得胜利后，于二十二日，派遣孙镗、范广等率兵二万，追剿瓦剌军残部。二十四日孙、范大军追击打败敌军于固安。宣府守将杨洪率兵二万，击败瓦剌军于霸州，擒获敌军将官阿归等四十八人，夺回所掠人口、牲畜，数以万计。到十一月八日，瓦剌军残余退出塞外，京师宣布解危。

冬季来临。朔风怒号，大雪纷飞，大地变成了一片银白的世界。

帐篷里，炭火熊熊，也先像一个撒了气的皮球，颓丧地坐在椅子上。兵力损失严重，连亲生弟弟的命也搭上了，真是天不遂心愿呀！也先一想起北京的战斗就会全身发抖，若不是战马跑得快，说不定难以回到塞北了。还有那明朝又冒出个于谦，调兵如神，真是令人可怕。他想着想着，突然瞪大眼睛：“呼”地从椅子上跳起来，喊道：

“把明朝龟孙皇帝推出去杀了！”

“慢！”也先的另一个弟弟伯颜贴木儿说道：“北京之败，孛罗弟丧生，令人痛心。但这次出战，实在是不合天意。大明王本欲与我和善通好，经常将大批茶叶、绸缎、珍宝交换咱们的牛、羊、马匹。再说明朝手工业发达，若双方修好，对我有益无害。若杀掉明帝，则造成千古遗恨。望哥哥三思而行！”

众将领因连连用兵，长途跋涉，疲惫不堪，厌战情绪油然而生，都一致赞同伯颜的意见。

也先道：“本来以为挟持明帝，以要挟明朝，现在明朝有了新的皇帝，还留他有何用？”

伯颜又道：“哥哥有所不知，明朝人是最讲忠君的，在他们的心里，君与国一样重要。虽然有了新皇帝，但朱祁镇毕竟是他们的“皇上”，若杀了他，明朝百姓会与我们结下深仇大恨，不如派使臣前往讲和，表示愿意送还明帝，也好借机下台阶。”

也先终于被说服了，他命人写好敕书，派使者送往北京。

于谦督战九门，击退了瓦剌军第一次大规模的侵略，粉碎了也先阴谋夺取北京的计划，从军事上把明朝的危急形势挽救和稳定下来。朝廷论功行赏，晋升于谦为少保。总督军务，仍掌兵部尚书事。于谦辞让道：

“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

这是他发愤图强热爱祖国的心声。他开始整顿军队的编制、布防，操练和调动兵力和部署营垒。着重加强保卫京城的力量。抽调辽东、宣府的部分兵马来京，把镇守宣府多年的名将杨洪、镇守居庸关有功的罗通，都调到北京，命他们管理京营部队的操练。同时，调大同总兵郭登率部队到北京增援。从而使北京的防务力量得到加强。接着，于谦又奏请景帝，派遣佾都御史肖等镇守保定、河间、真定各府，又派刑部侍郎耿九畴去南直隶整顿江南北各卫所军政，并安置各处流民七万余户，在凤阳等地，从事屯耕。又派顾兴祖、刘安、刘聚等率兵修筑北边关塞要隘。又推荐左都督朱谦去镇守宣府、佾都御史王镇守居庸关。

经过于谦的部署，朝廷的防务日臻牢固之时，景帝收到了也先发来的请派使臣迎驾的信函。景帝召集群臣在礼部商议此事，许多大臣建议迎回英宗。

吏部尚书王直道：

“上皇蒙尘在外一年有余，实为国耻。现在也先有意送还，我们须赶快派人迎驾，以免将来后悔。”

景帝有些不痛快，道：

“也先诡诈难测，不可轻信。”

王直答道：“也先诡计多端，这是事实。但眼下也先屡败，伤亡惨重，军士厌战，人人怨恨。也先前来求和。臣以为，他是有一定诚意的。”

景帝勃然大怒，道：

“当初，朕并不想当皇帝，是你们强行拥戴的；今日，你们又要与瓦刺议和，迎回上皇，出尔反尔，是何用意？”

群臣一听，都睁大了眼睛，不敢言语了。

于谦看出了景帝的心思：他是怕英宗回朝之后，自己的皇位难保。于谦略微考虑了一下，从容地说道：

“万岁在上，天位已定，谁还敢有其他议论？瓦刺在屡败之后，提出讲和愿送还上皇。陛下与上皇是同胞兄弟，理应立即派人去接。若也先欺诈，咱们就乘胜出兵，彻底把他打败。再者，我大明朝一向与瓦刺通好，瓦刺入侵，击退他们，是为煞煞他们的气焰，战的目的还是为了和。只有恢复通好，才能减少边患，确保边境安全。”

一席话说得句句在理，景帝只得说道：

“卿说得有理，照卿的意见办。”

遂决定升礼部给事中李实为礼部右侍郎，率大理寺少卿罗绮及随员等人，于景泰元年七月初一，出使瓦刺部落。李实等一行于七月十一日到达也先军营，了解到也先迫切希望与明朝讲和。也先又派人伴随李实等穿过三十里草原，去见英宗朱祁镇。看到英宗的住处是“围

帐布帟，席地而寝”，帐外有牛车一辆，马一匹，是“移营”时使用的交通工具。英宗见了李实等人问道：

“朕在此一年了，为何朝廷不派人迎接朕回国？”

李实答道：“自从陛下失陷瓦剌，朝廷曾三次派人迎接，都得不到确实消息。最近见到陛下的亲笔书信，才派臣来探问。”

其实，李实等奉景帝命出使，“敕书”上只说“答礼”，并没有说到迎接太上皇。李实的使命就是实地探查一下也先求和的态度和朱祁镇的情况。

也先迫切希望讲和，备酒热情招待李实等人，并说道：

“大明皇帝敕书内只说讲和，不曾说来迎驾，太上皇帝留在这里又做不得我每(们)的皇帝，是一个闲人。我还你每(们)，千载之后，只图一个好名儿。你每(们)回去奏知，务差老人三五人来接，我便差人送去。”

从也先的表示中，可以看出，也先战败后，在朝廷加强边防坚决抗战的措施下，挟持英宗，失掉通贡和互市的好处，处境非常狼狈。这就是他诚意求和的原因。李实等于十四日起程回京。回来后把北使情形禀报朝廷。

于谦和诸大臣认为，也先欲送回英宗希望议和有诚意，主张再派使臣去迎接太上皇。于谦道：

“也先屡败，他的求和是可信的。陛下和太上皇是兄弟至亲，若不遣使迎接，则直在彼，曲在我。不迎回太上皇，边疆终不得安宁，干戈终不得罢休。迎接太上皇回来，战事停止，百姓可以得到安宁。”

景帝见诸大臣异口同辞主张迎接太上皇，只得勉强答应。于是派右都御史杨善、工部侍郎赵荣率随行人员于二十七日出使瓦剌。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初二，也先等给英宗饯行，并派头目七十人护送，

随同杨善等从野狐岭(宣府西北)入塞，朝廷派侍读商辂率一轿二马迎于居庸关。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十五日，北京城内安定门外，停着各种不同颜色车轿，文武百官在此恭候英宗返回北京。景帝乘御辇来到东安门外等候。不久，远远望见一行马队由远而近，来到东安门。一个瓦剌军的头目下马禀报道：

“启禀大明皇帝，奉可汗与太师之命送还大明太上皇。”

正说着，英宗的轿子已到，景帝连忙下辇迎接，二人抱头痛哭一场。景帝虚情假意地表示让位，英宗也故意谦让一番。最后，景帝派太监护送英宗到早已备好的南宫内，将英宗软禁起来。

英宗回京以后，于谦向朝廷提出“上皇虽还，国耻未雪”的警告。他向景帝上疏，条陈各项安边的策略，致力于国防的充实，一方面加强各处的防务，增加守军人数，按时修缮城堡；另一方面对将军贪污怠职等弊端，严加纠察，整肃军纪。同时，还对马政、阵法、战车、军器、军功制度、火器等做了改进。

最重要的是，着手改革京营军制，创立了团营。原来朝廷卫队，分别隶属于王军、三千、神机三大营。王军营是洪武时编定的军制，有步队、马队，专教阵法；三千营是永乐时编定的，都是骑兵，专管保卫皇帝外出；神机营是永乐时对交趾国作战的部队，使用火器，主要是步兵，附带马队。上述各营各有总兵官，号令不统一。“土木之变”京军伤亡惨重，营制更加紊乱。

于谦于景泰二年(1451年)，开始改革京营军制，筹建团营。将十五万精锐京军，分编十营。每一团营有一万五千人。置都督一人，统帅本营。朝廷命石亨任总兵官，受兵部尚书于谦节制。又派太监曹吉祥、刘永城作监军。

于谦整军练武，加强了边防，其工作精神，集中表现在他的两篇诗是：

出塞

健儿马上吹胡笳，旌旗五色如云霞。
紫髯将军挂金印，意气平吞瓦剌家。
瓦剌穷胡真犬豕，敢向边疆挠赤子。
狼贪鼠窃去复来，不能偷生求速死。
将军出塞整戎行，十万戈矛映雪霜。
左将馋看收部落，前军又报缚戎王。
羽书捷奏上神州，喜动天颜宠数优。
不愿千金万户侯，凯歌但愿早回头。

入塞

将军归来气如虎，十万貔貅争鼓舞。
凯歌驰入玉门关，邑屋参差认乡土。
弟兄亲戚远相迎，拥道拦街不得行。
喜极成悲还堕泪，共言此会是更生。
将军令严不得住，羽书催入京城去。
朝廷受赏却还家，父子夫妻保相聚。
人生从军可奈何，岁岁防边辛苦多。
不须更奏胡笳曲，请君听我入塞歌。

景泰初年，明朝的军队和国防在兵部尚书于谦的积极整顿下，呈现出新的气象。特别是由于新军的建立，军队素质的改变，以及军事的周密部署，明朝国防逐渐趋于巩固。

瓦剌部落头目也先，对明朝的侵略，遭到坚强的抗击，大败而归，威信降低。瓦剌内部开始产生矛盾，互相争斗。景泰五年(1454年)，也先被部民刺死。瓦剌各部矛盾重重，纷争不已，势力日渐衰落。

正当于谦积极加强边防，改革京营军制的时候，宫廷内进行着一场争夺皇权的斗争，首先是更换太子，最后爆发了夺门之变。

盛夏的一天，景帝闲坐于宫中。天像下火一样炎热，树上的知了叫个不停。景帝烦躁不安，太监金瑛、兴安在一旁侍立。景帝回头问金瑛道：

“东宫的诞辰快到了吗？”

金瑛回答道：“尚没到。”

景帝又问：“七月初二不是太子的生日吗？”

金瑛又答道：“太子的诞辰是十一月初二。”景帝有意说错，是想试探一下金瑛的口气。

站在一旁的太监兴安看透了景帝的心思。于是凑到景帝耳边，低声道：

“圣上，何不把太子的生日换一换？”

金瑛不明话中的意思，景帝却含笑不语。

从此以后，景帝对诸位大臣都格外优待，对高谷、陈循、王一宁、黄滋、江渊、商辂等重要大臣都无故地加封赏银，以便取得他们的默许。景帝是多么希望朝廷内有人出来上疏请求更换太子呵！但群臣认为这是破坏祖宗之法，都犹豫不决。

正巧，广西浔州有个黄，整日羡慕弟弟黄任广西思明州土知府的官位。后来黄年迈，打算让儿子黄钧继位。黄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抢得这个官位，便让儿子杀死了黄父子及其全家。事泄后，黄父子被逮捕入狱。

心狠手毒而又阴谋多端的黄，料定自己必死无疑，于是急中生智，想出一个解脱罪行的计策，就是劝皇帝更换太子。

他在狱中买通狱卒，要来纸笔，写好奏章，委托好友袁洪身带万金到京城。袁洪千方百计贿赂太监，这篇奏章果然传到景帝手中。景帝一看，内容是劝他“及早更换太子，以固根本。”

那奏章上的话，字字都说到景帝的心坎上。他欣喜若狂，道：

“没想到万里之外，竟有如此忠臣！”

景帝立即写好特赦黄父子的圣旨，派人秘密送往广西。同时把黄的奏折转给礼部，召集文武大臣议论更换太子一事。

文武百官到齐了，礼部宣读了黄的奏章。景帝道：

“诸位都是朝廷的栋梁，黄所言，卿等以为如何？”

文武百官觉得不合礼仪，但又怕违抗景帝的旨意，个个面露难色。

太监兴安怒气冲冲道：

“现换太子一事，圣上决心已定，众大人签个名就行，何必这样躲躲闪闪。”

说着，拿来笔墨纸砚，逼着大臣们一一签名，表示赞同。

于谦看透了景帝的心意，想：“此事我虽无力制止，但绝不能与他们沆瀣一气。”他再三申述自己的意见，并拒绝接受景帝更换太子之后对大臣们的赏赐。于谦觉得：宫廷内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了，谁还来关心朝廷的存亡和百姓疾苦呵！悲愤之余，他捶胸顿足地说道：

“我这满腔居国忧民的热血，往哪儿洒呀！”

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多日早朝不见景帝，众大臣不知何因？一打听方知景帝身患重病。文武百官不免忧心忡忡。重新立的太子见济已经在三年前病死，景帝若殡天，由谁继承皇位呢？于谦、王直、王文等大臣上疏要求恢复见深为太子，未见回音。

与此同时，徐有贞、石亨和太监曹吉祥一伙正在私下导演着一出复辟的丑剧。

正月十二日，景帝拖着虚弱的身体，在众宫女服侍下勉强来到斋宫，召见石亨。

石亨虽在北京保卫战中受到提拔，但嫉妒于谦，早在私下与徐有贞勾结在一起了。徐有贞当初主张迁都，遭到于谦驳斥，险些丢了脑袋，早就想把于谦置于死地。无奈景帝重用于谦，使他无从下手。曹吉祥本是王振手下的帮手，时时想为主子报仇。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策划陷害于谦的阴谋。石亨在景帝面前假装非常虔诚：

“圣上龙体欠安，不必多虑。有我石亨在，决不会有什么变化，臣誓死为圣上出力！”

景帝深受感动，喟然长叹，簌簌泪下。

石亨从斋宫出来，径直跑到曹吉祥府第，说道：

“皇上病重，我看很难好转。我们应当拥立上皇复位，这样可以得到更大的升赏！”

曹吉祥一跃而起，连连说道：

“甚好，甚好！”

十四日夜，曹、石二人又来到徐有贞府，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徐有贞。徐有贞听了，拍手赞成，仰天大笑道：

“我徐某也该有出头之日了！”

徐有贞又问道：“此事南宫知道吗？须等上皇有了回音再说。”

元宵节的夜里，徐、曹等人在石亨家中密谈了整整一夜，一个复辟的计划酝酿成熟了。他们假传圣旨，说景帝于本月十七日早朝。

十六日晚，徐有贞爬上屋顶，观测天象，对石、曹等人说道：

“我观察，今晚紫微星有变，事在今夜，机不可失。”

正巧，边境告急，徐有贞大喜道：“天助我也。正好以保卫皇宫为名，发兵入内宫，不怕不成！”

夜半三更，石亨调来了军队。四更时分，石亨偷偷打开长安门，放军队进入皇城，直奔南宫，拜见英宗。

朱祁镇正在蜡烛下看书，见众人入内，惊愕地问道：

“你们是干什么的？”

徐有贞等人跪拜道：“众人一致请陛下复位，陛下赶快上车吧！”

随来的兵士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惊慌失措，手脚不听使唤，连车也推不动了。徐有贞骂道：

“蠢才！”帮着推车，向着皇宫进发。

众人来到东华门。守门的卫兵呵斥道：“什么人敢在这里鼓噪？”

朱祁镇在车上答道：“朕是太上皇，入宫有事，何人敢阻拦？”

卫兵一听，赶紧放行。

天亮后，皇宫里，钟鼓齐鸣，群臣都停在偏殿等候早朝。只听徐有贞那尖细的声音喊道：

“太上皇复位了，众大臣赶快进宫祝贺！”

百官一听，万分震惊，但事已至此，谁敢抗拒？于是都各整衣冠，迈步入宫，跪拜朝贺。朱祁镇坐在龙椅上宣告道：

“景帝病势日重，不能临朝，众人迎朕复位，百官继任，一切如故。”

群臣一同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石亨在一旁喊道：“今日正午在此举行皇帝复位登基典礼，众大臣，届时参加！”

早朝后，于谦闷闷不乐，忧愁万分。景帝未死，上皇复辟，这不乱了朝纲吗？徐、石得势，肆意妄为，又是奸臣当道了！这些奸党小人怎能容许正人君子存在？于谦料到一场更加激烈的斗争即将来临。

中午，于谦参加完上皇复位登基典礼刚要退朝，只听，太监吆喝道：

“众大臣留步！圣旨下！”

群臣不知何事，心中都有些不安，跪拜接旨。太监念道：

“逆臣于谦、王文、陈循、商辂……图谋不轨，大逆不道，与外藩勾结，欲篡夺本朝皇位，罪大恶极，应依法制裁！”

石亨忙喊道：“来人呵，给我拿了！”

太监又念道：“卿徐有贞、石亨、太监曹吉祥，为国尽忠，协朕复位有功，朕特命徐有贞为兵部尚书，加封武功伯；石亨为忠国公；曹吉祥为锦衣卫世职。”

宣布改元为天顺元年。

次日，于谦、王文等遭受拷打，皆被判处死刑。抄没家产时，发现于谦“家无余赀，萧然仅书籍耳”独有正室锁得严密，打开一看，里面珍藏的是景帝赏赐给他的“蟒衣剑器”等物。于谦的清廉忠正更得到了明证。

将杀于谦时，英宗尚犹豫道：

“于谦，实在是有功！”

徐有贞秘密进言道：“不杀于谦，此举(夺门)为无名！”

天顺元年(1457年)二月十六日，北京城内天气阴沉沉的，压得人们透不过气来。西北风似狼嚎般地呼啸着，把人们的心都撕碎了。京城数十万军民冒着寒风伫立街头，他们多想再看一眼于大人，为保

卫京师，不使百姓遭殃，身先士卒和军民并肩作战的兵部尚书啊！多想再听听于大人那洪钟般的声音啊！

在人们的一片痛哭声中，于谦被害，时年六十岁。

后来北京出现了怀念于谦的童谣：

“京都老来贵，那里得饭广（指范广）；
鹭鸶水上走，何处觅鱼（指于谦）。”

锦衣卫指挥朵儿（鞑靼人），提洒浆纸钱，祭奠恸哭于谦于刑场上，遭到曹吉祥的鞭打。第二天，照旧祭哭。指挥同知陈逵感念于谦的忠义，收殓于谦的遗骸。

于谦长子于冕遭戍龙门。有位姓裴的太监，同情于谦，偕同于谦的少子于广逃往河南考城县，隐居民间。

元顺三年（1459年），于谦婿朱骥把于谦的灵柩运回故乡，葬于西湖三台山麓。

成化初年，于冕被赦，上书讼父，得到朝廷特诏，恢复于谦生前所有官爵，并将前故宅改为“忠节祠”。

爱国者于谦的祠墓和岳飞的祠墓都在秀丽的西湖岸边，岳飞、于谦的悲壮事迹为美丽的湖山增添了无限光彩。

明末烈士张苍水的词中写道：

国破家亡欲何之，
西子湖头有我师。
日月双悬于氏墓，
乾坤半壁岳家祠。

于谦抗战卫国的功绩，堪为后人所景仰。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我国的历史上放射着光芒！

徐阶

奸臣严嵩父子擅权当道，厚颜昏庸，朝臣被迫害致死者甚多，人人噤若寒蝉。面对如此情形，徐阶谨慎以待，用韬晦之计，将严氏父子拉下马，为朝廷除了一大害。对此，后人褒贬不一，争议不休。

中午，秋高气爽，枫叶红遍南山。徐府宅内一片寂静，人们正在午睡。忽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喊声：

“小阶儿，你在哪儿？”

喊声越来越大。这时徐宅内上下人等皆被唤醒，有人问：

“喊阶儿何事？”

“我的阶儿，我的宝贝儿子不见了！”徐母焦急地回答道。

“赶快找一找？不会丢的。”有人说道。于是徐府上下几十人分头在府内各处到处寻找。

“阶儿！阶儿！”的喊声连成一片。

可是，到处也没有阶儿的影子，正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一位老仆在院内一眼枯井边，高声叫道：

“井里边有个东西，可曾是小小少爷？”

大家聚拢到井边，朝下观看，在井底，果然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孩子。徐母也来到井边，认出穿红衣服的孩子就是阶儿，大叫一声：

“阶儿！”便昏了过去。人们一边救治徐母，一边扛来梯子，一位年轻的仆人，下到井底抱出一个大脑袋，脑后梳一条小辫，白白胖胖的身穿红绸衣的男孩。他用脸贴近孩子的鼻孔，发现男孩还在喘气，好像熟睡一样，高兴地说道：

“小小少爷还活着！”

“还活着，阶儿还活着！”大家异口同声地说道。

徐母被救治过来之后，将阶儿抱过来，紧贴着孩子的脸蛋，转悲为喜，喃喃地说道：

“我的心肝儿，还活着，让娘好找！你怎么会掉到井里去了？”

徐母将阶儿抱回房中，请来大夫诊治。大夫说道：

“孩子身体无大恙，乃属惊吓过度所致，数日内可愈。”

果然，三天后，孩子苏醒，能说会笑，嬉戏如常。

这是徐阶出生后，未满周岁时发生的一件令人惊异的事件。

徐阶，字高升，弘治十五年(1503年)，生于华亭(上海松江)，历代称此地为吴中。徐家为吴中的富户，父亲对其要求十分严格，三岁时即开始背诵《百家姓》、《千字文》，五岁学习《四书》、《五经》。阶儿性格沉稳，不苟言笑，聪慧过人，常为邻里小伙伴出谋划策，登山折木，戏水捉鱼，玩得十分开心。阶儿五岁时又发生一件令大人惊心动魄的事件。

正德三年(1508年)秋，父亲由两名仆人陪同要去括苍山狩猎。括苍山为临海县境内的高山，山上岩石林立，多处有悬崖峭壁，石缝中生长苍松翠柏，景色十分壮观。山上有猴、狐、豹、虎等出没。徐府从曾祖、祖父辈起，每当秋季，常去括苍山狩猎。阶儿看见父亲正在收拾猎装，嚷嚷着也要去。母亲不同意，说到括苍山要走几百里路程，孩子太小，不宜前往。但阶儿哭闹着执意要去，父亲没办法，只好将其扶上马背，一同前往。

到了括苍山，阶儿第一次见到怪石高耸、林木茂盛的高山，玩得高兴异常。特别是对登上悬崖，向下观望十分感兴趣。山脚下汹涌澎湃的灵江，像一条白带环绕在山下，而朵朵白云却在山腰飘动……一切都是那么美丽而又神奇。狩猎的第三天，父亲打了一些野鸡、野兔等禽兽放在悬崖上，让阶儿看守。下午，父亲和仆人回来，只见一堆野兽，而孩子却不见了。父亲和两个仆人在悬崖顶上到处寻找皆不见，从悬崖上往下望去，只见穿红衣服的阶儿正挂在半山腰一棵树上，山下恰是汹涌的灵江在流淌。

一位仆人欲叫他的名字，被父亲制止了，说道：

“不要惊吓他，恐其挣扎，衣服扯破，难以援救。”

于是，二位仆人将猎绳连接起来，一头绑在一棵大树上，一位仆人腰间拴上绳子，由两人拽着绳头被慢慢放下去，一直把仆人放到挂着阶儿的树枝为止。仆人把阶儿从树枝上摘下来，抱在怀里。悬崖上的两个人收拢绳子，将仆人和阶儿一起拽上来。

阶儿悬挂在半山腰的树枝上，父亲吓得脸色发白，心儿吊到嗓子眼上。一旦救上来，终于长出了一口气。这时三人才一齐高喊：“阶儿！阶儿！”

过了片刻，阶儿终于睁开了眼睛，说道：

“我抓的小雀呢？”

这时大家才看到，阶儿手中攥着一只小雀，小雀儿已经死了。

父亲见儿子说话了，急忙查验全身各处，除了有几处树枝划伤外，别无他恙。父亲抱着儿子亲了又亲。两位仆人忙说：

“小少爷，真乃大命之人！”

父亲见儿子死里逃生，停止了狩猎，和仆人一起回家，大吃喜宴。不少人皆说道：

“阶儿二次遇险，大难不死，必是大富大贵之人，日后不是当官就是发财！”

徐家老少，对此说法深信不疑，为此，刻意供其读书，全家把希望都寄托在阶儿身上。

嘉靖二年(1523年)，乃是大比之年。在通往北京的大运河上，一艘客船，载有数十名乘客，在波涛中行驶。客船甲板护栏旁，站着五名年轻的乘客，一位身材短小，约有二十一二岁，穿着灰色长袍，大眼睛，粗眉毛，举止稳健，从容大度。另四位短衣打扮，均为十七八岁年纪，有的背着行李，有的抬着书箱。

这是华亭人徐阶，带着四名仆人进京会试。轮船在运河上行驶十多天光景。到达北京后，住进前门外悦来老栈。

会试的最后一天，四名仆人将其送进考场，一直在门外等候。直到考生都出了考场，也不见少爷出来，一位仆人道：

“莫不是少爷在场内病了，没人知晓？”

“不会的。”一位仆人说道，“我们不妨问一问监场的士卒。”

两位仆人走到门边，问挎刀的士卒：“考场里可有考生？是否病了？”士卒很和善，进入考场看了看，回来说道：

“时间尚未到，尚有一位考生在答卷，没有患病的！”

仆人知道，这位考生必定是少爷了。在终场锣声响过之后，徐阶方不慌不忙地从考场中走出来。四位仆人焦急地迎上前去，一起问道：

“少爷，为何才出来？”

徐阶微笑道：

“锣声未响，何故着急乎？”

“文章做得如何？”

“不甚满意，但已尽到最大努力了！”

“少爷一定会中进士。”一位仆人说道，“就看少爷的稳当劲儿，没有不中的！”

仆人估计得不错，一个月后，朝廷发布圣旨：徐阶中进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

徐阶接到圣旨喜出望外，一边派仆人回华亭徐府报喜，一边进入皇宫，受到首辅大学士杨廷和的召见。

杨廷和，四川新都人。为成化年间进士。弘治二年(1489年)，晋升修撰，撰写《宪宗实录》和《会典》。后又晋升为左春坊大学士，充当武宗的日讲官。武宗去世，他引《皇明祖训》，请立兴献王长子

朱厚为皇帝；杨廷和还接受太后旨意，起草遗诏，革除武宗时一切弊政。受到朝廷大多数大臣的欢迎。

杨廷和看过徐阶的文章，内容充实，对仗工整，句法严谨，文字隽秀，真不愧为美文、美字。原先杨廷和的意见，想选徐阶为头名状元，但世宗坚持为第三名。杨廷和又见到徐阶本人，真是文如其人；身材虽小，但面目清秀，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一看便知道是个聪慧机灵的吴中人。

杨廷和交给徐阶的主要任务是熟悉宫廷各项典章制，并阅读皇宫的藏书。

宫廷中十多间大房子里，堆满了各种线装书，都是徐阶从来未见过的书籍。徐阶索性从前门外悦来老栈，搬进翰林院居住，一日三餐并做两餐，早晚也抽时间读书。自此大开眼界，知识越加丰厚。

一年后的夏季，徐阶接到家中的来信，催他回家完婚。徐阶在华亭时，由父母一手包办，与华亭另一家财主的女儿魏小姐订婚。魏小姐已二八妙龄，长得花容月貌，读过《四书》、《五经》，精通琴棋书画。魏家听说，未婚的姑爷在皇帝面前，考中进士第三名，惟恐徐家改变主意，曾经三番五次派媒人催徐家操办婚事。徐家父母认为儿子已超过结婚年龄，而且认为魏小姐配阶儿，还算是郎才女貌。于是从春节后即开始筹备，新房、嫁妆，被褥、衣物等，一切准备就绪，即命阶儿回家举行结婚典礼。

徐阶与魏小姐在家乡订婚时，徐阶曾经偷看过魏小姐几次，为其美丽的容貌所打动。进京会试期间，不免有此思念，见到家信命其回去完婚，兴奋异常，便将此事向杨廷和禀报，杨廷和上奏世宗，准予回乡。

徐阶回乡三个月，办完喜事回京不久，又接到家中的急信，说父亲突然去世。徐阶又请假回乡，为父亲守孝三年。

徐阶在皇家藏书馆读书期间，发现了一部很吸引人的书籍，即《王文成公全集》，对其中的“心学”十分感兴趣。王守仁在本体论方面，发挥了陆九渊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命题，进而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理论。他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就是天，“心之本体无所不该”。意思是，人心是宇宙的本体，是天地万物的主宰；心这个本体是无所不包的，整个宇宙万物都在人的心中，“心”之外别无他物。

徐阶回乡丁忧期间，结识了王守仁的弟子王艮(1483—1541)，他是自学成才的哲学家。原名银，字汝止，号心斋，曾在泰州安丰盐场充当盐丁。七岁方进家乡私塾就读，因家贫不能跟班学习，便跟随父亲赴山东经商，到了壮年才开始读《孝经》、《大学》、《论语》等书。正德六年(1511年)，到了江西，拜王守仁为师，追随王守仁到处讲学。王守仁和王艮到吴中时，徐阶前去听过王守仁讲学，对其“心学”大加赞赏。徐阶与王艮成为朋友之后，徐阶对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的论述，不仅赞同，而且成为后来治理朝廷的座右铭。

徐阶曾跟随王艮游览江南各地，宣传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因此，在士大夫之间，徐阶也成为很有名望的人物。

嘉靖六年(1527年)，徐阶丁父忧回朝，又回到翰林院任编修。这时，首辅杨廷和因“大礼仪”之争被免官回乡，原兵部侍郎张晋升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徐阶在华亭就听说朝廷正在争议“大礼仪”之事。乃是争世宗死去的生父的尊号。武宗无子，世宗是由藩王继位后，其父为兴献王朱

元，是明宪宗朱见深第四子。世宗继位后，认为自己当了皇帝，父亲在天之灵也应当成为皇帝，于是，他想要礼官议追崇其父母为皇帝、皇后，便命廷臣集议，结果反复辩论三年，尚无结果。杨廷和等人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武宗父)为皇考，称献王为皇叔父。而张等人迎合世宗的心里，认为，儿子是皇帝，父亲必然追崇为皇考，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最终世宗下诏，追尊兴献王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章圣皇太后为圣母。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在争议中，下狱的达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致死的十余人，此外尚有谪戍和罢官的。杨廷和因为没有迎合帝意被罢官。而张等人都晋升官职。

徐阶回朝时，“大礼仪”之争已结束，在家乡丁忧时，他支持杨廷和的意见，认为世宗的生身父母只是王，不是帝，称其为皇考不合礼法，恰好，“大礼仪”之争他不在朝，没有受到任何牵连，但是，却对尊为师长的大学士杨廷和被罢官而愤愤不平。

嘉靖九年(1530年)十一月，世宗赴孔庙祭祀，见供奉的牌位上写着“至圣文宣王孔子神位”，世宗对陪同的礼部尚书大学士张道：

“朕读《史记·孔子世家》时，司马氏言道：‘自天子王侯，中国言久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所以，孔子称至圣先师为好，可是唐、宋以来，为孔子加上文宣王的头衔，似乎大可不必，不知爱卿意下如何？”

“皇上所言极是。”张媚言道：“‘至圣’已经达到顶峰了，再冠以文宣王，是多此一举，况且将孔子称为王，似乎也是不伦不类。”

“朕欲去掉孔子之王号，命廷臣广为议论，结果如何，爱卿及时禀告之。”

“遵旨。”张忙道，“微臣立即督办，立即督办。”

翌日，朝廷上下文武大臣皆议论为孔子去掉“文宣王”称号之事，很多人知道是皇上的提议，随声附和道：

“应当去掉，孔夫子是教书先生，称其为王是对教师的亵渎。”

还有人说：“孔子一生谦虚谨慎，坚决反对称王称霸，死后一千多年，有人称其为王，孔子在天之灵，定会感到不安，今天，皇上提议，将其王号去掉，这是对孔子的最大尊敬与慰藉。”

“对，对。”大家异口同声地附和道，“应当去掉王号！”

张以为舆论一致，正想向皇上禀报。徐阶当场提出异议道：

“微臣认为，去掉孔子文宣王的称号不妥，称孔子为文宣王，乃是我们祖先提出来的，文宣王，不是王爷的王，也不是称王称霸的王，而是文化宣教之王，孔子的施仁政，讲究教育方法的思想，是做人之本，是治国之本，为后人立下了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功绩。为此，去掉孔子文宣王的称号万万不可！”

张见已经定论的事，经徐阶提出异议，十分扫兴，便立即宣布罢议。召徐阶于另室诘问道：

“去掉孔子王号，乃皇上之旨意，可曾知晓？”

“早已知晓。”徐阶回答道。

“为何提出不同之议？”

“皇上欲去王号，颁旨即可，议论为何？”

“是为了……”

徐阶的一句话，问得张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张立即大怒道：

“若叛我。”

徐阶正色道：

“叛生于附，阶未尝附公，何故言叛？”徐阶说完，很有礼貌地向张鞠躬，后退走出房门，扬长而去。

张向世宗详细上奏了文武百官议论去王号的情况，他说，大家都一致赞同皇上的主张，只有一名迂腐的官员表示反对，被微臣严厉训斥一番。

于是，根据世宗旨意，更正孔庙祀典，易泥塑像为木雕刻，将祭祀的用器和礼乐皆有所减少。将“至圣先师文宣王孔子神位”之牌位，改为“至圣先师孔子神位”。

数日后，皇上降旨，将徐阶斥为延平的府推官，连摄郡事。徐阶被逐出京城并不感到意外，因为他知道去掉孔子王号是皇上的旨意，但他认为皇上的旨意，纯属无知，没想到，文武百官没有一个敢出来说话，这对至圣先师是多么大的侮辱？对皇上治国安邦该遭受多么大的损失？特别是徐阶自小熟读《论语》，对孔子顶礼膜拜几十年，将其王号突然去掉，实在是想不通，为此，他突然心血来潮，使出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在朝廷百官中冒了一炮，他知道其后果的严重性，轻则迁官，重则削职为民，但为了坚持己见，维护至圣先师的声誉，什么都顾不得了。等到他离开北京赴福建延平府上任时，方感到后悔。

延平府距北京几千里，是个穷山恶水，地势险要，盗贼出没的地方，没有巍峨的宫殿、繁华的街市和堆积如山的图书，只有饥民、囚犯才到这里来。在这里怎么能够升官发财？徐阶坐在天棚露天的延平府大堂上，看到衣着褴褛的役卒，面带菜色的黎民百姓和抓来的穷极无聊的贼寇，深深地感到为了关于孔子该不该去掉王号之争，付出的代价太大了，真是悔之晚矣！看来还是顺情说好话为要，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很聪明，只有他一个是傻瓜，拿鸡蛋硬往石头上碰，最后吃亏的是他自己。这是徐阶一生中总结出的第一个沉痛的教训。这个教训使他因祸得福，使他在今后的仕途生涯中，变得更加聪明起来。

徐阶来到延平府，只当一名专管刑狱的推官，心中实在不甘。在这里的知府、巡抚，中过进士又进入翰林院的一个也没有，而如今他只在知府下面当一名推官，实在是大材小用。徐阶想，如果辞官回乡种田，将永无出头之日了，只好在此，施展自己的才能，干出一番事业来。

徐阶来到延平府，经过半年多实地考察，发现这里有几大特点：一是贫穷落后，府城没有一所官学；二是遍地娼妓，府城的街道上，商店都是妓院，妓院里也有商店；三是遍地盗贼；有当地的和各地流窜来的，成为盗贼的黑窝点。他拟订一个治理延平府的计划，呈给知府大人。知府见徐阶乃朝廷来的大官，愿意协助他治理延平府，乃是求之不得的事。于是对其计划大加赞誉，并支持其立即执行。

徐阶的计划是：缉捕盗贼；取缔娼妓，捣毁淫祠；创办乡社学校。缉捕盗贼是最难办的事，延平府为什么盗贼横行？据徐阶的调查是贼通官府，凡是杀人越货的大盗，被捉住后，买通官府，立即释放，照旧横行无忌。徐阶经过认真调查，将府中几个私通盗贼的官员的罪状，呈给知府，一并逮捕归案。然后，陆续抓捕巨盗一百二十多人，和府内官员一起斩首，这样，府内各地的治安状况立刻好转。盗贼的嚣张气焰立刻收敛。

徐阶的第一步计划奏效后，便开始第二步计划，取缔娼妓。这件事也比较难办。因为从元代起，这里就无人管辖，婚姻状况比较混乱，当娼妓成为妇女一件荣耀之事。其根源在于，府城街道上有三座淫祠，人们不仅去顶礼膜拜，而且还有人传授淫技，兜售淫技。在徐阶的建议下，府中派出几百名役卒，将淫祠一举捣毁，并将十多个专门传授淫技，糟蹋少女的淫棍，斩首示众。还将街道上的商场、作坊，加以

严格限制，只准卖货，不准兜售色相。凡是卖淫者皆限制在街道一端，由府内衙役严格管理。这样，百姓盛行卖淫的风气也大大好转。

第三步计划是兴办乡社学校。徐阶认为，延平府为什么如此混乱？人们都不知羞耻？乃是无人学习，百姓皆无知无识的缘故。创办乡社学校，乃是彻底转变混乱状况，改变其面貌的根本方法。兴办学校也比较困难，一无资金，二无教员，百姓只知道吃喝玩乐，识字、上学好像是讲天堂上的故事。没有资金，徐阶就将缴获盗贼的脏款拿出一部分来，又向当地富户募捐一些，并号召府内官员捐献。徐阶还从俸禄中拿出五百两银子。这样，办学的资金有了。教员皆由府衙的官员兼任，读过《百家姓》、《三字经》的就教授《百家姓》、《三字经》，读过《四书》、《五经》的就教授《四书》、《五经》。学生先由府衙内挑选，凡是文武官员，不识字者，皆从《百家姓》学起。然后招收黎民百姓。开始，没有一个人来学习，府衙就采取硬性规定，凡是有钱的财主，五岁以上的男孩，一律到乡社学校读书，不学者，每个孩童罚银一百两。

这样，在徐阶的奔波努力下，延平府第一所乡社学校终于开学了。它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启蒙教育，以府内官员为主，为成人班；还有一个幼儿班，有官员的子弟和财主的儿女。有时，徐阶也到学校亲自讲课，受到官员和孩子们的欢迎。

在徐阶的倡导下，延平府一年后有一些变化，盗贼、娼妓骤然减少，财主的孩童大部分上学读书。府城内百姓的风气大有好转。三年后，延平府成为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城镇。还出了秀才和举人。老百姓经常怀念为延平造福的徐阶先生。

因徐阶参预治理延平府有功，朝廷降旨，晋升徐阶为湖北黄州府同知，成为知府的佐官，分管督粮、缉捕、江防、水利等工作。不到

半年，各项工作均干得十分出色，受到知府的表彰，朝廷又提升其为浙江按察僉事，数月后，又晋升为江西按察副使，俱视学政。

嘉靖二年(1523年)，世宗刚刚十七岁，有一个暖殿太监崔文，引诱他在乾清宫设坛祈祷搞建醮活动。一个十七岁的孩子，不懂什么叫祈祷，只是好玩而已。但是，在首辅杨廷和等大臣的苦苦劝谏下，停止了。到了第二年，世宗又想起了建醮仪式，又玩了起来。这时，杨廷和已经辞官，而大学士张，为了迎合世宗的癖好，以取得他的欢心，换取权力和地位，便积极支持祈祷活动，并受命为世宗在钦安殿建醮。张还迎合世宗的心意，写了几首关于斋醮的诗进献，再加上支持世宗去掉孔子王号，张可谓步步高升，取代杨廷和升任为首辅。

嘉靖十年(1531年)，有一名大臣，名叫夏言，被世宗晋升为礼部尚书，受到朝廷百官的瞩目。

夏言(1482—1548)，字公谨，号桂州，江西贵溪人，为正德年间的进士，任过兵部给事中。世宗继位后，积极疏谏革除弊政，奉诏核汰京军冗员；出按庄田，悉夺还民产。劾贪鄙不畏权贵，救被诬不避嫌疑。在朝廷中有一定的威信。

在世宗斋醮活动中，有意变法，拟分祭天地日月，在四郊建祠堂。曾与张商议，张不敢决断。世宗便询问夏言，夏言立即领会世宗的心意，忙道：

“根据周礼，天地日月，应当分祭。周礼就分：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篇。所以，臣奏请于南郊、北郊、东郊、西郊，分别建坛，以便祭祀天地日月。”

张亦顺水推舟，力赞夏言的建议。有几位大臣主张合祭，认为，只建一坛，可以减少国库开支，有一位名叫霍韬的大臣，陈词最为激烈，被世宗降旨逮捕入狱。

遂命建丘于南北郊，以冬至、夏至日分别祭祀。建朝日夕月坛于东西郊，以春分秋分日分祭。

自此，夏言被世宗所宠爱，张常常被冷落。张终日苦思冥想，如何才能讨得世宗的欢心？一日，忽然想到：自己的名为“”，世宗的名亦为“”，偏旁不同，但与皇帝同名，有些忌讳。于是写一奏章，奏请世宗改易。世宗御览奏章，讪然一笑，手书“孚敬”二字，作为名。

张得此御批，高兴异常，逢人必讲，大肆宣扬。廷臣以为他也得宠，相率附和，不敢生异。然而，张孚敬只知谄媚，畏首畏尾，不知如何才能讨得世宗欢心？夏言比较了解世宗心理，朝廷中出现的重要问题，多由夏言解决，世宗很是信从。张孚敬虽为首辅，但在世宗面前，反而减色。因此屡进谗言，说夏言的坏话。谁料世宗是非分明，反而袒护夏言，斥责孚敬，道：

“爱卿身为首辅，廷臣能力强者，孰贬低乎？赞誉乎？”

张孚敬被世宗奚落一番，自知首辅又难保，辞官而去。

由此，夏言被重用。夏言听廷臣介绍，嘉靖初年，翰林院编修徐阶是个人才，被张孚敬贬逐为外官，治理延平府，功绩卓著。这时，恰好皇太子朱出阁，需要有才学的老师教授，经夏言推荐，世宗下诏拜徐阶为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讲。

徐阶在江西任所，接到朝廷召他回京的圣旨，喜出望外。数年前，因为年轻人好胜心强，因为“反对去掉孔子王号”的一句话，被贬出

朝廷。那时，原以为只有当一名外官，永无出头之日了，没想到朝廷还能将他召回。

时值仲春，杨柳依依，百花含苞待放。徐阶吩咐仆人，打点行装，启程回京。回到紫禁城，夏言亲自召见了。见徐阶乃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身材短小，皮肤白，面貌和善稳重，但透露出智慧和机灵。

夏言问道：

“下面可是子升？一路上辛苦了！”声音宏亮。

徐阶任外官时，听人介绍过夏言，为人耿直，快人快语，精明强干。初次见面，果然不差，此人约有六十岁左右，身材魁伟，花白胡须垂胸，两道粗眉下，两只大眼睛炯炯有神。

徐阶回答道：

“在下正是子升，多亏夏老师的关照，晚生感激不尽！”

“子升回京，任皇太子之师，任重而道远，可知晓老夫之良苦用心？”

“晚生明白，定竭尽全力而为之，决不辜负老师的期望。”

皇太子朱载，嘉靖十六年(1537年)生，世宗第三子。十八年(1539年)二月封裕王。嘉靖二十一年(1562年)，裕王五岁，由徐阶任老师，为其讲授《四书》、《五经》。裕王朱载是个聪明的孩子，读书十分用功，生母杜康妃对其要求十分严格，多次降谕徐阶，要将裕王培养成知识渊博的济世之材。徐阶用尽平生所学，使裕王学到广博的知识。能写一笔好字，写一手好文章。由此和裕王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取得了杜康妃的信任。

徐阶认真教授皇太子的情况，杜康妃上奏世宗，世宗很高兴，正欲对其擢升给予嘉奖时，徐阶家乡传来噩耗，母病故，回乡丁忧。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徐阶回朝后，世宗降旨，擢升其为国子监祭酒，后又迁礼部右侍郎。

在徐阶回乡丁母忧期间，世宗崇信道教更加虔诚，令夏言充当醮坛监礼使，文武大臣，逐日排班进香。世宗亲赴坛前，行礼膜拜。主坛的大法师为邵元节。

邵元节系贵溪人，幼年得异人传授，自言能呼风唤雨，驱鬼通仙。世宗听说有如此仙力的大师，征召入京。见邵元节一头白发，白须飘在前胸，年龄约有七八十岁，但行走如飞，似有仙风道骨，如活神仙一般。世宗赐其斋宴。盛情款待之后，叩问仙术如何才能学到手，邵元节回答道：

“只有一个静字诀。静字以外，便是无为二字。”

世宗听后，不太明白，请大师进一步讲解。邵元节又道：

“人只有离开酒色财气才为‘静’，有‘静’才能进入仙境；何谓无为呢？老子曰：宇宙万物的根源是‘道’，而‘道’是‘无为’而‘自然’的。人若求仙效法‘道’，也应以‘无为’为主，‘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若能‘静’心求‘道’，万物将随着人的意志而自然变化……”

“就是说，可以呼风唤雨。”世宗插言道，“要何物有何物！”

“皇上圣言至明。”邵元节道。

世宗听了邵元节介绍甚为赞赏，当时，正值春天，冬天过后，未曾下雪，便命大师，能否令天上下雪。邵元节命在午门外，设祭坛，摆上香蜡纸马，邵元节穿上道袍，披头散发，仗剑焚符，口中念念有词，过了片刻，果然彤云密布，瑞雪纷飞。

世宗见邵元节有如此高超的神力，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对道教竭诚敬信。当下封邵元节为致一真人，赏玉金银象印各一枚，加封二

品官职，封其师傅文泰也为真人，拨白银万两在京城内建真人府，赠田三十顷，派遣兵卒四十人，供府中扫除役使，真是恩礼交加、尊荣备至。

监察御史喻希礼，上奏世宗，要求取消求嗣礼仪，认为这是劳民伤财。世宗听后大怒道：

“希礼胡言乱语，影响斋醮该当何罪？”立命将喻希礼谪戍。翰林院编修杨名，劾奏邵元节言近无稽，设醮内府，尤失政体，又遭世宗怒斥，下狱戍边。

徐阶对世宗崇信道教，不理朝政，忧心如焚。但吸取去掉孔子王号的教训，未曾表达任何政见，只是观望而已。他见老师夏言不但未曾表示反对的建议，而且积极为世宗建醮活动，撰写青词。

徐阶还观察到，凡是青词写得好的大官，不断升官晋爵，凡是反对斋醮，对青词有反感的大臣，不但不能升官，反而要遭到贬谪。因而，徐阶也试着写了几首青词，呈给世宗，世宗甚为满意。

徐阶由礼部右侍郎，迁为吏部右侍郎以后，能够事必躬亲，礼貌侍仕，为边腹要害之地的官吏，解救百姓的疾苦，出谋划策。因为徐阶在延平府为官数年，深知下层的情况。他们认为徐阶的办法很实用。宫廷中的几位老大臣，如尚书熊浹、唐龙、周用等都很看重徐阶，认为是位很有前途的年轻大臣。

数月后，在夏言的举荐下，世宗降旨，命徐阶兼翰林院学士，教习庶吉士，不久，又命其掌管院事，晋升礼部尚书。

一天，徐阶在礼部处理朝廷要事，首辅夏言要召见他。徐阶匆匆来到泰和殿，只见夏言端坐上首，旁边坐着一位长身削肩、疏眉鼠目的老者。夏言介绍道：

“这是南京吏部尚书，严嵩、严老师。”

徐阶上前躬身施礼，道：

“严老师从南京远道而来，未曾前去迎接，请恕罪。”

“岂敢，岂敢。”严嵩道，“老朽是由老同乡夏首辅特邀来到京师共事朝廷的，还请徐尚书多多指教。”

“严老师这样一说，折杀晚辈矣！”徐阶忙道，“晚生重返朝廷，多亏夏老师提携，今后还请严老师指导帮助。”

严嵩给徐阶留下很好的印象，位居高官而又谦恭有礼，在大臣之中是少有的，他甚至比夏言更加和蔼可亲。

严嵩由夏言的举荐，以贺万寿节之机，进入京师。先是参加修订《宋史》，后留严嵩为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时值世宗将其生父恭献王，追封为恭献皇帝，供奉于明堂并称宗进入太庙。严嵩见此举不合礼仪，和群臣一起议阻，世宗大为不悦。严嵩听后，诚惶诚恐，立刻尽改前言，并积极参预恭献皇帝进入太庙礼仪。礼成，世宗奖赏严嵩，赐黄金一百两。

在群臣向世宗祝贺时，严嵩还编写《庆云赋》、《大礼告成颂》，命宫廷乐师演奏。世宗听了大悦，为严嵩加太子太保衔。

严嵩除了善于谄媚讨好之外，并无其他特殊的才干。他之所以能够步步高升，主要是由于世宗的昏愆。世宗由于“壬寅宫变”事件，深居西苑，专事斋醮祷祀活动，经常不到大内视事，朝臣中除了严嵩之外，都见不到他的影子。严嵩为了表示勤恳和随时窥视世宗的意向，则日夜侍候在西苑寝宫。世宗因此对他更加信任，表彰他“忠勤敏达”。严嵩利用自己独承宠臣的地位，开始排斥夏言等人。

世宗在进行斋醮时，按道士的要求必须头戴香叶冠。世宗不仅自己戴，还赐给身边的夏言、严嵩等人。在上朝时，世宗也戴着香叶冠，

而夏言坚决不戴，但严嵩在朝中竟戴着香叶冠，走来走去，世宗见了，对严嵩更加亲近。

严嵩进入朝廷后，徐阶很快就发现严老师并不是正人君子，而是有些心术不正。可是严老师是夏老师引荐进入朝廷，是其同乡，又受到皇帝的宠信，不应对其产生疑虑。于是徐阶专程到夏府拜访，倾听夏言对严嵩的看法。

夏言府第修在前门外，是一幢比较简陋的四合院，和普通百姓的住宅区别不大。傍晚，徐阶由两名仆役陪同，慢步来到夏府。夏言在厅堂热情地接待了年轻的礼部尚书。

夏府厅堂正中有一张八仙桌，两把太师椅，靠墙挂有一幅山水画，画旁为一副行草对联，上联为：龙跃九霄，云腾激雨。下联为：潭深千尺，水不扬波。落款为夏言草，对联写得龙飞凤舞，刚劲有力，可见夏言的手笔不凡。

徐阶来到夏府，天已经黑下来，夏言命仆人掌灯，为客人让座泡茶。

夏言道：

“徐尚书傍晚到寒舍想必有急事？”

“无何要事。”徐阶道，“只是多日不来老师府中拜望，甚为想念，今日晚得闲，信步而来，实在是打扰了。”

“不妨，不妨。”夏言忙道，“只要朝廷事务不多，就请过府一叙，不必客气。”

“晚生有一事想请教老师。”徐阶又附耳轻声道，“能否屏退左右？”

夏言挥手命仆人一律退出厅堂。徐阶又道：

“晚生冒昧动问，老师所介绍的严尚书，其人品如何？”

“品德兼优，才华出众。”夏言有些惊讶道，“乃老夫的同乡好友呀！怎么？徐尚书对其有看法？”

“看似面貌和善，谦恭有礼，但据晚生观察，可能是口蜜腹剑，两面三刀之人。”

“徐尚书言重了，今晚可否是贪杯失言乎？”

“晚生多年外任，是老师的举荐方返回朝廷，深感老师的恩德重如泰山。晚生阅历不多，涉世很浅，但为官多年，孰优孰劣，尚可断耳。现将所察，坦诚相告，乞盼老师，与其共事，慎待之！”

“实在是多虑了。”夏言朗声笑道，“严嵩老兄，多年故交，甚为了解，徐尚书之见，老夫铭记在心，并万分感激。”

徐阶见夏言固执己见，不便多言，便告辞而归。

夏言没有听从徐阶的劝告，一直对严嵩十分信赖，而严嵩表面上尊崇夏言，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地图谋夺取首辅的职位。严嵩发现夏言所支持的三边总督后部侍郎曾铣收复河套的计划，可能会给国家带来内忧外患，于是就想用这个问题，扳倒夏言。

河套地区，三面临河，土地肥沃，宜于农桑，在榆林、宁夏、偏头关等地。河套控制在谁手里，对明朝的边防，有着重要的意义。明朝中叶之后，蒙古鞑靼部队曾侵占河套地区，明军曾将其击退。到嘉靖年间，鞑靼部队又占据河套地区，杀掠人畜，曾铣力主收复河套，提出八项建议。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十一月，曾铣率兵出塞袭击，取得了胜利，并再次上疏提出恢复河套的方略。世宗表示赞同，朝臣也没有异议。但到了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一月，世宗忽然改变了主意，其原因就是严嵩指使兵部尚书王以竭力奏言“套不可复”。严嵩本人也在世宗面前说了曾铣不少坏话，说他“轻开边衅”，诬蔑夏

言勾结曾铣，败坏国事。世宗听了严嵩的种种陈述，开始反对收复河套。

恰好当时陕西澄城发生山崩，京师大风，刮得天昏地暗。严嵩请道士作法，乞求上天说明其原因，道士仗剑作法后，道：

“有臣擅权，外臣惹饿鬼作祟，必须将其罢官问罪。”

严嵩将道士的结论，上奏世宗，世宗终于听信了谗言，降旨逮捕曾铣进京问罪，同时也把夏言罢了官。

夏言被罢官尚不知是何因由，找到严嵩，问道：

“圣上震怒，将愚弟革职，老兄可知其因？”

严嵩仍然和蔼可亲地答道：

“真乃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夏老弟之祸，纯属受曾总督之牵连，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非要去收复河套，那里本是一片烂泥塘，贼寇所占何妨？曾铣被捕问罪是咎由自取，而夏老弟实在冤枉，愚兄定向圣上讲情，不日即可复职，万勿烦恼，宽心以待。”

夏言本来一肚子火气，被严嵩一席话说得冰消雪化，回府等待复职。数日后，世宗降旨，命严嵩为首辅，取代了夏言的职位。这时，夏言如大梦方醒，后悔当初没有听徐阶的话，将一条“狼”带进了朝廷，而且还引为知己。

严嵩晋升为首辅之后，并不因此而罢休。北国的正月，天寒地冻，一片雪白。鞑靼部队的首领俺答，乘黄河水冰封之机，率众渡河，进入河套地区，将其汉族百姓驱逐出境，并扬言要进犯延绥、宁夏镇。消息传至朝廷，世宗大怒道：

“朕已将轻开边衅，败坏国事的曾、夏二人免职，俺答为何又占领河套，欲犯中原？”

“据微臣所知。”严嵩急忙跪倒连连叩头，禀道：“这还是曾总督开衅所招惹之祸端，百姓大遭涂炭。”

世宗听后怒发冲冠。接着，严嵩还代替被曾铣奏劾而革职的前甘肃总兵仇鸾上奏皇帝，诬告曾铣上次攻打俺答失败却报功，还大肆克扣军饷，中饱私囊。世宗御览奏章后，下令将曾铣斩首。同时，将已罢官回乡的夏言抓入狱中。

夏言入狱后，对严嵩还抱着一线希望，买通狱卒，多次给严嵩捎信求他在皇上面前说情，救他一命，严嵩拒不回信。

八月至九月，俺答率兵又进犯大同和宣府，“杀掠数万”，一直打到怀来县，距北京只有一百多里地，北京城内人心惶惶，不少富商携家带口逃往南方。一向不问朝政，崇信道教，乞求长生不老的世宗，听说俺答打到北京城下，急召严嵩问道：

“朕已将罪魁祸首斩首，俺答为何步步进逼？”

“依微臣之见。”严嵩乘机谗言道，“贼寇南犯，是夏言和曾铣欲收复河套的报复，是其所惹祸事之果也！”

世宗信以为真，立即下诏将夏言推出午门，斩首示众。

徐阶眼看着夏言、曾铣被杀，心情无比沉痛。一位是他尊崇的师长，一位是能征善战的兵部侍郎，两位朝廷的重臣，积极为大明朝廷的安危着想，竟落得身首异处的下场。他眼看着严嵩在世宗面前谄媚得势，交结奸党，打击正直、敢于举谏的大臣，滥肆搜刮，贪婪成性。户部用于九镇的军费就有十分之六落入严嵩的私囊。他在北京的府第有四处，在家乡有五处，皆为雕梁画栋，峻宇高墙，家中妻妾成群，金银珠宝，无计其数。他还有一个奸猾机灵的儿子严世蕃，仗着父亲的权势，官至工部侍郎。严嵩升入首辅之后年过六十，已老朽糊涂，

他借助儿子为世宗办事。世蕃晓畅时务，颇通国典，见了世宗咨询的手札，往往能揣摩曲中，迎合世宗的意图奏答。他又以重贿收买世宗的近侍，叫他们把世宗的言谈举措，无论巨细都向自己密报。因而，每当世宗要办什么事时，他都早有准备，办得让世宗很满意。诸部府有事情请他裁决，他也总是说：“等我与小儿计议后再定。”所以，朝廷上下都说，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而严嵩不能一天没有其儿子。有人干脆称“大丞相、小丞相”。

由于严嵩父子的腐朽统治，直接影响了九镇的防务。严嵩作为首辅，公然反对收复河套，对俺答畏之若虎，更使一些将领不敢积极备战。这样，就给俺答发动更大规模的南侵造成可乘之机。

嘉靖二十九年(1550)六月间，俺答率领骑兵越过长城南下，把精兵埋伏在山林中，然后以少数老弱骑兵来引诱明军。大同总兵张达果敢勇猛，但短于谋略，他获悉俺答兵入关，没有等大部队来到，就匆匆带领二百名轻骑赶赴前线迎击，由于轻敌中伏，张达寡不敌众，奋战而死，副总兵林椿闻讯来救，也中箭牺牲。俺答发动的这次战斗，是大规模进攻前的一场试探。他在战斗得手后退回塞外，自威宁海称驻断头山一带，调集原在河套的骑兵十余万，准备大举南下。

张达战死后，仇鸾任大同总兵。仇鸾原为甘肃总兵，因贪污被革职，后靠贿赂、巴结严嵩而重新被起用。七月间，仇鸾得知俺答欲派十万骑兵攻打大同，恐惧万分，竟派人送重金给俺答。乞求俺答不要进攻他所管辖的大同镇。俺答接受了重贿，与仇鸾私下订约，便把进攻矛头移向东边的宣府镇。

八月初三，俺答攻打宣府镇的两河口，遭到明军有力的抵抗，无法前进。又移兵进犯宣府东面的蓟镇地区。十四日，俺答部沿潮河南下，迫近古北口。十六日，他派出数千骑兵，诱引古北口守兵出关作

战，同时，另遣一支精兵，偷偷地绕道到了明军守备不严的黄榆沟，拆毁长城城墙，攻入明军的后方。明军受到突然袭击，狼狈溃逃。俺答乘胜南下，当天就由石匣营（今密云水库东北）经密云而打到怀柔和顺义境内。十七日，进抵通州。当时正值白河汛期，水势很急，明军又把船只全部转移到了两岸，俺答军一时无法渡河，暂与守河西的明军隔水相持。

俺答率兵南下之初，警报即传至北京。世宗在宫中作乐，乞求长生不老，一向不愿听坏消息。兵部尚书丁汝夔怕触皇帝之忌，丢了乌纱帽，起初也就不敢把军情呈报给世宗。等到俺答的骑兵逼近北京，城内一片混乱，世宗方才知情，亦是惊恐不已。这时才想起召集御前紧急会议，部署保卫京师的计划。

当时，驻守京师的官兵，从花名册上看，有十四万，但各级将领为冒领军饷虚设兵员，实有兵数不过五、六万，其中还包括不少老弱残兵，真是“支粮则有，调遣则无”。世宗在危急中，只好下令京师戒严，命仇鸾率大同镇兵二万驻守在居庸关外，又征调保定、延绥、蓟州、河间、宣府、山西各镇兵马入京支援，以上七镇兵马共五六万人。此外，又征调河南与山东兵陆续来京援救。世宗还命仇鸾为平虏大将军，统率调至京师的各路军马；又以保定巡抚杨守谦为兵部左侍郎，协助兵部尚书丁汝夔总督守卫京师的军务。朝廷大臣分头率兵守御京城九门、皇城各门及城内外各要道并督巡五城（东南西北中五个城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千余名武举人，也被征调，登城守御；如后来成为抗倭名将的戚继光，当时正在北京应试，被委派为传达命令的总旗牌官，参与了守城之役。

北京城虽然经过一番部署，但仍笼罩着惊恐的气氛。京营将士长久缺乏训练，没有作战的经验。许多士卒，听说要打仗，吓得涕泣不

止。京师军备不足，而管理武库的太监竟按照向来的陋规，在将士领取武器时趁机敲诈勒索，以致不能迅速把甲仗武器发给士卒。各路援军奉命急速来京，给养供应不上，士卒们只好饿着肚子守城。士卒纪律本来就on不好，抢劫百姓衣物食品之事经常发生，尤以仇鸾的大同兵最甚。仇鸾对部卒的抢掠行为从来不予制止，兵部尚书丁汝夔慑于仇鸾的权势，对大同兵百般包庇，甚至通知地方官不得逮捕犯军纪的大同兵。将士害民，民恨将士。这些情况，充分暴露了朝政的腐败，以致在俺答进攻面前，显得软弱无力。

八月二十日，俺答率军在通州渡过白河，西犯京师，七百余名骑兵直抵安定门外教场。俺答兵在郊区大肆掠夺，烧毁房屋，百姓只好逃向京城，可是城门却紧紧关闭，百姓被隔在城外，进不了城，号哭之声连紫禁城里也能听得很清楚。世宗在得知俺答的主力还在远郊的情况下，才下令开城放百姓进来。

世宗曾下旨催促诸将率兵出城作战，将俺答兵打退。平虏大将军仇鸾与兵部尚书丁汝夔问首辅严嵩怎么办？严嵩道：

“如在关外打仗，败了可掩盖，在京师外被打败，皇上定会知道，谁来负责？应听任其抢掠，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策。”

仇、丁听了，正中下怀，只是守城而不敢出战。仇鸾还密派亲信，到城外去见俺答，假意允许贡市贸易，以求俺答退兵解围。

俺答这次大举南下，一直打到北京城下的目的，除了抢掠财物，也是为了用武力手段来逼使明廷同意通贡。俺答俘虏了几个管理东直门外御马房的宦官，又加以释放，让他们把一封书信带给世宗。世宗阅后，见里面有不少侮辱谩骂之词，但中心意思还是要求允许通贡互市。

俺答大军压城，形势危急，世宗于二十一日把首辅严嵩、内阁大学士李本、礼部尚书徐阶等三召叶进西苑的万寿宫，就俺答的来书，要他们提出对策。

严嵩道：“饥贼耳，不足患。”

徐阶听了十分气愤，他过去从来没有公开顶撞过严嵩，见他对俺答大军临城如此轻视，便质问道：

“大军逼城，杀人如斩草，何谓饥贼？”

世宗表示同意徐阶的看法。世宗又问求贡的事怎么办？严嵩抢着说道：

“礼部事也。”原来朝廷接待边疆少数民族首领的事，按例是归礼部管辖。但是同俺答谈判通贡，不是一般的接待事务，而是涉及国内统一朝廷安危的大事。

“微臣虽然有责任，但如此大事，应由圣上作主。”徐阶答道：“寇兵已到京都，而我方战守之策尚未确定。如果权且答应通贡的要求，又怕将来他们贪得无厌。”

世宗道：“只要对社稷有利，货币珠玉，在所不惜。”

“寇要货币珠玉还可以。”徐阶进一步说道，“万一提出我们满足不了的要求，将如何是好？应同意议和通贡，但不能兵临城下许之，寇应退回塞外，另送蒙文书信，通过大同镇守官员上奏朝廷。我得益为备，援兵集，寇且走。”

世宗对徐阶的建议连声称善，但并没有作出决定，又命徐阶到外廷召集群臣商议。徐阶道：

“俺答来书，要求在进贡时派三千人入京，允许了就退兵，否则要增兵攻打京城，请诸位大人发表看法，该采取何对策才好？”

群臣听了相顾无言。只有国子监司业赵贞吉激昂地答道：

“如允许贼寇之要求，让三千人入京，内外夹攻，如何抵御？不打算驱逐贼寇，又惧怕他们的恐吓，这不就是所谓的‘城下之盟’吗？”

世宗得知赵贞吉反对被迫议和的言论，又认为此话有理，急忙召赵贞吉入宫问话，加以鼓励，提升其为左谕德兼河南道监察御史，赐白银五万两，奖谕将士。

二十一日夜，俺答兵在德胜门和安定门外焚烧民房，火光烛天，世宗惊恐万状。这时，他的态度仍然摇摆不定，既表示赞同徐阶的缓兵之计，又鼓励赵贞吉的主战议论。二十二日，在群臣的一再奏请下，这个多年不上朝的皇帝，在傍晚时刻来到奉天殿，但一言不发，很快就退回到内宫。

俺答兵围京城三昼夜，在城外抢掠了大量财物、牲畜以及人口，于二十三日满载而归。仇鸾及诸路官兵眼看俺答率兵而退，不敢发射一箭。俺答的骑兵从进围京师到自动撤离，如入无人之境。

俺答原打算从长城要塞白羊口(居庸关西南)出塞，后见白羊口道路狭窄，恐明军偷袭，又决定从古北口原路出关。二十六日，在昌平城北与大同兵遭遇，俺答挥旗进击，仇鸾仓促应战，部下死伤一千余人，他本人如果不是两名裨将奋力相救，也险些当了俘虏。

俺答撤出后，北京于八月二十五日戒严。在俺答进攻面前束手无策的世宗，用诛杀大臣以推卸自己的罪责。他降旨处斩严重失职的兵部尚书丁汝夔。汝夔曾求救于严嵩，严嵩曰：“我在，必不令公死！”等到世宗发怒，坚决处丁汝夔死刑，严嵩却噤若寒蝉。丁汝夔临刑时大呼：“严嵩误我！”

奉行俺答“饱将自去”方针的罪魁严嵩和仇鸾，则互相包庇掩饰。仇鸾隐瞒昌平遭遇战役的败绩，令部将收斩遗尸，向朝廷报捷，世宗受骗，竟下诏嘉奖，晋升仇鸾为太保的官衔。

这一年恰好是庚戌年，历史上称庚戌之变，是明朝政治腐败，财政困窘，边备废弛的集中表现。

严家父子狼狈为奸，称霸朝廷，引起文武大臣的愤慨，纷纷上疏，揭露其父子的罪行。但是，昏庸的世宗，不识其奸，而严嵩往往利用世宗拒谏护短的毛病，在其面前，搬弄是非，借以打击陷害弹劾检举他的官员。

徐阶相识的锦衣卫经历沈谏，痛恨严嵩的贪鄙奸恶，认为是他导致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的入侵，使北京被困受危，上疏，痛骂严嵩道：“贪婪之性，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忠谋则多方阻之，谀谄则曲意引之。要贿鬻官，沽恩结客。”疏中历指严嵩纳将帅之贿，揽吏部之权，索抚按之岁例，阻制谏官，擅宠害政等十大罪状，请世宗将其诛戮，以谢天下。但是奏疏呈上后，严嵩毫毛无损，沈谏却以诋诬大臣之罪状被廷杖，谪佃保安。沈谏至保安后，百姓知道他是因骂严嵩而被贬谪的，对他很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沈谏捆了三个草人，比做李林甫、秦桧、严嵩，经常在教习之余以草人为靶，和众子弟一起练习射箭。严嵩得知后，气得咬牙切齿，暗中指使其党羽上奏世宗，诬蔑沈谏在保安聚众谋叛，被逮捕斩首。沈谏的两个儿子不服，直接赴朝廷告状，替父亲喊冤，被当廷杖杀。

另一个被害者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十大罪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伺世宗之

喜怒以恣威福，窃君上之大权；让世蕃代为票拟，纵奸子僭窃权柄；子孙无功而官，冒滥朝廷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臣；戒守将勿击俺答，误国家军机；中伤天下善类，专黜陟之权。杨继盛还上疏说，严嵩之所以如此横行，是依靠五奸才得逞的，其五奸是：贿赂皇上左右，使之成为自己的间谍；控制通政司，使之成为自己的鹰犬；与厂卫官缔结姻亲，使之和自己有瓜葛；拉拢文官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网罗部臣，使之成为自己的心腹。上疏中最后说道：

“至如大学士徐阶蒙陛下特拟，乃亦每事依违，不敢持正，不可不谓之负国也。愿陛下听臣之言，察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究，轻则勒致仕。内贼既去，外贼自除。虽俺答亦必畏陛下圣断，不战而丧胆矣。”

严嵩首先阅到此疏，怒不可遏，见其中提到徐阶，说其不敢持正，当然自己必是歪邪，看来徐阶将是自己的死对头，如何抓住徐阶的把柄，将其扳倒是当务之急。当即召世蕃商议。世蕃将上疏浏览一遍，道：

“上疏中提到徐阶，是为荆棘，然其在圣上面前正在得宠，无懈可击。不过疏中所言‘召问裕、景二王’六字，乃是对圣上之敬，可大做文章，杨继盛必死无疑。”

严嵩听后，一拍大腿，大悦道：

“还是吾儿聪慧，老夫就是未曾想到。”

严嵩持杨继盛上疏，呈给世宗御览，世宗阅后，变色道：

“严阁老乃朕之心腹，对其诬陷，网罗如此多的罪状，真是岂有此理！”

严嵩听后大喜，趋前跪倒谄媚道：

“吾皇公正、英明，断案如神!但疏中所云，‘召问二王语’用心十分险恶，恭请圣上明察之。”

世宗将上疏之结一段尾又阅了一遍，拍案大怒道：

“速召杨继盛!”

太监将杨继盛传来，世宗问道：

“上疏中所云：‘召问裕、景二王’是何用意?”

杨继盛答道：“非二王谁不慑嵩者!”

世宗勃然大怒道：“只有二王可慑朝臣，朕乃废铗也?二王为明君，朕为昏君乎?”

杨继盛吓得胆战心惊道：

“臣在上疏中措词不当，罪该万死!”

世宗怒气冲冲道：

“朕免尔死罪，但活罪难逃。廷杖一百，令刑部定罪。”

刑部的两位官员在审理此案时，为杨继盛说了句公道话，一个被贬官，一个被下牢。总督侍郎王抒同情杨继盛，严嵩记恨在心，找借口诬陷，将其杀害。世宗本来不想杀杨继盛，严嵩又进一步诬陷，终于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月，将其斩首于西市，年仅四十岁，临刑前赋诗曰：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

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时人读了相与涕泣传颂之，然而朝臣个个畏惧，凡是反对严嵩的，没有一个不遭受陷害，轻则贬黜，重则杀头。

严嵩怙宠弄权，将夏言迫害至死，可是他知道，夏言对徐阶比较好，徐阶对夏言也比较尊重。所以严嵩下一个打击的对象该是徐阶。

可是徐阶常常是含而不露，严嵩很想将他也置于死地，但徐阶没有什么过错，抓不住什么把柄。徐阶处处谨小慎微，为朝廷办事，如履薄冰，不知何时雪化冰消，会落入大海。

正值，孝烈皇后方氏宾天，世宗下诏曰：

“皇后曾救朕危，奉天济难，其以元后礼葬。”并欲将其归入太庙。世宗如此厚葬方氏，原因在于杨金英等宫女杀害世宗时，幸亏方氏前来解救，使世宗得以大难不死。

世宗诏礼部议论，徐阶认为不妥。方氏是世宗的第三任皇后，第一任为嘉靖元年册立的孝洁皇后陈氏。因两位妃子给世宗倒茶，世宗看妃子的手，陈氏有些嫉妒。世宗大怒，将陈氏吓得堕胎而死。陈氏为世宗的原配皇后，当然可以进入太庙。第二任皇后是废后张氏，已于嘉靖十五年宾天，未入太庙。两位原配皇后皆未进入太庙可是若令第三任皇后进入太庙，有违祖规。只能供奉于奉先殿。礼部都给世宗中杨思忠亦支持徐阶的意见。二人上疏世宗。世宗阅后大怒，太监转告徐阶，吓得徐阶惶恐谢罪，立即撤回上疏。

世宗发怒时，严嵩极为高兴。他以为不用他使用什么计谋，徐阶敢于违抗圣旨，是自讨苦吃，自取灭亡。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等待，徐阶立即撤回上疏，世宗并没有责难他，这使严嵩甚为扫兴。

不久，世宗又降旨命徐阶率领礼部大臣前往邯郸去主持吕仙祠落成典礼。徐阶很想不去，但君命难违，不知如何是好？忽然想到，他正在调动兵卒，欲将孝烈皇后的灵柩，运至永陵与神宗合葬，上疏世宗，请求缓期，待孝烈皇后移附太庙之后，再行前往。世宗见徐阶事情很忙，只好派尚书顾可学前往。

严嵩在朝廷紧盯着徐阶，观察他的一言一行，一旦有机会即将这个死对头扳倒，最起码得让他回家务农。但是徐阶处处谨小慎微，严嵩抓不住什么把柄，无懈可击。

一日，严嵩将徐阶召来问道：

“多日不见，徐尚书一向可好？”

“借严阁老翟吉言，尚可，只是事务繁杂，难以应付，不知所措而已。”

“那里那里，凭徐尚书的才智，过关斩将，游刃有余。而且将会步步高升。”

“严阁老过誉了，折杀晚生矣！”徐阶有些惶恐道，“晚生官至礼部，实属滥竽充数而已。今后还靠严阁老的提携，在圣上面前，多美言几句。”

“过谦了。”严嵩哈哈大笑道，“徐尚书所乏非才，但多二心耳！”

严嵩的一句话说得他面红耳赤，无言以对。徐阶深知老奸巨猾的严嵩已经看透了他在用心，彼此是冤家对头，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可是在严家父子称霸朝廷的时刻，只能用韬晦之计来应付，不能与其发生争执，在严嵩面前，要小心翼翼做事。

徐阶认为，对待严嵩是如此，更重要的是要迎合世宗的心意。他入阁以来，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取悦于世宗的惟一办法，就是写好青词，在斋醮时，一首好的斋词，就可以使世宗高兴异常，而斋词的作者就会立即升官发财。所以，徐阶散朝回来，将历代斋词搜集来，反复阅读、比较，并揣摩世宗的心里，撰写独出心裁的斋词，然后用恭楷誊写，呈给世宗。结果，在世宗三个月，六次斋醮活动中，徐阶撰

写的斋词，有五次列为榜首，只有一次被严嵩所得。所以，世宗对这个有些不太听话的礼部尚书，怒气渐消，而且看法越来越好。

数月后，世宗降旨，授予徐阶少保头衔，晋升为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严嵩在世宗面前，渐渐失宠，很不甘心，唤来儿子严世蕃道：

“近来圣上斋醮，青词榜首皆为徐阶所得，老父首辅的地位岌岌可危，蕃儿看如何是好？”

“徐阶年轻力壮，才华横溢，圣上重用，当之无愧，如之奈何！”

“混帐东西。”严嵩大怒道，“莫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只因老父身为首辅，你才能官至工部侍郎，一旦被贬，严家的名利皆化为乌有！”

“小儿明白！”吓得严世蕃跪下道，“只是徐阶攻于心计，难以对付，小儿也无甚办法！”

“为何无办法？”严嵩逼问道，嘉靖初年，他反对世宗去掉孔子王号，近来又反对孝烈皇后入太庙，借故不去吕仙祠主持落成典礼等等，上奏世宗弹劾其罪状，有何不可？”

“这些罪状小儿早就思之，但不足以将其扳倒，况且徐阶之青词已博得圣上之欢心，他人难以撼动矣！”

“老父苟活于世六十余载，已闯过大风大浪，孰不信，一个小小的徐阶也斗不过？”严嵩咬牙切齿道，“罪状不足，何不罗致？宋朝之岳飞无罪，还让秦桧杀之，就是明证。”

“小儿遵父所嘱，尽快弹劾徐阶，将其逐出朝廷就是！”

严嵩笑道：“这才是吾之儿也！”

严嵩父子正在密谋弹劾徐阶，而徐阶也深知严嵩绝不会放过他。数日以来，徐阶在思考，他只是在撰写青词上战胜了严嵩，博得世宗的好感，而世宗是个反复无常的皇帝，一旦翻脸，不管你是谁，将会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所以，只靠几首青词是远远不够用的，必须要有新的功绩，使世宗更加信任自己。但是左思右想也没什么好的办法。

时值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徐阶的得意门生张居正来访。张居正长得长脸，眉清目秀，留有短短的胡须，敢于办大事，自比豪杰，胸有城府，叫人摸不透他的底。张居正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被选为庶吉士。在徐阶的指导下学习三年，聪明好学，关心朝廷大事，被其引为知己，无话不谈。张居正见老师闷闷不乐，明显消瘦，便问道：

“多日未来府上造访，老师莫非有心事不成？”

“唉！”徐阶叹道：“一言难尽哪，还是不说为好。”

“老师之心事，学生早已知晓，无非是严阁老父子欲加害于老师，置老师于一筹莫展之境地。如今学生倒有一计，可为老师壮腰，必使严家父子威信扫地！”

“请讲！”徐阶高兴说道。

“学生在翰林院任庶吉士学习两年以来，虽然身在皇家藏书馆，但却心系朝廷，很多朝廷大事皆了如指掌。众大臣孰优孰劣也略知一二。据学生所知，这次庚戌之变，丁尚书和曾总督被杀实属冤枉，罪魁祸首当是严嵩和仇鸾。严嵩在圣上面前正在得宠，难以弹劾，然而，仇鸾之罪行累累，举朝瞩目，昭然若揭。”

“居正所言极是，老师尚未想到，真是后生可畏，后来居上。”

于是张居正将所掌握的仇鸾的罪状向徐阶详细介绍一番。

在张居正的启发下，徐阶连夜起草奏章，弹劾仇鸾。其内容有：

一、咸宁侯仇鸾任甘肃总兵，因有贪虐行为而被参革；

二、向严嵩父子行赂，被任命为大同总兵；

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七月，俺答率兵进攻大同，仇鸾派人送重金给俺答，乞求不要进攻他管辖的大同防区。俺答接受了重贿，与仇鸾私下订约。

四、同年八月，俺答兵围困京师时，仇鸾不敢向俺答军队进攻，反而俘虏百姓向朝廷谎报战功；

五、同年八月二十六日，俺答率兵撤退时，与仇鸾兵在昌平遭遇，仇鸾部下死伤一千余人，仇鸾本人险些被俘。而仇鸾隐瞒昌平败绩，令部将收斩遗尸，向朝廷报捷，世宗受骗，竟下诏嘉奖。

徐阶将奏章写好后，又将有关事项认真加以核实，人证、物证俱在。即将奏章绕过严家父子，直接呈给世宗御览。

世宗看完奏章勃然大怒，道：

“召严嵩入殿！”

严嵩升为首辅之后，为了取悦于皇帝经常住在西苑一间板房里，世宗随叫随到，从不误时，所以世宗经常看到的大臣主要是严嵩，但是，自庚戌之变以后，世宗已对严嵩产生了反感，因为他已老态显现，行动迟缓；对年轻力壮的礼部尚书徐阶印象很好，所以，有时不召严嵩，而召徐阶，可是徐阶经常在皇宫泰和殿，太监去传徐阶往往需要一袋烟功夫。

严嵩听到世宗宣召，十分惬意，三脚两步，奔到世宗面前，跪倒便拜，口中喃喃有词，道：

“老臣已到，不知圣上有何吩咐？”

“严阁老，朕来问你！”世宗怒气冲冲道：“咸宁侯仇鸾，曾任甘肃总兵，何故被参革？”

严嵩原以为皇上又要去祠堂斋醮，委派他重要差事，借此可取悦皇上。没想到当头一棒，问的竟是仇鸾之事。应该如何回答？半晌也未反应过来。忽然想到如果世蕃儿在面前商议一番就好了。沉思良久，只好如实回答道：

“回圣上的问话，因有贪虐行为被参革。”

“这样的人，为何又任命为大同总兵？”

“这个……”严嵩听此询问，立刻脸发烧，头上冒汗。他猜测，肯定是有人弹劾仇鸾了，仇鸾被揭露，于己十分不利，但是向世宗不能不说实话，便道：“是老臣举荐，群臣并无非议，认为贪虐已改过自新，率兵拒敌尚可胜任！”

“一派胡言！”世宗拍桌大怒道：“这次贼寇围困京师，仇鸾打胜仗了吗？”

严嵩在世宗面前从来不敢说一句反抗的话，全是顺情说好话，这是他升任为首辅的诀窍。听到世宗如此震怒，而且问得句句如利剑，想必已经掌握了仇鸾蒙骗皇上的证据，若替仇鸾辩白，必定落得像仇鸾一样的下场。在这关键的时刻，还是保自己为上。于是便老老实实地答道：

“启禀圣上，仇鸾从未打过胜仗，畏俺答如虎，多次冒功请赏。”

“那么，严阁老，你身为首辅，如何待之？”世宗进一步诘问道。

“老臣也被其蒙骗了！”严嵩匍匐于地上，连连叩首道：“老朽糊涂了。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姑念严阁老跟随朕多年，有些事不予追究，只是仇鸾欺蒙于朕，违背朝纲，如何处置，由阁老斟酌。”

“谢圣上不罪之恩！”严嵩仍旧匍匐于地，倒爬着退出殿堂。

严嵩回到府第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安静下来，慢慢思考：是谁上疏弹劾了仇鸾？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徐阶，但是又被他否定了，因为徐阶和仇鸾关系一向很好，每当仇鸾回京皆亲自去徐府拜访，徐阶在朝廷也多次赞誉仇鸾治军有方。严嵩断定徐阶决不会弹劾仇鸾。可是，究竟是谁弹劾了仇鸾？百思不得其解。

过了数日，当严嵩从秉笔太监那里得知，弹劾仇鸾的上疏，乃是徐阶的手笔时，一时惊愕得说不出话来。由此对徐阶的仇恨，更为加深一层。

严嵩遵照世宗的旨意，将仇鸾革职查办。原拟将其斩首，但严嵩在书拟圣旨时，将斩首改成自裁。

庚戌之变之后，仇鸾回到大同，“凯旋”而归，仍旧过着妻妾如云，挥金如土的生活。突然接到圣旨，又被革职，并命其自裁，知道是往日蒙骗事发，但不知严阁老为何没有继续包庇他？

仇鸾为了苟活于世，还想继续过荒淫无耻的生活，命其心腹，携带金银财宝，连夜进京，面见严嵩。严嵩收下金银财宝，并给仇鸾捎信说：一切均系徐阶所为，皇上震怒，难以挽救，但还要竭尽全力为之。

仇鸾等了一天又一天，不见朝廷音讯，无奈，没等自裁，竟忧忿而死。

自从徐阶秘密揭发了仇鸾的罪状之后，使世宗头脑清醒了不少，他感到朝廷中的文武百官，大多数都不可靠。原先以为最可靠的是严阁老，表彰他“忠勤敏达”，现在对他已经产生了怀疑。忽然发现过去反对他去掉孔子王号的翰林院学士徐阶，是个忠臣，甚为可靠。于是世宗对徐阶开始重用起来。

庚戌之变的耻辱，使世宗耿耿于怀，而大同总兵仇鸾竟是个骗子，靠这样的人防守疆土，大明社稷危在旦夕。所以，在仇鸾死后，不仅重新任命了新大同总兵，而且特意召来徐阶，谋划边防有关事宜。世宗道：

“仇鸾率领一伙庸兵，号称十万，能打仗者寥寥无几，将其大量裁减如何？”

“似乎不妥。”徐阶答道：“臣以为兵不在乏而在冗，宜精汰之，取其廩以资赏费。”

世宗听取了徐阶的意见，将边防将士部署重新加以整顿，并筹划粮、草、军费等，使边防军力羸弱的状况得以缓解。

严嵩见徐阶被重用，怒火胸中烧，但欲将其扳倒，已是黔驴技穷，毫无办法。他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诬陷，将徐阶连同他的学生张居正一起送回老家。

正在严嵩谋划诬陷徐阶之时，世宗所居的永寿宫发生火灾，熊熊大火烧了三天。太监、宫女将世宗救出后，其余财宝、家具皆化为灰烬。当晚世宗无处住宿，由太监安排寝于玉熙殿。玉熙殿是多年不用，皇太后们念佛的地方。自从孝烈皇后殡天，没人到这里来过。太监们指使宫奴，将玉熙殿彻底清扫一遍，将世宗圣驾移至殿中佛堂内。

世宗是夜晚由太监陪伴来这里的。进入玉熙殿，因为已经掌灯，室内陈设看不清楚。等到天亮之后，睁开眼睛一看，佛堂内潮湿，狭窄，黑暗，并且还有一股发霉的气味。于是高声喊道：

“传严阁老！”

世宗居于永寿宫时，严嵩经常住在宫内，世宗随传随到。可是世宗迁居玉熙殿之后。一来，这里没有他的住处，二来，大内的嫔妃、皇后经常找他，让他劝皇上回大内乾清宫居住，豪华的寝宫乾清宫正

在空闲着。严嵩想，这是劝皇上回去的好机会。所以等世宗睡下之后，他就放心大胆地回府了。

太监听到皇上叫人，急忙回答说：

“昨夜严阁老已回府安寝了。”

“立即传他来！”世宗又道。

“立即传严阁老到玉熙殿！”太监大声喊道。这声音由殿内传至殿外。一位小太监骑着快马，出了内宫奔向严府。

严嵩好不容易回府住了一宿，与几位年轻貌美的小妾，几乎玩了一个通宵。刚刚躺下，想要休息，就听门房高喊：

“皇上传严阁老进宫！”

严嵩急忙穿衣戴帽，乘二十四抬大轿，匆匆来至西苑玉熙殿。

世宗起床后，没有梳洗，即传严阁老。约有一柱香工夫，严嵩满头大汗，仍旧匍匐着爬入玉熙殿，来到世宗御榻前道：

“不知清晨圣上有事，老朽来迟，请恕罪！”

世宗本来想痛骂一通，但看见严嵩老态龙钟的样子，便将怒气收敛一下，心平气和地说道：

“朕昨夜寝于这里，彻夜难眠，不仅潮湿狭小，而且气味难闻，请问严阁老，如何是好？”

严嵩在路上想，皇上传他不会有别的事，定是玉熙殿难以安寝，正好就此机会劝皇上回大内乾清宫。于是，不加思考地答道：

“回圣上的问话，玉熙殿实在难于安寝，老朽劝圣上移驾乾清宫，嫔妃们皆……”

“不去！不去！”没等严嵩说完，世宗打断他的话，道：“大内发生的事，严阁老并非不知，坚决不去。”

严嵩知道世宗所说的，是指壬寅宫变，自此，世宗移居西苑，念佛修道，乞求长生不老。严嵩本想顺情说好话，但一想皇后和众嫔妃的嘱托，只好又道：

“圣上乃真龙天子，那帮女鬼，戕害天子，早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圣上回大内，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历代皇祖都是寝于大内，如长期驾临西苑，皇太祖、皇太后在天之灵，难以安心，况且，皇后、皇妃们也劝圣上回去，老朽的意见，还是回大内为好！”

世宗见严嵩搬出祖规，不便发火。他深知，按照明太祖的规矩，身为天子是不宜寝于他宫的，然而大内乾清宫里留下冤死的端妃的身影，如果回去睹物思情，更加难以安寝，为此，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想回乾清宫，于是世宗又改变话题道：

“遵照祖规，是该回去的，此事以后再议。朕以为，永寿宫遭灾，在此重新营造一所寝宫如何？”

“不可，不可！”严嵩一时未转过弯来，仍然固执己见道：“毋须营建新宫，圣上今夜就应回去，祖先和后妃们就都安心了。”

“容朕三思耳！”世宗很不高兴，也不再说话。

严嵩仍旧匍匐着倒退爬出去，悻悻地离开了玉熙殿。

当日下午，世宗传徐阶，恰好徐阶来西苑要拜见皇上。随着太监的喊声，应声即到。世宗道：

“朕所眠居之玉熙殿，潮湿狭小，难以成眠，严阁老劝朕移驾乾清宫，不知徐爱卿意下如何？”

徐阶听世宗一说，突然想起了“壬寅之变”。严嵩实在是老糊涂了，怎么能劝皇上回乾清宫呢？于是，急忙答道：

“回圣上的话，依微臣之见，坚决不能移驾乾清宫。当前，工部正在整修奉天殿、华盖殿和谨身殿，所余木瓦石料很多，臣命工部尚

书雷礼，在西苑重新建一幢宫殿，起名为万寿宫，请圣上移驾万寿宫，如何？”

世宗传徐阶应声就到，而且看到徐阶眉清目秀，年轻力壮，立刻眼睛一亮，好感油然而生。再加上徐阶一番通情达理的话，使世宗高兴异常，道：

“准爱卿所奏，即刻就办。‘永寿宫’改成‘万寿宫’也很好。”

世宗立即降旨，加派徐阶的儿子徐璠为工部主事，负责督工。只用十旬时间，一座华丽的万寿宫即完工，即日世宗迁居新宫。

万寿宫比乾清宫和永寿宫皆大四、五倍，宫内四处镶金铺银，闪闪发光。世宗住进去，很得意，升徐阶为少师，兼食尚书俸禄，徐璠也晋升为太常少卿。从此，严嵩被世宗所冷落。

徐阶看到严嵩在世宗面前，威信开始下降，感到很高兴。但徐阶认为，严嵩很会谄媚，在皇上面前变幻无穷，不知何时又会得宠。所以要彻底揭露严家父子的罪恶，使其威信扫地，这样朝廷的正气才能上升，社稷才能更加牢固。如何才能揭露他的罪行呢？徐阶突然想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邹应龙，也是他的得意门生，和他商议一下，想必会更加周全一些。

邹应龙，字云卿，长安人。长得虎背熊腰，满脸胡须，一看就知道是个豪爽之人。徐阶和他谈起严家父子的罪行，邹应龙也是恨得咬牙切齿，早就想上疏弹劾严嵩。徐阶道：

“严家的祸根是严嵩，但严嵩在世宗面前，威信尚在，难以弹劾，但其子世蕃在父亲的纵容包庇下，无恶不做，罪孽深重，可先弹劾其子，子一倒，其父必倒矣！”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邹应龙遵照徐阶的意见，起草了弹劾严世蕃的奏章，内容如下：

工部侍郎严世蕃凭藉父权，专利无厌。私擅爵赏，广致赂遗。使选法败坏，市道公行。群小兢趋，要价转钜。刑部主事项治元以万三千金转吏部，举人潘鸿业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夫司属郡吏赂以千万，则大而公卿方岳，又安知纪极。

平时交通贿，为之居间不下百十余人，而其子锦衣严鹤、中书严鸿、家人严年、幕客中书罗龙文为甚。年尤桀黠，士大夫无耻者至呼为鹤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辄献万金为寿。臧获富侈若是，主人当何如？

嵩父子故籍袁州，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扬州，无虑数十所，以豪仆严冬主之。抑勒侵夺，民怨入骨。外地牟利若是，乡里又何如？

尤可异者，世蕃丧母，陛下以嵩年高，特留侍养，令鹤扶南还。世蕃乃聚狎客，拥艳姬，恒舞酣歌，人纪灭绝。至鹤之无知，则以祖母丧为奇货，所至驿骚，要索百故。诸司承奉，郡邑为空。

今天下水旱频仍，南北多警。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掙克，内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塞被壑。民安得不贪，国安得不病，天人灾变安得不迭至也。臣请斩世蕃首于市，以为人臣凶横不忠之戒。苟臣一言失实，甘伏显戮。嵩溺爱恶子，召赂市权，亦宜亟放归田，用清政本。

连日来，世宗听几位太监说，严世蕃居丧淫纵，使世宗对其产生了反感。恰好方士蓝道行入宫扶乩，世宗询问几位辅臣贤忠与否。因蓝道行对严家父子怀有恶感，便在砂盘上写出：严嵩、严世蕃为奸臣；徐阶为贤臣的字样。

世宗极为崇信扶乩，再加上御览了邹应龙的上疏，立即下诏，将严嵩罢官回乡，并将严世蕃下狱。晋升邹应龙为通政司参议。

世宗将严嵩罢官后，晋升徐阶为首辅。可是，世宗多日看不见严嵩还有些想念，每日闷闷不乐。御笔手书给徐阶道：

“嵩已退，其子已伏诛，敢再言者，当并应龙斩之。”

由此，在朝廷中，无人再提严家父子的事。

严家父子倒台，朝廷文武百官高兴异常，对新首辅徐阶寄予厚望。徐阶接替首辅重任之后，亦深感力不从心。因为严嵩在朝廷执政达二十年之久，其党羽盘根错节，影响遍及各个方面，想要改变朝廷的面貌比登天都难。

徐阶思考再三，首先应从消除严嵩父子独霸朝廷入手，提出：“以威福还主上，以政务还诸司，以用舍刑赏还公论”的政策，欲使朝政有一个初步的改变。徐阶将其方针上疏世宗，得到世宗的御批。遵照这三项方针，各项政务皆由各部行事，毋须首辅一人包办代替；各部论功行赏、赏罚分明，除去功过不分，劳而无功的弊端。朝廷上无不齐声赞誉。

徐阶当政不久，六部的政务皆有新的起色，一些大臣纷纷上疏世宗，认为徐阶领导有方，是名符其实的贤臣。世宗也对徐阶十分器重，深感重用严嵩有些欠妥。一日，世宗召来徐阶问道：

“朕对严嵩十分信任，官至极品，家财万贯，竟与朕相悖，可见，知人之难矣。”

徐阶道：“大奸似忠，大诈似信。惟广听纳，则穷凶极恶，人为我撻之；深情隐匿、人为我发之。故圣帝明王，有言必察。即不实，小者置之，大则薄责而容之，以鼓来者。”

“好，甚好！”世宗道：“今后不能独听一家之言，应集百官之慧，方能坚社稷之固也。”

由此，朝廷益发广开言路，合理的奏章皆被采纳；有些抨击过火的奏章，一般不予追究。朝廷开始有了活跃的民主气氛。

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月，俺答流寇辛爱和把都儿率众，从长城墙自岭、磨刀峪溃墙处，进犯中原，京师戒严。世宗正在万寿宫斋醮，闻讯，大吃一惊。速召徐阶道：

“朕东见火光，此贼离京不远，速令兵部谕诸军并力剿逐。”

“流寇入疆，臣早已知晓。”徐阶奏道：“圣上正在斋醮，兵部尚书杨博不敢奏，曾与臣谋划，现正命宣府总兵官马芳、宣大总督江东驰援。”

“徐阁老之谋划，朕放心矣，万勿重蹈庚戌之覆辙，有人仿效丁、仇之举，定斩不赦。”

于是，在徐阶和杨博的亲自指挥下，马芳率兵首先挡住了流寇的攻势；江东又统兵从侧面攻击。流寇的骑兵战斗力很强，他们从通州抢掠到香河。徐阶指挥大军加强顺义城的守备，又派参将郭琥在古北口埋伏。流寇攻打顺义惨遭失败，乃往古北口窜逃，遭到郭琥伏兵的截杀，除了将所掠之人畜辎重截获之外，又杀死流寇百余人。此次流寇入侵被打退，明军大获全胜。

世宗得到消息，大喜。犒赏宣府、宣大两路兵马。晋升徐阶为建极殿大学士。

徐阶升入首辅时，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袁炜经常出入西苑，受到世宗的重用。他原先与严嵩关系不睦，朝廷的重大决策，严嵩从不与其商议，而袁炜青词写得好，世宗也要高看他三分，严嵩对他也没什么办法。徐阶当政以后，认为袁炜是个人才，遇事即找他商议，世宗的圣旨请他一起共同票拟。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春，袁炜请假回乡养病，不幸于路上去世，终年58岁。此时，只剩下徐阶一个人独当国政，而朝廷已开始步入正轨，风气日正。世宗对徐阶更加重视，见不到徐阶，即手书问安，谆恳如家人，恩礼特厚：赐玉带、蟒、

珍药。使徐阶更加谦恭谨慎。世宗委托的大事，徐阶经常通宵不眠，直到任务完成为止；要求票拟的应制之文，不到片刻工夫即可撰写好，呈给世宗。徐阶的工作效率是世宗一朝所有首辅中最快的，世宗日益钟爱徐阶，有很多事务，交徐阶自行办理，不必上奏。

自嘉靖中叶以来，南北边防经常用兵打仗，因为朝廷不抓防务，边防一触即溃，边镇大臣常常受到弹劾，轻则下狱，重则被诛。为此，边镇大臣时时小心翼翼，不知何时突然获罪。徐阶当国后，增加了边防兵力，精减了不称职的将士，南北防务皆得到了加强。由此，下诏入狱者渐渐少了，边镇大臣经常受到嘉奖。于是朝廷文武百官都议论，徐阶是一位称职的内阁首辅。

一日，学生张居正来访。张居正自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因身体衰弱，告假回籍养病，在故乡闲居六年。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回京，在徐阶的荐举下，由翰林院编修，升任右春坊右中允，领国子监司业。当时正值徐阶与严嵩明争暗斗之时，张居正坚决站在徐阶一边，为其出谋献策。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徐阶代严嵩为首辅之后，推荐张居正充任《承天大志》副总裁，经过八个月草成二十纪，呈给世宗，得到嘉奖。第二年，升任张居正为右春坊右谕德。徐阶看到世宗第三子裕王朱载，是个聪慧的王子，将来可承帝业，便派张居正充当裕王的讲官，为张居正日后辅佐帝业做好准备。

徐阶升任首辅后，张居正经常来徐府拜访，向老师问安。这次是刚刚从裕王府讲书归来，有急事向徐阶禀报。张居正道：

“晚生在裕王府听到一个消息，据王府官员说，景王病危，难以救治，特向老师报信。”

“好！”徐阶道：“景王宾天是裕王的福气，也是你的机遇。看来，老师的安排还是得体的。”

世宗一共生了八个儿子，除了三子裕王、四子景王长大成人外，其余六子皆夭折。景王被封于楚地，在当地侵夺民田，横行霸道，百姓苦不堪言。更有甚者，多年来，一直在积蓄力量，欲夺嗣位，丝毫不把裕王看在眼里，景王之病危，却是朝廷的福音。

不出所料，数日后，景王病逝，终年二十六岁。徐阶派大臣去楚地进行了详细调查，百姓纷纷控告景王的罪行。徐阶上疏世宗，将景府所占民田数万顷归还于民，楚人大悦。世宗第四子去世，为父者并不十分悲痛，而向徐阶道：

“此子素谋夺嫡，今死矣！”

世宗也认为朝廷除去一大祸害，但是过了不久，世宗想起四子的好处，不禁又思念起来。由此，身体日渐不支，进行斋醮活动都难以坚持。

一位太监介绍，说宣府有位方士胡大顺，会炼金丹，服后长生不老。世宗信以为真，便派人将其接进宫内。

此人约有五十多岁，身材矮小，比桌子稍高一些，一只眼，跛脚，走路一瘸一拐的。进宫后，躲于密室，要四名宫女陪伴，七七四十九天即炼出金丹十粒，而四名宫女皆变成了哑巴，说不出话来。

徐阶对胡大顺进宫炼丹一事，十分关切，四十九天之后，见四名宫女成了哑巴，感到蹊跷，便将四名宫女传来问话，四名宫女均用手比划，弄不清是什么意思。但有一名宫女读过书，会写字，便写出下面一段文字：

“在密室中，方士每天奸污我们四人各一次，用其秽物，炼成丹药，药成后，将我们四人的舌根刺破，不准说出实情。”

徐阶读后，恍然大悟，方知胡大顺乃是恶人骗子。将其罪状，上奏世宗。此时世宗已将金丹服了三粒，看到徐阶的奏章和宫女的供词，不太相信，即传来胡大顺问道：

“方士之金丹，是如何炼成？”

“为四十九天不见天日精华所炼！”

“所言之精液，是何物？”

“是人体之精液，比圣上过去所服之丹药要强几十倍！”

世宗听说所服丹药乃人体之精液，立刻恶心要吐，连连说道：

“骗子，骗子，速将其处以磔刑。”

胡大顺受召，原以为皇上会嘉奖，没想到成了死罪，便放声大哭道：

“此乃师傅之真传，治好了多人之顽疾，可长生不老！小人冤枉，请万岁爷饶命！”

任凭胡大顺高声求救，也无济于事。午时三刻，胡大顺被牵至西市伏法。很多人熟知，他是一个奸污妇女的大骗子。

户部主事海瑞见世宗乃是迷恋于斋醮不理朝政，便上疏世宗，极陈帝失，世宗大怒，欲杀掉海瑞。徐阶认为海瑞是一个难得的清官，在世宗面前，再三说情，只将其下狱，等待处决。

世宗在病中，欲建雩坛及兴都宫殿，徐阶力劝，没有建成，为朝廷节省了一大笔白银。盐务官鄢懋卿没有和朝臣商议，将盐课税骤增至四十万两黄金，徐阶知道消息，立即加以制止。认为从明中叶以来百姓的赋税不断增加，但灾异多变，民不聊生，增加如此多的赋税，百姓的生活会更加困苦，结果，将骤增之四十万两黄金取消。

世宗自服用胡大顺的丹药后，病情日渐加重，在身体难以支撑的状况下，忽然提出欲驾临兴都，兴都是个遍地烟柳繁华之地，世宗以病体去兴都，凶多吉少。徐阶再三劝阻，终于没有去。

不久，世宗驾崩，享年六十一岁。

世宗驾崩，宫内外一片哀悼之声，惟独徐阶十分清醒，他立即找到张居正商议起草遗诏等事宜。

徐阶道：“你我在朝为官多年，盼望革除弊政，世宗宾天，是除去弊政的好机会。”

“此时如何能革除弊政？”张居正大惑不解道。

“居正有所不知。”徐阶道，“我于嘉靖二年(1523年)，二十岁时，考取进士，进入翰林院任庶吉士。当时就听说，朝廷首辅杨廷和是位敢想敢干的大臣。正德十六年(1521年)，武宗驾崩时，受太后嘱托起草遗诏，趁机革除武宗时一切弊政，朝廷上下大悦。你看，如今除去弊政的好时机不是来到了吗？”

“听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张居正道：“如何起草，请老师示教！”

“事不宜迟。”徐阶道：“居正手笔较快，将多年来难以解决的朝政，均可以写进去，天亮前草就，明晨交太后审阅，在裕王朱载登基前颁诏。”

张居正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不出两个时辰，草诏拟就：凡斋醮、土木、采购珠宝、织作等劳民伤财之举一律停止，因大礼仪之争而下狱者和获罪的诸臣一律平反。

草诏颁布之后，朝野受害者皆痛哭流涕，感激皇上不罪之恩。

隆庆元年(1567年)裕王朱载继位，是为穆宗。徐阶乃任首辅，与高拱、郭朴等三人组成新内阁。

高拱，字肃卿，新郑人。嘉靖二十年进士，曾给裕王讲学九年。与穆宗关系十分融洽，穆宗曾手书“怀贤忠贞”四个字赐给他。高拱身材高大，满脸胡须，说话声音如洪钟，妒心很强。

世宗在世时，徐阶的同乡、给事中胡应嘉曾上疏弹劾高拱，说世宗有病，高拱不在宫中守候。当时高拱怀疑是徐阶唆使。而世宗去世时，起草遗诏，徐阶只找张居正商议，而没有与他商量，由此记恨在心。

郭朴，字质夫，安阳人。嘉靖十四年进士，历任吏部左、右侍郎、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等职。与高拱一起入阁参预机务。他本是徐阶荐举入阁的，但徐阶升入首辅后，犒赏三军、去留大臣之事，皆不与其商议。故郭朴与高拱站在一起，处处反对徐阶。

徐阶原以为与他所荐举的高拱、郭朴三人一起辅佐穆宗，重整朝纲，没想到，从隆庆元年起，就与其二人发生了矛盾。

当郭朴看到徐阶和张居正起草的革除弊政的遗诏时，大骂道：

“徐公谤先帝，可斩也！”

高拱同意郭朴的谩骂，认为徐阶借世宗驾崩之机，将先朝之政绩一笔抹杀，有违世宗在天之灵。此动议，在朝廷百官中没有得到响应，故未曾上疏穆宗。

当时，正值给事中胡应嘉负责部院考察被黜者，工作即将结束。高拱和郭朴认为这是打击徐阶的好机会，因为胡应嘉的工作是徐阶布置的，如果将胡应嘉的工作全盘否定，徐阶的首辅地位亦就保不住了。

于是二人联合上疏穆宗，说胡应嘉在诬陷先帝，将先帝的功绩全盘否定，是对祖先的大不敬。穆宗是一位比较和气的皇帝，因为刚刚登基，有些事难以明断，便和大臣们商量。郭朴奋然道：

“胡应嘉无人臣礼，诽谤先君，应削籍为民。”

“郭尚书言之有理。”高拱支持郭朴的意见，“胡应嘉之举不得民心，先帝尸骨未寒，将其诬为暴君，是可忍孰不可忍！”

朝廷文武百官，由高、郭带头，七嘴八舌，将胡应嘉的工作，予以否定，并大有下狱或杀头之势。徐阶见状想到，如胡应嘉有罪，他是此项工作的主持者，必定亦有罪，于是立即停止商议，宣布改日再议。

数日后，朝廷百官聚议，大多数言官一致谴责高拱，说他是以私怨胡应嘉，矛头是针对徐阶。给事中欧阳一敬，弹劾高拱最为积极，他说，世宗斋醮，不理朝政，致使严家父子独霸朝纲。高拱攻击反对严嵩的徐阶，是为严家父子张目，也是否定世宗罢黜严嵩之功绩，是对先君的诬陷。欧阳一敬的言论一出，百官皆拥护。高拱和郭朴二人狼狈不堪。

由此，朝廷就胡应嘉的工作，进行一场大辩论。徐阶与高拱的辩论最为激烈，二人在内阁泰和殿中，对骂，皆脸红脖子粗，怒发冲冠，各不相让。

高拱在与徐阶的争吵中，忽然想到御史齐康曾向他介绍，徐阶有两个儿子，在乡里横行霸道，抢夺民田。于是立即命齐康上疏，弹劾徐阶纵容儿子横行乡里。

穆宗阅后，难以决断，便转交内阁处理。徐阶知道后，急忙上疏申辩，说此事为数年前所为，已经对二子进行了教育，齐康上疏乃是为高拱攻击自己而张目。经过吏部的查证，果然如是，齐康被贬官。

在朝廷文武百官中，拥护徐阶者为大多数，为此，每天高拱都遭致攻击。甚至在京师街道上，百姓遇到高拱，皆骂他：“诬陷徐阁老，是为昏君撑腰，欲使大明王朝败亡！”

高拱遭受如此的攻击，心中实为不安，找到郭朴商议道：

“徐公心腹太多，如何是好？”

“高公，勿躁，你我皆是穆宗的老师，感情笃深，为与徐公争吵故，共同上疏乞归，徐公必倒无疑。”

“此计甚妙，只是归乡后，何日回朝，难以估料？”高拱道。

“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郭朴道：“归乡后尽享天伦之乐，与世无争，幸甚！”

隆庆元年(1567年)五月，高拱上奏穆宗，乞归。穆宗再三挽留，高拱坚持归乡养病。遂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衔，回乡养病。接着郭朴也上奏，乞归，穆宗亦再三挽留，郭朴三次上疏，终于回到故乡。家居二十余年去世。郭朴为人耿直，以廉洁著称，辅政二年没有过错。为了高拱的缘故，不容于朝，当时很多人感到可惜。

穆宗见陪伴他多年的两位老师皆辞官回乡，心情十分沉闷。开始对徐阶产生了反感，只因为徐阶是先皇所立之首辅，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内阁只剩下徐阶一个人之后，他感到轻松很多，除去二个对立面，可以施展多年来欲整治朝纲的抱负，于是推举李春芳和张居正进入内阁，希望得到他们的配合，将严家父子搅乱的朝纲重新整顿一下，为辅佐新君做点贡献。

因为世宗一朝积怨太多，有些给事、御史多是被贬逐又起用的，对朝廷意见很大，如今依仗徐阶的势力，对弊政进行猛烈的抨击。穆

宗御览这些奏章，多数都接受不了，而且越来越反感，为此召见徐阶，希望首辅能认真对待这些过激的奏章，并对这些给事、御史给予适当的处置。

徐阶对这些言官敢于发表意见，抨击时弊感到高兴，认为这是扭转政局，振兴朝纲的好兆头。穆宗的一席话，给他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他将言官召集到一起说道：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敢于上疏，不怕杀头，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上疏的矛头应加以疏导，不能完全对准皇上。上欲谴，我曹当力争，乃可导之谴乎。”

由此，言官们欲协助徐阶重整朝纲的积极性立刻消沉下来。大家都为新君唱赞歌，穆宗亦勿之罪。

时值中秋佳节来临，皇宫内到处张灯结彩十分热闹。每年中秋节，皆由翰林院主办，要花费十多万两白银，耍龙灯，跑旱船，扭秧歌，赛龙舟，在宫内还要大摆宴席，欢庆一番。徐阶上疏穆宗，请示罢宴，可省去几万两白银。穆宗同意徐阶的建议，也得到不少大臣们的拥护。隆庆元年皇宫中的中秋节过得简朴而热闹，有一个祥和的气氛。

中秋节过后，南京传来消息，振武营部分士卒哗变，对将军克扣军饷，吃不饱饭不满。振武营是看守太祖朱元璋孝陵的部队，很多人都是当年朱元璋部下老兵的子孙后代，都是世代代当兵，这些人自以为老子有功，受过太祖的褒奖，皆不把当朝大臣或天子放在眼里，遇有灾异祸端，即动刀枪，杀人放火。所以屡次哗变，朝廷无人敢管。

穆宗接到奏章，不知如何是好，召来徐阶，道：

“振武营兵哗变，派兵包围弹压如何？”

“回皇上的话，千万不可以。”徐阶道，“哗兵所据，乃孝陵也，不可攻打。依臣之见，先令操江都御史唐进禄督江防兵驻陵旁，而将

振武营兵慢慢遣散，哗变之兵不能以孝陵做依靠，将自动躲藏，销声匿迹。”

按照徐阶的意见，屡次哗变的振武营，果然被制服，孝陵一带从此安定下来。

一日，一群小太监在午门外与一位御史争吵起来。太监们最痛恨的就是御史衙门，他们皆用笔杀人，经常是无中生有，无理也强辩三分。于是一群小太监一拥而上，将御史官员打得半死。

都御史王廷得到消息，禀告徐阶，欲将小太监全部抓起来审讯，徐阶道：

“法难责众。一百多位小太监，不能都抓起来，应当处罚他们的主谋，不知道主谋是谁？抓也没什么作用，而且还会反诬我们迫害众人。”

徐阶让他派人去宫中，了解情况，诱导大太监说出主谋是谁？然后分别逮捕治罪。

徐阶任首辅之后，执掌朝政，讲究策略、方法，使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皆迎刃而解。所以朝廷百官一致认为，徐阶是一位聪明、肯于动脑筋的首辅，在他的领导之下，各部工作皆开展得很顺利，使嘉靖皇朝江河日下的局面，开始有了好转的苗头。

徐阶为了改革弊政，裁减冗员，整顿纪律，难免要得罪一些大臣。给事中张齐以私怨总结徐阶若干罪状上疏弹劾他。徐阶见是一位小小的言官侮辱他，恼羞成怒，立即上疏穆宗，辞官回乡。以往的做法是，穆宗将张齐贬逐或廷杖，再三挽留，徐阶方能继续执政。而这次出人意料之外，穆宗对张齐的弹劾，无动于衷，而竟恩准了徐阶辞官回乡的奏章。

隆庆二年(1568年)秋。

徐阶深知穆宗已对其失去了好感与信任，改革弊政的抱负只好付之东流。这一年，徐阶已六十五岁，吩咐子女、家人收拾行装，准备返回华亭家乡。

临行前，徐阶拜访了张居正。老泪纵横，道：

“老师去矣，朝廷大事交给你，深信老师的眼力不会有差，吾在京之璠、琨、瑛三犬子亦托附给你照看。”

张居正亦满眼含泪与老师依依惜别道：

“感谢老师多年培育之恩，居正之所以有今日，全是老师栽培的结果，老师的恩德，张家世代都要永志不忘！”

徐阶向穆宗告别，穆宗赐白金宝钞、彩币、裘衣等。举朝官员步出午门，送徐阶回乡。

徐阶辞官后，李春芳升为首辅。不久，穆宗又把回乡养病的高拱召回。李春芳被贬，高拱升为首辅，将徐阶的改革全盘否定，平反的冤案又翻过来。高拱复出后，开始不遗余力迫害徐阶，指使地方官，将徐阶的田产抄没，将两个曾经横行乡里的儿子戍边。欲进一步迫害，被张居正所劝阻。

徐阶回乡后，常常写诗作文，著有《经业堂集》、《少湖文集》。

万历十一年(1583年)徐阶病逝，终年八十一岁。朝廷赠太师衔，谥号文贞。

徐阶的弟弟徐陡，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侍郎。子璠，荫官太常卿，琨、瑛，任尚宝卿。孙元春，进士，亦官太常卿。元春孙本高，官至锦衣千户。天启中拒魏忠贤建祠夺职，崇祯改元后又升官为左都督。徐阶的后代徐念祖，明朝灭亡时，与妻张氏两妾陆氏、李氏皆自缢，表达了徐家子孙后代忠于大明王朝的心意。

徐阶是一个有能力、有抱负的首辅，对嘉靖、隆庆两朝的弊政有所匡救，而且培育了万历年间的改革家张居正。徐阶的最大特点是，在政务工作中有耐心，讲究方法，绝不蛮干。善于解决棘手的问题，所以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政治家。

海瑞

嘉靖朝，世宗朱厚，喜神仙道术，祈求长生不老，政事荒怠，国力渐衰。海瑞见状，购买棺材，诀别妻子，辞退仆人，上疏皇帝，以死陈谏。皇帝大怒，将其逮狱论死。海瑞毫不畏惧，视死如归……

黄昏时分，海边，低矮的茅屋里。

灯下，一个四五岁的男孩跪在墙角读书；还有一位近三十岁的少妇在做针线。男孩在读《孝经》，似乎是犯了什么错误，在受罚，左一遍右一遍读个不停。少妇脸色严肃，正襟危坐，一边忙手里的针线，一边在观察男孩读书的情态。

二更时分，男孩轻声道：

“妈妈，我已经背会了！”

“好吧，站起来背一遍我听听。”

男孩站起来，将《孝经》第二章背诵一遍。

“好了。”少妇道，“妈妈布置的功课，一定要完成。下次不准贪玩，再贪玩，还要罚跪，睡觉去吧！”

“我再也不贪玩了。”男孩道，“妈妈你也早点睡吧。”

男孩兴致勃勃地躺下，瞬间睡着了。

四更时分。男孩醒来，见妈妈还在做针线，便道：

“妈妈，快天亮了吧？怎么还不睡？”

“邻居张大妈给揽的活，明天就要，妈妈要趁天亮前赶出来。孩子，赶快睡吧！”

男孩看到，灯下妈妈那张俊俏的脸庞消瘦多了，额头上开始出现皱纹。他翻来复去睡不着，便说道：

“妈妈，我要快快长大，帮你干活，你就不用贪黑起早了。”

“傻孩子。”少妇道，“现在妈妈用不着你干活，把书读好了就行。妈妈盼望的就是，你要刻苦攻读，金榜题名，升官发财。到那时候，妈妈才真的不用贪黑起早了。”

“妈妈，我今后一定不贪玩，布置的功课一定完成……”

男孩说着，复又沉沉睡去。少妇给男孩盖好被子，又拿起针线活做了起来。

不久，纸窗上微微出现晨曦的曙光。少妇还在一针一线地忙着，看着熟睡的男孩，禁不住会心地笑了。

这个男孩就是海瑞，少妇是他的母亲谢氏。这是海瑞的父亲去世后，母子相依为命的情景。

海瑞，字汝贤，回族，自号刚峰，人称刚峰先生。他的祖籍福建，南宋时迁到广东番禺，明朝初年又迁到海南岛琼山县居所，后移居海口镇。

海瑞生于正德九年(1514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祖父海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有子侄五人：海澄为进士，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海澜、海鹏、海迈都是举人，父亲海翰是个廩生。海瑞四岁时父亲去世，年仅二十八岁的谢氏便靠祖上留下的十几亩租田和替人家做针线活，过着孤儿寡母相依为命的贫苦生活。谢氏个性坚毅，对海瑞的教育很严格，为海瑞选择老师更是慎重，这对以后海瑞刚强正直性格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母亲严格地教诲下，海瑞树立了明确的学习目标和崇高的志向，就是要为巩固大明江山，改革弊政，改变社会不良习气而努力学习。所以进入郡学之后，不但刻苦读书，而且还经常严格要求自己，修身养性，他在《规士文》中追忆当小秀才的情景，写道：

“余作小秀才时，见同学长者竦然恭敬，不敢在旁高言大笑，不敢在班乱序先行。迎骑于长者，道旁勒马；同席于长者，告坐隅迁；吩咐惟惟听从，使令中医奔走。夫礼非以尊人，尽吾道耳。不循理非以慢人，自弃其道耳。尊长尚存谦虚，卑幼岂宜倨傲、况尊长之年轮到其身，卑幼如斯，果能堪否？”

海瑞在郡学读书时，还先后写过《严师教戒》、《客位告辞》和《训诸子说》等治学之篇，表达了一个有志少年的理想和抱负。《严师教戒》篇说道。

“尝读至论，谓尊崇正学在君师，绍明绝学在宗师，至发蒙学后而提督之，又有教师职焉。此欧阳永叔祖韩昌黎之严谨而宗风之者。师固足重也。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义友耶？故尼父以善为芝兰，臧孙以恶为药石。君子能降师亲友，则雾扫空澄，纤毫不苟，浩然之气塞乎苍冥。果何至是？得力于师友者良多也。夫人外无师友之益，而欲所行之协于道，亦难矣。瑞为此惧！一旦召神立腔子下，诲之曰：“瑞，汝知女之得生于天地之间者乎？有此生必求无忝此生而后可。无忝者，圣人我师，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竟跻巍科、陟仕之谓也。汝今亦小寓于其间矣。入府县而得钱易易焉，宫室妻妾，无宁一动其心于此乎？昔有所操，今或为者一易之乎？财帛世界，无能屹中流之砥柱乎？将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则愧影，寝则愧衾，徒对人口语以自雄？质冕裳而有媚心焉，无能以义自亢乎？参之衣狐貉而有心焉，忘我之重乎？或疚中而气馁焉，不能长江大河浩浩然而莫御矣乎？小有得则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达，不能无竞心乎？讳己之疾，凡百所事，不免于私己乎？穷天地、亘古今而不顾者，终亦不然乎？夫人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德之难。于此有一焉，下亏尔形，上辱尔先矣。天以完节付汝，而汝不能以全体将之，亦奚颜以立于天地间耶？俯首索气，纵其一举而跻己于卿相之列，天下为之奔趋焉，无足齿也。呜呼！瑞有一于此，不如速死！三复斯言，凛若严师叮咛夏楚之督尔上，纷如直友箴规啐詈之诤尔旁。”

从上述文章中可以看出，海瑞在学习中，不仅学习知识，而且注意品德修养，把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看得尤为重要。这是母亲自幼

严格教育的结果。据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海忠介实录》中说：

“谢氏志教育，有戏谑，必严词正色诲之。”

另外，同邑人张子翼在《海南谢太夫人贞节卷题后》中也说：

“世道已波澜，汨汨长江泻。

砥柱屹悬梁，谁是中流者。

秋霜撼陵谷，艰哉慈母寡。

斜月照孤帟，苍鼠落残瓦。

结缡誓如初，抚孤泪盈把。

宣文还隔幔，浔阳时却鲋。

薄俗此挽回，内则今陶冶。

教子为名臣，直声动朝野。

邻卜喜王翰，弩负卑司马。

积善庆所余，造化不忍舍。

圣世重纲常，优诏南天下。

列传昭彤管，讴歌赠大雅。

嗟哉贤母心，褒旌非所假。

千年桂水情，应照寒山舍。

诗中可以看出谢母谆谆教子成才的情况。还有，海瑞在赴京会试前夕写的《与琼乡诸先生书》中详细叙述了母谢氏的苦节：

“瑞甫四岁丧父，时母谢氏年二十八，承父志励节确守，经今三十有四春秋矣。一终之行，无毫厘玷。古称陶婴，共姜辈，直可以相上下而无愧焉者。盖母幼粗识书史语，瑞少年，口授《孝经》、《书》、《庸》等篇。质秉近刚一，父性警敏不羁，不事家人生产，相励盛护持，能使内外不致乏绝。先后苦针裁、营衣食、节费资，督瑞学，至今虽襄疾相仍，不能一息少暇汝事，为疾忧计。日夜同瑞寝

处。访询戚近，卷卷然举而托之严明之师，以琢以磨，兼有父道。瑞今日稍知礼义，勉自慎伤，若非冲年背父者，尽母氏谆谆开我力也。持家有纪法，教子有义方，律身以正义……”

由上述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海瑞出仕前，良好的家教，是使其成为一代名人的基础。正如俗语所说的：家严出孝子，贫困出人才。

春天来到海南岛。蓝天白云，海浪翻滚，蕉叶片片，鱼帆点点。海滩上，海瑞和学友德宏在嬉戏。海瑞已长成十六岁的少年，身材清瘦，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正在琼山郡学学习。德宏与其年龄相仿，身材矮小、瘦弱，穿着五颜六色的黎族服装。海边留下他们的足迹，空中响起他们的笑声。

这是海瑞在琼山郡学相识的黎族学友。德宏的家在五指山，是投靠海口的亲属入郡学学习。因两人的家庭生活都比较困难，志向、趣味相投，故成为亲密无间的好友。

黎族为古越人的一支繁衍而成，聚居于海南岛的中南部，人口有十多万人。尚处于原始氏族公社制阶段。每一个氏族，有一个头领，由十多个家庭父系血缘关系组成，大伙做工，互助共耕。

由德宏邀请，海瑞到他家去做客。好友家居住在保亭、琼中、乐东三县交界处。村寨在山腰间一个平坝上，寨中有数十间竹楼。每间竹楼下，养有牛羊；顺着竹梯上去，是卧室。室内设施非常简陋，除了地铺上有两床粗布被褥之外，其余一无所有。德宏的曾祖父九十多岁了，是他们这一村寨氏族的首长。他有八个儿子，老二是德宏的爷爷。德宏爷爷还有六个儿子，大儿子是德宏的父亲。德宏一家共有八十七口人在一起生活。一起干活，一起吃饭。靠近平坝上种一点地，在山里采野菜、打猎为生。生活极为困难，很多人没有衣服穿，成年

人只在腰围一块兽皮。遇见灾荒之年，整个家庭吃不上饭，只靠吃野菜、野果充饥，生下的男孩想方设法喂活，女孩就扔掉喂狗。德宏是因为他爷爷有一个汉族朋友在海口镇，为了不让孩子饿死，寄居在朋友家。这位朋友见德宏聪明，即送到郡学学习。

海瑞来到黎民村寨，开始时穿着黎族服装，寨民们没有注意他，当得知他是汉族人的孩子，对他都投来仇恨的目光。德宏向寨民们再三解释，海瑞是海宽的孙子时，大家对他才比较友善一些。因为海宽曾任福建松溪县知县，曾经释放过黎族的一个大头领，在黎民中一提海宽都竖起大拇指。

海瑞曾经参加了黎族的篝火晚会。在山沟的平坝上，中间点起树枝，火焰熊熊，青年男女围着篝火边唱边跳。有些女孩子没有衣服穿，只在腰围一圈树叶，光着脚跳舞，尖声尖气的歌声在山谷回荡。海瑞不会跳舞，只是和青年们来回走。女孩子们发现村寨中来了一位陌生的年青英俊的小伙子，便围过来，与他调笑，有几个顽皮的女孩，要把他抢回家去。吓得海瑞不知如何是好，在德宏再三的劝说下，他们才放过海瑞，但是却缠住德宏不放，让德宏答应明天晚上陪她们玩，才算罢休。

海瑞在黎族村寨玩了半个月，玩得十分开心，与十多位黎族青年交了朋友。海瑞虽然不懂黎族语言，和他们交谈有时用手势，有时由德宏翻译。海瑞问道：

“我刚来村寨时，寨民为什么对我十分仇恨？”

“因为汉官欺压黎民。”一位黎族青年说道。

“汉官到了黎寨，不是杀人，就是抢牛羊。还抢黎族少女，捉回家当奴隶。”另一位青年说道。

“汉官为什么要杀黎族人呢？”海瑞又问道。

“因为黎族人见着汉官就杀，有时见到汉族百姓也杀，由此冤冤相报，世世代代传下来了。”一位青年回答道。

“我们都住在一个海岛上，应当和睦相处，不应当仇杀。过去的年代让我们把它忘记，从我们这一代，要成为好朋友。”海瑞提议道。

“汉族人都应当像海宽一样，对黎族人友好，黎族人都会敬仰他。我们肯定会成为好朋友？”黎族青年异口同声地说道。

“不过。”德宏补充说道，“汉官对黎族人民的镇压，愈演愈烈，而黎族人民的反抗也更加强烈，民族间的仇恨根深蒂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化解，非一朝一夕能够实现。”

海瑞明白德宏话中包含的内容。在郡学他们都听老师讲过，近几十年来，汉族官军对黎族人民反抗起义多次进行征讨。第一次是弘治十四年(1501年)，征剿儋州昌化北县黎民起义，还有嘉靖二十年(1541年)，征剿陵水县崖州黎民起义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征剿感恩县崖州黎民起义。这三次征剿杀死黎族人民数万人，捣毁黎民村寨数百个，使几千名黎民百姓无家可归。

海瑞从德宏家乡归来后，脑子中，对如何对待黎族人民的反抗，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他认为对待黎族百姓，只能疏导治理，不能征剿镇压。应当在黎族集中居住区设立县治，修筑大道，以便利的交通促进黎汉两族的交融与接触。这一想法，他在乡试中充分表达出来。其内容简述如下：

“三大举，功亏一篑，坐失时机，陛下将奚取哉！臣虽未手操矢刃，地方变故，区处事宜，则习闻知矣。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黎歧动变尽为良民，臣亦能之。事如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第臣平昔濡染瀚墨之人，一旦言及军旅，似可骇听。夫琼固有兵备副使之设矣，于此不为，是谓虚位。

伏乞陛下明敕君臣中知识事机，力可大任、不贪富贵、志在立功者，以之充兵备副使，以专治黎之任。琼去京师万里，当事请裁，或致迟误。设县立所，限其大概；乘机审势，听其便宜。”又陈：“招民、置军、设里、建学、迁创县所、屯田、巡司驿递七事并图说。时以疏下兵部议覆，卒不施行。会试报罢，遂南归。”

海瑞认为，解决黎族反抗问题必须调整政策。这些远见卓识显示了海瑞具有非凡的理政才能。当时海瑞三十四岁，这一年海瑞以《治黎策》而中举人。

然而，朝廷对海瑞的《治黎策》并未重视。王国宪在作《海忠介公年谱》时，对朝廷不用海瑞的《治黎策》多所感慨。他说：

“公《治黎策》详言开道立县，化黎为民，计划久远，悉中机宜。惜当时不行，黎患留贻至今。”

于此，又据光绪十二三年间，督师抚黎，开道东西，“其十字大路，乃用公策。惜开道而无立县”，“亦其策之失也”。

王国宪作如此说，对海瑞的的怀念和敬佩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上民族斗争归根结底是个阶段斗争问题。在封建剥削的制度下，最高统治者是不可能接受来自一个会试不第的举人海瑞的的建议的。退一步说，即便朝廷按照海瑞的意见付诸实践，其效果未必如愿。因为在当时黎族百姓之所以起而反抗，这是封建制度本身决定的。这一社会问题，也决不是一两个人，或济之以什么灵丹妙药而能解决的。

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海瑞在乡试中，中了举人。喜报传至家中，母亲谢氏十分高兴。母亲拿出做针线活赚来的几钱银子，买来肉、鱼，炒了几个菜，招待邻居亲友。四邻、故友也纷纷前来祝贺。夸奖海瑞是个有出息的孩子，并赞誉谢氏教子有方。

因为家庭生活困难，按照海瑞的意愿，想在海口镇谋一职业养家糊口，可是母亲坚决不同意，执意让其明年去北京参加会试。谢氏道：

“吾儿在私塾和郡学读书，老师皆夸奖其是个人才，不去京会试，是终生的遗憾。母亲就是不吃不喝，卖掉祖上传下来的几亩薄田，也要送你进京。”

在谢氏的一再要求下，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春天，母亲和亲友凑足几十两银子，海瑞只身前往北京参加会试。

因为海瑞生于海南，长于海南，听人介绍，北京的春天很冷，母亲将他的新旧衣服全带上，背上一个大包袱，匆匆上路。

海瑞从海口渡海到达广东省之后，昼行夜宿，将近二十天才到达北京。他有时步行，有时乘车，有时乘船，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过去他只从书本上得知大明王朝，地大物博，这回深深感到大明王朝真正之大、山河之可爱，大开眼界。

到达北京后，海瑞宿于前门外一简陋客栈。海瑞在准备功课之余，游览了北京城。海瑞所居之海口镇，只有几万人口，而数十万人口的京师，纵横交错的宽阔的大街，摆满琳琅满目商品的商店和作坊，高大的城墙和金碧辉煌的皇宫，一切都使他兴奋不已。

海瑞参加会试，除了按规定题目撰写了文章外，还将《治黎策》整理、润色，抄写送交考官。主考的几位官员，对海瑞的《治黎策》很欣赏，不仅文章写得好，字体隽秀，而且内容适时，是为朝廷解除南方边民反抗的惟一策略。

当时，正值庚戌之变的前夕，世宗朱厚忙于斋醮，乞求长生不老，不理朝政，奸臣严嵩父子当政，凡是参加会试的举人都要给严嵩父子送礼、送银子，少则几千两，多则几万两，方能中进士。海瑞在客栈听说了这件事。他没有银子可送，最终会试落榜。海瑞参加会试后，

蒙古酋长俺答已经入侵北疆，正在准备围攻北京。海瑞在京师戒严前夕，匆匆离开北京，返回海南。

海瑞回乡后，情绪有些消沉，有意准备谋求职业，在母亲的再三劝说下，又准备三年。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春，赴京参加会试。此时，朝政和三年前一样腐败，严家父子在朝中更加横行无忌，有几位正直的官员如徐阶等人皆敢怒不敢言，世宗更加昏庸无道。有几位考官已经认识了海瑞，均知道《治黎策》写得好，但是严嵩等人连一眼都未看，认为黎民造反离北京远隔万里。有一位考官戏言道：

“如果海瑞能写出《治俺答策》严嵩或世宗皇帝或许能看一眼！”

会试结束，海瑞又不第。按照朝廷科举条例规定，举人会试不第可入监读书，待下次继续参加会试。若本人不愿入监读书，可听从吏部分派官职。海瑞不愿入监读书，毅然听从吏部选调。于同年闰三月，被任命为福建南平县教谕。教谕，为县学的最高长官。

海瑞回到家乡，母亲见到儿子，虽然没有中进士，但是已任职南平县教谕，亦甚为高兴。海瑞在家乡拜别四邻亲友，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到任，不久，将家产变卖，接母亲到南平县一起居住，由此，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南平县比海口镇要富裕得多，地处福建省中部是一个比较大的县。这里的县学比较混乱，学生少，收费高，若想到县学学习，必须行贿送礼，否则拒之门外，只好在家请先生教书。为此，很多穷苦家的孩子皆念不起书。海瑞当教谕后，一改陋习，即发《教约》，整顿风纪校规，广招学生。他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看不惯滥收学生礼物的现象，把收礼视为索取非分之财，对送礼者一概谢绝。

一天，她母亲在家。一位中年汉子拿着两只火腿送到家来，说他的儿子要到县学学习，因为家穷，拿不出更多的银子，只好送来火腿。海瑞知道这件事后，收下了这位学生，并退回了火腿。

海瑞认为府学、县学是朝廷培养人才的地方，教谕应该尽职尽责，主张教师和读书人应有自己的尊严，要尊师重教。

有一天，福建省延平府的官员到南平县县学来视察。县学里的官员都在跪迎这些尊贵的上司，而唯有前排一位清瘦的人，只作揖行礼，与左右两位早已跪倒在地的训导形成了左右低中间高的笔架势态。延平府的官员们大喊：

“是谁不下跪？哪里来的山字笔架竖在这里？”

做出这一惊人之举的就是南平县新来的教谕——海瑞，后来人们称其为笔架博士。

有人问海瑞，道：

“你为何不下跪？”

“县学是神圣的殿堂，此堂乃师长教习之地，教师不应对官员们随便下跪。”

海瑞的解释很有道理，延平府来的官员对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又有一次巡按御史到南平县来，视察县学，海瑞照旧还是揖而不跪，把一位官员吓得伸出了舌头，很久才缩了回去。巡按御史问道：

“站在本官面前的是何人？”

“孔圣人的门徒，县学教谕海瑞。”

“为何见了本官不跪？”

“教谕有自己的尊严，盖教官者能尊其身而后能尊先圣。不能尊其身，则何以代先圣而行其教，其辱先圣莫大焉。为此，瑞不应随便给哪位官员下跪！”

巡按御史见海瑞说得有道理，便不再责难。而这位抗礼不屈的“海教官”却泰然自若地挺立在那里。于是他赢得了“海强项”的美称。

在南平县任教谕期间，他对学生十分关心，体贴入微，常常和学生谈心，有困难者即解囊相助。他主张因材施教，不能对学生要求过高，对学习差的学生多给以辅助。

他在县学中积极提倡道德和文章不可分割。作《规士文》劝谕诸生写好文章，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在读书时，应以修身、操守、品德为尚，要向古人学习，向岳飞、文天祥等英雄豪杰学习。

在海瑞的精心管理、教诲下，南平县学办得虎虎有生气，很多家长慕名将孩子送来学习。海瑞在南平县任教谕四年，为朝廷培养了大批品学兼优的人才。

海瑞在南平县，除了专心教授生徒外，还留心时事，他写了《申海南道陈双山文》，继续阐述他在《治黎策》中的基本观点。陈双山，又名陈元珂，北直隶怀安县人，进士出身，嘉靖三十二年任海南道分巡按察副使。

海瑞的《申海南道陈双山文》一文在海南各地流传，深得下属官吏的欢迎，但上层官员不重视。海瑞对有关衙门不采纳他的建议表示气愤。他说道：

“本职思之日久，考之日深，问之日多，事决可成，成无后患。台下请壮胆行之。本职初官遽不得上人意，这等世界究竟做成甚事业！……奇货可居，无越于此，台下幸勿犹豫。（以黎为奇货，此细人趋功名之心也。一时欲激双山，姑用此语。）”

海瑞针对延平府所辖七县(将乐、沙县、大田、龙溪、永安、顺昌和南平)，驿传的混乱，提出了整顿、裁革、并驿的方案，写成《驿传申文》。他说道：

“为今之计，只当议裁革，不当议官苗当。盖能裁革，苗当国初行之而验，官当则正统年行之而验，必于利于前不利今日之理。不能裁革，苗当时无染指之患，后无冒破之忧，若差胜矣。然应付不堪，必至逃避。”“然剥削贪难称过使客，彼此观效，日私日贪。”

他这样说，是根据南平县的实际情况，百姓赋税之苦，村庄破败，难于安居乐业。然而，海瑞济世安民的愿望，未能实现，只是存有美好的愿望而已。可以想见，当时的社会，能够有如此善良心肠的官员毕竟是少数，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如此，海瑞在南平县学，以礼为教，讲求道德情操，经义治事，实事求是，不为俗学所染，是教职中最难得者。所以，巡按监司等各级官员，极力推荐海瑞可担重任。遂有淳安知县之迁。

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春，海瑞被晋升为浙江省严州府淳安县知县。五月到任。在淳安县，他初展抱负，做了很多深得民心的好事。

淳安县山多地少，百姓十分困苦。官吏富豪占地众多，又串通舞弊，玩弄各种花样逃税；农民少地或无地，却要负担虚报土地的税役，负担十分沉重。海瑞决定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田亩数征收税役，这就减轻了百姓的经济压力。他还采取分配荒田、借贷耕牛和种子，三年后起征赋役等措施，使很多外逃他乡的农民回到了淳安。

在淳安，他还取缔了地方官员勒索民财携带大量金银赴京朝觐的陋规，革除了知县向出巡的巡按御史、分巡道、分守道等官员的吏书

馈赠银两的旧习气。尤为百姓所称颂的是，他重视刑狱，伸张正义，平反了许多冤案，被誉为“海青天”。

村民胡胜祖和邵时重因为争山地而纠纷不断，都认为山地为自己家所有，毫不相让。在多年的争斗中，胡胜祖不幸患病，不久就病死了。其弟胡胜荣、胡胜佑及外甥暗自把朱脂涂在胡胜祖尸体的头部，假作伤痕，诬告邵时重杀人害命。案子由原知县审理，接到状纸后，派人验尸，看到是被击伤头部致死，判定为邵时重杀人，拟秋后斩首。邵时重一家多次上告，呼喊冤枉。

海瑞查看了案卷，分析了案情之后，亲自开棺验尸，见头上的血迹仍旧为红色，十分鲜艳，擦去之后，无任何伤痕，由此昭雪了邵时重的冤案，判定了胡胜荣等人的诬告罪行。

由此，一件件巧断的疑案，一桩桩昭雪的冤狱，使海瑞的名声大振。于是严州府内各县的重大案件凡不能结案的也常请海瑞去进行会审或移到淳安县来审理。

桐庐县一件杀人案，甚为难断。百姓徐继有一妹妹，嫁与戴五孙为妻。徐、戴两家开始关系很好。戴生活侈奢，花费很大，曾向徐母借过银两，徐继替母多次向戴索要，均无回音。一天戴五孙在门前遇见了徐继，二人谈到所借银两何时归还的事，一言不和，发生口角。徐继用石块打死戴五孙，然后用大石头绑在尸体上坠入水中。刚巧这一天，吏员潘天麒及仆人因公差投宿戴家。桐庐县审讯认为是戴五孙妻徐氏与潘天麒通奸谋杀亲夫，拟将徐氏凌迟处死，潘天麒处斩。杭州复审时判潘殴斗杀人，定绞罪。北京大理寺驳回后，由桐庐县、建德县、遂安县三知县会审，仍没有结果。后巡按御史崔楨把此案移到淳安县审理。海瑞细心研究，多方调查，终于真相大白，保全了徐氏

和潘天麒的性命和名誉。这桩历经数官审判，拖延十多年的疑案，经海瑞亲审才公正结案。

在淳安县处理政务中，最使百姓称快的是海瑞嫉恶如仇，敢于打击权贵。事情发生在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

一天，淳安县接到严州府的通知，说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要来淳安。负责接待的冯驿丞和知县助手陈典史来请示海瑞，道：

“总督胡大人的公子在严州府住了几天，现已启程来淳安，我们怎样接待才好？”

海瑞道：“胡公子要来淳安，本官已经知晓，如何接待，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照朝廷颁布的章程，我们完全可以不管。”冯驿丞道，“但是，这样胡大人准会怪罪我们，所以还是让他们住下，供应一下食宿。”

海瑞道：“冯驿丞的意见很好，对胡公子干脆不管，人家难免要说我们太不近人情，让他住下也好，一日三餐，不应短少。假如这个胡公子倚仗他父亲的权势无法无天，我可要着着实实收拾他一下。”

陈典史和冯驿丞听了，面面相觑，似乎心中无数。冯驿丞又道：

“得罪了胡公子，谁担当得起啊！”

海瑞听了，沉思一下道：

“无论出了什么乱子，本官是一县之主，当然是我海瑞一个人承担责任。这个，请你们放心。”

听了海瑞的话，陈典史还有些不放心。他觉得这个胡公子确实不好接待，也担心海瑞因此而得罪胡宗宪。海瑞虽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但不知对策如何？

海瑞猜到了陈典史的心情，便诚恳地说道：

“难怪你们放心不下，事情的确不好对付。不过现在他人还未来到。究竟出现如何情况，难以预料。只好等他来时，随机应变吧！”

陈典史听了，还是不得要领，心里想：随机应变，当然是最好不过了，但是知县大人究竟有什么妙法对付总督的公子，他无论如何想不出。冯驿丞听了，心中的疑团也没有解开，想来想去也不知道知县大人如何随机应变。他们二人只好一起告别，离开了县衙门。

海瑞如何随机应变，他自己也没有想好。因为他还不知道胡公子到达淳安后会玩弄什么花招，会惹些什么祸。反正是他若不遵守本县的规矩，一定要给他点厉害看看。

胡公子在杭州时，总督府里的人说起海瑞，都认为他很难说话，是个十分古怪的人。所以胡公子也拿定主意不去见海瑞。到了严州府以后，胡公子向知府问海瑞此人的情况？知府竟说：还好，还好。想必就是比一般官员好说话的意思。因此，又决定到淳安县看看。实际严州知府故意这样说，是让胡公子到淳安去，让海瑞给他点苦头吃吃。

胡公子来到淳安县馆驿，见驿丞和驿吏们都很恭敬，不禁飘飘然起来，有些得意忘形，特意穿上华丽的衣衫迈着方步，摆起了臭架子。

等到吃饭时，桌子上摆得皆是瓜豆菜。胡公子以为鱼肉会慢慢端上来。可是干等也不来，问了一声，说是菜已齐了。

胡公子立刻脸色发青，把桌子一拍，大吼道：

“这种菜怎么能吃呢？”

冯驿丞因为事先请示过海瑞，胆子大了一些，听了胡公子的话便回答道：

“这几样饭菜，都很好吃！”

胡公子听了认为是故意耍弄他，如火上浇油一般，更加恼怒。他把牙齿一咬，瞪了冯驿丞一眼骂道：

“你们这样招待我，简直都是该死的奴才。”

冯驿丞道：“馆驿里开饭，从来就是这样，当然不能和总督府的小厨房相比，请胡公子谅解。”

胡公子道：“我管不了那么多，快把这些菜端下去，另外摆几桌酒菜上来！”

冯驿丞道：“另外摆几桌，仍旧还是瓜豆菜蔬。这一桌已经比我们海大人吃的好多了！”

胡公子道：“海瑞只不过是个七品芝麻官，他吃瓜豆菜是应该的，而我是钦差大臣浙闽总督大人的公子，你得罪了我，准是活得腻烦了吧？”

家丁看见胡公子发火了，都围过来。胡公子把手一挥，两个家丁看见这个手势，马上一左一右把冯驿丞的胳膊扭住了。

这时，有个驿吏溜出了馆驿向陈典史报信去了。

胡公子问道：“你知罪不知罪？”

冯驿丞道：“我犯了什么罪？”

胡公子道：“慢待本公子就是犯罪？”

冯驿丞道：“何时慢待了？……”

众家丁因为知县、县丞、典史都没有来迎接，住下来以后，又没有看到礼物，心里早就不满意了。眼下看饭菜也不好，冯驿丞还顶嘴。只听胡公子一声令下，吩咐要把冯驿丞打四十大板，再用绳捆住，倒挂在天井里的大树上。

这时，家丁们把冯驿丞按在地上，举起板子就要打……

陈典史得到驿吏的报信，又请示了海知县。海瑞命陈典史带全县的捕快飞速赶到馆驿，把胡公子和家丁一个不漏地带到淳安县衙门。

冯驿丞被打了四十大板，并倒挂在天井上，这时，陈典史已经到了，早有人把冯驿丞放下来。

胡公子和家丁本来想反抗，看见来了几十人捕快，只好乖乖地一个个被绑了起来，被带到淳安县县衙。

海瑞吩咐击鼓升堂。衙役、皂隶们一声吆喝，将胡公子等人带到堂上。胡公子大骂道：

“我是钦差大臣浙闽总督胡大人的公子，你们敢对我怎么样?!不要有眼不识泰山，胡大人要知道你们今天这样待我，你知县的脑袋非搬家不可!”

陈典史、冯驿丞等人听了冯公子的话，都替海瑞捏一把汗。看海瑞如何来了结这件事。

只见海瑞对跪在公案前的胡公子说道：

“你可知道胡大人曾三令五申，要各地官员奉公守法，不许浮华奢侈?你可知道朝中严老太师曾经多次夸奖胡大人清廉正直?”

胡公子听见海瑞对他父亲大加赞扬，倒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他以为，事情有了转机，便厉言正色道：

“你既然知道我父亲是大清官，既然知道严老太师对我父亲十分重用，就该立即为我松绑，替我摆酒宴赔罪才是。”

海瑞道：“这你就不必过于着急了，事情要完全弄清楚，再商量如何解决。”海瑞停了一下又问道：“我来问你，既然胡大人是清官，你是他的公子，自己又没有一官半职，为何带这么多随从?到馆驿里要酒要肉还打驿丞的板子，将其倒挂起来。这父亲和儿子的做法没有一丝一毫相同之处，你说是胡大人的公子，谁能相信呢?”

海瑞的几句话，把胡公子问得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这时，海瑞把惊堂木一拍，高声说道：

“你是何方游民？竟敢冒充官亲，招摇撞骗，败坏总督胡大人的名声，左右还不与我打他四十大板！”

皂隶举起板子一五一十，足足打了四十板，胡公子像猪被杀一般嚎叫不停。

陈典史和冯驿丞两个人十分紧张，弄不懂是怎么回事，这胡公子明明是真的，怎么说是假的？

家丁之中有一个头领站起来说道：

“知县大人，公子这次出游，总督大人还为他写了好几封信。让公子亲自面交府、县衙门，哪里会是什么假的，求知县大人明察！”

海瑞又拍了下惊堂木道：

“这一游民居然也来败坏总督大人的名声，真是狗胆包天，也要打四十大板，如不服罪，再打四十。”

胡公子被打四十，已皮开肉绽，叫唤不停。听说不服罪，还要再打，就不吱声了，那个家丁首领挨了四十下，也老实了。

海瑞又道：“我们淳安县，是个偏僻小城，离杭州、北京有千万里，你们冒充官亲，还不至于马上传过去，万一真要传过去，胡大人要背起教子无方、纵子行凶受贿的罪名，事情可就闹大了。所以我不能不把你们假冒官亲的案子亲自审问一下，如今真相大白，事情也不至于不能挽回。”

海瑞吩咐将众游民关进牢狱，击鼓退堂。

当天晚上，海瑞写了一道上报严州府的公文，把淳安县查办假冒官亲的案情作了详细的陈述。说有游民冒充胡公子，到处勒索招摇，不严加惩办，被朝廷知道了，对胡大人很不利。又说这伙游民还带了假造的胡大人的书信，请求严州府再往上报，彻底查清。

于是连夜命人带着这道公文，押着人犯，解往严州府。

严州府看到胡公子果然碰了海瑞的硬钉子，也暗自高兴。就另派差官，将人犯送往杭州总督府。

胡公子回到总督府，立刻被松绑，总督夫人见儿子被打得狼狈不堪。立刻大哭大闹，让胡大人替儿子报仇，撤海瑞的官职，查办严州知府。

胡宗宪道：“要是别的人，我自然完全照办，但是偏偏碰上这个海瑞，事情就麻烦了。”

夫人问道：“何以见得呢？”

胡宗宪道：“过去我曾说过海瑞是个清官，为老母祝寿只买了两斤牛肉，原是拿他的事情茶余饭后打趣的，没想到却替他造了好声誉。这回海瑞用的办法很高明，因为他说是查办假冒官亲的游民，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要说他抓的打的不是游民，真是我的儿子，那么他也无罪，反而更有功。你要办他，总得有个罪名，你用什么罪名办他呢？我是想不出来的。”

胡宗宪又指着自己的宝贝儿子道：

“你自己没有官职，淳安县馆驿让你住下也就不错了，何必再找麻烦，有时间再去逛逛黄山，如今搞得你老爹十分被动，如果真的追究一下，丢官的不一定是海瑞，也可能是我胡宗宪。”

总督夫人再也不吱声了，胡公子白白挨了四十大板，由此，出外敲诈勒索的行为有所收敛。

嘉靖四十年(1561年)，大奸臣严嵩的爪牙鄢懋卿以钦差大臣的身分南来，名义上是查办江浙盐务，实际上是专门来搜刮民脂民膏的。因为淳安是杭州到徽州的必经之路，海瑞已经接到通知，鄢懋卿要到淳安县来视察。

鄢懋卿来淳安，怎样对付，海瑞心中没数，决定先派家人海安先到扬州，一路暗中跟随查看其行动，搜集罪证，等到海安回来，再做具体的对策。

海安到扬州时，鄢懋卿已经到了三天，其排场和皇帝出巡一样，他向扬州知府要了四百万两银子，扬州知府就层层摊派下去，弄得整个扬州城人人愁眉苦脸，拿不出银子的人家，只好卖田卖房，有的卖儿卖女。

当地盐务官员，尽力巴结，各自送上金银珠宝。有人定制了一把黄金夜壶献上，鄢懋卿当时就把献此壶的人提升了两级。鄢懋卿出巡有三十只大船，自己和夫人外出都坐二十四抬大桥，每到一地，供役使的有六百多人。

海安把情况打听明白，赶回淳安县，向海瑞禀报。海瑞决心要和这个钦差大人斗一斗。

鄢懋卿到了杭州，和胡宗宪谈得很投机，于是就多住了几天，鄢懋卿一伙在杭州敲诈勒索，狂吃狂赌，百姓吓得鸡犬不宁。消息传到淳安，人心浮动，不少人要躲到山里去。

鄢懋卿到总督府拜访胡宗宪时，商量由杭州去徽州的路线，胡宗宪劝他绕开淳安，省得麻烦。懋卿问为什么？胡宗宪说：“知县是海瑞，古怪执拗，对任何人都不服帖。你又何必去自讨没趣呢？”

听到海瑞的名字，懋卿也知道他一些事情。京师不少人谈起过，管他叫海疯子，天不怕，地不怕。绕道避开也是一种办法。但是这样做怕有伤钦差大臣的体面。决意要到淳安去看看。

胡宗宪看他不听劝阻，就把半年前，儿子挨打的经过说了一遍。

懋卿一听笑道：“我有先斩后奏的上方宝剑，怕什么？他总不能说我这个钦差大臣是冒充的吧！”

胡宗宪一想也对，道：“大人有什么可怕的？果真能收拾他一下，倒也能解我心头之恨哩！”

懋卿回到行署，和幕僚汤星磋商一番，决定先派旗牌官前往淳安，车马船只三日后动身。

旗牌官到了淳安城，骑着马冲进县衙，在大堂上大喊大闹，问知县那里去了，为什么上差来了，不出来接待。

海瑞吩咐击鼓升堂，旗牌官骂道：

“你海瑞是什么东西，好大的架子，不出衙来迎接。”

海瑞叫衙役把他的公文取下来，把惊堂木一拍，大喝一声道：

“你这奴才敢咆哮公堂，谩骂本县，左右，还不替我掌嘴！”

差役们，左右开弓，在旗牌官脸上打了十几个耳光。海瑞命令，上锁收监。

旗牌官被打落了一颗牙，被带上了铁锁关进牢里去了。

海瑞退堂，一看公文，上面写着，这次出巡主要是察看盐务，但也关怀民间疾苦，要各地官员不能奢侈浪费，一切都以节省为主。海瑞不知道这公文里玩的是什么新花样。

为了不让钦差大臣进入淳安地界，海瑞率领县丞、典史、教谕等大小官员一起出发，郊迎四十里，到县署外去接迎。

那个旗牌官，海瑞觉得可以用来出钦差大臣的丑，于是从牢中提出，仍旧用铁链锁着，带到县界去。

淳安县的百姓都想看海瑞怎样斗钦差，有一千多人跟随前往。

海瑞等人，到了太平桥畔，看见江上有三十多只大船迎风破浪而来。第一条船上，有一面大旗，上绣：“钦差总巡八省盐政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六个大字。

在官船上，懋卿也看见岸上有一大群官员、百姓正摆香案迎接自己，有人指出还有海瑞，不禁乐得手舞足蹈起来。自然想起胡宗宪来，心想，这位总督太无用，如今海瑞不仅没有为难自己，而且出城郊迎四十里。

船帆落下后，靠近江岸。岸上，海瑞和文武官员匍匐在地上，说道：

“淳安知县海瑞与文武官员跪迎钦差大人。”

在船头上的钦差，一挥手叫海瑞等人站起来说话。

海瑞道：“大人此次出巡，以民间疾苦为重，通令各地供应务必简单，不得扰民。大人真是爱民如子。”

懋卿听了，装腔作势地答道：

“关心民瘼，为国节流，原是朝廷命臣的本分，那算不得什么！”

海瑞道：“大人只是说得很好，但风闻大人出京以来，每过州县，以贿万金，不仅狂吃狂赌，甚至便溺也用黄金之壶，这又做何解释？”

说到这里，码头上的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在船头上，钦差大臣的卫士都拔出刀，就等一声令下，好下船杀人。汤星槎深怕海瑞再说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大声喊道：

“海瑞休得无礼，胆敢诽谤钦差大臣。你有何凭据证明钦差大人得过贿赂。你难道不知道朝廷有王法吗？”

海瑞哈哈大笑道：“不知道王法的是你们，不是我海瑞。这三十条吃水很深的船，所载的不是贿赂是什么？”

这时候，鄢懋卿才想起胡宗宪的忠告很有道理，这个海瑞实在是惹不起，不该来淳安县，但已经骑虎难下，挽回已经来不及了。看见海瑞理直气壮，而且有二千多人围观，只好改变口吻道：

“本院看你是个书呆子，不通人情世故，虽然诽谤本院，本院也不加罪。万岁爷、严老相爷都能为我作证，本院一贯清廉守法。如今废话少说，快接本院进城才是。”

海瑞道：“休想掩人耳目，这三十条大船所载何物，是否敢开舱相验？至于想进淳安城，城小恐怕容纳不下。”

汤星槎道：“你敢挡钦差大臣的驾，胆子可不小！”

海瑞不理睬，命县衙役和看热闹的百姓上船搜舱。

鄢懋卿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原来海瑞出郊四十里迎接自己，是有意阻挡，是不让他进入淳安县境。钦差大臣思考再三，觉得这样闹下去对自己不利，还是早一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上策。于是鄢懋卿又退一步对海瑞道：

“既然淳安县城太小容纳不下本院的车船马匹，本院改道便是。请派民夫八百，撑船抬轿。至于搜船，则万万不可！”

海瑞道：“百姓正忙着农活，没有空闲，派不出民。至于船当然要搜的，大人既然为官清正，又何惧搜船呢？”

在海瑞的命令下，县衙役和百姓都奔到江边，准备登船，有的已经触摸到船帮。

汤星槎发出一声号令，大船立刻从河岸撑开，起锚解缆驶向江心。

鄢懋卿站在船头上，气得面色发青，抽出上方宝剑，狠狠地说道：

“海瑞呀，海瑞，你不要欺人太甚！”

海瑞道：“你有上方宝剑，我也不怕，不能斩我无罪之人。再说钦差大人为何匆匆而去，不让搜船呢？”

在船舱里有一个人始终没露面，那就是钦差大人的夫人秦氏，她把外面的这些话都听得一清二楚，知道已经碰了海瑞的钉子。就冲出来，拎着鄢懋卿的耳朵，骂道：

“你这个老混蛋，不识时务。胡大人说不要来，你偏要来，如今害得我也跟你一样挨骂、受气！”

骂着骂着，就把钦差大人拎回船舱去了。

三十条大船全部掉头开回去了。岸上脖子上套着锁链子的旗牌官着急了，嘶哑着喉咙高声喊道：

“大人，大人，先别开船，还有我哪！”

汤星槎也高喊道：

“你先在淳安住两天吧，大人有急事先往别处巡察去了！”

钦差大臣的三十条大船驶离太平桥之后，江岸上的百姓欢呼雀跃，拍手称快。有一位百姓作歌唱道：

钦差逢到海刚峰，上方宝剑也没用。

正是正来邪是邪，邪不压正一场空。

淳安有了好知县，负受涂炭乐无穷。

海瑞回到城内，百姓见钦差大臣没敢进城，都异常高兴。然而海瑞知道这个鄢懋卿决不会善罢干休。后来他果然借机进行了报复，把海瑞排挤下了任。直到严嵩及其党羽被罢官以后，海瑞才重新出来，当了江西兴国知县。他的不怕权贵和嫉恶如仇的品格，仍旧和当淳安知县一样，处处受到老百姓的赞颂。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海瑞由于为官清廉公正，被调升进京，任户部云南司主事。

海瑞被调到北京之后，老母、妻子王氏和儿子等举家北迁。原以为生活在天子脚下，一切都会十分美满，其实和现实一接触，发现朝政紊乱，治理得一塌糊涂，自己的幻想马上化成了泡影，因此终日愁眉苦脸，心情十分不安。

海瑞想，从前在南方做地方官，以为朝廷里的坏事，都是严嵩和他的党羽干的。等到严嵩被贬之后，朝廷的坏事并未减少，这一切都和世宗有关，他看到这个皇帝太糊涂，不知如何是好？

仆人担心海瑞这样下去身体会受到影响，劝他想开些，公余之暇到同乡或京官家中走一走，解解烦闷。海瑞有一同乡好友，名叫王宏海，是海南岛定安县人，也在京为官。海瑞经常到他家坐一坐，除了谈天喝茶之外，有时也饮几杯白干。真是“借酒浇愁愁更愁”，海瑞的心事更加沉重了。

海瑞在户部衙门是一个六品官的主事，每天经管银钱。海瑞看到最近半年以来，全国各地都大规模地修建庙宇寺院，所花费的银两几乎占钱粮总收入的三四成之多，所以，对世宗信道教一心求仙的做法，格外感到痛心。

当时，还可以经常听到倭寇南犯的消息，大批倭寇骚扰汕头、潮州沿海一带。而朝廷却忙着修建庙坛，采摘灵芝仙草，进贡白兔、白鹿，有些官员忙得团团转，百姓也寝食不安。这样一来，朝廷没有多余的人力顾及到抵抗倭寇之事。

在户部衙门里，大臣之间，都不谈朝政，人人守口如瓶。因为世宗对直言敢谏的大臣，皆采用屠杀的手段，人人怕锦衣卫的揭发检举，一旦被他们盯上，自己的性命就难保了。

和海瑞关系较好的九品官何以尚，以户部任司务之职，是海瑞的下属。他见海瑞办事公正，也听到海瑞敢斗胡公子、鄢懋卿的事，对海瑞很钦佩，两人成为无所不谈的知心朋友。

一天，海瑞和何以尚谈论杨继盛的诗。杨纪盛是反对严嵩的一位大臣，曾任兵部员外郎，把严嵩祸国殃民的事实总结出十大罪状，上疏世宗，但却被世宗降旨斩首。他在狱中临刑前，写了一首诗：

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

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

海瑞说道：“杨继盛大人死得很惨，但也很有意义，天下人以他敢于上疏、不怕死的壮举学习很多东西，他说‘留与后人补’，我们就应该补上一补。”

何以尚听海瑞说了以后，很快就淡忘了。可海瑞却天天想念着杨继盛，对其十分钦佩，为此也滋长了对世宗上疏的念头。

满朝文武大臣对世宗迷信不理朝政的行为，早就敢怒不敢言，因为还有几个人在世宗面前谄媚，所以世宗对道教一直笃信不疑。他派大臣去全国各地去寻仙人、仙草，把茅山、崂山、武当山的一大批道士请进宫内，宫中每一座房子的梁柱上，全贴了七歪八斜的符咒。御花园中，到处砌起炼丹炉，弄得烟灰满天飞舞，睁不开眼。

一天傍晚，世宗和一个名叫王道陵的崂山道士，在御花园丹炉旁谈求仙的道理，忽然听到天上有仙鹤的叫声，有两只灰色的仙鹤从南向北飞去，王道陵趁世宗抬头看鹤的一刹那，把藏在袖管里的一只桃子塞在世宗的座位上。他自己以为干得手脚麻利，却被两名宫女看见了。

世宗发现座位上忽然有一只桃子，觉得很稀奇，便问左右：“此桃是从哪里来的？”

王道陵走上前去，把桃子一看，惊讶地说道：

“刚才贫道看见仙鹤嘴里有一件东西掉下来，没想到会掉在万岁爷的宝座上。这是一只千年熟一次的蟠桃，当年东方朔偷西王母的蟠桃和此桃是一树所生。依贫道看来，这是因为万岁爷成仙在即，故而天赐仙桃，以为祝贺，这是莫大的祥瑞。”

一番话把世宗说得心花怒放，立刻封王道陵为护国真人，赏黄金一千两。

一位宫女背地里对太监说，她亲眼看见桃子是王道陵从袖管里掏出来的，和仙鹤一点关系都没有。这话被王道陵知道后，派两个小道士把两位宫女劈死在炼丹炉旁。

那王道陵看见皇帝已上了圈套，又从乡下抓来一对小白兔，硬说是月中捣药的玉兔；又说白兔生子之后，皇上就将和白兔同时升天。世宗于是又封赏王道陵，盼望白兔生子。

有一位老太监名叫黄锦，见到世宗昏庸到这种地步，心中十分难过。想找机会劝世宗几句，但一想到几位大臣进谏皆落得悲惨下场，未免心惊胆战。但他曾与海瑞相识，就把世宗迷信王道陵的种种表现，一五一十告诉了海瑞。

海瑞认为是给世宗上奏章的时候了，当他拜访了几位大臣，材料收集足了以后，用一个月时间，写成一篇上疏，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共写了三千六百多字。内容简略如下：

“臣闻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称其任，亦惟以责寄臣工，使尽言而已。臣请披沥肝胆，为陛下陈之。

昔汉文帝，贤主也，贾谊犹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责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虽有及民之美，将不免于怠废，此谊所大虑也。陛下天姿英断，过汉文远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节用爱人，使天下贯朽粟陈，几至刑措。陛下则锐精未久，忘念牵之而去，反刚明之质而误用之。至谓遐举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滥兴土木。二十余年不视朝，法纪弛矣。数年推广事例，名器滥矣。二王不相见，人以为薄于父子。以猜疑诽谤戮辱臣下，人以为薄于君臣。乐西苑而不返，人

以为薄于夫妇。吏贪官横，民不聊生，水旱无时，盗贼滋炽。陛下试思今日天下，为何如乎？

迹者严嵩罢相，世蕃极刑，一时差快人意。然嵩罢之后犹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汉文帝远甚。盖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过，赖臣匡弼。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建宫筑室，则将作竭力经营；购香市宝，则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误举之，而诸臣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谀之甚也。然心馁气，退有后言。欺君之罪何如！

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顾其家者，由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过于苛断，是陛下之情偏。而谓陛下不顾其家，人情乎？诸臣徇死废公，得一官多以欺败，多以不事事败，实有不足当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谓陛下厌薄臣工，是以拒谏。执一二之不当，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于过举，而恬不知怪，诸臣之罪大矣。《记》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此之谓也。

且陛下之误多矣，其大端在于斋醮。斋醮所以求长生也。自古圣贤垂训，修身立命曰‘顺受其正’矣，未闻有所谓长生之说。尧、舜、禹、汤、文、武圣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示见方外士自汉、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术于陶仲文，以师称之。仲文则既死矣，彼不长生，而陛下何独求之？至于仙桃天药，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书于乾祐山，孙奭曰：‘天何言哉？岂有书也’。桃必采而后得，药必制而后成。今无故获取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赐者’，有手执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为妄诞以欺陛下，而陛下误信之，以为实然，过矣。

陛下又将谓悬刑赏以督责臣下，则分理有人，天下无不可治，而修真为无害己乎？太申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用人而必欲其惟言莫违，此陛下之计左也。即观严嵩，有一不顺陛下者乎？若为同心，今为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宫，陛下以为逆者也，历任有声，官户部者至今首称之。然诸者宁为嵩之顺，不为找之逆，得非有以窥陛下之微，而潜为趋避乎？即陛下亦何利于是。

陛下诚知斋醮无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与宰相、侍从、言官讲求天下利害，洗数十年之积误，置身于尧、舜、禹、汤、文、武之间，使诸臣亦得自洗数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臬、夔、伊、傅之列，天下何忧不治，万事何忧不理。此在陛下一振间而已。释此不为，而切切于轻举度世，敝精劳神，以求之于系风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域，臣见劳苦终身，而终于无所成也。今大臣持禄而好谀，小臣畏罪而结舌，臣不胜愤恨。是以冒死，愿尽区区，惟陛下垂听焉。”

海瑞把奏疏写好之后，捧在手里，读了数遍，每读一遍，手总是剧烈地发抖。他想，奏章呈上之后，世宗会不会将自己斩首呢？十分可能。人生都有一死，只要死得有意义就行，没有什么可怕的。海瑞虽然想得很多，但是丝毫没有动摇上疏的决心。

这时候，海瑞的母亲谢氏和妻子王氏都因北方寒冷，而回到故乡琼山。海瑞起先担心自己如有个三长两短，母亲在家乡得了凶信，可能活不成；继而又一想，她们虽是女人，都一向深明大义，一定会赞成自己的做法。

海瑞在呈交上疏前，把身后事，做了安排。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说明忠孝不能两全，请求母亲原谅。叮嘱她万一自己被处死，就带着

他的妻子和孩子回老家。另外又写了一封信给王宏海，托他照顾一下老母和妻子。

京中府第有一位仆人和两名差役也遣散回家了。海瑞为官多年没有什么积蓄，手头只有二十两银子，到街市上定做了一口棺材，省得别人替自己收尸时还要破费。

一切准备就绪，就在一次早朝时，将上疏呈给世宗。海瑞递上奏疏后，没有回家，而是到了王宏海家。王宏海见海瑞今天满面笑容，以为出了什么喜事，便置酒招待一番。待王宏海问海瑞何喜之有，海瑞将给世宗写了一篇上疏，并把内容简要叙述一遍，王宏海听了一半，吓得大惊失色，将手中的酒杯失落，跌得粉碎，轻声道：

“我的刚峰老兄，你真的活得不耐烦了！当年杨继盛的奏章都没敢直接指责万岁爷，可他却被害死，你怎么能幸免呢？”

听了王宏海的话，海瑞笑道：

“我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现在好像朝廷生了病，万岁爷好像已经病入膏肓。这一上疏奏章，就是一剂起死回生之药。”

说着，把预先写好的嘱托信面交王宏海。王宏海对信中所提的要求满口应承下来。

何以尚听说海瑞闯了大祸，飞跑到海瑞府第，见海瑞不在，只见家门前停着一口棺材。何以尚又跑到宫内找到老太监黄锦，探听风声。谈起海瑞已经买好棺材，两人不仅同声叹息起来。黄锦告诉何以尚，世宗散朝后，现在正在请徐阁老读海瑞的奏章。

世宗这一年已五十八岁，虽然比徐阶小十多岁，但眼力昏花，还不如徐阶。世宗读了几段海瑞的奏章之后，有些字看不清，便请徐阁老代读。

世宗听奏章中所言，越听越不顺耳，待徐阶读完，世宗勃然大怒道：

“简直是反了，先帝爷也没有这样骂过朕啊！”又对太监道，“赶快派人去，把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捉住，朕要把他千刀万剐，决不能让他逃掉。”

一位太监道：“万岁爷且息雷霆之怒。奴才听说他是个十足的书呆子，上奏疏之前棺材都买好了，不会逃走的。”

世宗想，我想长生不死，而这个海瑞居然不怕死，而买好棺材存心找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世宗在宫女的扶持下，喝了一碗参汤，强打精神，把海瑞的奏章反复读了两遍。觉得里面有些放说得也对，但是，总觉得被海瑞骂了一遍，胸中有一口气没有出。第二天下令，派锦衣卫把海瑞抓起来，关进锦衣卫特设的诏狱。

深受海瑞影响的何以尚在海瑞被捕的第四天闯进宫，击打臣子要求皇帝上朝的景阳钟，呈上奏疏，请求释放海瑞。世宗当时令锦衣卫将何以尚廷杖四十大板，也关进诏狱，和海瑞押在一起。

世宗要把海瑞处死，刑部也拟了把海瑞斩首的奏章，经过徐阁老的手，徐阶便有心搁置下来，没有呈世宗御批。

好在世宗因吃丹药，中毒很深，渐渐卧床不起，拖了不久，世宗就驾崩了。

道士都说，万岁爷升天了；而大臣和老百姓们都拍手称快。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徐阶等朝中元老扶太子朱载继位，改元隆庆。徐阶、张居正等人，用世宗遗诏的名义，把祸国殃民的王道陵等道士统统斩首，宣布大赦，把海瑞、何以尚等人释放出狱，恢复原职。

在临释放前，看守监牢的官员早就听到一些风声，为了向海瑞、何以尚表示慰问，在狱中摆了一桌酒席，海瑞以为这是上刑场前的规矩，于是和何以尚大吃二喝一顿。酒足饭饱之后，被宣布无罪释放，他俩还不太相信。监狱官说世宗已殒天，他二人官复原职，这时他俩反而激动起来，抱头痛哭一场。

这一次买棺谏君，海瑞从九死一生中保存了性命，后来他在朝廷中与奸臣的斗争，就什么都不怕了。

海瑞出狱后，在徐阶等人的荐举下，改任兵部武库司主事。隆庆元年(1567年)，又调任专管皇帝玉玺的尚宝司司丞。后来又升为专管平反冤狱的大理寺寺丞。这年冬天，又调任南京右通政。

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以钦差大臣的名义总督粮道，巡抚最富庶的应天府。这一消息传出来，使应天府的贪官污吏、骄横之徒惊恐万分。有的自感难逃惩治，急忙请求解职；有的迁往远方暂避风险；有的收敛穷奢极欲、专横跋扈的恶习；有个显赫权贵，听说海瑞来了，连夜把朱红大门改漆黑色。一位监察江南织造的太监也出入乘八抬大轿改为四人肩舆。

海瑞上任后，发现最富饶的鱼米之乡，已被贪官污吏糟塌得千疮百孔。加上这一年，正好大雨成灾，苏松常杭嘉湖六府沿太湖的田被淹得一干二净，很多房屋被雨水冲塌。看来水势还要上涨，百姓苦不堪言。

于是，海瑞决定先从治水救灾入手。赴苏州时，因为大水，很多河道几乎被水漫到桥面上了。海瑞乘的官船到了关帝庙已经无法前进。好在行李简单，随从也少，就换了便轿，黄昏时分进了苏州城。吩咐前来迎接的文武官员各自回去，留下苏州府推官龙宗武，上海县知县

张顶，商量治水的办法。他在京时就听到有人称誉龙宗武的才能和张柄的魄力，这一次南来，打算让这两人的才干好好发挥一下。

龙宗武和张顶本来早就有治水灾的愿望，也向上司提出过建议，无奈各级官员都主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因此结郁在胸，现在看到海瑞是真正关心民间疾苦，心中都异常钦佩。把历年来的水势以及自己的打算，向海瑞一口气都说了出来。

海瑞听完汇报之后，说道：

“治水灾，本官决心很大，只是人生地不熟，不知如何下手，既然两位大人成竹在胸，看来治水必能成功。”

说着海瑞从竹筐里摸出一本归有光的《三吴水利录》来，向两位县官介绍了三吴治水首在疏通太湖入海河道的经验。他俩也认为书中所言甚为有理。大家商量的结果，决定大力疏浚苏州河。

工程的经费，主要靠官府筹集，同时裁减过往官员供应和招待方面所花的费用，再加上各府派民工，以工代赈，这样，就解决了疏浚费用。张知县担心这样裁减要得罪很多人，海瑞听了，说道：

“当今之世，要替老百姓做点事情，总要得罪一些人的，我们也顾不了这许多了。”

这天谈到了午夜以后，海瑞送走两位县官，立即草拟治水奏疏，上报朝廷。同时行文十府，裁减供应，并要苏州、松江两府，在圣旨到达之日，马上兴工开河。

海瑞的奏疏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圣旨下达各府，疏浚工程迅速开工。海瑞多次亲赴工程现场，奖励开河有功人员，惩处贪污腐败者，使工程进展十分顺利，不到两个月，苏州河基本疏通了，积水不分日夜地倾泻出去，被淹的田地都露了出来，先后由农民补种了菜蔬、杂粮等。

在疏通了苏州河之后，又开始疏通白茆河。两项工程相继告竣后，在一个时期内基本消除了三吴地区的水患。就连同海瑞作对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万世功被他成了。”

在应天十府，海瑞的另一辉煌政绩是清理狱讼，逼乡官退田。他就任应天巡抚，治理水患之后，就和原朝廷元老徐阶发生了矛盾。

在海瑞的心目中，朝廷的文武百官，其中徐阶还是比较正直。虽然过于稳重，怕冒风险，没有能劝阻、纠正世宗的残暴和荒唐，但是，这两年来贡献还是不少。特别是海瑞入狱，被判死刑，而没有死，出狱后一再得到提拔，这都和徐阶有关。因此，海瑞把徐阶看成是生平的大恩人。

徐阶在朝廷辞官以后，从北京回松江府华亭县，中途经过南京时，海瑞到郊外相迎，徐阶也很高兴，两人在馆驿畅谈了很久。海瑞道：

“宦途风波，在所难免，徐阁老深得人望，圣上也看成国家的栋梁，阁老要作东山再起的准备啊！”

徐阶道：“朝廷大臣能在晚年享天伦之乐者并不多，老朽解职南来，也算是荣归故里了。”停了停，捋了一下胸前银白色的长须，继续说道：“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老朽过了七十，今后无论谈报效朝廷或是追求功名利禄，对老朽来说，恐怕是难上加难了。有希望的还是你们年轻人啊！在年轻官员中，奋发有为者，也只有刚峰老弟了。”

海瑞道：“这是阁老的鼓励，晚生不敢当，谈到人才，南北两京实在不少，有为者随处可见，不过一般人不会像晚生这样不要命的，遇事多半要考虑周全一些。”

徐阶道：“刚峰老弟敢说敢做令人钦佩，老朽也不能及你于万一啊！更何况那些庸碌之辈和奸刁小人！”

彼此寒暄一番之后，海瑞想到此次分别，不知何时再能相见，便问徐阶有什么托附和教诲？徐阶苦笑了一下，道：

“老朽到了这一地步，那里有什么可以教诲老弟的，至于托附，也想不出什么？只是在京中曾接三儿之信，说起高拱的门生蔡国熙现任松江府兵备副使，对舍弟和几个小儿们百般为难，老朽为此心中十分不安，此番回乡，不知情况如何？”

海瑞道：“请阁老放心，如果蔡国熙无理取闹的话，即使天下人都不敢碰他，晚生决不能坐视不管，为国为己，我都要报阁老的大恩大德。”

徐阶深受感动地说道：“勿提报恩二字，那是老朽应该做的。这次回乡，能得到老弟照顾，是最好不过，但是南京和松江相距千里，恐怕老弟心有余而力不足呀！”

海瑞道：“晚生尽力而为之，尽力而为之。”

两人交谈许久。第二天，徐阶乘船而去。

数日后，海瑞审理公案。他想，松江府属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如今正好查一下蔡国熙迫害徐家的事情。他翻开案卷，见到不少是控告徐家的。苏州护龙街古玩铺商人陆曾状告徐家家人购买宋人山水画一幅，拒不付银两，反诬此画为假画，将其吞没，还将陆曾扭送吴县县衙，被打了四十大板；太湖东洞庭山农民王六保等状告徐三公子徐琮骑马驰骋农村，踏平茶树苗数百棵，撞伤其树苗主人王朱氏。王朱氏到县衙告状，没有下文；徐三公子又打击报复，将撞伤农妇能痛打一顿。余外，还有七、八份状子都是华亭县农民状告徐家侵夺田产的。

海瑞没有来得及进行调查，但看见告徐家的状子如此之多，便对徐家产生了看法。然而，心中还替徐阶解脱，认为阁老常年在京，对家中的事，很少过问，子侄家人为非作歹，不能要他负责。

但是经过海瑞的进一步调查了解，徐阶一家确是为害乡里。至于蔡国熙，不仅没有迫害徐家，而是把徐家的很多案件都搁置起来没有追究。海瑞决心要禀公而断，决不徇私，有人犯罪，概不宽容。

海瑞为了查清徐家的问题，决定到松江府华亭县去一次，亲自看看徐家的情况，并做出适当的处理。

海瑞乘轿来到徐府，徐阶率领其弟和众子侄在大门外数十步远相迎。海瑞进了大厅，和徐阶分宾主坐下。然后，诚诚恳恳地以晚辈的谦恭，向徐阶谢了当年的救命之恩和提拔之情。海瑞道：

“晚生不能知恩不报，很愿意听到阁老的教诲和托咐。不过，晚生的报恩和世俗的报恩不同，古有人冯市义的故事，想必阁老知道的，晚生倒想学一学冯。”

冯市义的故事，源自春秋战国的时候，齐国孟尝君，家里养着一些食客，其中有一个名叫冯。孟尝君曾派他到一个叫薛的地方去收债。他把债券都烧掉以后就回来了。孟尝君查问他，他说别人欠的债，不要了，买了“义”回来。后来齐王把孟尝君赶到薛地去，薛地百姓因为孟尝君不收大家的欠债，十分感激，都争先迎接。

徐阶理解海瑞说话的含义，便道：

“刚峰老弟要学冯吗？”

“是啊！”海瑞道，“阁老位极人臣，享尽荣华富贵，现在年逾古稀、子孙满堂，样样都好，就是缺少一样东西——“义”，何不补救一下呢？”

徐阶面有难色道：“刚峰老弟认为如何补救？”

海瑞道：“晚生有三件事，要求阁老办一办：第一，把四十年来侵占的四十万亩民田退还给原主；第二，把欺压良民的众子侄和家人

自行捆绑送到官府，请求从宽发落；第三，告家中诸人，今后不准侵夺良田、欺压良民。”

徐阶道：“老朽多年在京为官，不问家事，果真有这些不法之事，理应按刚峰老弟之言办理。”

海瑞道：“这就是晚生要阁老补上的“义”。当年阁老救了我一命，我想阁老是为了让我为朝廷、为黎民百姓效劳，而不是让我把性命留下来暗通关节，营私徇情吧！晚生现在秉公办事，正是报阁老的救命之恩、还提拔之情啊。”

徐阶道：“甚好。我虽是一家之长，但田宅产业诸事都由小儿辈经营，一切听命处理。”

于是徐阶吩咐众子侄和总管，把帐房等人全部找来，着手进行退还侵夺田产的准备工作的。

海瑞指定蔡国熙和松江府的官员，住在徐府，监督退田工作，足足忙了半个月，才把四十万亩良田全数退给原主。

海瑞又派人把告徐家的状子送到徐府，请徐阶一一过目。这时，徐阶才如梦方醒，将其弟徐陟，二儿子、三儿子皆送往官府，受到法律制裁。

海瑞大公无私，劝徐阶退田四十万亩，将其子弟问罪的消息传出后，应天十府一些乡官把吞没农民的田产，纷纷自动退还原主。海瑞在应天十府名声大震，穷苦农民争相传告：“咱们这里来了个‘海青天’！”

烈日炎炎，没有一丝风。牛躲在水塘里，只露出一个头喘气。街镇上看不到一个人，只有树荫下，有人摇着芭蕉扇。

从南边大道上，来了一辆驿车。拉车的三匹马，浑身是汗。驿车停在街头一幢大房子门前。从车上跳下两个人来，一个身着官服，一个为仆人模样，在房门前高喊道：

“换车，请出来人给我们换车！”

喊了数声，屋内没人回答。仆人闯进屋去，很快出来，说道：

“没人，怪事，上个月从这里走还有人呢？”

于是仆人便走到一棵大榕树下，问一位正在喝茶的老者道：

“请问老大爷，这里是不是苏州驿站？”

“是。”老者回答。

“我们老爷从松江来，要到无锡去，过去都在这里换驿车，怎么没人？”

“应天府新规定，苏州的驿站只传送公函，不转送官员。刚才有一批公函已经快马送走了。”老者道。

“混帐！”身着官服的人骂道：“应天府谁规定的？这个驿站几十年都转送来往官员，怎么能随便取消？”

“听说是应天巡抚海大人提出来的，为的是节省银两，治理苏州河。”老者道。

老者的一席话，说得两人皆哑口无言。接着仆人又问道：

“那我们老爷上无锡去，该怎么走？”

“这些天过往的客官，皆自己掏银子雇车。你们要雇车，我可以代劳。”

仆人和官员商量了一下，委托老者雇一辆车。老者进入街镇。去了约有一袋烟功夫，领着一个年轻人赶着一辆有篷的牛车走过来。

从松江驶过来的驿车返回去了，官员和仆人乘上了牛车，朝无锡方向慢慢走去。

仆人在车上骂道：“什么‘海青天’？简直是‘海黑天’，如今为朝廷办事还得自己掏银子雇车，天下越来越不像样子了。”

骄阳似火。老者又回到大榕树下乘凉，一边摇头一边扇着芭蕉扇道：

“海大人为老百姓办事，还得挨骂，这天下确实越来越不像样子了。”

苏州府取消了来往客官的驿车、招待，再加上传说海巡抚令朝廷元老徐阶退田四十万亩，一些官吏、豪强十分恐惧，有的逃往外地躲避起来。而奸诈者乘机揭发世家富豪的隐私，从而博得海瑞的好感，从而隐藏自己巧取豪夺的田产。苏州府一位号称滚刀肉的富户，靠诈骗发家，夺取民田数千亩。他看到海瑞清丈土地，实行“一条鞭法”之后，感到自己所夺之田恐怕难以保住，便先发制人。亲自写状子控告苏州首富，原任知府李必先夺占民田一万二千亩的罪行。海瑞派官员核实，果然有此事。海瑞批复，其一万二千亩田归还原主，并将李必先投入狱中。李必先家人不服，多次上告朝廷。

不久，给事中戴凤翔上疏弹劾海瑞庇护奸诈歹徒，欺凌有权势的官僚地主，猎取名誉而败坏朝政。给事中舒化也上疏弹劾海瑞为官迟滞而不明白政体，应该免其巡抚职务，可安置为清闲官职。

穆宗读了上述弹劾奏章，先是下诏奖励海瑞，敢于摧折有权势的豪强，抚恤穷弱民众。过了数月又令其改任督南京粮储。

海瑞任巡抚刚到半年，就被免职，老百姓听说海瑞改任，哭声载道，不少人家绘制了海瑞的像，供起来，祭祀他。

海瑞启程将要赴南京上任时，适逢徐阶的老对手高拱被穆宗召回朝廷主掌吏部，而平素高拱怨恨海瑞，过去海瑞支持徐阶排挤高拱之

事一直耿耿于怀。那是隆庆元年(1567年)的事，大学士徐阶被御史齐康弹劾，齐康当时是高拱的门徒。海瑞上疏说：

“徐阶侍奉先帝，没有能够阻止先帝迷信神仙、大兴土木的谬误，畏惧退缩而保全官位，的确也是有的。然而，自他执政以来，为国忧虑而勤劳，气量大能够宽容人，很多人都拥戴他。齐康身为御史某为当鹰犬，攻击陷害好人，其罪又超过了高拱。”朝廷不少文武官员认为海瑞的上疏是对的，接着张居正联合宦官冯保弹劾高拱，高拱只好请假回乡养病。高拱复出后，首先想到如何报复海瑞上疏之仇，于是将海瑞的粮储职务合并到南京户部，而粮储之工作已经有人兼管。海瑞得到消息，赴南京上任时，无任可上。于是海瑞只好称病辞官，返回故乡。

海瑞不禁愤然慨叹道：

“余垂成中止，奈之何！奈之何！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

海瑞从应天回到海南岛琼山，开始过着清苦的闲居生活。他尽管在外为官多年，却从来没有添置过田产，仍是靠祖田十余亩度日，身边也只有年已古稀的老母亲和几个侍妾。然而朝廷里怀念他的大小官员却很多，在应天、苏州、松江很多官员和穷苦百姓，都念念不忘“海大人”、“海青天”。

正式向穆宗推荐海瑞出来做官的人也很多，一遇见难办的棘手案子，都说：“有海大人在就好了！”但是，这些奏疏送到穆宗手里的并不多，有的送到吏部，转到首辅张居正手里，就没有下文了。这就是说，有的人明知道海瑞有能力有气魄，就是横加阻挠，不愿意让他出来做官，希望海瑞老死在海南岛算了。

这些情况，远在万里之外的海瑞不完全知道，但是他的同乡，在北京的梁云龙却常常听到，他曾写信告诉过海瑞，海瑞却没有明白的表示，好像无动于衷。

梁云龙回海南岛探亲的前三天，内阁首辅张居正派人邀请他立刻随同前去，说有要事相商。

张居正道：“你是刚峰兄的至亲。而我和刚峰兄情同手足，因此我们也就应该和至亲一样。”没等梁云龙回答，又道：“此番你南下探亲，我托你代为向刚峰兄问候。如有适当机会，我一定请圣上让他再来京中一展抱负。”

梁云龙道：“我这个亲属过于耿直，本性难改，恐怕妒忌他的人太多。”

张居正道：“那没关系，现在虽然有人反对他当官，可是，我准备力排众议，荐举他来京出任礼部尚书。但是，你要劝他少管些闲事，少得罪些人。”

梁云龙道：“依太翁之见，你要他少管什么闲事呢？”

张居正道：“譬如科举啊！刚峰兄今后也不必过问。如今京城里流言蜚语不知多少，刚峰兄切莫卷进这个漩涡。”

到这时，梁云龙已经听明白了；张居正举荐海瑞进京为官，是为他儿子会试中进士着想。去年会试，张居正的次子懋修考卷一般，很多考官反对，未被录取。今年会试，三子嗣修又要参加，欲将海瑞调进京城为官，是和海瑞来一个心照不宣的交易：那就是张居正不再阻挠海瑞来北京，海瑞对张居正的所作所为不加干涉。

梁云龙思考一番，道：“刚峰兄为人相当固执，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我想太翁一定也是深知的。他远在海南岛，对朝中大事不

一定知道多少。有关科举等事，我看不和他谈为上策，一谈反而会弄出风波。”

但张居正还是要他回海南岛试探一下海瑞的口气。梁云龙回到海南岛见到海瑞，两个人在一起散步谈心，两个多月过去了，梁云龙没有谈张居正所委托的事，到即将回京时，梁云龙才把张居正托他带的口信告诉了海瑞，海瑞道：

“请你转告张太翁，礼部尚书我也不当，儿子参加会考中进士我也不会干涉，请好自为之。”

梁云龙回京之后，立即拜见张居正，将海瑞拒不为官的话说了一遍。张居正走过去，把书案上放着的保荐海瑞做礼部尚书的奏疏扯得粉碎。

后来京城会试时，众考官觉得把张嗣修取为头名状元，恐怕引起人们的议论，只好取为第二名探花。

而海瑞在海南一直生活了十六年。直到张居正病死，才有人出来向朝廷推荐海瑞。

海瑞自隆庆四年(1570年)四月，离任回琼山闲居，到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复官，共十六年。海瑞过着贫苦的农村生活。除了他的叔侄女婿梁云龙自京回乡探望他之外，也有一些京官来过海南，探察海瑞的生活情景。

一位御史来到琼山海瑞的茅舍，看望海瑞一家。海瑞很高兴，立刻命仆人去镇上买酒、杀鸡，煮玉米，热情款待。御史与海瑞对食，海瑞为其频频斟酒。居室内仅竹桌、竹椅而已，冷落凄切，非常寒素。御史叹息离去。

而海瑞在家乡的田园生活却过得很愉快，仍然身居山林，心念国事。有些地方官员仰慕海瑞的业绩，纷纷写信到海瑞的家乡，询问有关政事，海瑞一一认真复信。曾写过《奉分巡道唐敬亭》、《复唐敬亭》等信，信中内容，都较为全面地论述救民的关键在于清丈土地、平均赋役的道理，详细谈论了丈量土地的办法，以及自己在淳安、兴国、应天丈田的经验教训。还有《启殷石汀(正茂)两广军门》等多封书信，建议并提出防御倭寇的策略和方法。他论述政事，有问必答，直言不讳。对官军不能平寇，官吏不能救民的现状，异常愤慨。海瑞在家乡还整理多年撰写的文稿，书写有关农事、丈田的序文、墓志铭等。他还刻印续集两卷，收录兴国知县任后十余年来有关时政得失的奏疏和杂文。海瑞闲暇之余，还读了不少经史，去海口镇郡学等地讲课。海瑞在乡十六年，生活得很紧张、很充实，受到家乡百姓的爱戴。很多穷苦百姓，仍然称他为“海青天”。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故。时过不久，由于宦官冯保被逐，抄家时，金银珠宝甚多，神宗怀疑张居正贪污，不少言官上疏弹劾张居正，其家产被夺，封爵皆被削没。并且召回被张居正迫害的诸臣，其中之一就有海瑞。

万历十三年(1585年)正月十日，朝廷正式下令，起用海瑞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二月二十日又改为吏部右侍郎。海瑞接到圣旨后，即由家人海安陪伴前往应天上任。端午节前一天，他们乘船来到上新河。这是南京城外的一个水路码头。

岸上，柳绿花红，街市喧闹不已，河上船只扬起白帆，往来如梭。小镇上的一切都显得热闹、和谐。

为了免得惊动沿路官府，应酬客套，一路上“琼山县海府”的灯笼也没有悬挂。海瑞穿着青衣小帽，遇见的人，都以为他是个乡下老秀才，决不会想到这老头子是朝廷的吏部侍郎。

海瑞这一次出山，有些出乎意料之外，七十二岁了，身体又不好，往往终夜不能入睡，还能撑持几年？虽然有这些消极想法，但是一想到圣上降旨，社稷需要，便毅然前往。他曾经对人说道：“主上有特达之知，臣子不可无特达之报。区区虚袭，奚取焉！”

海瑞这次上任，走得匆忙，未曾准备好朝服，十六年前的朝服已经破旧得不能穿了。只好着青衣小帽，到岸上走一走。一边散散心，一边在这里等待接他上任的南朝的官员。在进街口的栅栏旁边，有个小小的茶馆，窗明几净，收拾得很干净，桌子大多都空着。海瑞进入茶馆，要了一壶浓茶，慢慢喝起来。

对面有两位茶客，一边喝茶，一边闲聊，一位说道：

“听说房御史的儿子要娶第十三房妾了，这么多妾可够累的呀。”

“十三个算什么？严阁老的宝贝儿子严世蕃娶七十三个美妾，还不够用呢，还要到宫女中去打食吃。”

“这第十三房妾是谁家的女儿？”

“听说就在上新河，是一家小店铺老板的独生女，才十五岁。”

“说这个女孩不同意？”

“是不同意，房御史的儿子都是四十多岁的老头子了，娶一个小女孩，怎么能行。说这个小女孩昨晚上吊自杀，被救过来了。可怜，可怜！”

……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想到上新河还有这等冤案，严家父子横行朝廷，严世蕃被诛，世人皆知。而如今还有人胆敢学严世蕃，抢男

霸女，实在可恶。一路上，他还听说，近年来，南都的官员们毫无法纪，公开受贿，日夜在秦淮河、钓鱼巷的妓院里鬼混。他此番北上，想把南都官场的坏风气整顿一下。可是听了茶客的闲谈，现在官场的风气比预料中似乎还要坏一些，房御史只是个七品官，其公子竟要讨十三房小妾，那些大官腐败到什么程度，便可想而知了。可是，这些坏风气要整顿好，谈何容易？假使睁一眼、闭一只眼，让那些官员仍旧胡作非为，那么，自己这一次出山又有什么意思呢？

海瑞喝完茶，信步回到船舱内，海安见主人情绪不好，便上岸买了三两金陵大曲，海瑞就着红烧鱼，喝了就睡，晚饭也没有吃。

海瑞早晨醒来，第一句话就说道：

“那位十五岁的小女孩不知怎样了？”

海安听了，不知是怎么回事，摸不着头脑，便向主人询问一番。海瑞便将在茶馆听到的话说了一遍。海安听了也为那位小女孩担起心来。海瑞道：

“趁南朝官员没来迎接时，应当打听一下，上新河是否有这个人，看看我们能否帮她一下？”

海安自愿前去打探。早餐后，海安走进街镇，四处打听为房公子当十三房小妾的家。恰好，问到第三个人，是个老者。他说，他家的邻居老张头，有一个女儿，名叫锡珍，今年已经十五岁了，长得颇有姿色，被房公子看中，要娶其为十三房小妾。吩咐张家做好准备。第七天上家来抬人，今天是第六天。前天，锡珍想来想去，没有法子逃出房家的手心，夜里便在灶屋里上了吊，幸亏老张头发现得早，救了下来，现在大伙看着，深怕还要上吊。

海安听他介绍之后，又亲自到老头家去看一看。只见他家门开着，屋里人满满的，一个小姑娘倒在一个老头怀里，已经哭得声嘶力竭了。其余的人看来全是邻居，都在劝小姑娘想开些，千万不能寻短见。

海安回来，将老张头一家的情况向海瑞做了详细介绍。海瑞道：

“看来这件事我要管一管了。这个女孩，房公子硬娶过去，恐怕也会寻死上吊，人命关天，我要救下这一条小命。”

海安道：“当官的都像你，老百姓就有好日子过了。可是，已经到了这般局面，你又能怎么样呢？”

海瑞思考片刻道：“我写一封信，你给老张头家送去。待明天房公子来抬人时交给他们。估计这封信，可以救下这个小姑娘的命。”

说着，海安拿来笔墨砚，在船头的饭桌上展开纸，海瑞写了如下的一封信：

侍御房大人台鉴：

令郎娶新娘的喜讯，已经传遍南京城，我刚才到达上新河，也知道了这件事。没有来得及前来祝贺，请原谅我的失礼。

大人在南京也是很有名望的人，因我觉得你为令郎娶新娘，不宜过分简单草率，特别是新娘，尚没有想通，这样就会被人们传为笑柄。

娶新娘的日子能否延缓几天，等待新娘同意后，再行迎娶。到举行花烛之礼的一天，我认为应该多邀请些客人，大家热闹一番，我也准备送一点薄礼，并亲自到府上向你道喜。

刚峰于上新河

即日

海安拿着海瑞的亲笔信，匆匆赶到老头家，将信交与老张头道：

“我和我们老爷刚从海南岛来，我们老爷听说了你家的事，很关心。我们老爷与房公子的父亲房御史是多年的老朋友，他特意给他的

老朋友写了一封信，让我送来。如果明天房公子来抬人，就把这封信交给他们看看，恐怕就不敢抬人了。”

老张头接过信，半信半疑。有人问海安道：

“你们家的老爷是谁？”

海安道：“在信上写着呢，凡是识字的一看就明白了。”

海安走后，老张头找来一位老秀才，将信念一遍道：

“这个刚峰来头不小，他反对强娶民女，是锡珍姑娘的救命恩人来了。”这时，张老头一家转悲为喜，锡珍姑娘也止住了啼哭。

第二天，房公子带着四名家丁，两名丫鬟，后面是一顶花轿，到老张头家要来抬人，老张头道：

“人，现在抬不去，有一封信拿回去交给你家老爷看看，如果你家老爷同意，你再来抬人也不迟。”

房公子见张家不让抬人，本来想要抢回去。看见信上写着“刚峰”字样，这刚峰是谁？一时想不起来。忽然想起有人说，最近海瑞要来南京当官，此人莫不就是海瑞？于是拿着信，率领家丁、丫鬟回到府内。

房公子将信交给父亲房寰看了一遍，房寰道：

“你要上天，我也让你上天，你要入地，我也让你去入地，讨妾要讨多少，我都依着你，就是怕你惹海老头了，你偏偏去惹了他，看来我们房家要倒运了。”

“父亲大人。”房公子哭丧着脸道，“我根本没去惹他，是他找上门来干涉儿的喜事！”

“你个畜牲。”房寰骂道，“人家女儿不同意，强娶民女，当然有人要管，海瑞不管，别人也会来管，今后最好别干这类事！”

“那这件事，如何是好？”

“识时务者为俊杰。”房寰道，“你和我一起到吏部拜见海瑞承认过错就是。”

数日后，房寰真的带着公子拜见了海瑞，交代了强娶民女的经过，承认自己教子无方，请求海瑞把他的儿子依法惩办。

海瑞立即派人将房公了押解到应天府，令应天府与上元、江宁两县严厉惩办。同时告诫房寰，回去以后，仔细想想自己在任职期间干了哪些坏事。房寰听了心中十分恼怒，口中虽连声喏喏答应，背转身来又大骂海瑞无情无义。

在海瑞的关照下，应天府率同上元县、江宁县公审了房公子，不仅打了四十大板，而且革去秀才头衔。消息传开，大快人心。那些贪官、恶少、土棍个个都吓得心惊肉跳，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嚣张跋扈了。

有人告诉张家父女，那位救锡珍之命的大官就是“海青天”，他们惊异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们去寻找“海青天”表示谢意，海瑞已被南都来的官员接回应天上任去了。

房寰被斥责，儿子被制裁，恼羞成怒，便勾结一批贪官联名上疏攻击海瑞。房寰等人的攻击，海瑞毫不理会，更加雷厉风行地整顿南京官场的风气，经常有贪官污吏被查办。

南京城中，老百姓听到“海青天”被诬蔑和攻击，个个都替海瑞鸣不平，特别是一些书生，受房寰的迫害最大，都纷纷揭露房寰的罪行。有正义感的官员们也纷纷上疏，要求朝廷对毁谤“海青天”的房寰从严惩办。朝廷在这一股压力下，最后终于把房寰削职为民。

万历十三年(1585年)冬，就在房寰被削职为民之后不久，海瑞被提升为南都察院御史。成为正三品的官员。

海瑞官职晋升之后，再一次发出告示。严禁向新任官员馈赠礼物，并带头把送来的各种礼物一一退回。与此同时，他还明令各级官员禁止向百姓摊派物品。为了惩治贪污腐化，他主张不能以钱赎罪，要恢复明太祖所定的旧规，对违反者用廷杖重责。

南部御史这个职位看起来比吏部侍郎要高。但南都的衙门权力不大，事情也不多，可海瑞总想在晚年再多做一点对老百姓有益的事情。反正给他官职，他就行使职权，一点不肯马虎。有时候碰了钉子，满肚子牢骚，说道：

“我已经七十岁了，不是当官的时节了，世道不对，再做下去也没有意思。”但是这样说了以后，气就出了，仍旧精神饱满地去干工作。

可是有些人犯了法，被海瑞查处之后，一些中下级官员，不肯认真办，尽是和你拖，有些事情是要立刻办的，他们也拖，一直拖到事情无法挽回为止。

公事不顺利，心情也不愉快，海瑞感到自己衰老得很快。头发脱落得几乎快光了，牙齿也掉净了。这个性格倔强很少考虑自己家庭的老人，现在常常感到孤独和寂寞，常常怀念死去的王氏夫人和童年夭折的儿子。

最使海瑞伤心的事情是立嗣这件事。人生七十古来稀，已经到了古稀之年，尚无子嗣，一些亲戚朋友劝海瑞早一点立嗣，海瑞自己也在考虑这件事。海瑞的几个侄子并不争着要做海瑞的儿子，因为海瑞没有多少产业可以继承。海瑞是明代开国以来海南岛上出生的最大的官员，但家中只有二十亩田。海瑞的几位嫂嫂和弟媳对立嗣之事，并不热心，所以始终都没有定下来。

不久，海瑞患病卧床不起了。老百姓听说，“海青天”身体不好，都很不安，盼望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再为老百姓做些有益的事。可是海瑞的病始终不见好转。

在南都任职期间，海瑞有两位朋友，一个是金都御史王用汲和户部员外郎苏民怀，他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谈。

有一天，海瑞召人请来了王用汲，推心置腹地说道：

“我自认为是一个倔强的人，现在却力不从心，倔强不起来了。但是马上和你们分手，还不甘心。如果过些日子，身体能硬朗些，我打算回海南岛去养病，病养好了再回来任职。”

王用汲听了，满眼含泪，不知说什么为好。

海瑞又道：“我这一生对朝廷、对老百姓，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因此，我每想到这一点，就异常惶恐。惟一可以自慰的就是我嘴里怎么说，也就怎么做，不顾虑自己的生死得失。做应天巡抚时，有些人攻击我志大才疏，实际上就是这些人处处和我做对，要不是如此，有些事情是可以办到的。”

海瑞又说道：“我性子是急躁了些，脾气也不好，有时很固执……”

王用汲劝海瑞不要太激动，安心养病，别的话下次再谈。海瑞就没有再说，但以后也就一直昏迷不醒了。

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十四日，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里，海瑞与世长辞了。临终前三天，兵部送来的柴薪费多算了七钱银子，海瑞还让人如数退了回去。

海瑞去世时七十三岁，守护在他身边的除了家人之外，还有王用汲和苏民怀。他的遗容和生前一样，很少改变，清瘦而稍微显得有些严峻。

南京的六部衙门听到海瑞逝世的消息，立刻派人快马飞报朝廷和海南岛琼山县海瑞的老家。南京的老百姓听到消息都十分悲痛，有的人忍不住放声大哭。

南都礼部和应天府派人帮助王用汲、苏民怀布置灵堂，料理后事，看到海瑞的遗物仅有《贞观政要》、《苏东坡诗文集》等一竹筐旧书和两藤箱衣服，除一件朝服之外，袍子、袄子和里面的衬衣没有一件不是经过多次缝补的，有的已经看不清原来衣料是什么颜色了。他们都知道海瑞为官清廉，但是还不知道他在生活上刻苦到这般地步。

到灶间去看看，也只有半缸最糙的粳米，和一些干菜、咸菜而已。清理遗物时，只有放衣服的藤箱里，有一包银子，一共是二十两。查问家里人，是否别处还有银两，说是只有这一点。大家为海瑞拿出几百两银子，料理丧事。

海瑞出丧这一天，南京的官员和百姓来参加的很多。海瑞故乡琼州府也派了一个同知随同海瑞的亲属一起到南京，参加了殡礼。送葬的行列，长达数十里。

朝廷对海瑞的评价较高，谥号为“忠介”，肯定了他对嘉靖、隆庆、万历三朝皇上的进谏都是赤胆忠心的，肯定了他的不阿谀奉承是可贵的人格。

人民忘不了这位刚正不阿、为民请命的“铁汉”。他以卑抗尊，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相谏，骂皇帝而不怕杀头；他反对贪官污吏，同豪强权贵进行斗争而不怕丢官解职，他为官一方，兴修水利、清丈土地、发展生产、改革赋税、清理冤狱，尽力减轻人民负担而不顾个人安危；这正是几个世纪以来他受到人民爱戴被称为“海青天”的主要原因。

海瑞那刚正不阿的精神，以及为官清廉、不徇私情的美德，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称颂。